

漢譯世界名著
現代歐洲外交史

R. B. Mow
王造時



R. B. Mowat 著
王造時 譯

漢譯
世界名著

現代歐洲外交史

至一九二五年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序

莫瓦特先生的學歷及歐洲外交史的價值，已在上冊中介紹過了，用不着再說。

這裏我要提醒大家的便是現在關係日益密切，各國的內政與外交不能分開，做一個國家的公民應該有相當的外交常識，尤其是居於國際風雲險惡的中國人，更不能不了解國際的背景與現勢。因此我打算多介紹幾本關於近代外交史的書籍。本書敘述至一九二五年止，自彼時至現在又快要十年了，其間國與國的重要交涉寫起來又够成一鉅冊，想治學甚勤的莫瓦特先生不久當有以示我們罷。

王造時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五日

原序

大戰開幕以後的十二年中，歐洲對於和平的和公平的國際系統，已有長足的進步。萊茵左岸的德國地方以及右岸三十一英里以內的區域，都由凡爾塞條約劃爲非軍事地帶了。洛加諾協定穩定了法國東部的邊界，並且把亞爾薩斯與羅連從國際角逐的場所搬出來了。歐洲被壓迫的民族解放了，現在形成了獨立的國家或加入了他們的祖國。小協約對於中歐這些新國境的鞏固，很有貢獻。國際聯盟看管着各國土地的完整，並且是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高等外交的常設組織。國際常設法庭正在繼續造成一種法律學，這種法律學將來一定可以得到逐漸加增的信任。種族的感情，雖然還是一個紛亂的因素，但比較十九世紀的下半期無疑是減少了。軍隊太大，但德國已經裁軍了；其他各國不能永久反抗開通的人類的願望與良心。

有一方面，歐洲系統退後了一步。關稅比較十九世紀自始至終是加多了，並且加高了。歐洲政

治家第二步的偉大工作，便是交涉國與國間的關稅協定與關稅同盟。根據一九一九年及其後的條約所訂關於貨物自由通行各國界的協定，在經濟上很有助於歐洲的團結。國際勞工局之收集並散佈情報及其關於協定之磋商，也是在那裏促進國際的經濟合作。

不能否認有許多急迫的國際衝突的原因仍然存在；但是無論如何，公允和平解決他們的方法，不但存在，並且馬上可以運用。世界上雖分成許多主權國家，但是有一種國際輿論的存在，這種輿論是大家所公認與愛國心並不相反的。文明人類願意和平，並且願受指導。

指導，政治家的手腕，比從前更加重要，因為世界仍是在和平時代的邊緣上徘徊。

在十九世紀中有些高潮，其中最激動的要算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及一些野心的戰爭，如一八六六年的普奧戰爭，及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便是後一類的最慘痛的。不過就全體看來，因為有歐洲協調的維繫，政治的建築還沒有崩潰；這種歐洲協調至少一部分是基於君主們的相互了解。維克多利亞皇后的信中，便充滿了君主階級的團結的例證。

弗列羅 (Gulielmo Ferrero) 所謂的朝廷國際 (International of Courts) 已經消滅了。

『那種辦法是歷史的惟一的奇事。』(註一)公衆所信託以執行政事的政治家現在必須單獨負責，不是如從前他們與他們的君主們共同分負。如果他們能夠領導，世界便會跟着來。雖然許多沒有了，但是還有許多存在，並且雖然他們現在的力不比從前可以推動天地，他們卻還是他們。

莫瓦特

牛津聖體學院

一九二七年一月

附註——我要乘這個機會感謝發見雜誌(Discovery)的編輯，因為他允許我把在該誌已發表的兩篇論文的重要部分在第十章內重新寫出來了。

(註一) "An International that has disappeared," by G. Ferrero,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Aug 16, 1924, pp. 314, 336.

目次

第一章	倫敦公約	一
第二章	土耳其的參戰	一三
第三章	意大利的參戰	二七
第四章	君士坦丁的割讓	四七
第五章	戰時違禁品	五七
第六章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的美國	七五
第七章	巴爾幹半島的外交	九三
第八章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的和平運動	一〇七
第九章	俄國的崩潰	一二三

第十章	美國的參戰	一四五
第十一章	困苦中的奧國	一六一
第十二章	巨哥斯拉夫人	一八七
第十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一九五
第十四章	停戰	二〇五
第十五章	巴黎會議	二二七
第十六章	和約的簽字	二四九
第十七章	凡爾塞條約	二五七
第十八章	補充條約	二八七
第十九章	威爾遜總統的失敗	二九五
第二十章	波羅的海各國	三一三
第二十一章	會議外交	三二九

第二十二章	華盛頓會議	三三七
第二十三章	魯爾	三九七
第二十四章	德國的破裂與挽回	四一三
第二十五章	陶斯報告	四二三
第二十六章	倫敦會議	四四一
第二十七章	俄羅斯	四五五
第二十八章	土耳其的復興	四六七
第二十九章	洛桑條約	四八五
第三十章	洛加諾	五〇三
第三十一章	歐洲政團	五二七

現代歐洲外交史

——（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五年）——

第一章 倫敦公約

『歐洲失蹤了，』——這句話是馬勒杜潘 (Mallet du Pan) 在一七九二年說的，那時正當法國革命戰爭爆發的時候，打破了中歐和西歐三十年的和平局面。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軍侵入比利時，必然引起一場歐洲大戰的時候，許多人又覺得歐洲快要失蹤了。四十餘年來歐洲列強早已嚴修邊防，壁壘森嚴的互相窺伺着。有時候人們也胡亂地猜想道：這些強有力的軍隊，再加上近世科學的可怕而不可測的無限寶藏，假如一旦火拼起來，不知要發生什麼結果。然而，聰明伶俐的歐洲公衆，大抵不肯自尋煩惱去探討那種可怕的將來，那也許永不會發生。人民既然如此，他們的政治家亦然；他們只以從事於日常公務爲滿足，只知有危機發生時再去解決，並且希望下一

次危機也能解決。不消說得，在各國參謀部裏，也有些冷靜敏銳的軍人，非常注意一個歐洲危機中間可能的戰事發展。但是軍界以外，一旦戰爭開始，大家對於將來便感到萬分渺茫。只有一件事是一定了的，就是歐洲的舊秩序已經崩潰了。德國已經『簡直向全個歐洲挑戰，要歐洲順從她的命令，並且開動了她的強大軍事機器。』（註一）

在此後四年中，國際官場無一事可作。所謂『國際官場』者，乃指那些公僕，雖然由他們各自的政府所僱用和給薪，他們大部分的時間，實在是銷磨於料理歐洲（包括他們本國）的事務，以求共同的幸福。這種國際官吏是那些外交部長及各大國的那些高級外交人員。他們的例行公事，他們的日常工作，是爲他們本國而做；除了這種例行公事以外的任何事件，在平常，都具有國際的價值，並且是鞏固各國睦誼的。可是，在這次歐洲大戰中間，每一交戰國的全部資財，莫不牽涉在內；沒有安全的邊際，戰敗使不免有山河破碎版圖變色的可能。政治行動的普遍原則便是各謀自全；每一個政治家和外交官的惟一任務，便是盡力爲國，充分運用本國的力量，並與別國構訂最便利的

（註一）

紐約泰晤士報，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第十二頁。

結合。

這些戰鬥員加入這場大戰，根據的是一種性質簡單的外交契約。德與奧——後來所謂『同盟國』——是由一八七九年十月七日訂的兩國同盟 (Dual Alliance) 的條款聯合在一起的。他們約定了，他們當中如果有一國被俄國攻擊，其他一國必須前來協助。(註一)到了一九一四年，這個條約的原文已經公佈了二十五年。這是一個耐久的外交文件。根據這個條約的條款及戰爭時所訂的幾種補充的協定，德奧兩國共同作戰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德人也希望，但是大概並不預期，那三國同盟 (Triple Alliance) 會使意大利政府加入同盟國一邊。這著名的條約，使三國以外的歐洲政治家和公衆焦心了許久。牠是祕密的，牠的條件從沒有漏洩過；幹練的著作家和政治家所作最精銳的猜測，沒有引起承認或否認。那些知道牠的條款的人——自從牠一八八二年創訂起爲數當不在少——也都守口如瓶。所以一九一四年八月一

(註一) 原文在 Pribram: The Secret Treaties of Austria-Hungary (1925) 1, 25.

Cp. Mowat,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 (1923), p. 239

日，聖喬立諾侯爵 (Marquis di San Giuliano) 代表意大利政府聲明：因為這次戰爭不是自衛的戰爭，按照三國同盟，意大利沒有加入作戰的義務；那時候凡屬同盟國以外的人聽見了，都是如釋重負似的（雖然他們的好奇心並沒有滿足。）（註一）

德國在大戰前和土耳其政府締約到了什麼程度，至今還不很明瞭。或許在現今著稱的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的協定以前，沒有其他條約，不過『在大戰之前，早已進行談判了。』（註二）桑特爾將軍 (General Liman von Sanders) 於一九一三年十二月赴土耳其時，曾挾有一種軍事的使命，並且曾經奉命去指揮在君士坦丁鎮守的第一軍團。（註三）吉馬爾 (Djemal) 在他的回憶錄裏面承認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告終時，少年土耳其黨人已認定『協約國』是他們的仇敵，而德意志是他們的朋友。（註四）

（註一） Grey to Bertie, Aug. 3, 1914, in *Collected Diplomatic Documents* (1915), p. 106

（註二）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p. 107.

（註三）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1919), p. 41

（註四） Djemal op. cit., p. 69; Grey, *Twenty-five Years* (1925), I, 128.

在『協商國』(Entente)(稍後普通叫做『協約國』(Allies)方面也，有若干契約，但並沒有規定任何共同作戰的滿意方法。總共計有三種協約：法俄，英日，和英葡。那一八九四年的法俄條約，與三國同盟一樣，也是祕密的。牠底內容直到一九一七年纔公佈。牠規定法俄兩國，倘有一國被德國攻擊，必須互相全力援助(註一)。

當德國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對俄宣戰時，法國根據一八九四年的契約，自動地捲入了漩渦。關於其他兩種條約，英日的那種規定假如有一國被兩國或兩國以上攻擊時，兩國必須互相全力援助。英葡的那一種是防守同盟的條約，訂於一六六一年(註二)。牠經過拿破崙戰爭的試驗，並且除掉一八二六年至三四年米居里騷擾(Miguelite troubles)的時期以外，一向安然沒有引用過。如果英國不加入大戰，英日和英葡兩條約都無關係。英國加入大戰，究竟是爲其他什麼條約呢？這個問題的答覆絕對確定。英國對於法國或俄國都沒有條約的拘束。一九〇四年的協商，乃

(註一) Mowat,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p. 253

(註二) 戰爭一開始，葡萄牙立即承認她在『老同盟』下的義務。

是規定英法兩國對於埃及、摩洛哥和紐芬蘭的關係。一九〇七年的英俄協商，乃是規定英俄兩國對於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的關係。英法及英俄間的明顯衝突原因既然除去，也就沒有什麼可以隔閡他們彼此間的良好諒解——這就是協商的意思。這種協商自然包含有英法俄三國在歐洲危機中，要考慮任何種互相援助的提議的意思。牠根據的觀念是——在國際事件上，三國的利害實際一致。所以英國外交大臣格萊（Sir Edward Grey）能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他的著名演說中，用十分的正確和真實宣稱，這種協商不折不扣構成了一個『外交團體』（Diplomatic Group）。

根據協商，三國既應在外交上合作，甚至擔任共同的軍事行動，那麼每一國的參謀部似乎就有預備這樣一個可能的事變之責任。三國的參謀部常在機秘地策劃，準備一個不能逆料的將來。但是這種計劃——許多是很不相容的——決不能視為構成了什麼契約或諾言。必須英法兩國內閣決定了合作作戰，然後英法兩國參謀部人員的談話，纔有效果。法國保羅肯邦（Paul Cambon）與英國格萊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所作同樣的通牒中，明言兩國政府

保留他們決定合作與否的自由。(註一)英國與法國、俄國和比國的參謀部人員彼此間會交換過意見，現在是人人知道的事實。但竟稱從這種談話中產生的假定辦法是『協約』(Conventions)那是十分不確的，雖然俄國的外交家有時候隨便這樣指稱。

• 在格萊於十年後寫的回憶錄裏，他說得更爲明白。他說：

『我和肯邦彼此間的光榮的諒解非常明白，即是英法兩國軍事當局間並沒有通過什麼東西，可以限定或包含任何義務，要任何一國政府承擔。這個諒解就是在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前的那個煩惱苦悶星期當中也光榮地保守着。』

雖然如此，協商至少把英法兩國團結在同情和利益中間，使英國在道德上，（並且像一個自尊的國家，必然）要在歐洲的危機中，給予法國積極的援助。該協商所未確定的惟一問題，乃是英國要到什麼時候纔能出力相助；但她遲早會予以援助那是一定的。(註二) 法國爲了英國，也同樣爲了自己的利益，集中了她的艦隊於地中海，以便英國遣派少數皇家海軍(Royal Navy)巡邏這個海面，而集中她的大艦隊於風雲緊急的北海。但是既把她的戰艦集中於地中海，法國在大西

洋和英國海峽的防禦就等於零。如格萊在他八月三日的演詞中所說，英國怎麼能希望法國繼續防守地中海而遺下她的西北岸『完全沒有防備』呢？他說法國『有權利要知道』英國怎樣做法。英國至少能夠做的是『如果德國艦隊駛入英國海峽或穿過北海來攻擊法國的海岸或船隻的時候，英國艦隊必全力予以保護』。這就是格萊在八月二日允許法國大使的任務。這樣的一個任務，差不多使英國勢必至於以海陸軍援助法國。德國政府的確允許過，如果英國保守中立，即不去攻打法國海岸。但是除非法國迅速地屈服於德國的猛擊之下，在戰略上德國艦隊差不多必然要去攻擊法國北岸。如果這樣，英國的海軍勢必出而抵抗他們。這樣便發生戰爭了。所以協商的存在，既必然地造成了英法兩國遲早間的合作，那麼在大戰前的幾年中，兩國沒有訂立及公布一種

(註1) Grey, Twenty-five Years I, 83, 94-8, 286-7, 被批評 Siebert 與 Schreiner 所著 'Ehentliche Diplomacy and the World' 一書 p. 78. 內所用「協約」(Convention)。

(註11) Cp. the famous Minute of Sir Eyre Crowe, July 24, 1914 in No. 101, pp. 81-2, of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 of the War, Vol. XI (1926.)

正式的同盟條約，實在是一件大可憐的事情。因為這樣，德國便知道，假如她攻擊法國，英國定將從頭起就加入作戰。這樣也許可以使德國不敢與兵動武。情形既是如此，英國一定要加入戰爭，那麼德國所能希望的，只有希望英國加入太遲。一位最深刻的歷史家馬漢（Admiral Mahan）在八月三日說道：『據我的判斷，只要對於情勢有正確的領會，便可以斷定英國是要立刻宣戰的，否則不管協商的文字如何，在精神上她是違背了協商的義務，不能見信於將來一切可能的與國。』（註一）英國早已決心依照協商的精神去做了。

一八三九年四月十九日所訂的那個著名倫敦五國條約（Five Power Treaty）不能視為約東協約各國在一起的一個普通外交文件。卻是牠對於決定英國宣戰的時辰，有極大的關係。沒有這一個保障比利時中立的條約，英國政府也許會遲疑數日，數星期，甚至於數月之久（雖然這點似乎不致於）。（註二）但是當德軍侵入比利時，英國必須在那地方與那時候作戰。比利時的抵抗

（註一）見 Times, Aug. 5, 1914.

（註二）這是格萊爵士的見解，見 Twenty-five Years I, 285, 格萊為援助法國的問題，準備以去就爭。

德人，也是爲着該條約。併在該條約內的附約第七條，限定了比利時須『遵守』（Observe）她的中立。沒有這種法律上的義務，沒有人會責備比利時，如果她寧願選擇那條和平的康莊大路，與其去抵抗德意志軍國主義怪物要蹂躪的暴怒。

所謂協約國方面的『外交戰線』（Diplomatic Front）就全體看來，在大戰的第一月裏可說是一樁權宜之計。可是他們的外交家並沒有偷懶。九月五日，大家都準備去簽字於那個團結的條約，如果沒有這個條約，各國政府要想共同作戰，那是徒然的。這個倫敦公約（Pact of London）於九月五日由格萊保羅肯邦（Benckendorff）代表英法俄三國簽字，規定三國『在此次戰爭期內，不得單獨媾和』。三國政府允於和議開始談判時，任何一國未經其他兩國各個預先同意，不得提出和平的條件。』日本於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九日加入這公約。她的地位很微妙：英國政府覺得必須通知她，謂她的幫助固所歡迎，惟『她的行動須有限制，並且她期在取得的德國領土，不得逾過某種範圍。』因爲澳大利亞和紐絲蘭以及美國對於日本在太平洋的目的很懷疑，所以這點必須弄清楚的。（註一）

『一九一四年九月五日英國與法俄簽訂的條約（按即倫敦公約）人家認爲足資證明是英國要使她的協約國堅持到底的政策。』（註二）其實是法俄兩國逼英國簽這契約的。德國的宣傳想造成這種空氣，說這公約是英國政府欲使其他協約國在大戰中欲罷不得的一種計謀。英國政府自然不屑去駁斥這種攻擊，聲明是俄法兩國堅持要訂立這公約；因爲如果這樣一做，會引起協約國自己內部的不安與猜疑。

在公約裏所提及的和議條件開始談判前，一條悠長悲痛的道路必須要經過。有一國（按指俄國）的確中途退出單獨言和了。然而該公約持續着，這是列強出而維持歐洲制度及國際公法的聯合意志之一種標記和一種約束。

全體說來，自戰爭爆發後，協約國的外交，較優於德國的外交，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特別應該歸功於格萊。一九一四年八月，那種著名的白皮書（White Paper）的迅速編集與印行，不但使英國的政策大白於世，並且使她確信自己的行動是光明正大。

（註一） Grey, Twenty-five Years, (1925) II. 104.

(註二) Grey, Twenty-five Years II, II 9 比較 p. 164『該提議非我方發動』

第二章 土耳其的參戰

如果在十九世紀的前七十五年中，英國在君士坦丁的勢力是居歐洲列強之首，那麼在最後的二十五年中，她便失掉了這種地位。她的卓越的地位，漸漸爲德國所奪去。這中間的理由，照德國駐土大使（一八九七年——一九一二年）馬歇爾比伯爾斯坦（*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的見解，乃是由於土耳其相信德意志的政策是在維持土耳其的完整。『與這種相信並行的是他（蘇丹）對於德國軍隊的欣仰，認爲是鎮壓過激主義和騷亂的權威。』（註一）馬歇爾男爵並沒有誇張德國的勢力。英國使館的侍從武官，約在同時給軍部的報告，證實了馬歇爾的意見。一九〇二年有一個德國公司獲得了自君士坦丁至巴格達（*Basrah*）的鐵路建築權，中間有好一段在大戰

（註一） *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e*, Bd. XII, teil 2, p. 569 (*Marschall to Hohenlohe*, Aug. 6, 1898)

前確已完成。哈布斯堡皇室 (Habsburg Monarchy) 實行合併波斯尼亞 (Bosnia) 與赫爾仔哥維那 (Herzegovina) 計劃的成功，驚動了協商各國。這表示德奧在君士坦丁的勢力，甚至於可使土耳其人放棄他們的古省的宗主權。英皇愛德華七世 (Edward VII) 把這事看得最嚴重。雷斯得爾爵士 (Lord Reddale) 寫道：『我從沒有看見他這樣激動的。』俄國外交家覺得他們的國家的『歷史使命』 (historic mission) 是完全被德國阻斷了。(註一)

自從一九〇八年革命以來，土耳其便實行了內閣政府制度。當大戰爆發時，內閣的意見是不一致的大丞相賽德哈理親王 (Prince Said Halim) 是一位年老的，和平為懷的人。財政部長耶維特 (Djavid) 爲了財政上的原因，也是主張和平的。支配統一與進步委員會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的泰拉提 (Talaat) 和安威爾 (Enver) 二人，加上他們身為大吏的權勢，

(註一) Lord Reddale's 'Memoirs' Chap. VIII, p. 178. Siebert, *Diplomatische Aktensücke zur Geschichte der Ententepolitik der Vorkriegsjahre* (1921), p. 294 (Naidow to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pril 2/5, 1909)

是主張戰爭的，並且主張加入德國的一邊。

泰拉提曾被形容爲一個無知，浪蕩，出身郵務官吏的人。吉馬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否認泰拉提曾經在郵局裏服務過。瓊斯古（Take Jonescu）（羅馬尼亞人）在他的回憶錄裏描寫他是一個有決斷，精力，勇氣，但少遊歷，缺乏世界智識，而且像一切少年土耳其黨人一樣，是一個浮躁的愛國者。『這個人的盲目將斷送土耳其的命運。』（註1）

大戰爆發時，泰拉提的地位是內務部長。他和安威爾，吉馬爾統治土耳其帝國。安威爾比泰拉提更有勢力，如果不比他更浮躁的話。他在一九一四年比較還是一個年青人。他生於一八八一年，直到一九〇八年革命時，還少有人知道他。十九世紀末有一個英國旅行者在馬西唐尼亞（Macedonia）注意到滿拉斯地爾（Monastir）的土耳其後備軍裏一個形容不凡的隊長。這就是安威爾。在托利坡里（Tripoli）戰爭時，他顯出很大的冒險性，據說是化裝經過埃及，達到戰地，組織托利坡里的防禦，堅持至數月之久。他是個短小精幹的人物，穿着整齊，很漂亮的衣服——被人苛刻地

（註1） Take Jonescu, Souvenirs (1919), pp. 145, 149.

說是類乎意大利理髮匠的樣子。他騎術很好，是一個極其整潔的軍人，並且歡喜人家說他像拿破崙。他是真正愛國而且肆無忌憚的。歐洲全世界可以付之一炬；他決不放鬆土耳其的利益——火勢愈是大，那麼在隣人的灰燼上，恢復土耳其（Ottoman）以前的勢力的機會愈是多。

海軍部長吉馬爾是一個很有知識，知道世界情形的人。平靜溫和，談諧，他是很有朋友的。斯帝特（Sted）寫道：『在我認識的貴顯的流氓裏面，我永遠記得他是最合人意的。』他與安威爾一樣的黷武。他在一九一三年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結束時被委為君士坦丁的督軍。青年土耳其黨人在國裏鬧得一團糟，但他們並不失望。他們的個性很不同。瓊斯古總括起來說：泰拉脫是最強的，耶費特是最有學養的，吉馬爾是最文明的，安威爾是最好動的。

一九一三年的大丞相麥默特歇夫克提拍夏（Mahmud Shevket Pasha）是一個軍人。他常常夜晚睡在禁殿的公事房裏。吉馬爾宿於督軍衙門裏。這兩個人時常在半夜裏通電話。歇夫克提的見解是：『關於我們的軍隊，我認為對於德國方法的採用，毋須再有所躊躇。』（註一）根據這種

（註一） *Memoir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by Djemal Pasha* (not dated) p. 67.

見解，他請了李猛將軍與一個軍事委員團來君士坦丁。這軍事委員團於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行抵土耳其，這時歇夫克提纔逝世不多時。李猛即被任爲君士坦丁第一軍團指揮的非常職務。吉馬爾相信（一般青年土耳其黨人大概都如此相信）協商諸國已自行約定，以君士坦丁給與俄國。（註一）他想英國政府故意在那裏遷延土耳其政府交英國船廠建造的蘇丹渥斯孟（Sultan Osman）和雷斯賈地（Reschadieli）兩艦的完成和交付。這一切的結果便是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簽訂的土德密約，『不過談判在戰前便早已進行了。』奧國政府知道這同盟的條件，意大利卻沒有得到通告。（註二）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的土德條約規定在德奧加入的任何戰爭中，土耳其必須立即加入。事既如此，閣本（Goeben）和勃來斯勞（Breslau）的那件事便恰好發生了。並非這兩隻軍艦的逃

（註一） Ibid., p. 69

（註二） Ibid., pp. 107, 109. *Imman von Sanders, 土耳其五年紀* (Fünf Jahre Türkei)

(1920) pp. 33-5

道，和托庇於君士坦丁，方纔決定土耳其的參戰。有些地方，這兩隻德艦的來到極爲不便，因爲土耳其若不按照國際法封鎖他們，就得與協商公開作戰。事實上，土耳其人雖受盟約的束縛必須加入戰爭，但很想遲延到他們完成了韃靼海峽（Dardanelles）及博斯佛拉斯海峽（Bosphorus）的防禦。吉馬爾承認如果協商各國於一九一四年八月間就向君士坦丁進攻，那麼土耳其帝國在『方纔開始的時候，』便要宣告崩潰。所以如果可以這樣說法，那麼土耳其把閣本與勃來斯勞魯莽地收爲己用之後，能使協商各國遷延了這許久才發出哀的美敦書，乃是由於土耳其在外交上行詐背信的能力。至於協商各國竟爲巧言所惑，幾達三月之久，不能不說他們缺乏智識及判斷能力。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一日，土耳其的閣員在大丞相家裏聚餐。泰拉提，耶維特，和吉馬爾先到。威爾來得稍後，用他特有的安靜的微笑說道：『我們生了一個小孩子。』這句話並不能使聽的人十分明瞭，所以在答覆他們急切的追問時，他就告訴他們說閣本和勃來斯勞已出現於韃靼海峽外面，要求准許駛入海峽裏面，吉馬爾以海軍部長的資格准許了。不過，按照國際公法的規定，如吉馬

爾坦然所承認，土耳其不監禁這兩艦的行動，就得勒令他們於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土耳其的水面。德國大使王根哈姆 (Wangenheim) 甚至對於假繳械的辦法也不肯答應。勒令這兩艦離開土耳其的水面，照土德盟約是不可能的：這樣做法，吉馬爾寫道：『既違犯我們的利益，也違犯我們的責任。』然而這個講求正道的人的良心，被一份倒填日期的出賣閣本和勃來斯勞的契約所滿足了。出賣與假日期，就在那夜用電報商量好了。這計策，使這班政治家都稱許：『每個人舒舒服服吐了一口氣。』(註一)

賸下的故事是一段可悲的滑稽劇；土耳其人結着舌頭向協商各國巧言中立，同時協商各國張着眼睛明白受欺。八月四日（土德同盟簽訂後的兩天）大丞相向英國駐君士坦丁的代理大使保孟 (Beaumont) 擔保說，土耳其意在『嚴守中立』。(註二) 君士坦丁的輿論對於英國政府

(註一) Djemal, op. cit., p. 120

(註二) Parliamentary Papers, 1914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events leading to the rupture of relations with Turkey Cd. 7628), No. 3.

徵發使用土耳其在英國定造的兩隻軍艦的問題，憤慨起來了。土耳其皇室對於此事發了一個上諭，語氣明明白白是反英的；可是大丞相溫和地告訴英國使館說，這種強硬的態度，乃是敷衍民意的，沒有什麼嚴重的意思。（註一）八月十一日保孟報告閣本和勃來斯勞已於前夜來到海峽裏面。於是協商各國接着就要求按照國際法封鎖德艦或者予以驅逐。這時候事情變動得很快，在同日即八月十一日，土政府正式通知了保孟稱已購買閣本和勃來斯勞。這時候君士坦丁有一海軍委員會以林普斯海軍司令（Admiral Limpus）為領袖。這委員會裏的份子，在土耳其海軍裏面，擔任有行政的職務。八月十一日他們都被撤職，以土耳其官吏充任。

協商各國竭力設法解除土政府的疑懼，特於八月十六日建議說：『如果土耳其在戰爭期內嚴守中立，英、法、俄必尊重她的獨立與完整，以對付想利用歐洲大局進攻她的任何敵人。』（註二）這種建議自然沒有效力，因為土耳其政府已在八月二日的條約裏，下了決心了。時局嚴重發

（註一） Parliamentary Papers, 1914, No. 6, Beaumont to Grey, Aug. 13, 1914.

（註二） Parliamentary Papers (Cd. 7628) No. 17, Grey to Beaumont, Aug. 16, 1914.

展的第二步，是因爲閣本與勃來斯勞二艦，雖說賣了給土耳其，但原來的德國水手並沒有更動。大丞相答覆英國大使馬勒提 (Sir Louis Mallet) 的抗議說，『他不能否認這是違犯了中立，他爲之痛心。』他要求寬以時日，並且答應把德國水手『逐漸的』排除。(註一)

這滑稽劇然後進入另一幕。海軍部長吉馬爾於八月二十日拜訪馬勒提，因爲『談話能夠自由』，吐了一口氣，提出了取消治外法權條約 (Capitulations) 的要求。——這些治外法權即是在土耳其的外國人依照條約和風俗所享受的特殊權利。兩天之後，大丞相竭誠告訴馬勒提說道：『他需要三國協商所能給與的一切幫助。』協商各國仍然毫無希望的把自己捲在君士坦丁的蜘蛛網裏，允許一俟適合現代情形的司法行政成立，立即取消治外法權條約，並願立約擔保土耳其的獨立與完整。這期間自俄國黑海口岸駛往地中海的糧船，在博斯佛拉斯海峽被阻了。八月二十三日馬勒提探知德國官吏已取道梭菲亞 (Sofia) 來到君士坦丁。英國政府還沒有覺得土耳其已下決心，還勸英皇致函蘇丹『表示他對於因爲扣留他臣民辛苦造成的兩艦，以致引起土耳其』

(註一) Mallet to Grey, Aug, 15, 1914 (Parliamentary Papers, Cd. 7638).

其人民的憂慮，深爲扼腕。』(註二)土耳其軍隊的動員紛紛如狂，但土耳其政府解釋這是預防保加利亞可能的攻擊。大丞相向馬勒提承認說德國在那裏強迫土耳其放棄中立，但他鄭重聲明說這是不會成功的；土耳其政府『決不墮入陷阱。』據馬勒提的消息，這時候除了閣本和勃來斯勞的水手外，又到了數百名德國水手和海軍。大丞相告訴英國大使說：『他與海軍部長都一點不知道外面所傳德國水手的來到。』(註二)

按照八月二日的祕密條約，土耳其雖然應立即加入作戰，但是德人已經同意土政府應俟土軍充分動員後纔放棄中立。不過，德軍既然在馬因(Marne)一戰後(引證聰明的吉馬爾所說)不能不『稍爲後退』，德國自然要壓迫土耳其立即加入。(註三)土政府並不是不願如此，因爲最近在法國舉借的第一筆債如今已將用罄，所以這是向德國告借的一個適當時機。也許所有從柏

(註一) Grey to Mallet, Aug. 25, 1914(Parliamentary Papers, Cd. 7628)

(註二) Ibid. Mallet to Grey, Aug. 27, 1914 (No. 43)

(註三) Djemal op. cit., p. 127

林來的錢沒有直歸土耳其的國庫。如今就在這個最後的時辰，若是協商各國立即宣戰，也能消滅土耳其的禍患。馬勒提八月二十八日報告外交部說韃靼海峽，君士坦丁，與博斯佛拉斯的全境，在逐漸變成『爲十足的德國領土』(Nothing more or less than a sort of German enclave)；但他依然說他與俄法兩國大使『認爲局面沒有絕望，並且認爲我們應該力維和好，勿啓決裂。』

協約國對於土耳其的特別容忍，好像有兩層理由。第一，陸軍部大臣吉青納爵士(Lord Kit-chener)堅持，英國在那開赴法國的印度軍隊沒有安然經過蘇彝士運河以前，切勿與土耳其作戰。第二，也有人逼迫外交部，說對土作戰，將使印度的英國回教徒發生嚴重的騷動。(註一)但是這兩種考慮都是應該不顧的，因爲無論如何，印度軍隊終能安然經過蘇彝士運河的；對土戰爭勢既難免，那麼英國的回教徒總得設法鎮壓（後來不久果然如此。）

九月八日馬勒提居然能向外交部報告說『許多地方，形勢顯見進步。』翌日晚上，他與別的

(註一) Grey, "Twenty-five Years" II, 170-1.

大使們接到土政府一紙通知，聲明廢除治外法權條約。九月十五日，馬勒提報告土耳其艦隊已『完全操在德人手中』。爲什麼這時協商各國仍袖手旁觀呢？

十月三日韃靼海峽對一切商業，宣告封鎖。德國軍官在水裏散布了水雷。英國大使以爲土耳其人自己也不知道水雷的確實地位。可是在十月二十二日，海軍部長吉馬爾猶以爲仍值得（事實上的確如此）打電報給英國使館，再保證土耳其的中立。吉馬爾也提到關於土德同盟的謠傳；他『絕對否認』。十月二十九日俄國大使報告費杜西亞（Feodosia）（克里米亞內）於該日黎明被土耳其的水雷艇所轟擊。俄國大使基爾斯（M. De Giers）因此於十月三十日接到本國政府的命令，攜帶全體職員離開君士坦丁。英法外交部知道這事後，也發出同樣的命令給他們的大使。土政府一無阻礙的演完這場喜劇。在訣別英國大使時，那位大丞相差不多淚眼汪汪的自認是被同僚瞞住了。

英國對於土耳其加入同盟國方面作戰的答覆，是宣布佔據塞普拉斯（Cyprus），並在埃及行使保護權。如果對於埃及不採取這步，則因爲土耳其蘇丹在埃及及有名義上的宗主權的關係，所

有的埃及人，就專門術語而論，勢必成爲英國的仇敵。（註一）

巴爾幹政治的綜錯的愛與憎，平均起來看，顯然是利於德人的。因爲保加利亞雖然第一年沒有作戰，已經聲明效忠於德國的一邊了。當土耳其駐柏林大使默克他拍夏（Mahmud Mukhtar Pasha）拿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的土德盟約給德皇簽字的時候，德皇『欣然微笑』道：『現在讓我再告訴你另一個好消息。今天早晨我袋裏就有一封保加利亞皇寫給我的信，說他願意和我結盟。』（註二）土耳其政府自己在最近六個月來，也在那裏與保加利亞交涉一個同盟條約。所以如今同盟國百事都有希望。只有一個障礙。保加利亞政府說牠要等到戰局的結果可以看見時再實際加入。這一點，要等到一九一五年秋季，保加利亞政府纔能認爲滿足。

（註一） Grey, 'Twenty-five Years', II, 167-7

（註二） Djemal op. cit., P. 127

第二章 意大利的參戰

當大戰在一九一四年七月終爆發時，人人詫異意大利將採何行動。大家知道她加入了三國同盟，如此而已；因為三國同盟的條款，除掉締約各國的高級官吏以外，無人知道，於是引起更多的不安。所以富意大利外交部長聖喬立諾侯爵宣稱，這次奧國的作戰，有一種侵略的目標，違犯了純粹防禦性質的三國同盟，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意大利當保守中立，協商國方面聞之如釋重負。

(註一) 關於三國同盟的內容，說了這麼多以後，意大利的政治家，又閉口不言了。同盟國的政治家們，更不肯多言。就在意大利加入大戰之後，也沒有許多東西漏洩出來。一九一五年夏，奧國第二回

(註一) Sir H. Grey to Sir F. Bertie, Aug. 3, 1914 (Parliamentary Papers, 1914 Cd. 7860). 意大利的

中立宣言印於 Austro-Hungarian Red Book (No. 2), document No. 27. Sir James R. Kault,

"Social and Diplomatic Memories" (Third Series, 1925) P. 204

紅皮書 Second Austrian Red Book 披露了該條約的四章。一直等到大戰既終，革命政府打開奧國的檔案，這三國同盟的全文方纔洩漏出來。

意大利的雄心是昭著的，要與同盟國有任何真正聯合簡直不可能。使意大利統一的一八六〇年及一八六六年的條約，贖下了大批未贖回的意大利地方 (Italia Irredenta)，尙待克服。一八六六年所劃關於奧國與威尼西亞的邊界，從軍事上看來，極不利於意大利。托倫地洛 (Trentino) 雖在奧國手中，然而從種族和語言上看來都屬於意大利。經過亞得利亞海 (Adriatic)，有幾個說意大利語言的城鎮，從前本來是威尼斯共和國之一部分，只因肯坡福米阿條約 (Treaty of Campo Formio) 的『罪惡』，於一七九七年被拿破崙把威尼斯及其領土由意大利轉入了奧國的版圖。對於協商各國，意大利人並無報復主義的感情。至於尼斯及薩屋夷兩地方，固然直到一八六一年是屬於意大利的，但是這兩塊地方是在法屬阿爾排 (Alpine) 的分水嶺那邊，到了一九一四年感情上已絕對成爲法國的了。

一九一四年夏大戰爆發之後，同盟國自然竭力拉意大利到他們那方面去。奧國願在維也納

設意大利大學（註一）她希望至少意大利保持善意的中立。要辦到這一點，必須給意大利報酬；但是情勢之爲難處及惡作劇處，卽在於一切報酬都須取之於奧，德國沒有什麼可以貢獻。奧國政府確曾提議，如果意大利加入同盟國方面，便可從法蘭西取得薩屋夷及突尼斯（Tunis）。意大利政府拒絕了這個『貢獻』。

除了他們關於收復失地（Terra irredenta）的普遍和長期的齟齬外，還有從一九一一年意土（托利玻里）戰爭而起的另一個齟齬，到了一九一四年依然爲之心痛。一九一二年末次重訂的三國同盟第七條說過：

如果，情事的進展，巴爾幹或土耳其海岸地域以及亞得利亞與愛琴（Aegean）兩海中羣島的現狀不能維持；如果，不論是否爲第三國的行動的結果，奧國或意大利覺得有修改現狀，暫時或永久佔據之必要，這種佔領的實行，必俟兩國間先有根據互相賠償的原則之協議，如其中有一國在現狀外取得土地或其他一切利益，其他一國須得相當的報酬，務使兩方面的

（註一） Rodd, op. cit., p. 205.

權利和合理的要求都得到滿足。(註一)

意大利政府埋怨說，在一九一一年托利玻里戰爭期中，奧政府根據三國同盟第七條的規定，曾拘束意大利『實施數種陸軍和海軍的行動，否則戰事必然可以縮短。』(註二)如今奧國要與塞爾維亞作戰，是要改變巴爾幹的現狀了，卻是事前與意大利沒有任何協議，也沒有提出任何賠償。她僅於七月二十三日通知意大利政府謂將於翌日給一哀的美敦書與塞爾維亞。(註三)所以意大利政府在同月二十五日即要求與奧政府早日交換意見。

伯啓托特伯爵(Count Berchtold)是一個奧國貴族，從前是駐彼托格拉得(Petrograd)的大使，於一九一二年繼任愛倫塞耳伯爵(Count Aehrenthal)做了外交部長。一個英國的觀察者曾形

(註一) Pribram, 'The Secret Treaties of Austro-Hungary' (Myers and Paul 譯本 1920), I, 249-50.

該第七條亦見於一九一五年意大利參戰後發行的 Second Austrian Red Book.

(註二) Italian Green Book, 1915, No. 1 (Sonnino to Italian Ambassador at Vienna Dec. 9, 1914)

(註三) Austro-Hungarian Red Book (No. 2) document No. 4.

容他是一個『舉止合度，秉性灑落，身體軟弱而富裕的奧匈貴人』。(註一)維也納內廷的親信馬古第將軍 (General von Murguth) 形容他是『那個顯然不甚稱職的政治家』。再如那個羅馬尼亞政治家瓊斯古說：如果你贊成他那樣的人，你可稱他爲一個『漂亮人物，精緻，非常精緻，舉止文雅，並且……這便是所有一切了』。(註二)伯啓托特的確是一個君子；他主持奧國內閣的事務沒有用一點誇狂和威嚇，比之德國威廉街 (Wilhelmstrasse) (德政府所在地) 所用的方法好得多；但是他完全被陸軍元帥康拉德 (Field-Marshal Conrad) 的主戰派所挾持了。他在武人挾制之下犯了對塞爾維亞作戰的大錯誤。如今他顯露他自己非西德尼宋理諾 (Sidney Sonnino) 的敵手。聖喬立諾侯爵忽然於一九一四年十月十六日去世，續任爲意大利政府外交部長的，便是西德尼宋理諾。

(註一) Wickham Steed, *Through Thirty Years*, I, 358.

(註二) *The Emperor Francis Joseph and his Times* (1921), p. 346. 再閱 *Jonescu Souvenirs* (1919), p. 20.

意大利外交部長宋理諾老是被認為一個親英的政治家。他的母親是英國女人，他的英語說得非常好。實際上他是一個有些偏狹的意大利愛國者，在他的外表上有些乖戾和詭譎的樣子，雖然他絕對是一個率直忠實的人。『我也許不常把我所有的心思都說出，』他有一次說道：『但我有一種不願說謊的天性。』（註一）他的父親是一個意大利猶太人；他是富足，受過教育，遊歷過的人。他很早就入了政界，知道如何去鑒別人的性質和動機。他是一個有決斷的，實在是一個固執的人。他的缺少伸縮性，使他與其他協約國的關係，在意大利加入戰爭以後，有時候不免困難。他既是一個很少有的意大利新教徒，當然他不是教皇所惹意的人。照他那樣的漂亮，講究猶太人的狀況，宋理諾是一個出色的可是有些不可測度的人物。他的不折不撓的意志，在大戰期中，對於像意大利這樣一個窮國，常給社會主義者的『戰敗主義』（defeatist）宣傳以不少的發展機會，實有極大的價值。

伯啓托特想躲避宋理諾的外交攻擊，推托說奧國軍隊之佔領塞爾維亞土地並不在三國同

盟第七條範圍之內，因為這種佔領是『既非一種暫時亦非一種永久的性質，而僅僅是一時的。』不論這是什麼意思，這並不能搖動宋理諾對於第七條的堅持。伯啓托特又說奧國沒有『殲滅』塞爾維亞的意向。宋理諾不難指出『在土地的完整和政治與經濟的獨立之維持的一邊，以及武力殲滅的另一邊，中間尚有一條很闊的邊岸，而正是這一條邊岸必須成爲我們與奧國依照條約的規定而談判與協議的主題與根據。』這個不幸的，或是有些不稱職的伯啓托特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與意大利駐維也納大使亞伐那公爵（Duce d'Avarna）見面時，對於這合於邏輯的解釋，不得不表示同意。

真相是意大利至少要得到托倫地洛纔滿意。談判到這一點時，那位合人意的布洛親王（Prince Bülow）又出現於幕上了。他是一個有學養的德國貴族，非常圓通，外表很文雅。他娶了一個意大利妻子，自從一九〇九年退出閣揆的職務後，一向住在羅馬，他的美麗的馬爾達別墅（Villa Malta）彷彿成了一個聚會的中心。

瓊斯古說馬歇爾，吉德爾倫維希特爾（Kiderlen-Waechter）及布洛是德意志的三強。頭兩

個人如今已經死了。『在德國政治界上的智識的沙漠裏，布洛是淵博的。』（註一）戰事爆發後，他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被任爲駐羅馬大使。

十二月二十日布洛來會晤宋理諾男爵，以公和私的立場，向宋理諾擔保說，他對於意大利外交部長給予第七條的解釋，是同意的。『如果奧國得到任何結果，』意大利自然有報酬。宋理諾固執已見。如今賠償的期限到了，這賠償一定要能滿足『某種全國期望的東西』——布洛當然知道這是指的托倫地洛。其次——顯然就在布洛來訪的同一日——奧國駐羅馬大使麥吉阿男爵（Baron Macchio）也來到宋理諾的辦公處。他正要乘着一個短休息日到維也納去。宋理諾說這很便利，麥吉阿男爵可以親自把意大利的情形，告訴伯啓托伯爵；他又乘機要奧國大使注意到意大利外交部對於三國同盟第七條的解釋。麥吉阿男爵或許已經接到伯啓托伯爵寄來許多關於這事的備忘錄（奧國官場是以備忘錄的衆多著名的），說他已經知道這些意見。麥吉阿暗示，謂賠償可以取之於協商各國。宋理諾不客氣的答道，『既守中立，我們現在就不能根據一種牽

（註一） Jonesen, Souvenirs p. 159. 參閱 Tardieu, La Princesse de Billore (1909)

涉到現爲其他交戰國所有的土地的賠償來討論這件事，因爲那就等於我們從今天起參加戰爭。』如今完全明白，當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意大利是否加入奧國的一邊，而是意大利是否繼續保守中立或者加入協商各國的問題。宋理諾的地位很好，奧人最大的希望，便是去購買（出一筆很高的價錢）意大利的中立。德人自然盡力催促奧國。但是奧國政府能够像別人一樣的頑固：牠是一向如此的。

在這些交涉裏面，托倫地洛雖然是在每個人的心中，但是宋理諾及大部分的意大利人所望實不止此。可是，須一件一件來提出。一九一五年正月十一日，布洛親王又來訪宋理諾，說德國政府正派一個專使到維也納去勸奧國政府放棄托倫地洛。宋理諾接受了。這個報告，並於正月十四日第二次晤面時說，據他的意見，托倫地洛一地猶不能滿足意大利的衆望，與奧國永久的和諧，只有滿足這個收復失地的公式『托倫提和托里斯提（Trent and Trieste）』。布洛被這個冷淡提示弄得生氣了。他請宋理諾不要繼續增加他的要求，因爲奧國寧可作戰，也不肯割讓托里斯提。宋理諾對於這點說了些什麼，沒有記錄——大概沒有說什麼：這是他的脾氣。後來路易喬治稱他爲『一

個可怕的人。』關於他的固執，他的沉默，以及他了解對手心事的正確，確實有點近乎古怪的東西。到這時候伯啓托伯爵已解去職務（一九一五年正月十三日），他的外交部長地位已由布林爵（Baron Burian）接充，這人在宮庭間是被形容爲一個『魯鈍的官僚』（註一）布林繼續進行談判，開始便承認根據三國同盟第七條給予意大利賠償的原則，但是他指出意大利政府仍佔據多德康尼西（Dolnikanez）（在托利坡里戰爭中奪取的十二個前屬土耳其的島），而最近（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意人又佔據了阿爾巴尼亞的凡隆那（Valona）。可是這幾點都有了答覆，因爲意大利外交部有一封伯啓托伯爵在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寫的信，該信聲明奧國對於意大利暫時佔據多德康尼西，並不要求任何賠償。至於凡隆那，意大利軍隊在該處登陸，乃是『去收拾那地方的無政府狀態的。』

一月十六日，偉特爾將軍（General Count von Wedel）領袖的德國委員團，抱了勸奧政府割讓土地於意大利的使命，來到維也納了。布林及其他驕傲的奧地利人都不很歡迎這種干涉。

（註一）Marguth，見前 p. 346

並且布林知道，如今即使他把托倫地洛給意大利這貢獻也不會令意大利認爲足夠的。可是，一九一五年三月九日布洛親王能够通知意大利外交部謂奧政府已同意「與意大利開議關於割讓奧國土地的事：『但布林於此附帶了條件，謂須等和平締結後，纔能轉讓土地。提出這個條件，有許多理由：一個理由是（布洛親王洩露出來的）奧國不能辭退在她軍隊裏服務的托倫地洛新兵。宋理諾卻宣稱不能等到媾和的時候。談判到如今的結果，給他『很少希望的餘地。』後來據說在二月底，匈牙利方面已知道與意大利作戰，是不可避免的了。（註一）

三月二十七日布林男爵在奧國外交部向亞伐那公爵作第一次割地的正式提議。如果意大利承任遵守一種友誼的中立直到戰爭終了，並且允許奧國在巴爾幹有完全的自由，那麼奧帝國政府願意把南帖羅耳（Southern Tyrol）割給意大利包括托倫提城在內。這種割讓，須保守秘密，並且須等到戰後纔發生效力。意大利對於這些提議的答覆很簡單：第一，奧國的貢獻還不够；第二，任何割讓必於同意之時起即發生效力。意大利方面的提議，包括割讓在意松查（Isonzo）流域

（註一）Karolyi, Fighting the World (1924) p. 134

格的拉迪斯加和郭里齊亞 (Gradisca and Gorizia) 以及建托里斯提爲自治邦，這是以條約草案的形式在四月八日提出的。奧政府認爲不能接受。因此宋理諾男爵於五月三日給了布林男爵一個通牒，說『意大利從此時起恢復行動的完全自由，並宣告取消及從此作廢她與奧國訂立的同盟條約。』布林男爵拒絕承認這個通告，理由是三國同盟有一個確定的期限，要直到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日纔滿期。宋理諾卻指出奧國已經破壞了該項盟約，因爲她以哀的美敦書給塞爾維亞，並沒有照（時常提起的）第七條所規定的『預先同意』而干涉巴爾幹。

如今意大利政府只有與協商國會商參加他們方面的條件。在意奧談判的時候，意大利駐倫敦大使印泮略里 (Imperiali) 和英國駐羅馬大使羅特 (Rennell Rodd) 自然不是在那裏袖手看着。意大利不但望着阿迪治 (Adige) 流域，並且望着亞得利亞海的彼岸。協商國對於意大利在亞得利亞的行動不大感覺到的。誠然，在英國政府主持的倫敦會議，曾建立阿爾巴尼亞王國，由列強保證她的中立與獨立（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決議）。列強選擇的人是維特威廉 (William of Wied)，一個衰微的德意志皇室的家長。他在一九一三年是三十五歲，在普魯士衛隊

烏蘭 (Uhlans) 第三集團裏當一個隊長，並且娶了烏定堡 (Württemberg) 王的一個女兒。威廉於一九一四年三月行抵杜雷查 (Durazzo)，他的新王國的首都。他是那種偶然在歷史幕上經過而只留下一個名字的毫無色彩的人。差不多當他纔到阿爾巴尼亞的時候，就發生了叛亂。實際上他被幽禁在杜雷查，直等到一九一四年九月三日，他纔放棄了這個國家。

十月三十日有一隊意大利海軍在沙生諾 (Saseno) 登陸，該地是倫敦會議撥給阿爾巴尼亞的一個小島；在凡隆那的對面。十二月二十五日意大利軍隊便佔領了在阿爾巴尼亞本土上的凡那隆。(註一)

在某種意義上，自八月二日以來，依形勢的發展，意大利就有加入協商國一邊的傾向；意政府一宣告中立，法國便可從她毗隣意大利的邊境上，調回三十萬大兵。(註二) 德奧兩國政府對於這

(註一) 沙生諾和凡隆那由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倫敦條約撥歸諸意大利，一九二〇年八月，意兵退出阿爾巴尼亞，但沙生諾島仍在其掌握。

(註二) Rodd, Social and Diplomatic Memories (Third Series), P. 221

中立宣言的態度，引起意大利參謀部長嚴重的成見。(註一)宋理諾這時候還沒有在位，當他在羅馬火車站初次聽到政府決定中立的消息時，不禁大爲歡狂；及他任事之後，他卻改變了態度，並且有些時候大沒有以前那樣堅定。首相沙蘭德拉(Antonio Salandra)雖在一九一四年，也沒有畏避戰爭之意。同年的十月十九日，他向意大利外交部的屬員演說，勸他的聽衆拋開『一切成見，偏執或感情，除非是出於絕對和無限的愛國心及意大利的神聖自私自利主義。』(註二)十二月三日，議會重行開幕的時候他進一步的表明他的見解，說道：『我們的中立決不是靜的和無差別的，而是動的和面面俱到的；不是軟弱的，而是強有力地武裝待發的。』這個，加上在同篇演詞裏面所說『意大利有合法的要求要證實及支撐』，表明了風是在向那一方面吹。社會主義黨起先主張中立，後來分爲兩派。在一九一四年終，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創辦了意大利人民報 II

Popolo d'Italia 爲主張參戰的社會主義派的機關。(註三)

(註一) Cardona, *La Guerra alla fronte italiana* (1921), I, 42.

(註二) *Op. Kodd, op. cit.*, p. 226.

(註三) *Ibid.*, p. 249

顯然是在一九一五年二月模樣，宋理諾纔開始認爲與奧國作戰，大概在所不免。然而剛在這時候，前首相和自由黨的領袖喬涅立帝 (M. Giolitti) 在如今很著稱的一九一五年一月十日的那個信中，把參戰和中立的兩種可能的結果，衡量得如此巧妙，弄得他的黨員們（在議會中佔多數）沒有確定的原則。喬涅立帝表示這個見解，說意大利可從這次戰爭中得到『許多東西』但這些東西也許不戰可以得到。如今奧國所貢獻的不是完全的失地，而是托倫地洛的有用的一塊『這並不壞』，喬涅立帝這樣寫着。（註一）然而宋理諾繼續進行他的，到四月二十六日那秘密的倫敦條納（有時也稱亞得利亞條約）（Adriatic Treaty）便簽訂了。第一條規定法、英、意、俄的參謀部間，應立即成立一種軍事協定，限定俄國對奧出兵的最少數額，以免奧國集中全力對付意大利。如果俄國決定用主力對德，爲保證意大利不致獨自擔當奧國攻擊的全個重量起見，這個條文是必要的。

意大利承認用她的全部國力與英、法、俄共同作戰，以對付他們的一切敵人（第二條。）

（註一）參看 Rodd, P. 244

第四條規定在和平條約內，意大利應得托倫地洛，錫沙爾品·帖羅耳（Cisalpine Tyrol）（加上勃倫納（Brenner）的邊境），托利斯提，郭里齊亞與格拉迪斯加，意斯托利亞（Istria），犬沙羣島，羅新（Lussin），派拉助利（Palazueli）和其他。第五條除了上列各割讓地外，又加上大爾馬地亞（Dalmatia）的行政區（直至普蘭加角（Cape Planka）之南）及大爾馬地亞西北的羣島（惟其間稍有除外）。在阿爾巴尼亞海岸上的凡隆那與沙生諾小島，也給了意大利。自從一九一二年即由意大利佔領的多德康尼西，仍歸意大利有其完全主權（第八條）。如果地中海的均勢因亞洲土耳其的瓜分而改變時，意大利將得公允的一份（第九條）。如果法國或英國在非洲增加他們的領土，意大利也能要求公允的賠償，特別是關於厄立得利亞（Erythrea）沙馬利蘭（Somaliland）和里比耶（Libya）等意大利殖民地邊境問題的有利解決（第十三條）。（註一）

（註一）英意兩國代表於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在倫敦簽了一個條約。英國割肯雅（Kenya）之一部名久巴蘭（Jubaland）給意大利；該地方大約從久巴河（River Juba）西約五十英里至一百二十五英里。在一九二四年，前久巴是肯雅與意大利沙馬里蘭之邊界。（看，Toynbe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4, pp.

意大利將來在戰爭賠款裏面可得到一份，其數目須視她的努力與犧牲而定。

第五條給與克羅地亞 (Croatia)、塞爾維亞 及門的內哥羅 (Montenegro) 某種在亞得利亞的地域，特別是匈加利與克羅地亞海岸(包括阜姆 (Fiume) 商埠) 凡格里亞 (Veglia) 潘維吉亞 (Peruvia) 格利各略 (Gregorio) 郭立阿 (Golio) 及亞爾培 (Arbe) 等島，以及從普蘭加角之南到德林河 (R. Drin) 口的一切海岸，包括斯派拉托 (Spalato) 拉古沙 (Ragusa) 喀泰拉 (Cattara) 諸埠；但喀泰拉及其海灣則化爲中立。杜雷查須歸於木索兒人 (Musliman) 的阿爾巴尼亞小獨立國。在第十五條裏，協約國允許協助意大利反對任何擬介紹神聖教堂 (Holy See) 派代表參加和平會議的提議。

這條約是要守秘密的；惟意大利之加入一九一四年九月五日的宣言（倫敦條約）須於意大利正式宣戰或被宣戰時後立即公布（第十六條。）意大利聲稱將於最近期內加入戰爭，至遲須在現訂條款簽字後一個月內。（註一）這條約是由格萊、印泮略里、朋根多爾夫及康邦簽的字。

(註1) State Papers, British and Foreign 1919, pp. 973-7

五月二十日，沙蘭德拉在意大利議會中發表了一篇動人的演說，（那時喬澤立帝未到，）獲得以四零七對七四的多數之信任投票。（註一）貴族院裏，擁護政府的計劃二六人，反對的二人。五月二十二日意大利於是對奧國宣戰。因為商業上及國際私法上規定的個人權利的理由，意德兩國到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纔正式宣戰。

外交家照例是一種寡言的人，一定有人對於這亞得利亞條約有所饒舌，纔洩漏了風聲。一位能幹的南斯拉夫新聞家，阜姆的佛郎西司蘇辟羅（Francis Supilo）四月在彼托落格拉德時，對於談判的進行，有所聽見。（註二）倫敦的塞爾維亞使館，差不多在條約墨藩未乾時，已經知道了，牠嚴重抗議把這麼多大爾馬地亞的地方給意大利。德爾加塞（Delcasse）這時還是法國的外交部長，於答覆南斯拉夫人的抗議時，說協商國不能隨便不理像意大利這麼一個可能的聯盟國的要求，須知意大利能夠在戰場中出一百萬大兵，並且『不久之後，』還能使六十萬羅馬尼亞人加入。

（註一） Rodd, op. cit., p. 264

（註二） Sneed, Through Thirty Years II. 64-5.

(註一) 羅馬尼亞的加入對於公衆中消息最靈通的人，也是一種詫異；德爾加塞也沒有想到這麼快，不過沒有意大利，那是不會來的。

由意大利人看來，這次大戰是完成他們的自由與統一戰爭的。『我從來沒有，』一九一五年一個住在羅馬的著名外交家寫道：『看見過一樁比這回人民更興奮的景象。意大利從一八五九年（按這一年意大利民族解放初次告成）以來，沒有過這樣的事。據曾經目覩那次情形的遺老說，一九一五年的熱誠更爲盛大。』（註二）

(註一) Ibid., pp. 66-7. 關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的意奧談判 可閱 Italian Green Book 和 Austrian Red Book, No. 2. 又見於 J. B. Scott 編訂的 "Diplomatic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Outbreak of the European War" 此爲英譯本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16) Parts I. and II.

(註二) Rodd, op. cit., p. 253.

第四章 君士坦丁的割讓

俄羅斯加入大戰，並不想取得君士坦丁。這點從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六日英、法、俄三國政府對土耳其獻議，如果她守中立即保證她的獨立與完整，可以證明。（註一）但是土耳其拒絕了這種獻議，並且於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對俄妄行攻擊，以致開始戰爭之後，俄羅斯可以自由回復她舊日的野心了。羅馬教皇據說確是堅決反對（註二）這個希臘教會的主要強國來奪取君士坦丁，——那『第二羅馬』——不過法意兩國政府都不曾把羅馬教皇這種感想絲毫放在心裏。可是在英國人民向來的感情，尤其是外交部方面，是完全反對以君士坦丁給俄國的。這種感情能否在戰事的進程中，克服下去或改變過來呢？

（註一） Grey, *Twenty-five Years* II, 173-4

（註二） Nekudorff, "Diplomatic Reminiscences" (1920), p. 118

根據一九一四年九月五日的倫敦條約，俄國政府不能與同盟國個別言和。該國政府自願受此約束，未曾要求規定報酬。從最初起，誠然，俄國人分明想把一九一四年時在普魯士和奧地利統治下面的波蘭地方合併於俄帝國。（註一）不過，自然有許多俄國人希望不止於此：土耳其的參戰敵俄，看來是指着到君士坦丁的路。

在戰爭的開頭三年，俄羅斯外交政策是在沙重諾夫（M. Sazonov）的手裏，這人被形容爲一個很有榮譽的人，有不可相信的自滿自足，及昭然若揭的庸碌無能。（註二）這種形容的說法，似乎太嚴厲。沙重諾夫是一個有經驗的外交家。他在一九〇四年後的幾年中向在倫敦的俄國使館充顧問，這是一個在俄國外交上極多事的時期，包括日俄戰爭與樸資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及『十月者』（Octoberist）的革命（這次革命挾那直前無忌，鋼鐵意志的斯托立品）

（註一）閱俄國尼古拉大公爵 Grand Duke Nicolas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的宣言，載在 Mowat 的 Select Treaties and Documents p. 65.

（註二）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1922), II, 191

(Stolypin)的內閣以俱終。後來他是俄國的外交次長，做伊斯伏爾斯基 (Isvolsky)的助手；一九〇九年伊斯伏爾斯基放爲法國大使，他便繼任爲外交部長。沙重諾夫娶了一個斯托立品的妻妹爲妻，他是頭腦清楚的人。他的身體很不康強，肺很弱，時常須到達沃斯 (Davos)去。斯托立品活着一天他的政策是堅定的乾脆的；但是可悲的斯托立品被慘殺以後（一九一一年），俄皇的政府，即復歸平庸了。哥爾倫米金 (Goremykin) 時爲內務部長（這個位置有些近於首相之職），是一個年老怠惰的人。沙重諾夫很受自由黨人 (Cadets) 的歡迎，不久就喪失了他初爲外交部長時的溫和態度；他的自負心逐漸加高，於是他的政策不免大驚小怪起來，因此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的時候頗爲不靈。他失掉了在巴爾幹的威勢，因此大戰發生時，他在保加利亞，希臘或是羅馬尼亞都沒有勢力。

大戰開始以後，沙重諾夫做得比較好。他加入了倫敦條約，並且忠實地遵守着，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關於波蘭的那篇可欽佩的宣言是在他的公事房裏起草的。不久他開始展開他的手腕，直接以君士坦丁爲目標。

從土耳其參加同盟國作戰的時候起，俄羅斯便被封鎖了。德國艦隊掌握波羅的海，土政府則封閉韃靼海峽及博斯佛拉斯海峽。在協約國方面，正當的兵略，顯然應該去掃清波羅的海或是博斯佛拉斯海峽，而且博斯佛拉斯的奪取，在大體上，並無多少困難。所以一九一四年十月底土耳其一加入作戰，協約國便設法攻取海峽。（註一）其結果，大概可以取得君士坦丁問題自然發生了，就是怎樣處置君士坦丁大戰後，誠然可以把君士坦丁給回土耳其人，但是協商國自然不希望時常冒這種被土政府封閉海峽的危險。可以使君士坦丁中立化，但是協商國很難相信土耳其所立任何中立的約言；並且也沒有其他巴爾幹國家能委以保管君士坦丁的；保加利亞和希臘正在運用於協商國所不喜的政策。因此如果協商國取得君士坦丁，英法兩國真不能不承認俄國對君士坦丁的歷史的要求權。無論君士坦丁實在為英法俄那國軍隊所攻取，那倒與問題無關。協商國裏面每個國家都出了全力應戰；這些力量向此處或他處進展，不過是軍略上的問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所有俄國的兵力，都用在加里西亞（Galicia）及小亞細亞的戰事裏面。

（註一） Callwell, The Dardanelles (1919), pp. 1-3.

在一九一四年的最後幾個月中，俄國政府督促把君士坦丁問題作一個最後解決。該年末，法似已允許把這個俄國所切望的城市給俄國。俄羅斯的人民，大部分是未受教育的，那比較少數的知識份子，大都在莫斯科及彼托洛格拉德，彼此很熟。多數的高級官吏，都是由他們擔任。他們在集會裏很注意政策的討論。在一九一五年頭幾個月裏，集會裏的談話都集中在大戰那個題目，你可以時常聽到君士坦丁的名字。在開會中的國會（Duma），你也可以聽見許多關於俄羅斯歷史的使命之愛國演說。沙重諾夫在國會裏算盡了他的能事。他的態度很忍耐，他的言語很熱烈流利，他所得自由黨的歡呼，差不多與保守黨一樣的多。

這時俄國軍事的情形開始不利。在東普魯士方面，不得不敗退。在高山荒涼的小亞細亞，遇到了幾乎不能相信的困難。俄國的工業組織不能為軍隊製造所需要的軍械。二月二十日法國駐彼托洛格拉德大使派利洛格（Paléologue）與沙重諾夫經過大操場（Champ de Mars）有幾隊步兵正在操練。他們雖然沒有帶軍器，但在雪上，前進不免困難。說到他們沒有軍器的情形，沙重諾夫憂愁地說道：『這些並不是待訓練的新兵，而是幾天內就要上前線的有訓練的兵士——你看，一

枝鎗也沒有。』可是公衆依然主戰不懈；『比尙與（即君士坦丁）的幻景』（Byzantine Mirage）迷住了他們。法英兩國已經答應了。他們甚至於希望這時仍守中立的保加利亞王菲地蘭也能予以同意，並加入戰爭。但是法國政府二月間派遣保王的姪子古斯公爵（Duc de Guise）往梭非亞的使命，並沒有什麼成功。（註一）

英國外交部所允許者，不過是『海峽（the Straits）的問題應依照俄國的希望辦理。』據說英皇喬治第五表示得明白些。他曾向俄國駐倫敦大使朋根多爾夫說過，『君士坦丁一定是你們的。』（註二）

三月初，一八七〇年戰爭中的法國獨臂英雄鮑將軍（General Pan）取道沙隆尼加，梭非亞及布加利斯提（Bucharest）往彼托落格拉德呈贈法國勳章。俄皇於三月三日爲他舉行了一次盛宴。這是一樁冗長的事，那年輕的皇太子向他的姊妹們弄鬼臉來表示他的厭煩，也沒有用。到了最

（註一） *Paléologue, La Russie des Tsars* (1921) I, 305, 307, 311

（註二） *Ibid.*, I, 312.

後，宴會算是完了。客人們到客廳裏去。俄皇於是拉着法國大使到『客廳』的末端，說他不能把大戰的可怕的犧牲，加於他的人民身上而不給以他們所夢想的報償。『俄國輿論爲海峽問題很奮激……我要根本解決君士坦丁與海峽的問題。』派利洛格轉問俄皇對於法國所注意的問題，有沒
有改變意見。『放心，俄皇答道：『我盼望法國在這次戰後，變得愈強大愈好。請取萊茵河（the Rhine）的左岸；取梅顏斯取科布林茲（Coblentz）；只要你認爲有用，向前取好了。』派利洛格把這些擔保的話報告了他的政府。因而三月八日他得到了德爾加塞（法外交部長）的電報，要他向沙重諾夫保證，說法國政府願意如俄國的希望解決君士坦丁及海峽的問題。（註一）派利洛格與俄皇這些談話，使人猛然想起一八五三年的西摩談話（Hamilton-Seymour Conversations）（譯者按此指俄皇尼古拉與英國駐俄大使西摩會談，稱土耳其病夫已入垂死狀態，英俄應磋商如何瓜分土耳其的問題。）（註二）

（註一） Paléologue op. cit., I, 315.

（註二） 見 Mowat,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 pp. 102-5.

英法與俄國關於君士坦丁的談判，和協商國與意大利的談判，同時進行。意大利人有不甚高與俄國獲得君士坦丁的意思。俄國政府認為意大利對於大爾瑪地亞的要求，與斯拉夫意識是衝突的。其實這個要求有助於那個要求。沙重諾夫向派利洛格暗示略為抗議意大利要求的時候，法國大使回答道：『我們不是爲了要實現斯拉夫主義的夢想而戰的。君士坦丁的犧牲，也足夠了。』

(註一)

關於君士坦丁與海峽問題的協定，是包含在一九一五年三月間所交換的電報及通牒中。第一個便是上面所提到德爾加塞三月八日致派利洛格的電報，在該電中，法國外交部長聲稱法國政府願依俄國願望，去解決君士坦丁與海峽的問題。三月十五日沙重諾夫致駐巴黎俄國大使的電報中，聲稱知照此事，並稱英國在保障其經濟利益之保留條件下，也答應了俄國的要求。英國這個同意，是由格萊於三月十二日致駐彼托落格的英國大使轉告沙重諾夫的牒文中給予的。既已得到英法對於俄國佔有君士坦丁與海峽的要求之同意，沙重諾夫方面乃允許經過這

些地方的貨運，除了來自俄國或運入俄國者外，概准自由通行。

劃歸俄國的土地，包括君士坦丁堡，及歐洲土耳其的全部，直到意諾斯米迪亞線（Tinos-Midia line）爲止，還有在小亞細亞的海岸，從沙卡利亞河（R. Sakaria）起到意斯米特灣（Gulf of Ismid）的一端止；還有，在馬摩拉海（Sea of Marmora）中的羣島及鄧納杜斯（Tenedos）和應布洛斯（Imbros）。（註1）

幾世紀來的爭端，就這樣用外交解決了；幾代以來，毒害歐洲公共生活的外交陰謀的中心，在士坦丁，將從土耳其取出，而歸一個文明的強國保護。這是外交家的豪舉；如格萊所說，在英國方面，無論在她的直接利益，她的歷史的感情，或她的政治傳統而言，這是一種實在的犧牲。如今是要軍人來完成這外交的工作了。四月二十五日協約國的軍隊在加里波里（Gallipoli）登了陸。

（註1）對於此等協定，閱 Niemeyer, Die völkerrechtlichen Urkunden des Weltkriegs (1918), II, 691-6

與 Mevans, Modern Turkey (1924) pp. 602-12 此項祕密文件，於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由鮑爾雪維克政府公布了。

那裏，青春的生命像流水般犧牲了；一番光榮的努力和一個高尚的目的，獲得了不朽的花冠，但沒有說到君士坦丁和海峽，以為酬報。俄國一得到她的聯盟國的允許後，也就開始失敗了。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即英法在加里玻里登陸後的三天，德國麥根生元帥（Field-Marshal von Mackensen）對騰拉傑克（Dunajec）的俄軍戰線下了一個攻擊，這個攻擊破碎了一個俄國軍隊，使不得不從加里西亞敗退，並且毀壞了俄軍系統的力量。

第五章 戰時違禁品

在大戰裏，那敵對的勢力（物質的與知慧的）是差不多勢均力敵，以致開頭的三年，相持不下。在從前，所謂戰爭的勝利，乃是一邊的軍隊，破滅了敵人的軍隊。但是這種情形如今很少發生的機會，每個軍隊是這樣的強有力，組織是這樣的精密，集中在抵禦敵人前進的智力的程度是這樣高。在歐洲的戰爭成了一樁包圍戰術的事件；就全體來看，被包圍的乃是同盟國，他們徒然想去衝破包圍的陣線。在這樣的一個戰爭裏，後方人民的忍耐是有如（雖然有些不及）前線軍隊一樣的緊張；如果任何一方的人民忍耐不住了，戰事便可結束。因此，封鎖一切供給，不論平和的或戰鬥的貨物，使其不致達到敵人那邊，成了交戰國的一個目的。協商國既稱霸海洋，他們就有俄斃敵人的最好的機會。德奧的海上貿易（除掉波羅的海），從開戰起，就絕對的被壓制了；但是中立國與同盟國的陸海運輸，仍然存在。協商各國政府能否予以阻斷呢？

根據國際法，戰時海上貿易的情形，（這從格羅秀士（Grotius）以來不但是聚訟紛紜的題目，並且是許多公約的題目，）在這次大戰爆發時，係由一八五六年的巴黎宣言（Declaration of Paris）所規定。這個宣言的簽字國家爲英、奧、俄、普魯士、薩丁尼亞（Sardinia）及土耳其，後來多數文明國家都簽字了，惟美國不在內。巴黎宣言宣稱：

（一）私船捕獲制（Privateering）從此廢除。

（二）中立國旗可以保護敵貨，惟戰時違禁品除外。

（三）在敵人旗下的中立國貨物，除戰時違禁品外，不得捕收。

（四）封鎖欲令人遵守，必須有效，換句話說，必須用充分的武力維持，俾敵方海岸真正無由達到。

迄一九一七年德國海軍採取攻勢實行一種無限制的潛水艇政策的時候爲止，壓迫海上貿易的，差不多完全出於協商國。因此，協商各國對於巴黎宣言，傾向給以範圍最狹的解釋，而德意志及中立各國，自然給以範圍最寬的解釋。關於一、三、四等條規則，協商國是不爲難的。沒有人想到要

去發動那糜費和冒險的私船捕獲的生意（第一條）。英法兩國政府都沒有宣佈封鎖德國海岸（第四條）。局部的封鎖是有的，像一九一五年二月宣布的德屬東非洲（三百哩海岸線）的封鎖，及土耳其，保加利亞以及希臘在地中海的海岸的封鎖（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宣布的）。關於德國在歐洲的海岸，並沒有宣布過合法的封鎖。最近於這樣一個合法的封鎖，是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一日的律例（Order in Council）；該命令宣稱不許商船出入德國商埠。這樣捕獲的船隻與貨物，由英國政府償價。這種辦法與封鎖無異，英國外交部也公開承認（註一）。

大戰開始了幾個星期以後，關於中立國貨物在插敵旗的船隻裏駛運，不發生什麼問題（第三條），因為除非在軍艦上，敵旗是在海洋上看不見的。協商國政府（關於這方面的工作大部份

（註一）國務會議的命令從沒有封鎖兩字，也沒有正式宣布謂德奧海岸有一種封鎖狀態之存在，但在外交的通訊中，

英外交部長曾云，英國已經實行封鎖（the British has instituted a blockade）見 Grey to Page, march

13, 1915, in J. B. Scott,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etc., p. 42. 在英國大戰時的公文中，封鎖

兩字是常見的。

落於英國外交部和海軍當局身上）集中他們的注意在第二條上：『中立國旗可以保護敵貨，惟戰時違禁品除外。』主要的問題是，什麼是違禁品？起初，英國的律例認定的違禁品名單較短；這名單漸漸地擴大。到了大戰末了，凡是於德國人有用的東西，沒有不被協商國認為是戰時違禁品，而加以捕獲和處罰的。

英外交部增加違禁品名單的理由是合邏輯而且是不可辯駁的：現在的戰爭，不僅是對付軍隊，而是對付整個國家；因此任何物品凡能增加敵國資力的，實在是戰爭的兵器。並且每一個交戰國，可以叫牠的全體人民服務：雖然每個人不都穿上軍服，在軍隊中服役，可是每人直接或間接都在為戰爭服務。所以，英國政府聲辯，謂敵國軍用和民用貨物的分別已不能存在。

一九〇九年倫敦宣言羅列戰時違禁品在十一種標類之下。（註一）所羅列的物品是軍器鎗彈及其他容易認為軍用的東西。但是有一追加條款，聲明某種其他貨物『能作軍用亦可作普通用途』的，也可以不必通知，作為戰時違禁品看待：這樣地羅列出來的貨物（有條件的違禁品）

(註一) Declaration of London, Chapter II, Article 22.

包括食品、衣服、船舶、鐵路材料。(註一)另外更有一款羅列了十七種不得宣告爲違禁品的東西：這中間有棉花、油籽及橡皮。

英國在大戰爆發時，基於貴族院所取的行動，並沒有批准倫敦宣言。美國外交部的第一步行動，就是於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七日發電給各駐外使館力促交戰各國採取這宣言的規則。(註二)英國大概還是不肯予以批准，但是俄法兩國（德奧兩國亦然）卻聲明了願服從這個宣言。因此，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二十日英皇在一個律例裏，不能不宣布接受倫敦宣言；但是附有某種保留條件。主要的保留，便是要用一張英國訂的違禁品及有條件的違禁品的名單，來代替原來包括在倫敦宣言裏的名單。英國用來代替的名單，實在與宣言裏的名單並沒有多大差別：在有條件的違禁品裏，牠沒有包括棉花、油籽或橡皮；但是上面冠以留有餘地的文字『等我們再發公告。』在這些文字的保護下，一千九百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的律例英國便把橡皮與銅加在有條件的違禁

(註一) Declaration of London Chapter II, Article 24.

(註二) Hendrick, Life of page (1923), I, 373.

品名單上；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又把棉花列爲絕對的違禁品，同年十月十四日油籽和果仁亦加列上去。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十四日這個律例，不但十分精細，而且名目繁多；如果中立國船隻在這名單之外，再能找出可以供德人的東西，聽他們的便；可是這在買賣雙方都不會是有利的生意。（註一）

最大的外交戰爭是關於棉花。實在是有兩個戰爭：一個是英美間的；一個是英國海軍當局與外交部的。海軍部（陸軍部自然一致）絕對主張立刻宣告銅與棉花爲違禁品。他們應該主張這種見解，這是他們的本分。在外交部方面，絕對決意不觸犯美國的敵意。所以這裏是一切交戰國內當局間常有的衝突，政治的與軍事的權宜間的衝突。在英法政府對這次大戰的處置當中，再沒有比對這件事做得巧妙了：他們調整軍人與外交家間相反的要求，如有必要，不怕偏袒外交家。這番調

（註一）倫敦宣言與兩者有關係的部份，其原文附錄於 Pyke 所著 *The Law of Contraband of War*

(1915). Pp. 253-99. 又閱 "State Papers, British and Foreign (1914) pp. 72, 100; (1915)

整事件關係的重大可以在駐華盛頓德國大使於戰後似乎懷着的意見內看出：即是協商國的獲勝，由於能以政治的必需制服軍事的必需，而德國之所以失敗，乃由於爲軍事的必需而犧牲政治之故。（註一）

美國駐倫敦大使曾目觀這兩個戰爭：軍人與外交家間的戰爭，及英國外交部與美國外交部間的戰爭。他知道海軍部正逼着格萊核准停止美貨前往德國；他同情於格萊的困難；可是他不得不維護美國政府的權利（美國政府向來是中立國旗的擁護者）『我與格萊爲了停止貨運的事作戰』美大使貝其（Page）在一九一四年終寫道：『真作戰』（註二）格萊向他說道：『你逼得緊』但他加上說道：『你很公道』（註三）在貝其方面，也正像格萊一樣急切地想免除英美間的衝突。他一面維護美國的權利，一面又忠告英外交部如何答覆美外交部，並且指示英國外交部或

（註一） Bernstorff（德駐美大使）*My Thirty Years in America* pp. 9-10.

（註二） Hendrick, *Life and Letters of W. H. Page* (1923). I, 315.

（註三） *Ibid.*, III, 191.

海軍部可以安然行動的範圍。『在這一切裏面，』格萊寫道：『貝其的忠告與建議是有極大價值的，警告我們何時應該謹慎，或是鼓勵我們何時可以安心表示堅決。』（註一）對於美國外交部關於海上法的見解，貝其很少同情。他打電報給霍司大佐（Colonel House）說道：『上帝把我們從圖書館的法律家那裏拯救出來吧。』（註二）

棉花的爭執僅關係一九一四年的收成。大戰爆發時，這收成剛預備運出去。契約也訂好了。收成中不少是要到英國去的——這方面的載運無甚困難；但也有不少是要到德國去的。在一九一四年末了的期內，這些貨運始終由美向德進行着。英國感情自然大為這事激動，因為棉花在炸裂物的製造上，是一種重要物品。英國（和法國）的兵士被射殺，英國的船隻被攻沉，都由於包含用棉花製造的炸藥的彈丸。在美國棉花種植家及輸運家方面，對於英國政府要來阻礙他們履行與德國商店或中立國家（從這些中立地方棉花也許流入德國）的契約，也很憤怒。

（註一） Grey, Twenty-five Years, II, 110.

（註二）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Charles Seymour 編 (1926) I, 305

如果美國輿論對協商國的棉花問題政策激動起來，協商國將蒙兩大危險。一個是美國政府也許要禁止人民售軍器與交戰國。這個禁令，自然正合同盟國的意思，因為軍器當然是戰時違禁品，英國海軍已經阻止他們使他們得不到美國的軍器。壓迫華盛頓的行政當局下令禁止軍器輸出的力量很大。（註一）其所以拒絕宣布這種禁令，至少一部分，是出於自利的緣故。『我希望總統對於軍器問題永不要讓步，』甘拉特（Gerard）大使寫給霍司大佐說：『倘使他一讓步，我們何不把那隻德國鷹高舉在國會議事廳（Capitol）上面。』（註二）

假使英國外交部在一九一四年把棉花列為戰時違禁品，可以引起第二個危險，就是美國也許要用海軍來護送美國商船，以為對付。有了這種護送，英國便不能止住美國的商船，檢查他們的貨單；否則必產生那種引起一八一二年戰爭的事變。有人相信，如果美國國會禁止了軍器的輸出，

（註一） Statement by W. J. Bryan, Secretary of State, 載於 CURRENT HISTORY, Vol. II (1915), p.

1178. Grey, op. cit., II, 116.

（註二）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I, 23.

或是採用了海軍護送美國商船的辦法，協商國『在一九一七年春季當已失敗。』（註一）『德國的封鎖，』格萊寫道：『對於協約國的勝利，固然是切要的，但是美國的敵意，勢必使他們失敗。』（註二）當協約國最後於在一九一五年把棉花列爲違禁品（並有一種最低價格的保證）時，德人立刻發明了一種代替品。格萊的意見是：『如果我們在一九一四年就把棉花列爲違禁品，我們須冒我上述的危險，而一無所得。』（註三）

美國外交部有勢力的顧問藍辛 (Tammings) 準備堅持他對於美國權利所抱的見解，這對於英國很有所不便。藍辛是一個很好的法律家，精通國際法上的先例。在美國外交部致英國外交部的牒文（多是藍辛的手筆）裏面，美國的立場，乃是用一種嚴格而且近於毒辣的法律理由來辯護，使英國外交家爲戰爭攪擾的腦經，感受十分的不快。其中關於倫敦宣言的那個牒文，原稿措詞

(註一) Hendrick Life of Page, I, 308

(註二) Grey op. cit., II, 64

(註三) Ibid., p. 117.

是這樣的嚴厲，使得總統也不肯認可。威爾遜拿這個牒文給他的朋友霍司去看，霍司主張應與英國駐美大使西雪爾斯普林·來司（Cecil Spring-Rice）商議。這種在外交上非常的手續竟採用了。霍司大佐面晤英國大使，示以這個牒文。西雪爾力說不應照這樣送出去；他甚至於說像牒文現在這個樣子，不啻是一種挑戰。（註一）霍司大佐回來見威爾遜，威氏指令藍辛把這牒文重新起草。再呈與威爾遜總統的時候，仍認為太強硬。可是威爾遜與霍司大佐再把牠修改得溫和了些，使美國大使交給英國外交部長，不至有很大的憂慮。西雪爾在華盛頓告訴霍司大佐說，如果照原來的牒文送給格萊，『這差不多等於宣戰。』（註二）

稍後（一九一四年十月十六日），藍辛在一封公文裏面，向貝其提出這希奇的提議，謂應請英國（1）無保留的接受倫敦宣言，（2）隨後發一通告照自己的意思『解釋』這宣言。當貝其盡職傳達這使命於格萊時，這位英國外交部長率然有點不耐煩道：『你的意思難道要我們接受這宣

（註一）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 308.

（註二） Life of Page I, 378 (House to Page, Oct. 3, 1914)

言，然後再發一個通告規避牠麼？」

貝其被這答覆深深觸動，因為他自己是那樣的光明磊落，他覺得在這次特別的交涉中，他負擔了一個不誠實的使命。藍辛囑咐他傳達這個『解釋』倫敦宣言的提議時，『說明這是你個人的提議，你的政府不負責。』貝其在這封公文這些字的旁邊寫着評語道：『這是不確的。』藍辛的公文繼續說道：『讓英國政府發一律例，接受這宣言，沒有改變或增加。這個佈告出來以後，讓牠再來一個律例，不必預先通知美國。』貝其對於這段話的批評是：『很欠直爽。』（註一）格萊一看便看透這把戲了。

英國海軍在海上向來是握着統制的（只有惡意的批評說是壟斷 *Dominieering*）的勢力。因為這個緣故，有着一個良好的海軍傳訓的美國人民時常要懷疑英國海軍對於他們航運的態度，而且極其自然，不免有些神經過敏。在他一方面，因為法國海軍從沒有強大到可以要求海上的統治，又因為獨立戰爭時法國對美的友誼，美國人民對法國海軍部的行動並沒有怎樣敏感。貝其回

（註一） *Hendrick Life of Page III, 186-7.*

想到這種自然易知的國民心理，卒能率領他的政府及英國政府跳出這一種很棘手的困難。

美國衆議院在大戰初啓時通過了一個法令，准許外國造的船隻，從他們原來的登記，轉向美國登記。（註一）這個事實對於歐戰很容易發生重大的影響。這樣移轉，只有使從前的德國船隻，能在海上行駛，並和母國貿易，而不能當做真正轉向美國登記。英國政府不得不對此提出抗議。在美國行政當局和公衆方面，卻又很正當的關心於容許外國船隻改變爲他們的登記的權利。

在上述的情形下，密歇根的勃來登 (E. N. Breitung of Michigan) 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五日購買了漢堡美國間來往的貨船大西亞 (Dacia)，註冊爲美國船，載了棉花赴德。假使協商國同意此舉，那麼從此成立了一個先例，將使一切因爲有英國巡洋艦在看守而停泊在美國港埠裏不能出去的德國船，都可以掛美國國旗了。反之，假使英國捕獲大西亞，她就要與美國陷入一種嚴厲的爭端中——『這同樣的正合德國的意思。』

作貝其傳的人表示他的意見，說大西亞事件的嚴重，不下於一八六一年托倫提 (Trent) 事

(註1) The New International Year Book, (New York) for 1914, P. 725.

件。(註一)英國差不多願意做任何事情來維持美國的善意，但是她絕不能許大西亞經過前往德國。貝其說他和格萊萊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是『我和他所有的談話中的最險惡的。』(註二)

英國外交部與海軍部都知道大西亞事件的一切。西雪爾，他是把華盛頓的英使館和英美友誼的維持，看做他平生工作的最高目的，不能不帶了一顆沉重的心，報告美國外交部說，假如大西亞駛往德國口岸，是要被捕的。在華盛頓，空氣依然緊張。在倫敦，籠罩了昏黯與焦慮；新聞紙使民衆站着脚尖兒期望着。在英國，沒有一點躁動主戰的精神。沒有人想不顧一切與美國作對。

有一天，貝其照例來外交部拜訪。他被延入格萊的房間裏。這兩人已成了朋友，貝其的拜訪並不都是官場的。雖然格萊的身體需要休息，他也願意做幾分鐘隨便的談話。

『你有沒有聽到關於英國艦隊的事，愛德華先生？』貝其說道。

這位英國外交部長有些莫名其妙，只能用一種含糊的認可回答着。

(註一) Hendrick, Life of Page III, 228.

(註二) 同前

『你不覺得這是已經宣傳過甚麼？』這是美國大使第二個問題。

愛德華格萊現在差不多無從捉摸貝其的意思了。他在那些時候工作實在過度，貝其的諧謔使他覺得很有趣，雖然他並沒有得到要領。

『我想，法蘭西也有一個艦隊的，』這是貝其的又一步。格萊諒必已經看出了思想的趨向，但是他讓貝其說下去。

『好了，』美國大使說，『那裏是大西亞。爲何不讓法國艦隊去捕獲牠，得到一些宣傳呢？』（一）其餘的事，由無線電辦妥了。大西亞遇見了一隻法國戰艦，被扣留起來，沒有引起外交的困難。

至於倫敦宣言，英國海軍部的見解漸被外交部所採納，並且就大體看來，是堅定地維持了。不僅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與十月十四日的通告把棉花與油籽列爲違禁品，並且一九一六年三

（註一）Life of Page, I, 305. 霍司大佐隨後建議謂華盛頓的法國大使糾塞蘭 Jusserand 對封鎖的問題，

可以多露頭角，藉此轉移美國人的注意從英國的封鎖政策，轉到法國的封鎖政策上。

月三十日的一個通告更削除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的命令裏對於倫敦宣言遵守的程度。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三日的一個命令，又廢除了絕對違禁品（作為軍用的貨物）與有條件禁品（如果不專供民用，就得視為違禁品的貨物）的區別；根據的理由，是實際上全體人民，都在直接與間接參加大戰。

這通告羅列了一百六十九種貨品為戰時違禁品。這個名單，係按照字母先後排列，看起來像一張絕對完備的目錄，凡是物質生存所需要的東西，都包括在內。（註一）

霍司大佐一九一五年在倫敦時，曾告訴格萊說，如果德國人沒有用潛水艇政策，激怒美國人，便有美國議會禁止軍器輸出的大危險。霍司提議英政府應該贊同解除從海上運食物入德國的禁令，只要德政府答應放棄牠的潛水艇政策及窒息氣的使用。格萊是贊同這個提議的，雖然他說不定能夠使內閣也同意。當霍司向德國外交部提出這意見時，他得到一個「率然的拒絕」。格萊向霍司批評這件事說：「這卻解決了德國人的巧辨，說其所以對英要運用潛水艇政策乃是迫於

英國要餓死六千五百萬沒有參加戰爭的人民的爭議。』(註一)

除美國外，其他中立國家也有不平之鳴：格萊的通牒，能寫得最客氣，但有時也能寫得帶有凌人的嚴厲性。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他開始給了瑞典政府好幾個牒文，討論英國當局對於寄往瑞典的橡皮包件，予在開爾克華爾 (Kirkwall) 以扣留的問題。瑞典政府極力抗議要求將戰時的扣留問題交給公斷，但是格萊拒絕任何足以危害搜索權利的讓步。(註二)

大戰末了在協商國與荷蘭間發生了一種棘手的形勢。一九一八年六月，一隻武裝護送的荷蘭政府搭客運貨船，準備從歐洲到東印度去。荷蘭政府在答覆公眾的要求時，輕率地聲稱『護送軍的司令，不能容忍對於護送船隻的任何檢查。』英法當局看了荷蘭交來的文件，知道這次航運沒有違禁性質後，一致同意『放棄他們在這次特殊事件裏的搜索權，』纔使荷蘭當局有了下台的地步，不致難堪。荷蘭政府對這宣告，表示欣喜並聲明沒有牽涉到國際法的問題。(註三)

(註一)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 444-6, 448, 450, 453; II, 16.

(註二) 此項通信載於 State Papers, British and Foreign (1916), 531-59.

現代歐洲外交史

(註三) State Papers, British and Foreign (1918), 533-44

第六章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的美國

美國對於歐洲事件的孤立態度，是一件被傳統和地理所造成的事實。這傳統創始於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告別辭，和湯麥司甲菲遜（Thomas Jefferson）的就職宣言，其中都有對於『糾纏的同盟』的著名警誡。地理比傳統來得利害。一個英國人或法國人只要在美洲就攔幾天，就覺得與歐洲相去之遠，這是何等一個隔斷新舊兩世界的海洋與空氣的厚幕。大戰爆發時，老是愛好新奇的羣衆，聚集在美國大城市的街上守候公報；民衆心目中總是想像穿着草灰色制服和戴着鐵釘做的頭盔的德國人，排着隊經過比國的里集（Liège）城；同時也容易想像亞西利安人（Assyrians）向埃及及出發，或是阿里涅維斯達斯（Arioviscus）的部衆越過萊茵河去攻擊西撒的羅馬軍。可是也有深思熟慮的美國人，看到美國的重大利益是深深牽涉在內。（註一）

自從俠義的拉斐德 (Lafayette) 來幫助美國的獨立戰爭後，美法間就有一種友好的傳統關係（實在不很活動）。美國人民對於德國人據說從沒有多少的親近過，不管條頓移民在美國的數目如何，也不管受過德國訓練的美國學者有多少。缺少外國語言的知識，益使美國人疎遠；很少人懂得德文；就是那外交用語的法文，在一個德國大使駐美的八年時間內，沒有看見一個國務卿說過。（註二）在華盛頓，糾塞蘭 (Jusserand)（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法國大使）老是說英文的。美國人能夠瞭解的惟一歐洲國家，就是英國。並且，英國政策向來（現在亦然）有一主要點，就是決不做任何足以使美國離心的事。貝其初到倫敦的時候，英皇喬治第五向這位大使說：『我不願有什麼事，使貴國人民誤解我們。』（註三）這是大戰爆發前一年的事。

（註一）紐約時報十月十四日 (1914) p. 10. 該報聲稱德國如果戰勝，她的土地野心同樣可以向美國要求夏威夷羣島及其他屬地。參看 Roosevelt, America and the War (1916) p. 13.

（註二）Bernstorff, op. cit., pp. 15-16. 他是德國駐美大使，自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七年。

（註三）Hendrick, Life of Page, III, 30.

在開戰的頭三年裏駐在華盛頓的德國大使伯恩斯托夫 (Bernstorff) 說有三個原素決定美國對於大戰的態度：第一是普通美國人的和平主義，他們完全贊成他們的國家保持和平，因為他們知道美國很隆盛，不願意失掉這隆盛。第二是美國輿論的容易煽動，這種輿論總是激烈的情感，擁護國家榮譽的。第三便是美國文明思想，習慣的英吉利背景。伯恩斯托夫說：『即使威爾遜願意這樣做，他也不會對英宣戰的。』

在大西洋的彼岸，情形也是差不多的；就是說，英國外交部於美國生活非常熟悉，還有一個很新的美國司的組織，至於德國政府方面，首相底下的兩位最高級官吏對於美國社會是很不明瞭的。外交部長耶各 (Jagow) 是一個有學養的紳士，在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的時候，拿了許多小說和遊記來看，藉以獲得關於美國生活的知識。齊麥爾門次長 (Herr von Zimmermann) 曾於十五年前，自上海回國時，在舊金山耽擱了兩天，紐約耽擱了三天。『他似乎自以為這次橫貫美洲的旅行，給了他對於美國人格的密切知識。』(註一)不用說得，駐華盛頓的德國大使也可以說美

(註一) Gerard, My Four Years in Germany (1917) P. 423.

國外交部同樣地不瞭解德國的情形。就是在美國歷任總統裏面，大概算得最受過教育的，而且著過一本講到歐洲政府的書的威爾遜，對於歐洲情形也沒有深沉的知識。（註一）

威爾遜的肖像是大西洋兩岸都曉得的：是一個穿得很講究剃得很乾淨的，『大學教授』中最好的一流的面孔。他有一種深思的，修雅的外貌，一種人道的表情；一張堅定的嘴和一個決斷的下頰；那夾鼻眼鏡更給這一個到處引人注意的面孔以一種可說是不尋常的貴相。也許是公正，說有三件事聯在一起，使他成爲不平常的政治家：智力，固執，和孤寂。他的健康不很好，不很喜歡交際；他不像羅斯福總統那樣每天在白宮裏面用膳，以便與外界談話，與政治及社會發生密切的關係；威爾遜與他的家庭過着很簡單的生活，很少接見人；若是偶然接見人，他是和善，謙虛，很願意了解別人的意見；像貝其所說，他是過一種鄉村大學教授的生活；普林斯頓（Princeton）學者的習慣。威爾遜的又自然又有學養的雄辯，他的文學的嗜好，使他的演詞與信札，成爲一種傳達崇高與奮的情緒給舊世界被戰爭打碎了理想的疲乏人民之神奇媒介。可是有時候，他和日常生活的

（註一） Charles Seymour, Woodrow Wilson and the World War (1921), p. 25

疎遠，以及他想要找出驚人語句的欲望，使他作出使人民感覺不快，而同時引起譏諷的語句。『我相信，我們不可勉強改變我們一面觀察一面等候的政策。』（註一）『有時候一個人可以自尊自大，到不屑與人爭鬧的地步。』（註二）有時他似乎被自己的語句所拘束了，他所說的事，詳細看來，是很少意義的，像：『俄羅斯的友邦，在將來的幾月裏所加於她的待遇，不啻是他們的善意的試金石。』（註三）可是除去這一切來講，威爾遜的演詞，我們必須承認牠有療治和鼓舞支離破碎的歐洲人民的力量。這般人民即是威爾遜聯合以從事於這個偉大圖爭的。

大戰前數年大家認為英德或是法德有馬上發生衝突的危險。威爾遜覺到這種危險，所以在一九一四年五月，便派了霍司去謀調解。（註四）他在歐戰爆發後第一次對國會演說中，一方面指出美國與全世界都相安無事，同時要人注意兩個事實：第一：『我們需要船隻，但是我們沒有；』第二：『我們在每一次國難時，在將來有如在過去，我們決不能靠一個常備軍，也決不能靠一個後備軍，而是靠受武裝訓練的國民。』（註五）在這麼早的一個時期，他已經想到參戰的可能。他的私人秘書在一九一六年說：威爾遜之所以不干涉墨西哥，就是想等待一個大概更大的干涉。一九一六

年威爾遜總統告訴他的秘書說：『看來對德作戰，似乎是免不了的。』（註六）

當大戰爆發時，德皇於八月十日在柏林給了美國大使一個希奇的文件，預備轉致威爾遜總統的，內稱比利時的中立，因為軍略上的原因，不得不破壞。伯斯門賀爾維 (Batmann-Hollweg) 首相在八月四日向國會演說，也這樣說過，但堅稱是法國先啓戰端的。可是六天後德皇寫信給威

（註一） Message to Congress, Dec. 2, 1913, 關於墨西哥。

（註二） 在 Philadelphia 的演說詞，May 10, 1915.

（註三）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向衆議院的演說。酸性試驗一語，也見於十四點中的第六點，到一九一八年四月六日止的演說見 Scott "President Wilson's Foreign Policy".

（註四） 閱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 249, 與 Mowat, Diplomatic Relations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25), P. 341.

（註五） Scott op. cit., pp. 74, 80. 該演說日期爲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註六） Tammly, "Woodrow Wilsonas I Knew Him (1921)", p. 159.

爾遜並沒有說法國是戎首。(註一)德皇的信並沒有公布；雖然如此，伯恩斯托夫當時還說：『這是預料得到的，美國輿論大多數將站在協商國一邊。比利時的中立被破壞之後，此種情形更遠出預料之外。』(註二)據說威爾遜聽到比利時被侵入後，不得不故意抑止他維護一樁他認為關係世界文明的事由的衝動。(註三)

他本來可以當衆用着他那種化理想爲言詞的可讚歎的天賦，來表示他的恐怖。駐倫敦的美國大使很感覺到他沒有這樣做法。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也有同樣的感覺。他寫信給格萊說道：『我對於我國政府沒有根據海牙條約，抗議這次加於比利時的橫暴，不勝駭然。』(註四)美德間在大戰爆發後的外交通訊，可說是開始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的一個通牒，這個通牒與送往其他交戰國者相同，建議遵守倫敦宣言的好處。八月十九日德國政府覆稱，假定別的交通

(註一) Document and Criticism in Gerard, My Four Years in Germany, pp 200-7.

(註二) Bernstorff, op. cit., p. 49.

(註三) Tammly, op. cit., p. 226,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I, 49-50.

(註四) Feb. II, 1915 的意見 Grey Twenty-five Years II, 154.

戰國照辦，牠也同意。後來在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美國撤回了她的倫敦宣言，應採爲臨時海軍法的建議，因爲交戰國非把牠修改，反對採用。因此美國宣稱其政府與人民的權利與義務，應照現行國際法的法則及現行的條約規定。（註一）

美德間迄無嚴厲的困難發生，直到一九一五年二月四日，德國政府通告英國及愛爾蘭周圍的水面爲戰爭區域爲止。美國國務卿布賴安（Bryan）在二月十日的覆文裏，請德政府注意『如果德國海軍實行她海軍部布告裏預言的政策，毀壞美國任何商船或使美國人民有生命的損失，緊急的形勢……可以發生。』這個堅決而且極正當的聲明書，似乎是那位意志堅強的藍辛所起草的。

第二樁嚴重的事件是華盛頓德國大使館具名的一張神秘和引起不安的布告，日期爲四月

（註一）欲閱以上及後來的通訊，有 Scott 的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1914-17 (1918). Q. R. Fish 的 War Book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第十

五章中對英美雙方的見解有中庸的敘述。

二十二日，上面說：『仰一切擬搭趁大西洋航路的人們注意，現在德國與其盟國正和英國與其盟國開戰……凡旅行人等搭英國或其盟國的船隻駛入戰區的，是自冒危險。』（註一）這個布告日期雖爲四月二十二日，但直到五月一日纔見報端（伯恩斯托夫所謂『歷史上常有的不祥的巧合』）這天正是肯那德輪船公司（Cunard Steamship Company）的一隻海洋船魯西坦尼亞（ Lusitania）從紐約開出去的一天。伯恩斯托夫在他的書裏宣稱，這警告，是很普通的，並沒有指名魯西坦尼亞。五月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牠便在愛爾蘭南岸之外被德國潛水艇的水雷擊沉了。在一千一百五十三個旅客中間，七百八十三個是淹死了或是被殺了，並且在淹死或殺死當中，有一百名以上是美國人。布賴安在他那二月十日的通牒裏預見的緊急的形勢，已發生了。

美國外交部不得不注意此事，但是布賴安送給德國政府的牒文是很奇怪的不決斷，也沒有生氣，特別是拿來和二月十日給德國的牒文裏傳達的勇敢（和嚴重）警告一起看的時候。布賴安不去對付他那二月十日牒文裏所預言的『緊急形勢』，而只說：『牠（美國政府）誠心期望

（註一） Bernstorff My Three Years in America, p. 115.

德國政府將否認美政府引爲遺憾的行爲，在賠償的可能範圍內賠償那種沒有數目的損害，並立即採取步驟，以阻止此等事件的再現。』可是在結束時，比較還強硬一點：『德國政府無庸期望美國政府在行使其維持本國權利的神聖責任上，忽略任何必要的言語或行動。』如果後面挑戰的一段是威爾遜的意思，那麼在布賴安看來已覺得過分了，所以他在一九一五年六月八日便辭了職。奧國駐美大使杜姆巴（Dumba）打電報給齊麥爾門說，布賴安告訴他這個牒文並無嚴重的意味，因之這個通牒對於德國外交部的印象更少。布賴安至少主張過寫一封信去聲明這一點，但是威爾遜拒絕簽名。可是這意思傳出去了，齊麥爾門很相信，並且告訴了美國大使甘拉特，甘拉特又把這事報告了倫敦的美國使館。（註一）

甘拉特預料美國會立刻對德斷絕外交關係，並且準備離開柏林。在華盛頓的伯恩斯托夫也很懼，以爲最好的辦法，只有道歉，說這是一個錯誤。看起來對於德國是很不幸：德國在美宣傳的領袖登堡博士（Dr. Dernburg）有一次在克利夫蘭（Cleveland）演說，爲毀滅魯西坦尼亞

（註一）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 451, II, 6.

辯護，說是她帶有軍器。伯恩斯托夫說：『這篇演說引起了（美國）全國洶湧的咒咀。』（註一）霍司大佐負了和平的使命，前往英、法、德三國，這時候還在倫敦，寫信給威爾遜（一九一五年五月三十日）說道：『我已斷定與德國開戰是不可避免的，』他立刻決意回國。（註二）他認為戰爭不僅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是公平的，高尚的。『美國已走到十字街頭，必須決定站在文明的戰爭一方面呢，還是站在野蠻的戰爭一方面。』這是霍司大佐給威爾遜的一個電報，他在倫敦給包爾福（Balfour）看過。無論如何，霍司對於英國政府是以一個可能的同盟國相待。（註三）

美國外交部六月九日發出了第二個通牒，這個通牒是由署理國務卿藍辛擬的（他不久受正式任命）。藍辛的強韌老到的句法，對於英國外交部是苦汁和苦草，可是現在用來對付德國的爭議更加合式。他毫無困難指出了是美國政府的事情，去檢察從美國駛出的一切船隻無使用偽

（註一）Bernstorff op. cit., p. 118.

（註二）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 453-4

（註三）Ibid., I, 434, 438

造的文書的情形；魯西坦尼亞如果有所不合，不會取到清單；若是德國政府有證據證明美國政府沒有澈底盡牠的責任，『美國竭誠希望將這種證據提出來考慮。』這個牒文然後宣稱，『美國政府很熱誠並且很鄭重，重新提出牠於五月十五日致德帝國政府的牒文裏的抗議。』

德國政府七月八日的答覆，實在是侮慢的。牠沒有舉出任何證據，足以證明牠對於魯西坦尼亞的性質的攻擊。牠倒說，假使美國自己的船隻不夠運載美國必須渡大西洋的人民，『德帝國政府不反對美國政府以美國之旗插在敵方的四隻載客輪船上，以爲英美間旅客交通之用。』這四隻船可以保證其『自由和安全的航行。』美國外交部的答覆是『不能接受這個建議。』這個七月二十一日通牒並且說：『美國政府不能相信帝國政府還不否認牠的海軍司令官擊沉魯西坦尼亞的妄行。』

霍司因爲他在美國政治的和社會的生活裏面有一種獨一無二的地位，故對於美國輿論的測量，有特殊的機會。他說過美國人民，在魯西坦尼亞沉沒之後，可以贊成對德宣戰。（註一）但是伯

（註一） Grey, op. cit., II, 125. &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 484, 488-4.

恩斯托夫所說的洶湧的吼咀』是不永久的：參戰的機會過去了。

一九一五年八月十九日，英國海船亞刺伯（Arabic）號被德國的潛水艇擊沉，又引起了一次危機。兩個美國人送了性命。如果德國政府再不否認這種行動，美國政府必依照牠從前的通牒，與德斷絕外交關係。這次是伯恩斯托夫救了德國。他用盡了一切可能的壓力，去勸那不願意而又不相信的柏林當局，否認這潛水艇司令官的行動。『形勢比從前更緊張，』霍司在九月十四日寫給格萊的信上說，『在這封信到你那邊之前，也許已經決裂了。』（註一）可是，十月二日伯恩斯托夫打電話給霍司說，他已從柏林得到了那個必要的否認。『假使不是他的忍耐，卓識及不倦的努力，』霍司在十月六日寫給甘拉特的信上說，『我們現在已經與德國在作戰了。』（註二）

從這個日期起，至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德國宣佈重新實行無限制的潛水艇戰略爲止，其間只有一個時機，似乎可以引起美國的武力干涉。

（註一）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I, 45

（註二） Ibid.

一九一六年二月，霍司大佐在倫敦。他這時候是威爾遜總統主要的或者是唯一的朋友。他照常靜默有效，暗中工作。一九一五年春他在倫敦、巴黎及柏林進行的，第一次偉大的和平運動，現在被魯西坦尼亞的擊沉完全破壞了。（註一）

格萊每天早晨，七點鐘開始工作，直到深夜纔罷，時常「在晚上七點鐘放開他的工作，而舒舒服服的」在他家裏吃飯前遣遣一個鐘點。在這個「自由的」時間內，他老是願見霍司大佐的。他們有許多次的談話。格萊寫道：

霍司從初起就令我完全相信，他是認爲這次戰爭應由德國軍國主義負責的，他並且把這次戰爭看做是民主與非民主及反美國理想間的戰爭。（註二）

在這許多談話裏，有一次這兩位政治家同意了起草一個文書，後來成爲著名的霍司議定書（House Memorandum）（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這議定書（內有威爾遜的一點修

（註一）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I, 433

（註二） Grey, op. cit., II, 124.

改)說道。

霍司大佐語我，謂威爾遜總統，俟聽到英法方面稱時機恰當時，準備提議召開一個會議來結束戰爭。如果協約國接受這個提議而德國予以拒絕，美國大概要加入對德作戰。

霍司大佐表示，謂如果這召集了這樣的一個會議，所議和平，當不至有不利於協約國的條件；如果和平不能成立，德國不講道理，美國（大概）要退出會議，而變為協約國一方面的交戰國。

一九二五年格萊首次發表這個現在著名的議定書，關於威爾遜所加的修改，自然有很多的討論。霍司大佐密件（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印行之後，纔洩露所謂修改就是第二節末尾『大概』一字之填入。這個填入，並無特別意義。牠僅僅使第二節的意思與第一節相合，第一節原稿稱在某種情形下美國『大概要加入對德作戰。』因為照憲法，宣戰之權操於美國國會，總統自身不能在這許多文字中，絕對擔保他的國家。英國外交部知道威爾遜的誠意，可由霍司三月八日從華盛頓寄給格萊的海底電報證明：『他（總統）要我說，謂他所能為美國將來行

動言者，他同意於你給我的議定書。」（這個電報是霍司向威爾遜報告後就發出的。）威爾遜總統在法律上再不能作進一步的應許，以束縛他自己和美國了。（註一）

『所以』霍司大佐文件的編者評道：『幸運確曾大叩協約國內閣的門……這個獻議提出的時候，正是美國因為她對於公理與人道的奮鬥漠不關心而被咀咒的時候。羅斯福大發咀語。』

對於這一切，威爾遜沒有公開作答，沒有作文自辯。但是在私下他要霍司大佐所提出的獻議就是回答中的最圓滿的了。（註二）

這是霍司大佐的見解，謂德國人與協約國都同意召集這麼一個會議，美國調解的和平條款，必包括比利時與塞爾維亞的復國，阿爾薩斯和羅倫的撥歸法國，俄國之取得君士坦丁，以及奧國內講意大利言語的區域之歸還意大利。德國可以保留些殖民地，或者還可得到些。（註三）

（註一）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I, 201-2. Cp. Hendrick. op. cit., III. 289-90
該書說第一節末尾，「大概」一字也是威爾遜加入的，那是錯了。

（註二） Seymour 所說，見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I, 204.

（註三）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I, 170 與附註。

在戰爭時期，外交的可悲的命運是，牠必須抱遠大的見解，默默地，小心地，謹慎地進行。所以就很遲緩，而每天之中有許多人斷送了生命，人類痛苦的程度，也在與日加深。英法政府交換意見需要時間的。再則，法國在凡爾登（Verdun）的抵抗既經逐見鞏固，桑姆（Somme）的大攻擊既已經在那裏準備，趨勢是等到夏季戰役過了後再說。等到協約國全體可以準備接收霍司的提案時，這議定書早已過時了。英國的愛斯葵士（Asquith）政府正要倒台。一個新的，也許更樂觀的內閣，（路易喬治內閣）在十二月七日（一九一六年）上了台。五天之後，德國政府宣布牠準備議和，但沒有規定什麼條件。從協商國方面看來，德國的態度，似乎使任何會議都不會成功。協商國是決定要取回阿爾薩斯和羅倫的。到了現在，威爾遜是不值得去召集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格萊霍司議定書裏面所規定的會議了。因為德人既不會來，就是他們來了，他們也不會允許割讓阿爾薩斯和羅倫的。（註一）那時美國勢必加入大戰，可是同時會議一經召集戰爭必暫時停止。這樣

（註一） Prince Bismarck 在一九一五年對霍司說：『這種條件，德國睬也不會睬的。』見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I, 273, Seymour 所註。

一來也許把協商國人民的戰爭努力 (war-effort) 或戰爭意志 (war-will) 完全拆散了。到了一九一六年終，威爾遜總統必定已經看清楚了，美國不久便要參戰（兩月後果然），所以，美國與其去加入一個停了重啓的戰爭，受種種失望，陰謀，爭執，及和議不成的猶豫的影響；不如加入協約國正在堅定從事的戰鬪。

據說霍司大佐除了在議定書裏面舉出的時期以外，還看到一個時期，美國在一九一六年可以加入戰爭。在議定書起草以前不多久，他曾到巴黎見過白里安 (M. Briand)。霍司大佐說，美國不能讓德國戰勝。假使法國通知美國，謂必需美國武力的幫助，然後纔可以防止德國勝利，那麼這樣的幫助，是會來的。不過這個建議，附有一條件，便是通知一定要在美國的幫助可以決勝負的時候。『這個建議等於要求法國，如果她能預先看到她快要瀕於毀滅的時候，只要，好比是，撞一下警鐘，美國就要趕來相助。可是法蘭西共和國從沒有發出這樣的一個通告。』（註一）

(註一) Hendrick, op. cit., III, 288-9, 詳見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I, 163.

第七章 巴爾幹半島的外交

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之後，保加利亞非常失望，對於她從前的同盟國，不勝憤怒。（註一）土耳其之收回亞得利亞羅堡（Adrianople），是德國外交的一種勝利，增加了德國在君士坦丁的勢力；對於保加利亞王弗地蘭（Ferdinand）的地位，差不多等於一個制命傷。（註二）這位陰險人物，是一個政治賭棍與百萬富翁的奇異混合體，對於過去的事，大概還不肯放過。他不久便在那裏暗中擬具種種新計劃，可是他總是要留出一個安穩的退避所，萬一失敗，他的銀行家能夠使他過一種舒服華美的生活。

大戰爆發時，所有巴爾幹的國家，都是亂七八糟。結果對於歐洲很不利，中了一個年老的法國

（註一）閱 *Mowat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 p. 280.

（註二）*Mekindoff, Diplomatic Reminiscences, 210-11, 217.*

政客在一九一二年對保加利亞首相蓋可夫(Guechoff)的警告和預言：『你們四個巴爾幹國家的團結，爲的是要在歐洲不穩的均勢上，發生很大的影響；這個團結（按即當時保加利亞、門的內哥羅，希臘和塞爾維亞四國的同盟）若是一旦破裂，便會變成歐洲大國角逐的鍵子。』（註一）

保加利亞王弗地蘭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向德國提議軍事同盟的事，載在吉馬爾拍夏的回憶錄裏面。（註二）據一九一一年修正的保加利亞憲法，外交政策完全操在國王之手。（註三）所以他可以與德國或奧國有了正式協定，而爲他的人民及其餘的世界所不知道。看來十分可靠，弗地蘭在大戰前幾年，與奧國政府發生了秘密關係；雙方正在合謀使大塞爾維亞不能成功。（註四）希臘（註一）Guechoff, *La Genèse de la Guerre mondiale* (1919) p. 119. 蓋可夫自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二年爲保加利亞首相，並爲巴爾幹聯盟發起人之一。

（註二） Djemal, *Memoir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p. 127, 並閱 Theotokes 致希臘王信（一九一四年

八月四日）載於 *Livre Blanc Grec*, No. 19.

（註三） 閱 Marcovitch 編輯的 *Serbia and Europe 1914-25* p. 176.

（註四） 見 *Revue des Deux Mondes*, Vol. XIII, Feb. I, 1913, p. 580ff. Pinon 所撰文。注意該文是在世

界大戰前寫的。

駐柏林公使謝托克 (Theotokos) (他是傾向德國的) 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報告說，奧國與保加利亞間似乎成立了一個協定。三星期後，德國駐雅典的公使，正式承認這個觀察。(註一)
保加利亞一九一五年十月三日加入戰爭的時候，發表了一長篇粗疏的宣言，內稱『我們已往的嚴守中立，在這次大戰裏是最聰明的政策，給了我國充分的利益』——主要的利益就是有適當的時間準備作戰。(註二)
弗地蘭王實際參戰的時候，是一個選擇得很巧的時候，對於正在前方與奧國敵軍堅持抵抗的塞爾維亞軍，足以制命。

不僅是塞爾維亞人與保加利亞人有嚴重的爭端，就是塞爾維亞人與希臘人間也有衝突。塞爾維亞人對於希臘人的兼併薩朗尼加是極勉強答應的。因為他們都反對保加利亞纔能聯合起來。在那次引起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的爭端裏，希臘和塞爾維亞在一九一三年五月十九日結了一個秘密同盟條約。在序言中間，說明了這是『一個純粹的防守契約。』牠有十年的法定限期，但是

(註一) Livre Blanc Grec (trans. Paris 1918) No. 13. (Theotokos to Streit, July 25, 1914) & Nos. 25, 26.

(註二) 該宣言全文見 Müller-Meinigen, Diplomatie und Weltkrieg (1917), II, p. 778ff.

任何一方，只要在六個月以前通知作廢，即成無效。第一條規定締約雙方互相擔保他們的領土。他們承擔，如果他們當中有一國被人無端攻擊，其他一國須用牠的全部武力來幫助。(註一)

當大戰爆發時，希臘總理威尼柴洛斯 (Venizelos) 正在慕尼克 (Munich) 赴布魯塞爾 (Brussels) 的道中，預備在該處與土耳其首相會商愛琴羣島 (Aegean Islands) 的問題。在答覆塞爾維亞總理巴式煦 (Pashitch) 的一個電報裏，威尼柴洛斯答稱，他將向他的閣員及國王提議，如果保加利亞攻擊塞爾維亞，希臘便參加戰爭。(註二)

一九一三年五月十三日的希塞同盟條約照字句上的解釋，是一個互相保證對付第三者的無端攻擊的條約；但在事實上，牠的解釋，是僅屬保證兩國對付保加利亞的攻擊的。但就是這種限制的解釋，威尼柴洛斯到了應當對保參戰的時候，也不能貫徹他自己的主張。希臘王康士坦丁絕

(註一) 約文見 Guéchosif La Genèse de la Guerre mondiale pp. 161-5. Livre Blanc Grec, pp. 5-25

(註二) 此爲 Venizelos 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十月四日在希臘議會中的演說閱 Livre Blanc Grec

No. 15 & Greece in Her True Light p. 42ff.

對拒絕。如他在大戰初啓時給他的姊夫德皇的電文所說，他是同情於德皇一邊的：『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之能得到卡伐那（Kavalan），不能不歸功於他。』（註一）

康士坦丁王如果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他的事業，如今看來，不免成爲歷史上一個大悲劇。但是他既然僅是一個中庸之才，所以就是他那最關命運的決斷，及最可悲的失敗，也沒有引起多少的注意。他身體高大，精神活潑，態度粗直有軍人氣，脾氣急躁，與人來往很和氣，有一個時候，會有許多朋友，並且他是無疑地關心他國家的利益的。但以一國之君主而言，他有三個大錯：第一，他時常不能當機立斷（實在能夠如此的人很少。）第二，他非常固執：打定了主意，錯了也永遠不改。第三，他是龐然自大，因此不惜把他的王國的生存，孤注在他一人的判斷上，及他自己實行計畫的能力。這幾點說明了，可以來爲康士坦丁辯護。撇開他個人對於德國軍事與權威的系統表示同情以外，他老實相信他的國家之福利，在站在一條中立的路上。他目擊兩隊有力的國家在打戰。假使中間有一方面打勝，他認爲這是同盟國。但是假使他加入任何一方面，他的弱小國家，在最後勝利之

（註一）該電發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七日（一九一七年後始刊行。）Livre Blanc Grec No. 21

前，也許已經變成各國軍隊的遊戲場，並且也許已經像比利時或法蘭西北部那樣被打成一片荒土了。他不預備冒這個險。所以他採取了那條領他到流亡，到王朝覆沒，到國幾不國的路。

威尼柴洛斯是另一典型的人，因為他有高超的性質，這種性質與品格的堅強及領袖的能力合在一起，便成了一個政治家，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這種高超的性質，便是判斷的能力，在現在複雜矛盾的事實裏面，能夠抉擇何者是將來應取的正路。平常的人，有相當材能的人，能够應付日常的事件，能夠措置政府的重要日常公事。但是只有少數例外的人，能為未來許多年，立下正當的決斷；能定出一個方針，決定未來幾代的命運，使子孫受其利益。在這些少數的大政治家，威尼柴洛斯一定要包括在內。他曾遇着不少有萬分困難的決斷要他下；就歷史家所能評判的而論，他的決斷都是對的，雖然他國內人民的感情，或是他國家的貧乏或有時僅是運氣的不佳，阻止了他實行他的決斷。

最初威尼柴洛斯希望改造巴爾幹同盟，勸他本國政府和塞爾維亞政府，將馬西唐尼亞某處地方割讓與保加利亞。可是這個計劃失敗了。這些割地，尤其是塞爾維亞準備貢獻的地方，殊不足

以使保加利亞保守中立，到了一九一五年十月，保加利亞軍隊便侵入塞爾維亞了。希臘政府顧到希臘同盟條約，現在不能不決定牠的行動。

希臘政府已有三次被迫去決擇戰爭與和平的命運——一在一九一四年八月，那時威尼柴洛斯自己也贊成中立；一在一九一五年一月，那時他曾決然勸康士坦丁王加入協約國方面參戰；（註一）還有一次在一九一五年三月，韃靼海峽遠征（*Dardanelles Expedition*）的時候。在這最後的一次，康士坦丁王之拒絕參戰，是受了俄國沙重諾夫給他的一個警告的影響。警告內稱俄羅斯極不希望希臘參加君士坦丁的佔領。（註二）威尼柴洛斯看見國王不接受他的意思，他便辭職了。命運不佳的賈那利斯繼任做了總理。

在保加利亞侵入塞爾維亞以前，威尼柴洛斯已重握政權。在一九一五年八月底，他又做了總理。九月保加利亞動員，希臘也下令動員。可是，希臘參謀部反對，謂除非塞爾維亞按照附於盟約上

（註一）文件見 Crawford Price, *Venezelos and the War* (1917), p. 61ff.

（註二）彼托落格拉德的希臘代辦公使所述，見 *Revue Politique*, Jan. 2-15, 1916. 並閱上述 Price 書中 p. 83.

的軍事協定之規定，出兵十五萬人，塞爾維亞所處的地位，顯然不能做到。威尼柴洛斯因此詢問（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英法公使，他們的政府能否供給這麼多兵。（註一）答覆是，英法可以遣派部隊，雖然十五萬人的足數不能立刻調齊。這可以說是薩朗尼加遠征的法律根據。這是預料到的，並且是準備了的；第一批協商國軍隊於十月三日開始在薩朗尼加登陸。希臘政府形式上提出了抗議，藉以保持牠的中立，直到助戰原因的發生。這個助戰原因就是十月三日保加利亞的實行參戰。威尼柴洛斯在十月四日對衆議院的一篇有力的演說裏，主張與塞爾維亞積極合作。翌日，康士坦丁王把他召去，勸令他辭職。

柴米斯 (*Naimis*) 繼威尼柴洛斯爲總理，他是一個從不把他的國家或自己牽入於任何重大危機裏的謹慎寡言的政治家。他保持中立的政策。在他一面，威尼柴洛斯絕不表示懊悔。他認爲希臘軍隊與塞爾維亞軍隊合作到協商國軍隊能從薩朗尼加開來的時候，就可以免得塞爾維亞人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一月的慘敗，及馬西唐尼亞的幾乎完全喪失。希臘人民大多數信仰他；他的一

（註一）威尼柴洛斯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在 *Kiryx* 所述，載於 *Price* 書內（見前），p. 102.

黨在國會裏佔多數。十一月他的一派打敗了柴米斯的一派，柴米斯於是辭了職；但是柴米斯的內閣（和政策）實際上又在斯古魯地司（Skouloudis）的總理座下出現了。這是希臘立憲政府的末日。國王解散了國會。新選舉在十二月九日舉行了。威尼柴洛斯派因抗議沒有去投票。他們要用他們的力量，仍在議會裏佔多數，一定較爲得計。斯古魯地司仍爲總理。

議會制的政府如今是不可能的了。英法俄是三個列名在一八六三年成立格魯克斯堡王朝（Glucksbourg dynasty）的條約的保護強國（Protecting Powers），他們現在不承認這條約有效力了。因爲在該條約裏，希臘是宣告爲一獨立的立憲國家；但是如今她不復是立憲的了。因此協商國留着軍隊駐薩朗尼加，並佔據柯夫（Corfu）爲塞爾維亞政府的退避地。從這個可愛的島上，塞爾維亞王彼得（King Peter）和總理巴式煦可以看到一泓碧水外的大陸，他們從沒有絕望於回到那裏去。

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發生了那或許是巴爾幹政治的長劇裏最驚人的一幕。一支保加利亞軍下來到羅泊耳要塞（Fort Rupel），這要塞是扼住斯吐瑪（Struma）入南馬西唐尼亞的。羅

泊耳的防禦極鞏固，還有一千希臘兵守着。他們不發一彈就投降了。威尼柴洛斯一九一七年取得政權後發表的希臘白皮書，內有文件證明羅泊耳的降服，是康士坦丁王的左右與保德人預先安排好的把戲。由德國駐雅典公使麥爾伯煦哈夫伯爵 (Count Mirbach-Hartf) 在五月二十三日通知斯古魯地司，謂不久就要佔領羅泊耳。斯古魯地司當日承認接到德公使的知照，並存記德國願意遵守的條件。(註一) 這麼一來，希臘於是不幸被協商國封鎖。協商國的封鎖，意思在逼希王舉行新選舉，成立一個比較同情的內閣。斯古魯地司於是在六月二十三日辭了職，柴米斯又做了總理。但是新政府並不見得比舊政府更同情些。希臘是半餓的了；孩童們跟路人哭泣着討『小葡萄乾』。但是康士坦丁王只有更加懷恨在心。他自己並沒有積極不守中立，不過希臘的海灣和島嶼變成了德國潛水艇的躲避地，沒有人加以阻止。最恥辱的打擊，是來自保加利亞人。他們既佔據了東馬西唐尼亞，又於九月十五日冷冷地把駐在卡伐那的全部八千希臘兵放逐出去。這些希臘兵士被送到德國，拘留在甘立茲 (Görlitz)。希臘與保加利亞並沒有交戰，而這一切事情卻都發生了。

威尼柴洛斯最後對康士坦丁王統治下的希臘絕望了，回到了他的克雷地 (Crete) 故島。並於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宣布了臨時政府的組織。他請國王出來領袖這個復興希臘的國民運動，因為現在的希臘是『赤貧的，瓦解的，垂斃的。』十月，他和一位巴爾幹戰爭中的英雄康多略地斯海軍司令 (Admiral Condouriotis) 到薩朗尼加，設立了一個國防內閣。留在馬西唐尼亞的希臘軍隊大多數接受他的號令。十二月二十四日，這個臨時政府便對保加利亞及其同盟國宣戰。

有好幾個月，希臘與協商國的關係非常緊張。英法的戰艦駐在沙拉米斯海峽 (Straits of Salamis) 裏，協商國通牒要求希臘交出指定數量的重軍械，作為中立的保證。現由雅典大學教授 蘭布羅斯 (Spiridon Lambros) 主持的康士坦丁王的內閣，承受了協商國的多數要求。十二月一日，有兩千英法海軍在法利弄 (Phaleron) 登了岸。他們向雅典出發去接收希臘輸誠的大砲。突然間從兩旁和前面的高地上，他們被希臘的機關槍所轟擊。協商國軍隊躲起來並謀回擊。法國的驅逐艦開始向着希臘方面的高地開砲，但沒有多大損害。這樣長距離的戰爭，從上午起繼續到下午七時，等到法國驅逐艦開始轟擊王宮之後，纔停止。協商國軍隊方面，約死一三〇人，傷三百人。

命運將要盡了；十二月一日的『戰爭』看來就是康士坦丁王統治的末日。可是一個極端的危機，因為希臘政府的道歉，及一隊希臘兵士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柴品 (Zappeion) 向協商國致敬禮而解除了。康士坦丁王本來是在必倒的，只因為俄政府的躊躇（康士坦丁是一位俄國大公爵夫人的兒子，）及意大利政府顧忌威尼柴洛斯派在南阿爾巴尼亞方面的『國家主義』的目標，所以苟延殘喘了。（註一）但是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發生了革命，俄皇尼古拉第二退位了。威尼柴洛斯又向意政府擔保他的領土目標的溫和。為十分有把握起見，意大利政府於是在六月四日宣佈了阿爾巴尼亞在意大利保護之下獨立。俄國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又使俄皇不能再事反對。美國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的加入大戰，保證了美國方面不會提出什麼抗議。所以在六月裏，協商國派了一位高級長官瓊拉提 (Jonhart) 到雅典，全權處理希臘的情形。

瓊拉提（他有不少協約國的海陸軍給他指揮）處理得十分果斷而且迅速。六月十一日他通知希臘總理（這時又是柴米斯，）謂協商國決議康士坦丁王必須去位。柴米斯大概是最適當

（註一）意大利對廢康士坦丁王事反對到底。Page to Wilson, June 22, 1917 (Hendrick, op. cit., III, 381)

的人物，去負擔過渡到新政體的困難責任。他不讓民衆知道內幕，所以沒有人曉得他和國王間的經過情形。康士坦丁的脾氣時常是躁急的；而且他的神經已經被與協商國的緊張，險惡，屈辱，悲慘的外交戰磨折至今三年了。柴米斯勸他喝那國恥杯中的最後的渣滓。六月十二日，他發表了一篇壯嚴的宣言，顯然帶有一種成仁就義的神氣，宣布了退位。兩天後他和愛妻長子，乘了一隻希臘兵船，離國而去。他遁入瑞士。他的第二子亞力山大 (Alexander) 年僅二十四，是不會偏袒任何一方的，被協商國承認爲希臘國王。六月二十四日，依了瓊拉提的忠告，亞力山大王邀請威尼柴洛斯從薩朗尼加來組織政府。六月二十五日威尼柴洛斯到披里亞斯 (Piræus)。他宣告雅典不合憲法的統治時期終了。希臘是要回復爲一個自由的，君主的，立憲的國家。六月三十日希臘正式與同盟國斷絕外交關係。這位偉大的克雷地人雖然在大戰最黑暗的時期也沒有改變他加入協商國方面的原來決斷，到了現在有全權來實行了。

門的內哥羅在一九一四年跟着塞爾維亞參加了大戰，但她的行動不能使協約國滿意。門的內哥羅軍隊的主要任務，是防守那俯瞰及威脅奧國喀他羅埠的洛金嶺 (Mount Lovchen)。

九一六年一月奧人佔據了洛金。據說門的內哥羅當局與敵人正在進行交涉。本可以安全退到柯夫或薩朗尼加的門的內哥羅軍隊，被門王尼古拉斯留在大陸上，以致成了奧國的俘虜。尼古拉斯王逃避在法國，由法意英三國政府給以一筆津貼，度過其餘的戰爭時期。

第八章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的和平運動

在大戰初起的幾個月，和平雖是常常提到，但是不能期望。人數的衆多，現代政府的複雜，牽涉問題的廣大而且不明瞭，都使戰爭在當時沒有方法結束這場大戰，像一種可怖的龐大的機器，有人把牠機關一撥，開動了之後，沒有人知道怎樣去停止牠。可是也有人，開頭起就在那裏進行和平。第一個機會似乎在麥因（Marne）一戰以後。從開頭起，威爾遜總統已經明白表示他願做一個和事老。霍司大佐準備好了，只等機會一到便要提出建議，請交戰國考慮。九月六日，麥因之戰正在打的時候，奧國大使杜姆巴博士說『德國人正在進行一次絕大的努力，以求在法獲得一個斷然的勝利，等到這個做成之後，他們準備來考慮和平的提議。』（註一）麥因之戰的結果是同盟國敗了。然而並不是斷然的戰敗。『局外的意見』認牠是『救了巴黎而不是大勝；阻止了德國的前進，

（註一）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1, 323.

而沒有轉變局勢。』(註二)德人自己，可以從他們的司令克虜克(A. von Kluck)的回憶錄看出來，並不認為麥因是一個斷然的失敗。(註三)所以他們不預備接受協商國要提出的那種條件。他們尤其不能考慮關於消滅普魯士軍權的條件；而這一點，正是英法兩國在一切猶豫中所忘不了的。其實在沒有錯，他在麥因之戰一星期後寫給霍司的信上，有力地說道，『你不必愚弄你自己；他們正預備把德國踢開去，不許有什麼東西阻擋他們的路。除非德國海軍出來，立刻被毀滅，這個戰爭勢必成爲多數人所沒有想到的那樣長久的戰爭。』(註三)所以麥因的時機就此過去了，對於和平沒有什麼重大的努力。(註四)

(註一) Grey, op. cit., II, 164.

(註二) A. von Kluck, The March on Paris, 1914(1920), p. 145 ff.

(註三)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 383.

(註四) 比較 Lady A. G. Lennox 所輯 The Diary of Lord Bertie, I, 33-44. Lord Bertie 訪問錄

這個機會，如果牠真是一個機會，只是曇花一現罷了。交戰國竭力搏鬥，要在冬季未來的時候，決一雌雄。可是羅馬教皇彭納地克十五世 (Benedict XV)，因為他的國際性，及他的重要的公共地位，首先建議和平，引起了注意。在九月初發出的一封信裏，他勸各國統治者言和；並在十一月十六日他的一個通告裏，他申斥這次戰爭及一切的戰爭爲『由於相信物質的福利爲人生惟一目的之觀念』。在那同一的通告裏，他乘機再提出教皇的抗議『反對基督代表在羅馬所受的反常境遇』。(註一)有人已經報告，說教皇正在採取參加和平會議的步驟，目的要在國際保證之下，取得他在羅馬的地位的規定。(註二)這個報告雖被否認了，但給了意大利政府一個印象。在幾個月後，意大利與協商國訂立參戰條約時，有一條便規定了不許羅馬教皇參加和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七日據羅馬的報告，謂教皇正想磋商一個聖誕日的休戰，但是他很少成功的希望；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接見紅衣主教時，他不得不憂愁地承認道『這個基督教的提議沒有成功』。(註三)可是，

(註一) Times, Nov. 17, 1914.

(註二) Corriere della Sera, No. 8, 1914, 引載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九日的 New York Times.

(註三) Times Dec. 8, 26, 1914.

一向與羅馬教皇沒有直接外交關係的列強，正在採取補救這點的步驟。十二月十二日英國政府宣布任命（從霍華德（Howard）的舊天主教家庭中）一個特別欽差和全權公使，駐在教皇政府所在地伐地坎（Vatican）。法國直到一九二一年五月纔派大使駐伐地坎。

迄一九一六年底爲止，並沒有過斡旋和平的大努力，但是各地的和平機關，官場的或非官場的，彼此常通聲氣。瑞士便是一個這樣的地方；她是遵照一八一五年條約永久中立的國家；她有使人尊重其中立的地位。瑞士政府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發表了一個宣言，宣告牠保守中立的決心，並且於必要時，牠還要實行條約上所賦予的權利，佔據上薩伏夷（Upper Savoy）（註1）實際上，瑞士的中立在大戰期間是完全被尊重的，她是戰雲瀰漫中的世外桃源。因此，她不但是中立國人，並且甚至是交戰國人能夠會面的地方。日內瓦比較瑞士國都盤恩（Bern）更有世界性，常是這種聚會的所在。國際紅十字會的總機關便在日內瓦；所以這個城市是許多與大戰相關的救濟工作的中心。牠老是政治的流亡者的佳寓，像無政府主義的巴枯寧，共產主義的列寧，正統主義的康

（註1）原文見 Grunberg, *La Suisse neutre et vigilante* (1917), p. 129.

士坦丁王或奧皇卻爾斯。在大戰期間，官吏，銀行家，政治家，大學教授，有錢有閒的人們經過瑞士或在她的一二佳城中留連幾時。許多安靜的會議在那裏進行，有時候是代表政府的人士，彼此會議；有時候是有勢力的私人彼此會議，這種有勢力的私人，假使他們的使命成功，便會設法使政府採用。在瑞士地方可以提出『嘗試的』獻議，而不至於束縛那（非正式地）提議的國家。一位曾在外交界服務的英國國會議員，在日內瓦的旅館裏，會遇見受過教育的土耳其人，帶一種儼然的西方風度，坦露他的襟懷（小心地聲明他僅是一個私人），並略舉出土耳其政府可以講和的可能路線。這些私人公使，其中常有人把這樣的談話記錄下來，寄給本國政府；本國政府有時候還把他們保留在牠的檔案裏面。在瑞士，除了這些介乎官場與純粹私人間的性質不明的會議之外，也有正式代表政府的重要會議，如利佛特拉與亞爾猛（註1）（Revertara-Armand）的以及斯茅次與門斯多爾夫（Smuts-Mensdorf）的討論。

（註1）見 Mantengyer, L'Offre de Paix Separée de l'Autriche（英譯名爲 Austria's Peace Offer）；及

本書第十一章。

在一九一五年裏，並沒很有組織的努力，用商權的方法來中止戰爭。交戰國還沒有弄得精疲力盡；兩方面都還有很好的戰勝希望。奧帝國是第一個顯出她戰鬥力孱弱；她的國力不能應付長年累月的大激戰。

一九一五年春季，意奧兩國正在進行關於意大利中立的賠償的談判，恰好內有一封書來自意大利駐柏林的大使：『從一個可靠的消息所明白證實出來的表示看來，我推測德國不會拒絕對俄議和。』（註一）德國（在她認為滿意的條件上）是不會拒絕議和的，但這事的主動大概是奧國。四月十三日意大利駐梭非亞的大使打電報說：『謠傳奧俄單獨議和。』這樣的議和據說是維也納政治圈子裏的談話題目。（註二）彼托洛格拉德的法國大使也風聞這種運動了。三月二十八日派利洛格做了一段重要的日記：俄皇方纔把一封信交給沙重諾夫看（他又交給派利洛格看）。這封信是從曾爲奧國駐俄使館參贊，現任駐柏林大使的何恆洛親王（Prince Gottfried von Hohen-

（註一） Bollati to Sonnino, April 1, 1915 (Italian Green Book, No. 61)

（註二） Ibid., No. 62.

Johe-Schillingfirst) 寄來的。何恆洛親王於論及維也納宮廷本性和平後，建議俄皇派一親信到瑞士去會晤法郎西士約瑟夫皇帝的密使。『這封信，』沙重諾夫對派利洛格說道，『顯出奧國的道德是何等低。可是，將置之不覆。那個年老的法郎西士約瑟夫對戰事還沒有厭惡到肯受我們擬加於他的條件。』派利洛格私人的意見以為這次和平的嘗試，應該比較重視一些：他在日記裏寫道：『難道我們打算從意大利得到的無定的幫助，能夠等於奧國背信所加於德國的直接而且不可救藥的傷害麼？』(註一)

一九一六年初霍司大佐歷訪巴黎與柏林以後，對格萊提出了舉行和會的著名的提議。但是這種理想沒有成爲事實。(註二)

第一個公開的和平提議，是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德國政府致美國政府的一個通牒。這個通牒已經準備了幾個月，據首相貝斯門賀爾維後來所說，是威廉皇帝在先前十月裏^註議的。一

(註一) Paléologue, La Russie des Tsars I, 335-6.

(註二) 見前

九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德皇的通牒全文已經刊布出來了。(註一)美國駐德大使的紀錄，也證實了此事。在一九一五年九月，甘拉特曾告訴外交部長耶各，謂他的夫人準備赴美。耶各因此『力勸』甘拉特也去，『藉此盡力設法勸美總統出謀和平。』(註二)甘拉特去了，因此德國十二月十二日的和平通牒沒有交給他，而交了給柏林的代理大使。這是很可注意的，德國政府既鼓勵美總統出來謀和，又自己發表一個宣言，以阻礙明知威爾遜要發的通告書。(註三)外交部長齊麥爾門說，這個提議，意在排去威爾遜做和議的調人。(註四)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和平通牒，指出如果大戰繼續下去，歐洲將有覆滅之禍。牠暗示德國及其同盟國已經證明『他們的毀滅不掉的力量』並且略為舉出德國『在戰事中有相當

(註一) Official German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World War. (Reports of Subcommittees of the German Constituent Assembly) trans. Carnegie Endowment (1923), I, 158.

(註二) Gerard, My Four Years in Germany P. 346

(註三) Official German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World War, I, 154-5, 156-7, 129ff.

(註四) Idib., I, 133.

的成功。』牠特別注重『最近在巴爾幹的（羅馬尼亞的）轉變，』已經『迅速地而且勝利地削平了。』如果必要，同盟國可以繼續作戰，不過爲『被阻遏流血的欲望所推動，』如今提議進行和平談判。但是如果戰事仍須進行，那麼德國及其同盟國使在人類與歷史之前不負任何責任。沒有舉出條件，但是同盟國覺得『他們所要提出的，及他們所要保證他們人民的生存，榮譽和自由發展的那些提議，一定可以做恢復持久的和平的基礎。』

德國的和平提議，在所有重要的報紙上發表了，向每一個交戰國負擔很重的人民陳訴。但是協商各國政府對之極爲冷淡。他們冷淡的理由似乎有兩個：第一，德國政府建議的時候，正是他們佔優勢的時候：恩提威爾普（Antwerp），布魯塞爾，法國東北部，伯爾格納德（Belgrade），布加勒斯提。都在他們掌握之中。假使擬議的和平，要根據德國軍事的顯然有利形勢，協商國絕對不會滿意的，可是德國政府或者會承認事實上協商國的財源較大，延長於協商國有利。假使是如此，然而德國並沒有表示他們覺到這點。所以協商國對於這個提議冷淡的第二個理由便是因爲十二月十二日的通牒沒有提出任何議和的實在條件。

這是德國政府一切和平運動的根本錯誤。牠拒絕爲任何確定的條件所束縛。(註一)牠免不掉普通商人的習氣，想不講出價錢以求得到超過於牠所能接受的最低價格。可是德國政府諒必已經知道，除非她說出具體的和合理的條件，協商國不會真正停戰。協商國在德國未宣布條件前來交涉連一個月的停戰也不能答應。因爲如果他們的條件證明爲不能接受時，協商國便上了當：他們再不能勸他們的人民作戰了。這大概是參謀部方面，要取得許多軍事要地的關係，以致腦經平穩的貝斯門賀爾維不能公開立下具體的溫和的議和條件。就是辜爾孟男爵 (Baron von Kühlmann) 當他知道德國已經沒有希望，並且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他那篇有名演說裏犧牲他的事業，明白這樣承認的時候，他對比利時問題也不能代表他政府再比下面的話進一步：『我們一定要拒絕比利時問題作預先讓步的聲明，把我們受束縛，而敵人毫不受束縛。』(註二)

(註一) 比較 *Freiherr von Liebig, Die Politik Bethmann Hollwegs* (1919), P. 83ff.

(註二) 並比較 *Ludendorff, The General Staff and its Problems* Chaps. XI, XIII, 特別 pp. 419,

威爾遜的通牒，預備好久了，到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纔用海底電報發出，差不多立刻就送到了各交戰國的首都。威爾遜總統說，他『有些爲難，』因爲德國的建議恰巧也提出來了，以致兩者之間，彷彿有些連繫。但是，就威爾遜總統來說，這兩個和平通牒的原起，是沒有連繫的。

威爾遜總統的建議，主張一切交戰國須早日聲述他們各個的見解，對於停戰的條件，及保證戰爭不再發生的滿意辦法。通牒繼稱，總統『請大家注意，這次戰爭裏兩方交戰國的政治家所抱的目的，照他們向本國人民和全世界大概所說的話，實際是完全相同的。』他又稱雙方都願意考慮一個國際聯盟的組織。他用動人的文字，指出大戰中鉅大的損失，及戰爭繼續進行，世界文明前途的黑暗。『可是戰爭的具體目的從沒有確定地說出來。』

德國政府一星期後答覆了。但是牠仍守着不提出條件的政策。該覆牒宣稱看到了美國總統所提『立意崇高』的建議，並自述所見，謂『即時交換意見，似乎是達到所希望的結果的最適當之路。』因此該覆牒主張交戰國家的代表，應在中立地方即時開會。

協商國於十二月三十日答覆德國的和平建議，又於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答覆威爾遜的通

牒。答覆德國的建議，他們寫道：『一種僅稱應開談判，而沒有說出條件的建議，不是一種和平的建議。』協商國拒絕嚴重地接受這種建議：『實際上，同盟國這些提議不過是想去影響戰事前途的一種有計劃的企圖；』他們又無非想『預先在天下耳目的前面，留下種種新罪惡的地步——潛水艇戰爭，放逐居民，強迫勞動，和強迫人民當兵攻打他們自己的國家，及中立的破壞。』協商各國政府因此『拒絕考慮一個空洞無誠意的提議。』

這個答覆的腔調有些侮慢；牠的理由，雖然出於誠意，卻有些不務實際。在他們答覆威爾遜總統的通牒裏，協商國寫得比較謹慎些，同情些。他們進一步——他們十分確切地說出他們的戰爭目的。這些是：比利時，塞爾維亞及門的內哥羅的恢復；退出侵入法蘭西，俄羅斯及羅馬尼亞的領土，而予以公平的賠償；歐洲的改組，須有穩固的制度保證，並且須以尊重民族主義為基礎；從前自協約國割去的省分須交回；意大利人以及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 (Rumanes) 和捷克·斯洛伐克人，須從外國統制下解放出來；在土耳其虐政下的人民的解放，以及逐出歐洲那截然不相容於西洋文明的土耳其帝國。

格萊在他的回憶錄裏說，一九一六年非常困難。德人差不多各地方都戰勝了。可是在一九一七年春天，那不畏懼的協商國舉出的條件，即使他們佔了柏林，也不過如是激烈。

惟恐這個通牒的條款還不夠準確，繼格萊爲外交部長的包爾福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寫給威爾遜的信件（附有致德國通牒覆文的翻譯）裏，特逐項加以標點。

在這封信裏，協商國第一次正式地用這許多字提出交還亞爾薩斯羅倫與法國爲他們戰爭目的之一：『我們希望將土耳其逐出歐洲，像亞爾薩斯羅倫之交還法國，意大利失地之交還意大利，或是任何在協商國通牒裏指明的領土變更，都同樣地有裨於和平。』如果和平以同盟國的勝利或是他們暫時造成的『戰事地圖』爲根據，那麼國際關係的改善，就沒有可能。『這種和平不會爲造成戰爭及使戰爭殘暴化的勢力的勝利。』

因爲除非三項條件具備，一種持久的和平難期實現。第一，現在國際不安的原因應該盡力祛除或削弱之。第二，同盟國贖武的目標和殘忍的手段應爲其本國人民所不齒。第三，對於冥頑的侵略者，應設一種國際制裁，以爲國際法及一切防制戰爭的條約的後盾。

比利時政府，因為不是簽字於倫敦公約的協商國，所以對於威爾遜的通牒，另致一答覆。威爾遜總統所稱各交戰國自其昭告公衆的言辭看來，實追求同一的目標一節，顯然使比利時像協商國一樣痛心。覆文聲稱「比利時的榜樣，不幸的表明」雙方交戰國的目標是很不相同的。她的政府相信「在這次長期戰爭的最後解決中，協商國對於比利時——這個被德國野心和德國貪慾所犧牲的無辜者——的要求，及其在文明國家中應佔的地位所發出的呼聲，因為她的無可責備的過去，她的兵士的勇敢，她的忠於名譽，以及她人民的非常愛好工作，在美國，必能得到一致的回音。」

協商國拒絕了她的和平提議之後，德國向各中立國發了一個強有力的宣言。她抗議謂她已經做了「一次誠實的停戰企圖」；她否認繼續流血的責任；又駁斥協商國以保護弱小民族自居，試想「愛爾蘭人的命運，波耳共和國（Boer Republic）的自由和獨立的破壞，英法意的宰制北非洲，俄羅斯的壓迫外國民族，及最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對希臘的虐待。」德人有批評協商國在希臘的政策之權利，但「歷史上絕無僅有」一語勢，一定使政治家們讀了不免懷疑德人的比例

觀念。

威爾遜總統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對參議院的演說裏，提及他近來致各交戰國政府的『同樣的牒文』。他仍然在尋找最後和平的方法。在紙面上，各交戰國給他的保證是滿意的。

但這些保證的意義也許並不對一切都同樣地清楚——也許在水（意即指大西洋）的兩岸不是相同的。我想如果我把我們所認識的意思舉出來，一定有所裨益。

這些保證的第一含義是，必須是沒有勝利的一種和平（a peace without victory）。

（註一）

這篇演詞在演說的前幾天，寄了給駐倫敦的貝其大使，以便他可以拿去披露在幾家比較和平為懷的報紙上。貝其對於演詞的大體是贊同的，但是覺得『沒有勝利的一種和平』一語不太妥當。他立即打了一個海底電報到華盛頓，恭請將這一句取消。可是威爾遜不注意貝其的勸告，而

（註一）全文在 J. B. Scott 所輯 *President Wilson's Foreign Policy,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apers*, (1918 出版)。

『沒有勝利的一種和平』就在兩天後脫口而出了。『在今日大概只有少數美國人不認爲這一語爲威爾遜總統一生最大錯誤之一。』(註一)這篇演說僅在美德斷絕外交關係十二天之前宣讀的。

(註一) Hendrick, Life of Page, III, 316. 貝其的勸告書於一月二十日下午八時五十分抵華盛頓。

第九章 俄國的崩潰

『俄人缺少支持的性質，斐其在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寫信給威爾遜說道：他有時候恰在戰勝前退出。』（註一）

大戰使一切交戰國竭其道德的與物質的力量；那一方面先屈伏在這種緊張情形之下，不過時間問題耳。許多人相信協商國能忍受這種壓力最久；但是事實上第一個崩潰的卻是俄國。俄皇政府出全力來作戰。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的努力可視為她的悼歌。腐敗，不靈，主持失當，俄皇政府，不管一切，卻來了一次偉大持久的努力。牠枯竭了牠的財富，牠斷送了國中的壯丁——共一千七百萬萬人——進吃人的軍隊，牠把這壓力繼續加在疲憊凍餒的人民，直到弓折矢斷。

在大戰中各事俱不利於俄。她的財政不能接濟自己的軍費，軍械亦缺乏。土耳其參加同盟國

(註一) Hendrick, op. cit., III, 168.

之結果，便是韃靼海峽的封閉及俄國南部的封鎖。德人實際在波羅的海上封鎖了俄國；只賸白海上些微的出入。對羅馬尼亞的參戰，不無多少希望。但不久便明白不能得到這方面什麼救濟。

當大戰初作時，羅馬尼亞根據一八八三年訂的條約，也是三國同盟系統中之一員。年老的查利王 (King Charles) 起初出身是一個普魯士的官吏，在一九一四年十月十日死了。據說他的政治遺囑是：『我是一個何亨佐倫 (Hohenzollern) (譯者按為德國皇室名)，就是我們參戰的結果可以開拓國土，也不能改變我們對於德皇的誓守中立。』(註一)在他繼位的姪子下面，羅馬尼亞政策為之一變。一位傾向協商國的前總理瓊斯古非正式地但十分確信地說，羅馬尼亞必加入協商國：『惟一要討論的問題，便是確定時日而已。』

羅馬尼亞政府要解脫三國同盟的約束，與協商國訂立適合的條件，需要一個相當的時間。可是到最後各事都預備好了，羅馬尼亞便於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向同盟國宣戰。她得到一種保證，就是她對於托倫雪爾文尼亞 (Transylvania) 的領土願望，在和平會議上可得到同情的

考慮。然而羅馬尼亞軍隊的侵入托倫雪爾文尼亞只有一度簡短的勝利。德國的參謀部從桑姆前敵，從凡爾登，以及其他危險的戰區，抽出充分的人數，並派福爾根海將軍 (General von Falkenhayn) 領一支強有力的軍隊到卡派新 (Carpathians) 於是震驚了歐洲。羅馬尼亞軍隊隨即屢次遇到驚人的慘敗。羅馬尼亞政府不得不放棄布加利斯提。瓦拉齊亞 (Wallachia) 全部喪失了。最後在摩爾達維亞 (Moldavia) 邊界的西利斯 (Sereth) 線纔站定了。羅馬尼亞政府遷都於普魯斯河上的約塞 ((Jassy)) 她的處境不能幫助俄國。

一個長久，不順利的戰爭是一個革命運動成功的要件。在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以後，這運動幾乎成功了。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有一個國會存在。這是俄皇於一九〇六年的一个讓步。但是沒有負責的政府制度。俄皇的國務會議老是只包括些官僚。威特 (Witte) 斯托立品哥來米金，沙重諾夫及其他諸人全不過是高級的臣僕。關於一九一五年卡派新戰役的慘敗，及退兵時的可驚損失，(大半因為缺少器械的原故)，公眾對政府有所指責。一九一五年九月俄皇親來擔任俄軍的最高指揮，大概是一個錯誤：這樣使俄皇個人對於將來軍事的失敗須負責任，並且俄皇既

赴前方督戰，那位不很聰明的皇后，便留在彼托落格拉德，成了政府中最高無上的人物。荒淫僧人拉斯普丁 (Rasputin) 之出入宮禁，作威作福，更把朝廷的信用喪失了（該僧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終被暗殺。）

俄皇政府覺到自身的孱弱及暴風雨的將至，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顯然已開始與奧國議和。
（註一）事前英國陸軍部長吉青納在赴俄途中亡於海上（一九一六年六月五日。）外交部長格萊決定在年底親自赴俄一行，但是愛斯葵士政府的下台，使他沒有成行。（註二）

俄國對同盟國的提議，英法兩國都有懷疑，但是有力地被否認了。最後，欲謀改革行政系統以求更有效地從事戰爭，有幾個大公爵和將軍計劃了一個苦迭打 (Coup d'État)（譯者按即政變之意），目的在使俄皇及俄后不與問政事。但是這些陰謀家卻被工人與彼托落格拉德戍軍於一

（註一）這種提議公布於 Pester Lloyd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閱 L. Dickinson, Documents and

Statements relative to the Peace (1919), p. XXIII

（註二） Grey, Twenty-five Years II. 130, 133.

九一七年三月十一日先從下面發難了（註一）

俄國革命起初只流了一點血便成功了。牠落在憲政民主黨（Constitutional-Democrat Party）（Cadets）與平和的社會革命黨人（Social Revolutionaries）之手，這輩人獲得了俄皇的退位，組織了一個臨時政府，並且想要在相當的時候，召集一個制憲會議來建立一個以法國為模型的布爾氾亞（譯者按即指資產階級）共和國。同時，國計雖然竭蹶，兵士雖無鬥志，臨時政府卻光榮地決心遵守倫敦公約，與其餘各協約國共同作戰。可是他們採取了一個步驟，使軍紀鬆懈，作戰不復可能。臨時政府軍政部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發的第一號命令，廢除了不服軍令的死刑。（註二）

一九一七年七月伏夫（Lvov）親王的憲政黨臨時政府下了台，繼任的是一個和平的社會黨政府，以著名的黨人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為領袖。可是極端的社會主義者正在

（註一） Miliukov, Russia To-day and To-morrow (1922), Chap. I.

（註二） 閱 Gourko, War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 (1919), p. 328.

那裏進行推倒這個政府的工作。

一九〇九年一個遊歷維威(Vevey)的人，遇到一個尖頭廣額及無情的嘴脣的人物。(註一)這個叫做尼古拉列寧(Nicolai Lenin)的生面孔給了那位旅行者一個印象，使他寫了一段記事。大戰爆發時，多年流亡在外的列寧正在奧國，想煽動工人起來反叛。奧人把他禁錮了一些時候。他被釋之後，便往瑞士。到了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年的冬末，同盟國感到非常窘迫；而協商國正在那裏確信地預期一個迅速的勝利。俄國革命似乎給同盟國一個苟延殘喘的機會。牠對於軍事的義務是忠誠的，但牠也許要弄壞。有人建議，可以讓各種俄國的亡命客——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安然回到俄國去，希望他們會分解俄國的力量。一九一七年四月專車把列寧經德國，送入俄羅斯境了。這個試驗成功了功；最後的結果，便是俄國的退出大戰。牠還有別的結果——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德國人曾經料到是可能的，而且德國參謀部顯然認為有過於軍事利益的。魯頓多夫將軍曾寫道：

(註1) P. H. Box Three Master Builders and Another (1925,) p. 21.

我不能懷疑俄羅斯軍隊和國家的瓦解對於德奧有一個非常的危險……遣送列寧回俄，我們的政府負了一大責任。從軍事上看來，他的此行是有理由的。但是我們的政府應該看清俄政府一倒，不至牽涉我們。（註一）

列寧及其餘社會主義者的行程，顯然是由瑞士社會黨，特別是聯邦行政委員普拉吞（Fritz Platen）（和平主義者）所計畫組織的。列寧也受了瑞士社會主義者伯恩每日警報（Berner Tagwacht）的主筆格列姆（Robert Grimm）的幫助。由三個德國官吏，押送這個封了的車輛，內面載着這班俄人，出瑞士邊境。（註二）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由列寧組織的布爾雪維克黨推翻了臨時政府，開始他們的恐怖統治。

奧帝國的形勢很壞；克實林伯爵（Count Ozerinin）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曾告訴卻爾斯皇

（註一） Ludendorff's own Story, (1919), II. 126.

（註二） Albert R. Williams Lenin (1919), p. 38; Wileox, Russia's Ruin (1919) p.p. 238-9.

帝 (Emperor Charles) 謂奧國再不能支持一個冬天的戰事。(註一) 克實林希望德國在西部來一個勝利，「衝破英法陣線，取得喀萊 (Calais) 和巴黎。」我不相信協商在喪失喀萊和巴黎之後會拒絕俯首就縛的和議的。(註二) 但是如果德國在西部的攻擊要成功，必先使東部前線停止戰爭。十一月七日，即俄國布爾雪維克革命後十天，克實林從維也納也納寫信給他的朋友說道：

我在過去幾天接到了關於布爾雪維克的可靠消息。他們的領袖差不多都是猶太人，抱着奇怪的思想，我不羨慕這個歸他們治理的國家。從我們的觀點看來，最有興味的事，卻是他們之急於求和，而在這一點上，他們似乎不致有什麼改變，因為他們不能繼續作戰。(註三)

奧政府不大高興與革命的共產黨人列寧接洽。克實林承認「這個俄羅斯的布爾塞維克主

(註一)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演說，載於 *Otokar Czernin über die Politik Während des Weltkriegs*

pp. 10-11.

(註二) *Czernin In the World World War (1919)*, p. 214.

(註三) *Czernin, op. cit.*, p. 216.

義是歐洲的一個禍患。』他主張『直搗彼得堡，在該處開談判。但我們沒有這力量；趕快言和是我們自救的必要條件。』因此克實林不得不把他的驕傲收藏起來，與該共產黨人談判：『我不能找一個俄羅斯的梅特涅（Metternich）做我的同事的時候，只有聽之而已。』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克實林和他的僚屬出發往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何夫孟將軍（General Hoffmann）寧爾孟及其他德國官吏也在那裏，協同與布爾雪維克代表團會面。

俄軍總司令杜克賀林將軍（General Dukhonin）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由布爾雪維克軍事委員克列倫可（Ensign Krylenko）接任。十二月一日杜克賀林便在克列倫可的眼前被兵士謀殺了。

布爾雪維克早已宣布無割讓，無賠款，公開外交，及人民自決權（雖因此國家分裂亦所不計），為講和的指導原則。

停戰條約是於十二月十五日（一九一七）訂定的。（註一）其中有一個俄方提出的條件，就

是駐紮東方前線的德軍，不得調往西方。德國停戰談判的總代表何夫孟將軍對於這點不難接受，因為他早已下令把德軍主力部隊調往西方前線了。所以停戰條約第二條禁止軍隊的調動『但在停戰條約簽訂時期前已經開始調動的除外。』（註二）

何夫孟將軍爲外交公開起見，也贊同俄方委員在每次會議之末由雙方同意起草一個完備的報告，拍電發出公布。（註三）

俄國停戰的代表，又要求布爾雪維克文字自由輸入德境之權。何夫孟將軍『不得不拒絕這點，』但聲稱他是『十分願意幫助把這種文字輸往英法。』

那時布爾雪維克黨人還沒有確定否認前俄皇政府的債務和契約，他們假意爲倫敦公約作口舌上的殷勤，首先提議『普遍的和平，』包括他們的盟國——英法及其他。德國軍人派反對這

（註一）全文見 Text of the Russian Peace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p. 1, Current History Vol. XIV, p. 11.

（註二）Text of the Russian Peace p. 2; Hoffmann, The War of Lost Opportunities (1924 譯本) p. 199.

（註三）Hoffmann op. cit., p. 198.

種普遍和平的提議，因為這樣就不能從法比或英取得割讓地；他們『不能作如是無利益的停戰的念頭』。克實林伯爵報告此事，並且他早就知道同盟國沒有戰勝希望。他加着說：『這種笨話真使聽者不耐。』（註1）

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是德軍佔據的一個俄屬波蘭的礮台。克實林這樣描寫道：

這是一個希奇的地方——憂悶，可是有牠自己的美麗。一片無盡的平原，恰帶着一點高地，像一片汪洋，前浪推着後浪，縱遠眺之所及。一切的東西都作灰色，直到這片死水接觸灰色的地平線。雲在空中奔流，風在後面加鞭。

在這個純灰色的地方，會議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以前的俄羅斯戲院開幕。雙方代表在或定聚餐時互相見面。第一次全體會議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舉行的。同盟國接受布爾雪維克人根據無強迫割讓和無賠款為原則的普遍和平的提議，德國政府之所以接受這種普遍和平的意思，乃是因為明知英法必定拒絕。

(註1) Ozernin op. cit., p. 224.

我們必須正式拆散協商國，以便與俄國單獨講和。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所以有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宣言。該項宣言便是在東方已經開始的政治遊戲的動向的表示。（註一）

事實上，協商國各政府沒有注意這個提議。

德國的主要代表是：巴伐利亞的李阿坡特親王（Prince Leopold of Bavaria），他似乎多半是一個有名無實的首領；何夫孟將軍給克實林伯爵的印象是老練、精幹、鎮靜，但有點殘忍；足智多謀的辜爾孟是德意志帝國的總代表。還有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的代表。在俄國方面，有繼從西伯利亞釋放出來的猶太人越飛（Yoffe），托洛斯基的妹夫卡門納夫（Kameneff），他也是從獄中出來的；以及比成可（Madam Bizenko）。她是一個省長的女暗殺者。她沉默寡言，對於會議的進行似乎沒有什麼興味，但是無論何時一提到國際革命，她的形容就變了：她變得緊張熱烈，像『一隻獵食的野獸，看見美味在前，預備跳上去攫取裂食的樣子。』

越飛對於世界革命的觀念，也表示深切的興味，堅持要拿來討論。克實林不客氣告訴他說，如

（註一） Indendorff. The General Staff and its Problems, II, 639. 另參 Uzerin, op. cit., p. 224.

果俄羅斯人要想干涉奧國的內政，他們最好搭下班火車回去。『越飛愕然用他的柔和的眼睛看着我，沉默了一會，然後用一種我所永不能忘懷的慈和而且差不多是懇求的口氣說道：『我依然希望我們還能在貴國也引起革命。』』（註一）抱着這種友誼的念頭，越飛轉到討論的問題上去了。克實林覺得布爾雪維克人都不很老實。

起初會議進行不很順利。布爾雪維克人要求德人退出波蘭、可蘭（Courland）及立陶宛（Lithuania）。讓那裏的人民舉行投票來決定這些省分的趨向。德人對此不能贊成。『那些地方形成德國軍械所的一部份。』德國的同盟保加利亞爲難。他們不願遵守不割讓的原則。這一點顯然是保加利亞人在大戰中向來的特色：『他們一切都要，但不肯拿出一點』（註二）『他們抱了割地的目的來參戰，沒有退讓的意思。』（註三）可是，他們不能不讓步；但布爾雪維克人則不然。

（註一） Ozerin, op. cit., p. 221.

（註二） General von Stein: A War Minister and his Work p. 233.

（註三） Ozerin, op. cit., p. 231.

到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會議宣告休假，到一月六日再開。代表們於是各返本國國都。

克實林在維也納略事逗留後，於一九一八年二月三日回到勃來斯特里托夫斯克。在途中他接到一個電報，聲稱布爾雪維克人想把會議移往一個中立地方，例如瑞典的斯托克霍姆(Stockholm)。他和辜爾孟合意拒絕布爾塞維克人這個建議。恐怕布爾雪維克代表不回到勃來斯特里托夫斯克來，不免有相當的着急。『必然』克實林寫道：『如果俄人中斷談判，我們的處境就很狼狽。』可是這天晚上就知道布爾雪維克代表團由托洛斯基領着來了。『這是很有趣的，來看所有的德國人聽到這個新聞而欣喜。』(註一)一個布爾雪維克的單獨議和，顯然對他們是有大價值的。托洛斯基自己是這次俄國議和代表的首領。他立刻停止了那些俄德全權代表的非正式的散步和每日的宴會。以後的會議，俄國人自己吃飯。

最近有一個烏克蘭的代表團到了。他們與同盟國間的會議，於一月六日開始。烏克蘭人所關心的，便是要承認他們的獨立；奧國所關心的便是取得和平與奧地利烏克蘭的舊疆界。所以這種

(註一) Czernin op. cit., p. 231.

談判沒有特別的困難。布爾雪維克人比較麻煩，他們還是念念不忘斯托克霍姆，那裏『要阻止各國的布爾雪維克人的示威是完全不可能的。』克實林於一月八日和德國代表定計『用一種哀的美敦書的形式，要求在勃來斯特里托夫斯克繼續談判。』布爾雪維克人屈服了。何夫孟將軍『因我們這次給俄國的哀的美敦書的成功，而趾高氣揚，想照這樣子再給俄人吃一鞭子。』但是克實林和寧爾孟都不贊成。（註一）

布爾雪維克人這時候雖然毫無兵力（俄國軍隊實際上已經粉碎了），勃來斯特的談判卻拖延了一個可驚的長時間。一月十二日何夫孟將軍不客氣提醒他們所處的實在情形。『德軍是深入俄境了。』克實林以為這是一個錯誤；他稱這是何夫孟的『不幸的演說。』（註二）可是這位將軍自己很以為得意；他已經『從事於此好幾天了。』他相貌古怪：高而且闊，樣子很聰明，架着夾

（註一） Ozernin op. cit., p. 235.

（註二） Ibid., p. 237; 比較 Hoffmann, op. cit., pp. 218-19, 以及 Nowak, The Collapse of Central Europe, (1924).

鼻的眼鏡，一張十分堅決的大嘴——他具有專門的能力，不爲常人的軟弱或感情所攪動：一種有頭腦的機械軍人。

到一月二十一日又有一個間斷。辛苦的克實林回到維也納，目擊耳聞那裏的不良局面。二十八日他又回到勃來斯特。翌日，托洛斯基亦來到像從來一樣的倔強狡猾。他知道奧德正在醞釀革命。事實上布爾雪維克人希望在幾星期內，世界革命便會爆發；他們如今不過利用和平談判爲遷延之計，以便世界革命在幾個星期內可以成熟。（註一）最後德國政府，並非沒有理由的，失掉忍耐力了。牠發覺了布爾雪維克黨致德國兵士的勸告書，鼓動他們叛變，起來殺死德皇及他的將軍們，與蘇維埃聯合。德皇因此拍電到勃來斯特，囑代表團要求可蘭，立陶宛，立汪尼亞（Livonia）和愛沙尼亞（Estonia），不管甚麼民族自決。在和議決裂之前，與烏克蘭人已經訂好了有利於烏克蘭的和約（二月八日），因爲烏人知道奧國爲要獲得穀糧起見，不得不議和。『與烏克蘭訂立的和約，是被飢荒所逼迫而成的。』在維也納一般人都很感戴，稱之爲『麪包和平』（Brotfrieden）。

〔註一〕 Czernin op. cit., p. 245.

(註一)

一月十日托洛斯基對於同盟國交給他的『割讓主義的條約』拒絕簽字。同時他又正式宣布與同盟國的戰事終了。總司令克列倫可下令復員。因此，戰爭已經終了，而和平尚未成功。德國人——的確任何人都如此——不能瞭解這種非戰非和的局面。『辜爾孟雖有自制能力也糊塗起來了。』(註二)可是，德人不久便從他們的驚訝中醒了過來。那屬目於非戰非和情形的布爾雪維克的心境，將爲事實所屈伏。在二月十八日，德人便宣布了停戰終止。

隨着發生了任何民族所未忍受過的最大恥辱。德軍長驅直入無抵禦的俄境。文斯克 (Dvinsk)，明斯克 (Minsk)，利佛耳 (Revel)，斯可夫 (Pskov) 等要地，都不戰而降。(註三)德軍直入芬蘭，一個自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七日起的獨立國家。彼托落格拉德旦夕可下。武力協助了外交。布爾

(註一) Czernin op. cit., pp. 240, 249, 251, 257.

(註二) Tirkova-Williams, "From Liberty to Brest-Litovsk" (1919), p. 474.

(註三) M. P. Price, "Reminiscence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該書對蘇俄極表同情。

雪維克黨只有屈伏。他們預計，德國軍事當局不致於寒冬興兵，並且即使興兵來攻，德國軍隊也會與蘇維埃同化。於是『最後的希望去了。』（註一）布爾雪維克黨乃同意簽約，其所根據爲『在幾個月內德國就有社會革命爆發的機會，這時對德帝國主義作一神聖的戰爭，未免是魯莽的輕舉。』（註二）一個無線電宣布屈服了。托洛斯基抗議說『這是一個武力獨裁的和平，』卻沒有効力，於是三月三日在勃來斯特里托夫斯克便簽訂了該約。

這條約雖然後來被凡爾塞和會所廢除，但是有相當歷史趣味的。第一條，不管托洛斯基二月十日有『不戰不和』的宣言，聲明了同盟國與俄國間的戰事已告終止。第三條規定俄羅斯不與聞附圖上所劃之線以西所有的土地。線外的土地是可蘭，立陶宛，及波蘭。俄羅斯認可『讓德與按照這些地方的人民的同意，去決定這些地方的命運。』俄軍還要從立陶宛，愛沙尼亞及芬蘭退出（第六條。）當三月十九日這條約來到德國聯邦議會待批准的時候，首相黑特林伯爵（Count

（註一） Price, op. cit., p. 289. 又 Verstraete, Mes Cahiers Russes (1920), p. 260

（註二） Lenin 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宣言載 Price, op. cit., p. 245.

(Mortin) 伯爵解釋第三條道：可蘭與立陶宛早已和德意志聯合，至於立汪尼亞和愛沙尼亞也希望能和德意志有『密切的友好關係。』烏克蘭已經有條約（一九一八年二月八日）承認爲獨立國。波蘭的命運還沒有解決。三月七日德國在條約上承認芬蘭的獨立。

按照第六條，俄國擔任與烏克蘭議和，並且承認勃來斯特里托夫斯克的烏克蘭條約。在一九一八年與同盟國簽訂的一個補充條約裏，俄羅斯擔承付德意志六十萬萬馬克（三萬萬英鎊）『作爲賠償因俄國的措置而發生的德國損失。』

辜爾孟的意思，認爲這些從俄羅斯分出來的土地應成爲『國家單位』（State-entities）。即使他們並不『自決』參加德意志帝國，他們差不多必然要接受德國文化及行政方法的印像。他們這樣於是形成德國東境的一帶附庸國。假使協商國不會作戰到底，辜爾孟的計劃或已實現。俄國崩潰後，羅馬尼亞絕對不能得到援助。然而羅馬尼亞的問題對於同盟國也不是簡單的問題。自從她一九一六年在瓦拉齊亞挫敗以後，羅馬尼亞軍隊，在亞威列斯古將軍（General Averescu）之下已經改組過了；『羅馬尼亞軍佔有極好的地位，軍中士氣極好，並且在（一九一

七年八月) 麥拉色斯帝 (Maracesti) 最近一次大攻擊中, 麥根生的軍隊 受創很重。 (註一) 還有, 奧政府 殊不願對 羅馬尼亞 逼迫太甚, 以致逼成革命, 推翻 羅馬尼亞王室: 『這時歐洲市場上君主的價值已降落若干了, 我怕如果我們再推翻若干君主, 便要形成一種恐慌。』 (註二) 一九一八年三月五日, 在靠近 布加勒斯特的勃夫梯 (Bulftea) 城堡簽了一個預備和約, 最後的和平, 所謂 布加勒斯特條約, 則由同盟國和羅馬尼亞在五月七日簽定了。這個和約在 克實林 和 辜爾孟 方面認為是優容了羅馬尼亞人; 但在羅馬尼亞人方面, 則認為實際上打碎了他們的一切希望。奧國割去了從 托倫西爾文尼亞 通 瓦拉齊亞 的要道, 保加利亞得到了 多布魯甲 (Dobruja) 地方, 北至 多瑙河 (Danube) 的最近出口處。 (註三) 這個損失, 雖由同盟國非正式『准許』羅馬尼亞割取 培沙刺比亞 (Bessarabia), 也不足以抵償。德國因距離關係無從割取羅馬尼亞任何土地, 只有將德軍所征一切羅馬尼亞人的貨物和服役欠帳, 一筆勾銷, 引為滿足。

(註一) Ozernin, op. cit., p. 261.

(註二) Ibid., p. 261.

(註三) 條約上只允保加利亞得回一九一三年羅馬到亞從她手中取去的那部分的多布魯甲。其餘部分則由羅馬尼亞割與「同盟各國」(即德奧土耳其及保加利亞)保加利亞將來也可得到這部分，不過須給她的同盟國以相當的利益。

第十章 美國的參戰

一九一七年春，俄羅斯正在開始崩潰的時候，美國正在加入大戰。這實在是歷史上最富戲劇性的事件之一。這個發過誓不願捲入歐洲糾紛，向來卓然獨立的國家，如今走進了歐洲的舞台，遣送她的男兒來到法國的戰場。

『官場的』意見，亦即威爾遜政府的意見，無疑是親向協商國的。貝其大使在一九一四年十月六日自倫敦給了威爾遜一封信，建議美國應在外交上和經濟上援助英國，使戰事早日在公平條件之下結束。（註一）貝其是以親英著稱的，在大戰期間熱烈的，相信協商國的宗旨的正當。霍司大佐，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同時是威爾遜的心腹，腦筋裏面也明白協商國是對的。格萊爵士在大戰爆發後與霍司曾有許多次的聚會，他寫道：『他自始起就令我毫不疑惑，他是認德意志軍國主

(註一) Hendrick, op. cit., III, 173

義須負這次戰爭責任的。』(註一)威爾遜的見解與他朋友的也無所出入。霍司大佐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三十日寫道：『我覺得他對德國的態度正像美國其餘的人一樣的不留情。他甚至比我更進一步斥責德國此次的肇事，他的惡感不僅及於德國的領袖，並且幾乎及於包括德國全部的國民。』(註二)當一九一五年十一月霍司大佐向威爾遜提起意大利和羅馬尼亞不久便會加入協商國的時候，威氏對此表示歡喜，並希望這兩國不致遷延過久。(註三)在私人中間，意見自然不免有相當的紛歧。哈佛大學前校長伊立阿提(Charles W. Eliot)大概是美國學界中最德高望重的，他的見解，必為許多人所贊同。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日寫了一封信給威爾遜，提議『英、美、法、

(註一) Grey, op. cit., II, 124. 美國知識階級對德國及大戰的態度，從威斯康新大學戰書 War Book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中可以找出一種有講究的敘述。該書包括該校教職員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寫的有精彩有根據的論文。

(註二)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 293.

(註三) Ibid., I, 300.

日，意，俄攻守同盟，來懲罰奧德正在那裏所犯的罪惡，方法是對這兩國實施海陸封鎖。」（註一）使其不能與其餘世界各國交通。這個提議感動了威爾遜，威氏便拿了該信向他的內閣宣讀過，但覺得不能改變嚴守中立的政策。此中的真相是，威爾遜雖然深信德國是錯的，但對於歐洲的事件以及起初對於大戰，顯然不感到興趣。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霍司大佐在他的日記裏寫道：

我不高興說（我以前也說過）總統（威爾遜）對於內務和外交似乎沒有一種正確的比率的意識。我想這是華盛頓的空氣把他蒙住了，正像住在那裏的人都是如此，而且日常的工作，倒把當前震驚世界的大事大半掩住了。（註二）

有些地方，對同盟國的官場的關係，反比對協約國來得好。德奧都不能怎樣干涉英美間的貿易；但協約國的海軍卻能夠並且確曾阻止美國和同盟國間的一切貿易，（除了道經中立國家的以外。）就是道經中立國家的貿易，也被「繼續航程」原則的採用，及「攤派」海外貨物於那些

（註一） Ibid., I, 287-8.

（註二） Ibid., I, 286.

國家的辦法，所嚴格限制了。所以如果美國商人大體對於協約國沒有惡感，這並不是因為協約國特別關心他們的經濟利益的緣故。

自從魯西坦尼亞沉沒起，至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無限制潛水艇政策之宣佈止，其間發生了許多海上的事變，遂使美國中立成爲不可能。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的霍司議定書證明如果德國真不允接受合理的和平條件，美國官場便擬加入大戰。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威爾遜的和平通牒大概使他腦筋清楚了，並且有了決心。如今他能夠感覺到，他已經爲和平盡了力，協約國已經向他明白陳述他們戰爭的目的，而同盟國沒有；他最後已對雙方表示公正，他如今便能向前援助他一向認爲正當的方面。

威爾遜很怕他自己的中正不偏的態度，因與別人接觸，而受影響。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魯西坦尼亞沉沒之後，他謹慎地把自己隱藏起來，不僅避開他的內閣，並且避開公衆。他那著名的「不屑戰」的演說，便是同年五月十日發表的。國務部也是嚴格守中立的。住在倫敦的著名美國藝術家沙琴(Sargent)想把他的德國獎章退回德皇，請其大使托國務部轉辦此事。一九一五

年六月二十二日貝其拍發一個海底電報到華盛頓。國務卿藍辛答覆道：

非本部及其駐外官吏有關之事。

沙琴應償使館來電及這個回電大洋五元。(註一)

因為英美間溝通意志的正常機關不完全滿意，所以兩國的關係更加困難。駐倫敦的貝其大使對於英國的同情是非常熱烈的，公開的，以致國務部對於他的報告不能不打折扣。「一俟我們和英國的交涉稍為鬆懈，」霍司寫信給威爾遜說，「我想最好要貝其回國來住上三四十天。戰事已盤據他的神經，他全沒想到本國人民對於戰爭的感情如何。」(註二)

在交通線的華盛頓的一端，情形有時候也不好。西雪爾斯普林·來司是一個深造的外交家，一個高尚的紳士，一個真愛國者，一個學者式的詩人。他把華盛頓使館看做他的大工作；他高尚地為國服務，他為他的職務犧牲了他的生命。有時候，他的病體使他幾乎不耐工作；並且有一次他似

(註一) Hendrick, op. cit.

(註二)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I, 62. 日期爲一九一五年八月四日。

乎完全失了自制。霍司和斯普林·來司約在一位第三者的家中秘密會面。斯普林·來司出言衝犯美國。他竟然用過那可怕的『戰爭』一字，認爲英美間有這個可能。他說：『不管我們的處境怎樣惡劣，若要我們照貴政府解釋的那種封鎖原則而行，我們寧可作戰。』霍司湊巧向他提起伯恩斯托夫。

這話一提觸怒了他，他說：『我歡喜你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伯恩斯托夫；我不願對任何纔從他或德人那裏談話而來的人講話。這個時候我不知道我有多少在英格蘭的親戚被昨夜德國的飛艇的襲擊殺死了呢。』在這時候（霍司大佐繼稱）我發脾氣了，我告訴他這種話我認爲是一種侮辱，我不准他再這樣說。我否認他代表他的長官或政府，並且聲明他的見解不是他們的見解，並且我不知道那裏會有服務國家像他這般壞的官吏。他回答，假如我感覺如此，他不如辭職返國。我忠告他對於這點可以自己斟酌，至於我，我不想再和他有什麼討論。

在這次不很雅觀的事情之後，英大使知道他言詞的可笑和嚴重，請求霍司大佐饒恕他。他以

私心有所憂戚爲釋辭。嚴正的霍司答道：『他應該把公私事情分辨得清楚。』斯普林·來司要求霍司把他當做一個朋友，分別後他又逕赴國務部請一位高級官吏到霍司那裏去疏通這場事情。這位高級官吏去了。霍司慷慨地說：『此事發生，他很惋惜，而且已經忘記了。』可是，在上牀前他還記得把牠記在日記裏面。（註一）

溝通的機關除了兩國大使以外，另有格萊和霍司間的往來。他們在一九一五年六月六日約定了一種密碼，並且用密碼直接互相通信。霍司是惟一的非英國人，接到一種英國外交部的密碼文字的。（註二）

英國對於海上貿易的限制，在美國也引起了極度的惱怒。『假使我們要有戰爭，無論如何讓我們與德國戰，』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霍司大佐在他的日記裏寫道：可是他又加添說：『我承認協約國的激怒，幾乎要忍耐不住了。』（註三）事實上，德國政府在不久以前通知了美國一種意

（註一）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I, 75-8

（註二） Ibid., II, 54, 128.

（註三） Ibid., II, 327.

向，這種意向勢必引起美國的參戰。一九一六年十月十八日伯恩斯托夫伯爵曾秘密把德國政府一個覺書送了給霍司看。內稱如果威爾遜總統沒有爲交戰國出力謀和的積極意思，德政府或許要恢復在五月四日通牒中所保留的自由行動。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德國政府將要恢復不給警告擊沉商船的自由。『所以，』霍司大佐文件的編輯者批評道：『在協約國……似乎正把美國推回的到一種孤立政策的時候，德國卻以恢復無限制潛水艇戰事，來威嚇我們取積極行動。』（註一）這個覺書是在威爾遜被選爲第二任總統不久以前發出的。

實際上引起斷絕外交關係的行動，乃是一月三十一日通知的在英倫三島以及法、意和東地中海的或種地帶的無限制潛水艇戰事。引起這場重大事件的經過事實，從戰後德國憲法會議成立的審問委員會的調查中纔得知：（註二）事實如下：

（註一） *Ibid.*, II, 336.

（註二） 報告印行名爲 *Official German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World War*, 由美國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譯出, (1923).

一九一七年一月三日，駐華盛頓大使伯恩斯托夫拍電至德外交部，謂霍司大佐代表威爾遜總統問起關於和平條件的確實消息。外交部長齊麥爾門遲遲作覆。直到一月七日，他纔答覆，叫伯恩斯托夫「用一種延宕的樣子，去傳達我們的和平條件的問題。」（註一）他須去說明德政府自信牠能作戰勝利。

齊麥爾門發電後的一天，德軍事領袖與興登堡聚會，「一致議決無條件實行無限制的U船戰爭」（一月八日）。（註二）九日，在普列斯（Pless），正式作最後決議，於二月一日開始無限制的U船戰爭。如果首相不合作，「便改換首相。」貝斯門賀爾維違背他的較好的判斷，又屈服於軍人派之下，像他在一九一四年關於侵入比利時事件一樣。參加普列斯決議的人都「看得清楚這個決斷的結果，必發生對美的戰爭。」

「這一定如此。我們正計算對美作戰的可能性，並且一切都準備好了，」是興登堡的話。

（註一） Official German Documents, I, 137.

（註二） Ibid., I, 138.

他又說：『我們預備了對付一切的非常事變』……首相對於通過的決議案不提出反對（註一）

既已決定一種在他們自己也認爲免不了對美作戰的政策，德國政府然後纔送給威爾遜那件他已要求了幾個月的東西，即德國可與協約國講和的條件。威爾遜接到這個文件的時，他還不知道無限制的U船戰爭已經決定，他的本國就要捲入漩渦了。但是德國條件傳達之後，他對於德國的精神，諒必絕望。因爲他們與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致威爾遜的協約國之通牒和巴爾富那封信所舉的條件，全不接近。德國政府謂如果接受她（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和平提議，她願與協約國在互相回復戰利品的基礎上進行談判，可是關於比利時以及俄屬波蘭的邊疆，應給德國特別的安全保障。（註二）霍司大佐對於這個文件的按語是：『若稱此信爲答覆我們的和平條件的問題，那是笑話。』在這個文件交給威爾遜兩天後，伯恩斯托夫伯爵便宣佈了無限制戰爭行將開始。德國政府爲良心所驅使，不得不出此，『以爲更高一義的爲人類福利服務並且不致

（註一） Ibid., I, 138.

（註二） Official German Documents, II, 1049.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I, 474.

貽誤她自己的人民。』（註一）

國務卿對此，容易作覆（二月三日）他請德國注意到美政府於一九一六年四月十八日蘇塞克斯（Sussex）船沉沒後致德政府的通牒，內中美國已經聲明過：

除非帝國政府如今立即聲明並實行放棄牠攻擊載客運貨船隻的潛水艇戰爭的方法，美國政府除與德意志帝國全然斷絕外交關係外，更無旁擇。

藍辛隨即指出德政府當經同意，不再無警告擊沉船隻。但德國如今通知了所有船隻遇於某地帶內將被擊沉。『鑒於這個宣言，』藍辛續稱，更無其他『可以保全美國尊嚴和榮譽』的辦法，只有照說要做的做去，即斷絕外交關係。『故大總統吩咐我通知閣下謂美國與德意志帝國間一切的外交關係是斷絕了。』

伯恩斯托夫伯爵的護照也交給他去了。他把華盛頓的德國事務交給瑞士使館代辦。在向

（註一）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德大使致國務卿載於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1914-17 p. 299. 係 I. B. Scott 所編輯。

協約國政府取得通行證及護照所必需的耽擱後，（註一）他於二月十五日自紐約啓行了。他遣下了一個哲學家 and 一個俠義者的聲名。他用高興和忍耐爲本國奮鬥。霍司大佐在前些時寫過：

伯恩斯托夫是各交戰國中惟一有分寸的大使。任何事情發生，他對於美國政府從未稍加批評。他對橫逆之來很達觀，並且設法留一個好印象。其他諸人有時似乎隨便說話惱人。

（註二）

德美間有兩個月沒有外交關係，可是也沒有交戰。所以德人得以從容佈置。美國之所以不立即宣戰，乃是因爲威爾遜不肯採取這個步驟；要直等到德國不僅是威脅稱不發警告擊沉美船，而且將此威脅付諸實施以後。遲至一九一七年一月四日他還向霍司大佐說道：『不會有戰爭……我們是當今白種民族裏惟一未捲入戰渦的。若是我們加入，那是一種反叛文明的罪惡。』（註三）

（註一） Bernstorff, My Three Years in America p. 335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I, 446.

（註二）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I, 396 (Dec. 4, 1916).

（註三） Ibid., II, 412.

『我不相信』他在二月三日向國會說道：『德國當局存心要實際上行使他們所警告我們說是他們覺得可以自由行動的。』他向霍司大佐說，德國像『一個應加以約束的瘋人。』霍司問他單請協約國去擔任約束的工作而我們不去分勞，是否公允。他顯然爲之不安，但依舊堅持他不牽入旋渦的決心，如果人力上可能的話。（註一）

威爾遜用不着久等。在他向國會演說的同一日（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日）美輪霍沙湯尼克（Housatonic）被一隻潛水艇擊沉了。美國的輿論自然激昂起來了。

自從保非略迪亞茲總統（President Porfirio Diaz）在一九一〇年下台後，那個貝其大使稱爲『大印地安共和國』“The Great Indian Republic”的墨西哥，一向情形極爲紛亂，對於美國人民以及其他各國人士，犯了許多過失。一九一六年三月墨西哥革命黨人維那（Villa）劫略了新墨西哥的哥倫布斯（Columbus）。美國政府爲對付此事起見，獲得了墨西哥喀朗閣（Carranza）總統的政府的同意，派了潘興將軍（General Pershing）率一支征伐軍越過墨西哥

（註一） Ibid., II, 440.

邊境。征伐軍沒有尋到維那，卻和喀朗開的一部分軍隊衝突了。可是，與墨西哥的戰爭是避免了，美國軍隊也在一次無甚效果的冒險前進之後於一九一六年六月撤了回來。（註一）

在大戰初起時，英國政府曾得到德國一種密碼，是德國政府與駐華盛頓使館間，以及華盛頓使館與墨西哥使館間用作通訊的密碼。伯恩斯托夫發給墨西哥城克哈特（Beckhardt）公使的通訊，只要能被英國人取得，就能譯出；此事時常發生。其中有一特別重要的通訊，是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六日德國外交部長齊麥爾門叫伯恩斯托夫轉達給克哈脫的也得到了。內稱：

我們擬於二月一日開始無限制的潛水艇戰爭。可是我們仍須努力使美國保守中立。假使此事不能成功，我們以下列的爲根據，向墨西哥提議締結同盟：一起作戰，一起議和，慷慨的財政援助，及我方諒解由墨西哥去收服塔克薩斯（Texas）新墨西哥（New Mexico）和阿利重那（Arizona）的失地。詳細的辦法委之於你。等到對美戰爭一定要爆發時，你即將以上意旨極祕密地通知總統（喀朗開），並且附帶建議謂他應該自動請日本立即加入，同時爲

（註一）見 Rippy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1926), pp. 340-1.

日本與我們之間調解。

英國偵察機關的方法是完備的。牠並不只靠這一份齊麥爾門電報；牠從四個方法得到了抄本。一個方法是在墨西哥購買賣主的姓名自然從未洩漏過。另一抄本，則由英國工人，從美國長島無線電台德人所發的通訊而得。第三本是搜集斯托克霍姆拍往布恩諾斯愛里斯，再由該處的瑞典使館轉達於華盛頓的伯恩斯托夫的海底電信殘稿而得。第四本是從柏林的美大使館不知不覺地爲德國政府轉達而經過英格蘭的一份海底電信（自然用電碼的）而得。齊麥爾門是否還用了別的途徑，來送達他的珍貴的電報，是不可知了。他所用的以上四種，似乎已竭盡能事了。可是這四份抄本，在英國政府也足夠了。他們譯出來之後由貝其大使傳達給美政府。

遲至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無人知道威爾遜總統打的什麼主意，雖然霍司在前一天寫信給貝其說，『至於我們，現在已經在戰爭中了，雖然正式的宣戰也許要在四月二日國會聚集以後。』（註一）威氏顯然直到三月二十七日纔下最後的決心。因爲那天他問了霍司大佐『他還是

（註一）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I, 462.

應該請求國會宣戰呢，還是他應該說一種戰爭狀態已經存在而請他們通過必需的經費以從事進行呢。』（註一）霍司勸採取第二途，但威氏採取了第一途。

美國就這樣走上前來了，並不是一個同盟國，而是一個參戰國（An Associated Power）。『這天是到了，』美總統總括說：『這天美國是特許爲了產生她的，並且給她快樂的，以及她所寶藏的和平的那些原則，而流血，而盡力。』

這是歷史上的奇事之一，即德國於一九一四年春拒絕了簽訂『白賴安條約』（Bryan Treaty）。假使她那時接受了這個公斷條約（像英國就接受了），美國非等這爭端發生一年以後，不得開始戰爭。當一九一四年五月霍司大佐在樸資丹（Potsdam）問德國何以不簽這條約時，德皇答道：『德國永不簽這樣的條約。我們的力量在於一秒鐘功夫內就可準備作戰。我們一定不肯犧牲這種便利，而給我們的敵人以準備的時間。』（註二）

（註一） Ibid., II, 484.

（註二） Ibid., I, 256 附註

第十一章 困苦中的奧國

德國向被認為同盟國中的主力。可是外交家像軍官們一樣，不能輕視奧地利。在戰爭的早期，一九一五年的九月，駐華盛頓的奧國大使杜姆巴博士因參與破壞軍械廠的陰謀，被美國政府遣送回國了。新的奧國大使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纔到任，那時因奧國沒有明白表示與德國的潛艇政策斷絕關係，威爾遜總統不讓他呈遞國書。（註一）可是美國直到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七日纔對奧宣戰。

然而奧皇和克實林伯爵深信奧國必須在一九一七年內議和。奧國以皇帝和外交部長都決心議和，而不能做到，真是外交史上一件最可注意的事實。

卻爾斯大公爵（Archduke Charles）於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繼法朗西斯約瑟夫

（註一） The Intimate Papers Colonel House II, 450.

爲皇帝。他是一個盡責的好人，自覺材不勝任而難過。法朗西斯約瑟夫的一個侍從武官記述卻爾斯尚係大公爵時，在戰期內，從大本營到熊勃魯（Schönbrunn）察訪中，常拿司令部的悲觀主義開玩笑。

「你離前方愈遠，信心愈減。你一定要到前方去纔能知道我們是必定勝利的！」
大公爵似乎舉目四顧以求贊許。沒有。這時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終。淒然失望了，他走到門首，轉着把手說道：

「缺少的是勇氣！」

當他去後，波爾弗刺斯男爵（Baron von Bolfras）搖頭說道：

「講話是太容易了！勇氣有的是，但我們更需要一樣東西，這便是運氣。這問題是：他會帶牠來麼？」（註一）

可憐的卻爾斯皇帝沒有運氣。自登皇位的時候起，他開始爲和平努力，並且在他的第一道上

（註一） Marguthi, The Emperor Francis Joseph and his Times（英譯本），p. 340.

論裏面便這樣說明了。(註一)他最初做的一件事情，便是罷免般林委克實林伯爵爲外交部長。這時候德政府正在決意採取無限制的潛水艇戰爭。

奧政府得悉這個計劃後，表示反對，但是仍不能不同意。『這也是一個例子，足以證明一強國和一弱國共同作戰，弱者不能阻擋，除非它全然倒戈對牠的舊盟國作戰。』(註二)

奧國帝制正在崩潰之中，但時機似乎尙有利於和平的前途。俄羅斯在上年十月暗示了和議的意思。(註三)又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由一中立國，隱隱的重新提出了她的意思。但在此事再進一步之前，俄國的革命發作了，俄皇也退位了。(註四)四月，克實林上了一個備忘錄給奧皇，內稱：

(註一) 時爲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文載 *Mantenever Austria's Peace Offer (1921)*, p. 33.

(註二) *Czernin, op. cit.*, p. 125.

(註三) 見本書第九章。

(註四) *Czernin, op. cit.*, pp. 141-2.

很顯然，我們的軍力快不能支持了。……陛下已屢次拒絕敵方擬令我們脫離我同盟諸國的圖謀，這個步驟我負其責，蓋以陛下不能做任何不名譽之舉也。但同時陛下曾要我通知德帝國政治家謂我力已竭，今夏過去之後，德意志再不必把我們算數矣。（註一）

可是奧國雖決心在一九一七年内議和，而實際上一直作戰到一九一八年秋革命發生與最後失敗的時候。德聯邦議會確曾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七日，以二一四票對一一六票，通過了一個決議，主張『一種諒解的和平，』而無『強迫的割地。』這樣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一則協約國不會同意；再則不管聯邦議會怎樣，德政府也不會同意。魯頓多夫的見解是『假使德國沒有得到利益，議和，德國便是戰敗了。』（註二）於一九一七年七月繼貝斯門賀爾維爲首相的米查立斯（Herr Michaelis）是一位強韌，飽經世變的官僚，也抱了同樣的見解。他也認爲，德國不能放棄阿爾薩斯

（註一） Zernin, op. cit., pp. 146-50. 比較其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演說載于 Ottokar Zernin über die Politik während des Weltkrieges, p. 10; Prince L. Windischgrätz, My Memoirs, 1921, p. 143.

（註二） Zernin, op. cit., p. 247.

羅倫，並且德國在比利時，可蘭，里梭恩尼亞，及波蘭，須有些軍事的和經濟的權力，即使沒有政治的權力；至於在法國的朗維白里埃（Longwy-Briey）流域，還須有經濟的勢力。（註一）

這時候卻爾斯皇帝正在追求他的和平的目標，甚至於不與德國相謀。困難的地方便是與協商國政府沒法接觸，因為戰事已打斷了一切來往，公共的以及私人的。可是卻爾斯的妻，那位濟大皇后（*Empress Zita*）有兩個兄弟正在比軍中作戰；他們以為可用一個做對協商國議和的中間人。

濟大皇后的這兩個兄弟是包本帕馬（*Bourbon-Parma*）的薛克士特親王（*Prince Sixte*）及柴維爾親王（*Prince Xavier*）。這包本皇室的幼支，自從十八世紀中葉起，便統治意大利的帕馬公爵領地，迄至一八五九年革命時被驅去位。此後，這一家多住在奧國。薛克士特親王是帕馬公爵的一個兄弟，在大戰爆發時，他是二十八歲。他多年前已入了法國籍——他認為一個包本族人必須做法國人纔對——住在巴黎也有十年了。他在巴黎大學讀書，得了法學博士學位。一九一一

（註一）致 *Czerinin* 的信，載於 *Michaels, Für Staat und Volk* (1922), pp. 332-5.

年，他的妹妹嫁了後來做奧國皇帝的卻爾斯大公爵。

薛克士特親王是一個冒險的旅行者。當大戰爆發時，他正在他的奧國的家鄉希伐坐（Schwarzau）地方，預備到高加索去。他的弟弟柴維爾和他在一起；薛克士特和柴維爾是分不開的。他們立刻決定回法，但不是他們的姊夫卻爾斯大公爵的幹旋（那時剛繼立為奧國皇儲），他們還不能離奧。他們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到巴黎，在法國查勒魯（Charleroi）一役戰敗之後。自從那時候起，薛克士特親王似乎認為法蘭西所受敵人的壓迫，可由對奧單獨言和而解除，大戰也可由此而縮短。『但是只要法朗西斯約瑟夫活着一天，此事一天不可能，』他說。

這兩位親王要求參加法國軍隊（由於反對皇族的法律）被拒絕，試投英國軍部又被拒絕，他們乃往投比利時軍隊，起初被准為擡牀兵，但稍後即受委任為砲軍的尉官。比軍前線的生活卻不曾阻止薛克士特盤算他的拆開奧地利的計劃；到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朗西斯約瑟夫皇帝死的時候，相當的根據是預備好了。

在那年的五月，法國總統頒了給他們十字（Croix de Guerre）的獎章，故薛克士特和柴維

爾親王間接與法總統有了接觸。十月，他們請假往巴黎，與一位閣員叫做弗來辛列（M. de Freycinet）的談話，薛克士特親王便發表了他的見解。他以為同盟各國完全靠德意志：『要緊的是對一個主腦攻擊。』所以把奧地利拆開是一件要事：如果奧地利退出聯盟，土耳其和保加利亞也將離開德意志了。這樣協商國便能集中力量於戰敗德國，和摘去賀亨索倫皇室的帝冕；協商國的目的，是在打破普魯士的霸權，而不在於哈勃斯堡帝制（Habsburg Monarchy）的覆滅。所以薛克士特親王有雙重目的：（一）使協商國對德意志以促其速敗；（二）保存那不能持久戰的奧地利帝國。

那年輕的奧皇於登祚後，立即發了一詔，諭稱：『朕願於最短期內掃除戰爭的恐怖與犧牲。』數日後，薛克士特親王的（也就是奧國皇后的）母親帕馬公爵夫人寫信（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給親王急要見他。薛克士特和柴維爾親王把該信給比王看過之後，請了假，並且詳細知照了法國外交部，便於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來到紐歇特爾（Neuchâtel），約會的地方。他們在那裏遇見了公爵夫人（在潘美爾路（Rue Pommier）一七號），她告訴他們說卻爾斯皇帝

希望言和，並且盼望兩位親王親自到維也納去見他。諸事俱已安排就緒，並且保守絕對秘密。如果親王們（須記得他們是比軍中請假出來的交戰官吏）認前往維也納爲不可能，那麼卻爾斯皇帝可以派一親信來瑞士與他們見面。

親王們回到巴黎去和那裏的當局商量，當局慫恿他們繼續談判。回到紐歇特爾（二月十二日），他們遇到奧皇派來的親信（二月十三日）。這是愛爾杜地（Count Erdödy）伯爵。薛克士特親王雖年僅三十，卻自始至終表現着成熟的智慧和謹慎，勸奧皇用公諭宣布他願在某種條件下共同議和。這樣一來德意志就要碰着一件已成的事實（fait accompli）了。如果奧皇自己覺得力量不足以爲此，他還可以繼續秘密談判，向協商國說明他所擬具的條件，以備議和。

二月二十一日薛克士特親王再和愛爾杜地伯爵在紐歇特爾晤面。愛爾杜地帶來了親王的母親，克實林伯爵，及卻爾斯皇帝各人的信，都要他到維也納去；說是和奧帝半小時的直接談話，勝於兩小時的間接談話。

迨至此時，這談判在奧方，只有皇帝，克實林伯爵和帕馬公爵夫人知道；在法方只有普恩加齊

(M. Poincaré) (總統) 糾爾肯邦 (M. Jules Cambon) (外交部祕書長) 和文書長威廉馬丁 (William Martin) 普恩加資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五日和薛克士特親王會面時，說他現在必須將此事告訴他自己的內閣總理白理安 (Brenan) 及俄、英、意各國政府的元首。『路易喬治』法總統說道，『是一個謹慎的人。』關於意大利或許有些困難。至於俄羅斯，那須通知俄皇。此時僅須以不確定的口氣，通告法國的盟國，說是已經接到一個和平的提議。

薛克士特親王與普恩加資再作一次晤面，後他便能把協商國要求於卻爾斯皇帝的最低條件記下來了。帶了這個文書和比軍的續假許可，薛克士特和柴維爾再向瑞士出發，於三月十五日到了日內瓦。愛爾杜地伯爵正在守候他們，於是詳細討論卻爾斯皇帝的和平提議。但是愛爾杜地的使命不止於討論而已：『這次』他說道，『你絕對要到維也納去。』這時有一種真正的危險，即在瑞士的來往，以及紐歇特爾和日內瓦的會晤，會引起德國的注意，使整個談判歸於破壞。因此兩位親王便決心到敵國首都去。卻爾斯皇帝出言保證，他們這次進出奧國決無留難。

三月二十日兩親王告訴愛爾杜地，他們准赴維也納。他們當夜就動了身。自然保守最大的祕

密；邊界上的警察長直接得到皇帝的命令，不用盤問，讓愛爾杜地伯爵及其同伴們經過。半搭火車，半搭汽車，親王們在三月二十二日行抵維也納。他們住在愛爾杜地伯爵家裏。當晚，愛爾杜地出發往在維也納數里外的並且爲歷代奧皇所寵幸的拉森堡（Laxenburg）宮，將薛克士特親王預備好的信（其中略述協商國條件）交給奧皇。

翌日，三月二十三日，這一個重要的會晤便舉行了。兩親王整天都留在愛爾杜地伯爵家裏。晚間，他們搭了一輛遮蔽着的汽車，出發往拉森堡。四圍暗黑，白雪滿地。『汽車停在外廷，一個皇帝絕對信任的年老的衛軍長領他們穿過花園，到皇宮的前殿。』他們由一扇小門進去踏上帝后私室的扶梯。

薛克士特親王和奧帝有一長時間的談話。卻爾斯關於比利時，阿爾薩斯羅倫和塞爾維亞的見解，實際上全和協約國一致。對於意大利也許有一種困難；奧國輿論不容有大塊的土地割讓。至於德意志，奧地利必須先行勸她接受那擬議的和平：『我意在正直到底。』卻爾斯說道，『有如我今後在和你們（協商國）一塊也永遠如此。』

奧皇的外交部長克實林伯爵稍後也引進來了；高大，瘦削，冷冷的，穿着披風。克實林也準備議和，但他不願確定條件。可是奧皇允許薛克士特親王翌日可有確定的和平建議。

翌日，三月二十四日，兩親王再赴拉森堡訪奧皇，收到了繕就的提議書。此事是要守最絕對的祕密的；稍有漏洩，勢將強迫奧帝，爲取信德人起見，不得不派遣奧軍到法國前線去；這樣將使全個談判發生阻礙。會晤既終，兩親王當夜便帶着奧皇的珍貴的信，在大雪下，由愛爾杜地伯爵伴着離開敵都而入瑞士。他們於三月三十日行抵巴黎。

薛克士特親王帶來的信，對於英法總督算是公正的和平建議。卻爾斯皇帝寫道：

『法蘭西已表現抵抗的力量和高尙的勇敢。我們全都讚嘆，沒有保留，她的軍隊的可欽的傳統的勇敢，以及法國人民全體的犧牲精神。』

這位皇帝接着說：

『我以一切的方法，並所有我與我同盟國的個人勢力，贊助法國關於阿爾薩斯羅倫的正當要求。』

比利時應完全恢復，主權無缺；她的損失應有賠償。塞爾維亞也須光復，並且保證有『一個公平和天然的到亞得利亞海的出路。』

關於君士坦丁的將來，協約國已經許給了俄國。奧皇因為該國在兩星期前發生了革命，保留他的提議。關於意大利，他甚麼都沒寫。他曾向薛克士特親王解釋，謂托倫地洛可以割讓，但他不願更進至於貢獻托里斯提。奧皇的信是鉛筆寫的，用的是法文。

這就是薛克士特親王如今能置於法國政府前的提案，並且似乎有被英法接受的好機會。很不幸，正當此時（實際是三月十九日）那個熟悉普恩加賽在那裏談判的法國總理白理安下了台，由那個老練的議會政治家李波特（Ribot）繼了任。

三月三十一日薛克士特親王在愛立西（Ellysée）向普恩加賽奉上奧帝的信和他在拉森堡談話的結果。李波特總理沒來與會，但外交部祕書長肯邦在座。普恩加賽和肯邦認為倘對意大利能有滿意的辦法，奧帝的提議，可作為對奧單獨預備和約的基礎。四月十一日李波特在福克斯東（Folkestone）與英國內閣總理路易喬治相會，並把卻爾斯皇帝的信讀給他聽了。路易喬治允許

對於此事保守秘密。後來保羅肯邦曾向薛克士特親王說，路易喬治不是『被立憲主義所蠱惑得的』，他甚至於願把奧帝的信對他自己的內閣也保守秘密。如今唯一尚待努力的事情便是去解決意大利問題。商量好了不把卻爾斯皇帝個人干涉的事告訴意大利（藉以保守奧帝的信用），而只對宋理諾男爵說已經有一個單獨和議的提出；大家都知道奧國老外交家孟斯多夫在瑞士，這便足以掩飾這裏所提的單獨和議。

這時恰好已定下於四月十九日在麻倫恩 (St. Jean de Maurienne) 舉行一個集會。李波特，路易喬治，及宋理諾行將聚會討論軍事形勢。四月十八日，路易喬治到了巴黎，薛克士特親王與他在克利龍旅館 (Crillon Hotel) 有一個談話。他們對於奧國提議的意見似乎全然相同。薛克士特親王知道奧帝因個人參預所冒的危險——甚至於被暗殺——所以力主有保守此事秘密的必要。『路易喬治正倚爐壁而立，走到親王前鄭重說道，我允許，便伸出他的手來握手。』他沒有失信。麻倫恩的集會舉行了；路易喬治會議回來，途經巴黎，又與薛克士特親王談了話。他敘述和宋理諾聚會的結果：意大利外交部長絕對拒絕與奧國單獨言和，除非意大利的戰爭目的能夠完全

如願以償。但是路易喬治以爲這裏有談判的餘地，並且極盼薛克士特親王繼續和奧國接洽。可是李波特卻認爲不要再進行。在他看起來，此事已告結束，並於四月二十二日經糾爾肯邦之手，用法政府名義，致書於薛克士特親王聲明拒絕奧帝的建議。很希奇的，從這『薛克士特』事件的開始，迄至四月二十二日的拒絕，李波特自己從沒允許接見這親王一次過。

雖然普恩加寶總統仍希望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奧國的和平建議有所結果，那位李波特總理已立意認爲無謂。卻爾斯皇帝對於意大利的未有具體建議，和宋理諾的除承認意大利全盤要求外拒絕作任何考慮，在李波特眼中看來，同是奧國計劃的致命傷。這種見解或許是正確的，但李波特實在不該懷疑奧帝的信用，像他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議會中所說的。卻爾斯的意思是完全懇切的，並且措置此事始終像一個有信譽的君子。路易喬治抱了此種見解，故雖法國有四月二十二日的拒絕之後，他仍鼓勵薛克士特親王勿中止談判。法國外交部亦然，由糾爾肯邦鼓勵親王繼續進行，並予以種種便利。

薛克士特親王因此又寫了一封信給卻爾斯皇帝，說明因奧方建議對意大利有所欠缺，故已

失敗。四月二十五日他與愛爾杜地會於楚（Zug），向他說明了情形，並且把信交付了他。五月四日愛爾杜地回到瑞士，這次在紐歇特爾會晤薛克士特親王。他自卻爾斯皇帝處帶來一封相當滿意的覆信。卻爾斯肯定地說他願單獨言和，不管德意志願意與否。至於意大利方面，他預備讓步，但不如所索之多。

於是親王決再赴維也納。他立刻與愛爾杜地（五月五日）離開紐歇特爾，六日過瑞士邊界，七日抵維也納。八日他在拉森堡見奧皇。

薛克士特親王與奧帝討論意大利的問題。奧國可以割讓托倫地洛，但須有賠償。曾經提到過舊屬奧國的普屬賽內西亞（Prussian Slesia），但卻爾斯稱不願取償於他的盟國。又提到過一個意屬的殖民地如厄利斯利亞（Erythraea）——一塊於意國無大價值的領土。薛克士特親王去過，所以知道；他好像什麼地方都去過。

薛克士特親王這番二度赴維也納的結果，便是從卻爾斯皇帝處帶了一封親自署名的信出來（第二封），內述割讓托倫地洛的可能性；還有一封密札，是克實林伯爵的，內容關於賠償，未稱與

國準備單獨議和（一九一七年五月九日）。奧帝請外交家們於六月中赴瑞士正式擔任解決和平的預備條件。凡此俱係薛克士特親王能在五月的下半月帶回給法政府的消息。

五月二十日薛克士特親王與普恩加賽在愛立西宮有一次會晤。這次李波特也在座，『年老，疲乏，帶一付常常取下戴上的黃色眼鏡——』看出一切的困難，並且只看見困難。可是總統依然贊成繼續談判，雖則他以為很難勸意人讓出一塊殖民地與托倫地交換。

與普恩加賽會晤終了時，薛克士特親王說他盼能在相當時間內接到對於奧帝的信的答覆。他還想往謁路易喬治，目的在向英國取一答覆。

五月二十二日薛克士特親王抵倫敦。在那時，人人都很忙碌，凡事都得趕快做。二十三日早晨的十一點四十五分鐘，親王接到法使館通訊，叫他十一點五十分到那裏。在接受保羅肯邦一些消息，並整理了一下文件之後，薛克士特親王即逕赴唐林街十號門牌。『三百年來英政府給牠的首相住的那所房屋，很小，』親王在他的報告中寫道。首相的祕書長台維斯（Devis）引他入路易喬治的書室，他在室中等候了兩分鐘。首相於是走進室內，請閱奧帝此次的來信。當他看到關於意

大力的建議時，他微微搖頭；這貢獻太不夠。至於奧帝擬遣一正規的外交家到瑞士去，以適當形式談判和平的預備條件，他未予以多少注意。『外交家只會耗費時間，』他說道；『我們遣派不能代表他們國家發言的人員，無非喪失時間而已。』他要負責的閣員自己去爲什麼他自己和李波特不能去會晤克實林了呢？薛克士特親王鑒於李波特的態度，認爲這是不可能的。

會晤結束了，親王便匆匆出去就餐。兩點三刻他回到唐林街十號，再由路易喬治自該處帶他去見英王。首相穿了披風，戴着高帽子出來。親王和首相便搭了一輛汽車出發往白金漢宮 (Buckingham Palace)。親王的經過沒有什麼報告，路易喬治自始就把奧國的談判告訴了英王。法國人對英王喬治很有信仰：『一位不凡的人，誠實而且正直』（那是保羅肯邦的話。）

路易喬治的計劃是法英的首相及意王應在法國前線相當地方會面，商好一個對奧議和的共同基礎。親王再去看首相一次，聽他的見解。同時薛克士特赴外特島 (Isle of Wight) 的來德 (Ryde) 地方休息幾天。他於五月三十日返倫敦，恰好到唐林街十號吃中餐。在座的簡直就是戰時內閣：司登福漢爵士 (Lord Stamfordham)，『小白鬍子，不大說話』，般那勞 (Bonar Law)

穿着藍衣服，『極平易可親；』厥重爵士（Lord Curzon）『十分貴族，』但『富於同情，善談話，而且喜歡追述歷史上的事情；』愛特華卡爾孫（Sir Edward Carson）『身體很大，一副有些悽傷的臉，沉思的態度；』李定爵士（Lord Reading）亦在座。中餐時的談話總是怡悅有趣：『令人覺得置身於文雅人士之中。』般那勞似乎是唯一熟悉法國諸閣員一生事業的人。吃罷，路易喬治另與薛克士特親王談了幾分鐘，並且說他是每天在盼望意王能來參加協約國的會議（宋理諾自然會和國王同來的。）他說，維克多伊曼紐王（King Victor Emmanuel）不至於難說話的。『意王與宋理諾意見不同。你看我們和意王將有所決議，』路易喬治搖手說了又說道：『宋理諾很兇，太兇了。』他請親王在倫敦再留一天，聽意大利的回音。答覆來了，自然是從宋理諾處轉來的。說來奇怪，這答覆是含糊的。路易喬治特差一急使到意大利去求一確實的答覆，同時請薛克士特親王再等幾天。但意政府不肯確定一個會期。宋理諾動也不動。路易喬治說，『那位剛執的人不願來。』『他顯然覺察些東西，』於是薛克士特親王不得不離開倫敦，如他離開巴黎一樣，沒有什麼信息可以傳給卻爾斯皇帝，以答覆他最近的那個信。但是路易喬治允許一俟英法首相和意王的

會議商妥了，就讓親王知道。可是奧國的建議沒有關門的時候，這個會議始終沒有實現；並且從沒有答覆奧皇五月九日的信。親王於一九一七年六月五日離開倫敦返比國前方，回復他在砲軍裏的服務，直到大戰終了。薛克士特親王的談判是告結束了，如今他對於此事的唯一憂慮，便是卻爾斯皇帝的信用，應該尊重。

一九一七年九月九日，李波特政府倒了，由只有兩個月壽命的班樂衛內閣 (M. Paimley) 繼任。這位新內閣總理完全不知道放在外交部那美麗沉靜的牆後的薛克士特文件。十一月十三日（一九一七年）班樂衛辭職了，著名的克里孟梭內閣 (M. Clemenceau) 開始。克里孟梭與前任內閣總理一樣，完全不知道薛克士特親王的談判。卻爾斯皇帝的信用謹慎地尊重了。

恰好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克里孟梭就職的時候，法奧間正在進行一種半官的和平談判。這與完全埋沒了的薛克士特親王的事件，截然無關。這個新談判係克實林伯爵所主動，他利用一位在野的奧國老外交家利佛特拉伯爵 (Count Revertera)。利佛特拉有位朋友在巴黎，叫做亞爾猛伯爵 (Count Armand)，在法國參謀部第二廳做事。利佛特拉和亞爾猛於八月七日會於瑞

士，再會於八月二十二日（一九一七年）。這是一種希奇的談判，由法國軍部進行，公文都是福煦（Foch）和他的軍事同僚指令所擬。英、法、意的外交部都與聞此事，雖然沒有實際參加。無論如何利佛特拉——亞爾猛事件，卒因奧政府依舊不肯無保留地割讓托里斯提，歸於泡影。可是在克里孟梭出任總理的時候，這項談判尙未十分完了；當他在十一月十六日得悉此事，他用簡明的筆法寫道：聽着，勿作聲——因為奧國提出的任何建議終值得聽的。

最後一次（並且十分無效果的）利佛特拉與亞爾猛的談話，在瑞士弗立堡（Friburg）地方舉行，時間是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不到一月後，德國的大攻擊開始了（三月二十一日）。這次軍事進攻，起初很有成績，可以用一種政治的攻擊爲助。克里孟梭現在是法國戰時政府的柱石。如果能把他推倒，法國人民也許爲之氣沮。這，無論如何是克實林伯爵的意思。他在四月二日對維也納市議員們的演詞內，稱在這次大攻擊（此時正在進行中）開始前，克里孟梭曾以法國得阿爾薩斯羅倫爲條件，詢問克實林伯爵 奧國是否願進行議和。

當克里孟梭於四月四日在法國前敵聽到這位奧國政治家的演詞，他僅用他的簡單有力的

風格，打電話回巴黎說『克實林伯爵撒了謊』。

克實林伯爵自有權用種種正常的方法來破壞他敵人的信用；但是要拿利佛特拉與亞爾猛的談判說是法國的和平建議，則既非正當，也不確實。克里孟梭他不僅是法國最堅決的主戰領袖，而且也是一個天生有些急性子的，他惱怒了。當克實林伯爵擬公開宣佈利佛特拉與亞爾猛的談判來證實他的宣言的時候，克里孟梭當然更爲憤恚。恰在此時，他從法外交部接到他們爲他準備着的薛克士特親王談判紀錄。這裏，正當克實林伯爵詆詆克里孟梭要求言和，而又以堅持取得阿爾薩斯羅倫二州，阻止進行的時候，這位法國總理手中有了卻爾斯皇帝和克實林伯爵的信件，建議在割讓阿爾薩斯羅倫於法的基礎上言和。

克里孟梭他不知道曾經答應保守秘密，本可以宣佈卻爾斯皇帝的建議來答覆。可是他沒有這樣做，但是他給了克實林伯爵一個警告，謂法政府能宣佈一種遠過於奧政府所能說的有害的秘密。克里孟梭在一個公開牒文（一九一八年四月六日）裏提醒克實林伯爵說，『在利佛特拉事件的兩個月前』就有『另一個類似的嘗試，出諸地位遠高於他自己的一個人。』這個警告應

該夠關住那不幸的奧國大臣的嘴了，即使他並不是（像他確是的）一個習於謹慎的外交家。但是他依然想把繼續作戰的罪名加諸法國。他在四月八日一封答覆克里孟梭上次牒文的公開信裏說：在利佛特拉事件前確有一次談判，但那次也是『同樣的歸於無結果——暗示也是因為法國執意要索阿爾薩斯羅倫阻止了和平。無論如何，這是克里孟梭對於克實林伯爵那個信的了解，在他絕難忍受。他於四月九日用一封公開牒文答稱：

確是卻爾斯皇帝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一封信裏，用他的親筆，表示他同意「法國對於阿爾薩斯羅倫的正當要求。」奧皇第二封信，聲稱奧皇「和他的大臣」意見一致。

這時普恩加寶總統已經告訴克里孟梭，奧皇的建議，允許了保守秘密的。但是他認為克實林伯爵的舉動使法政府不受該允許的拘束。他向兩個要求保守秘密的薛克斯特親王的朋友表示他的見解。他說：

德國人想去掉我。克實林供他們的驅使，公布這個謊。我被攻擊了。我找到一件武器；我表示我有武器。我有運用牠的權利。我給奧皇警告，如果他不叫他的大臣閉嘴，我就運用牠。

關於這整個事件，有一個可注意的事實，就是維也納政府並沒有保存奧皇的那兩個信或克實林伯爵的密札的抄本；而且，或許更可注意，卻爾斯皇帝和他的大臣已記不起他們實在寫了些什麼。所以，當克里孟梭在四月九日的牒文裏聲稱奧皇和他的大臣一致同意割讓阿爾薩斯羅倫的時候，克實林伯爵鄭重答道：『那種話的荒謬是顯然的。克里孟梭所說卻爾斯皇帝在一封信裏的建議，是從頭至尾的撒謊』（四月十一日的牒文）。這個宣言必然地使克里孟梭公佈奧皇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給薛克士特親王的信。

這封信的明白的言詞——『我願用一切方法和我個人與盟國的一切勢力來贊助法國關於阿爾薩斯羅倫的正當要求』——公佈以後，本可以結束這場爭論了。然而不，克實林伯爵不接受印行本的證據。在四月十三日，他以一種執拗到近乎愚蠢的程度答覆道：『法國內閣總理公佈皇上的那個信是假造的。』

但是卻爾斯皇帝是一個完全的君子，他不肯讓他的內弟受克實林誣指爲造僞。卻爾斯已忘掉他所寫的什麼，但他不許這一點事實克服他的公平意識：他在四月十三日命克實林伯爵公布

一個牒文聲稱：『包本薛克士特親王，其操行為皇上深悉，無假造的一切可能性。他和任何其他人物迄未被指為假造過。』同日，克賓林伯爵辭了職。（註一）

奧帝的和平努力大概從頭就註定了要失敗的。德國的軍人派不肯講和。奧國不能單獨行動。如克賓林伯爵後來所說，奧地利像一結實的石塊，橫在德意志和她的盟國土耳其與保加利亞之間；並且橫在德意志和羅馬尼亞的油與穀的供給之間。假使奧地利與協約國議了和，她勢必加入去封鎖德國。德國參謀部已預見及此，並且業已派兵隊開往波希米亞（Bohemia）及帖羅耳。預備給我們像羅馬尼亞的同一命運。（註二）奧地利不能擋德軍的蹂躪。德國挾她作惡。

（註一）Manteneyer的 *L'Offre de Paix Séparée de l'Autriche* (Paris, Plan-Nourri) 很詳細敘述了這整個事件，並有文件證明。Manteneyer 是襄助薛克士特親王談判的一個朋友。該書英文譯本名 *Austria's*

Peace Offer, 1916-17 由 Messrs. Constable & Co. 出版。該書包括有御爾斯皇帝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及五月九日的親筆信，以及克賓林伯爵五月九日的親筆信。最後那封信，克里孟梭在一九一八年四月的披露的時候，沒有提及，因為存在外交部的副本找不到。

(註二) Ottokar Czernin über die Politik während des Weltkrieges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演
說) p. 5.

第十二章 巨哥斯拉夫人

在大戰開幕時，俄羅斯是最大的斯拉夫國，塞爾維亞次之。可是有許多斯拉夫人既不屬俄，也不屬塞。這些人大都在奧國治下，在加里西亞，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克羅地亞，斯拉旺尼亞及波斯尼亞，赫爾仔哥維那。北方的一部份，波蘭人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有他們自己的民族理想和志願。南方的一部分，克羅人 (Croats)，斯洛文人 (Slovenses)，及博赫二州與大爾馬地亞 (Dalmatia) 的塞爾維亞人 (Serbs) (以及塞爾維亞的塞人) 形成一個地理的和『文化的』羣體，有的便以南斯拉夫或巨哥斯拉夫人見稱。在奧國治下的巨哥斯拉夫人起初還許滿意在一個聯邦的哈勃斯堡國家內得到統一和自治。但是大戰一天一天演進，哈勃斯堡帝國的解體似乎是巨哥斯拉夫人達到統一的唯一路徑，他們便開始向這個目標努力。奧地利須使分裂，巨哥斯拉夫人須與塞爾維亞內的同胞聯合。這個大巨哥斯拉夫國，這樣成立後，應採取聯邦的抑是單一的憲法，則未決。

定。在塞爾維亞外的巨哥斯拉夫人，大概願有一個聯邦的憲法。

塞爾維亞以外的巨哥斯拉夫人居住的地方，界限很分明：波斯尼亞、赫爾仔哥維那、克羅地亞、斯拉旺尼亞及大爾馬地亞。所有這些地方，俱受奧匈政府統治；克羅地亞和斯拉旺尼亞實際上則由馬札兒（Magyar）政府管理。主要的困難——除了戰敗奧地利的軍事問題外——有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倫敦條約（亞得利亞條約 The Adriatic Treaty）。根據這個條約，協商國允許意大利取得普蘭可角（Cape Planko）以南的大部分大爾馬地海岸及島嶼。自從這個條約被人知道以後（實際上墨跡一乾就被人知道了）（註一）巨哥斯拉夫人及他們的友人便繼續不斷的努力求其修正。

自大戰開始，奧國治下的巨哥斯拉夫人解放出來加入一個『大塞爾維亞』的希望，自然昇起來了。將近一九一四年終，一個克羅地人的委員會在羅馬成立了牠的主要份子托蘭姆比煦（Trumbitch），興可維煦（Hinkovitch）及伏金洛維煦（Vojinovitch）諸博士。那最

（註一） Steed, Through Thirty Years, II, 64-5.

重要的份子托蘭姆比煦博士是從前的斯派拉托 (Spalato) 的市長，並且是奧國議會裏代表柴刺 (Nari) 的議員，又是一九〇五年十月阜姆決議案 (Fiume Resolution) 的起草者，該決議是克羅地亞、大爾瑪地亞，及伊斯托里亞 (Istria) 的代表們要求在匈牙利政府下面聯合起來。自後托蘭姆比煦的見解已有進展，他現在正努力於聯合所有的巨哥斯拉夫人於一國的工作。在亞得利亞條約 (他不久就知道) 簽訂之後，該委員會遷至倫敦，到一九一五年五月便在該處成立所謂巨哥斯拉夫委員會，以托蘭姆比煦爲會長。該委員會宣稱『巨哥斯拉夫人民，在歷史上所謂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人，和斯洛文人，都是同一民族的份子，具有形成一個獨立國家的一切必要條件。』(註一)

除了托蘭姆比煦之外，巨哥斯拉夫委員會的靈魂是法郎洛蘇必羅 (Frano Supilo)。他是於一八七〇年在刺古沙 (Ragusa) 生的，未受過有規則的教育。他投身於當地的新聞界，出了名，在一九〇〇年於是被請至阜姆做新辦的克羅地報紙名 Novi List 的社長。他是一九〇九年協助揭破『佛里琴案』 (Friedjung Case) 的假造文件之主要人物之一。蘇必羅自然是奧政

(註一) The Southern Slav Programme (London, 1915), 巨哥斯拉夫委員會所發表的。p. 3.

府注意的一個人物。在大戰前夜，他正逢休假，在帖羅耳散步。他越過意大利邊疆去等候事變。大戰一作，他決定他自己的時機也到了。他往羅馬，再赴倫敦，巴黎，彼得堡。此後他的生活正像他熱烈讚賞的瑪志尼和意大利復興運動（Risorgimento）的人物蘇必羅是一個碩大的大爾瑪地的伐木農夫，他的外相很少表示出他裏面的火。但是他的英國朋友，如他的巨哥斯拉夫朋友一樣，都看出他是一個天才。他有一件成功的事情，便是在亞得利亞條約尚未簽訂時，便知道了牠的條款。（註一）他沒有及身看到他的希望的實現。他在一九一七年便死了。（註二）

巨哥斯拉夫運動的機關之一，自然是那個於一九一五年秋季喪失了所有的塞爾維亞土地而遷至柯夫的塞爾維亞政府。塞王彼得年紀太老，不能有任何權力。攝政王亞力山大是一個正直的人，但是塞政府的主力一種實爲任何所不能搖動的力，卻是尼可拉拍式煦（Nikola Pashitch）。這位巴爾幹政治家家中的老前輩，極其固執，帶一種有些窄狹的塞爾維亞觀念。他不相信一切聯邦

（註一） Steed, op. cit., II, 64-5.

（註二） R. W. Seton-Watson 有其生平記載見 Europe in the Making—Part (1919), p. 377.

計劃他努力的是一個單一的大塞爾維亞國。也許拍式照是對的。無論如何他打定了主意，並且抱着他的決心。新的巨哥斯拉夫王國，如果成立，應有一中央集權的政府在伯爾格納特 (Belgrade)。他並不是絕對不讓步，但是他從沒在讓步的路上多走。他盼望別人能和他走在一起；而在大體上他們是照做了。

巨哥斯拉夫委員會在英國得到最有力的幫助，雖然在法國得到的幫助，特別是佛朗克林蒲爾隆 (Franklin-Bouillon) 和他的朋友們的，不容忽略。一九一六年十月，倫敦有一部分有勢力的新聞記者和政治家們發行了一種週刊，取名新歐洲，主要的是討論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的事。稍後，十月二十四日，在大廈 (Mansion House) 舉行了一次集會，成立了英國塞爾維亞協會。(註一) 克羅麥爾爵士 (Lord Cromer) 當選為該會的主席。有些會員(會員必須為英國人)不僅是有勢力的人物而已；他們還極活動，與協商各國政府的要人有接觸，並且爲了巨哥斯拉夫事件，時常往國外奔走。

(註一) Stead, op. cit., II, 126

拍式煦的邀請巨哥斯拉夫委員會主席托蘭姆比煦赴柯夫，大半由於英國塞爾維亞會的努力。這次晤面的結果，遂有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日著名的柯夫宣言，由拍式煦與托蘭姆比煦以『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人和斯洛文人的代表』資格，承認他們的人民要組成一個獨立民族國家的願望。這個國家名為『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人和斯洛文人的王國』(The Kingdom of the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正統派(Orthodox)羅馬天主教派(Roman Catholics)及回回教派(Mussulman)都享有自由。這王國是要包括所有巨哥斯拉夫人居住的領土。(註一)

柯夫宣言是巨哥斯拉夫夫人對一九一五年四月亞得利亞條約的答覆。因為牠要滿足羅馬天主教的克羅地人的顧忌，所以保證他們信教的自由，並把他們的名字嵌入王國的名稱內。在倫敦的巨哥斯拉夫委員會其次是在柯夫宣言和亞得利亞條約中間找一個折中的辦法。當意大利首相阿蘭都(Signor Orlando)於一九一八年一月蒞倫敦時，他和托蘭姆比煦會面了一次。阿蘭都的政策究竟怎樣老不清楚，但他總是可以商量的。這次會面的結果，是托蘭姆比煦被邀赴羅馬。

(註一) Steed, op. cit., II, 166

一個意大利議會的委員會，和佛朗克林蒲爾隆的委員會，在巴黎議定召集一個哈勃斯堡統治下各種民族的公會。這公會須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初在羅馬舉行。因為參加這個會議，托蘭姆比、煦博士、纔應阿蘭都的召請，英國、塞爾維亞委員會亦有強有力的代表與會。佛朗克林蒲爾隆和朋斯（Dr. Benes）也列席。這會喚做『奧地利、匈牙利被壓迫民族會議』（The Congress of Oppressed Nationalities of Austria-Hungary）。會議在國會議事廳中舉行，自四月八日起至十日止。

這些集會不免有些風波，但他們終於同意了相當的方式，在四月十日發表名為羅馬公約（Pact of Rome）重要的句子是：

在意大利民族和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人和斯洛文人的民族，（亦稱巨哥斯拉夫民族，）彼此間的關係上，雙方代表承認巨哥斯拉夫民族的統一和獨立是意大利的重大利益，正如意大利民族統一的完成是巨哥斯拉夫民族的重大利益一樣。

出席會議的波蘭人另外發表了宣言，贊成意大利、巨哥斯拉夫的宣言。這樣得到的團結是一

樁非常的成就，而且不用說，對於動搖中的奧帝國有一種深切的影響。除了構成這會議的人有功績之外，同時還須歸功於米蘭 (Milan) 的一個主要晚報 *Corriere della Sera*；牠發表了不少鼓吹意大利巨哥斯拉夫接近的有力文章。所達到的諒解是不完全的。許多的困難必須要經過，在和會上以及和會以後，但是羅馬公約是最終得到的解決的基礎。

巨哥斯拉夫委員會不但在協商國範圍內做了重要的工作，而且在奧帝國裏面也做了重要的工作。牠能與克羅地亞的重要人物通訊（多是經過瑞士方面。）牠的努力無疑地有功於最後在一九一八年秋季臨到奧帝國的分裂。

第十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捷克斯洛伐克國的創設，確是大戰最堪告慰的結果之一。如果哈勃斯堡帝國須破裂（似乎不可避免），分得零零碎碎的危險是嚴重的。中歐洲也許會『巴爾幹化』成爲互相抵觸的原子。幸而一個大而有力的國家由捷克人（卽向屬奧地利的波希米人）、斯洛伐克人（向屬匈牙利）、和若干少數的盧森人（Ruthenians）與德人組織起來了，他們在地理上和經濟上自然包括在這個新國裏面。捷克斯洛伐克成了一個樞紐的國家，強有力到足以使自己受人重視，堅實到足以做穩定中歐的柱石，否則該方面必流動不安。同時也須歸功於匈牙利，她雖然因爲一九一九年的條約，減小了土地的面積，卻仍然是一個團結的有秩序的國家，出人意料的傾向於和平的解決。

迄一五二六年止，捷克或稱波希米民族向來是一個獨立王國，那年和當時也是獨立王國的匈牙利，一起在摩哈克斯（Mohacs）地方吃了梭立門大帝（Solymán the Magnificent）一場

大敗。從那時起波希米亞便由統治奧地利的哈勃斯堡的同一君主所統治。可是在南塞內西亞和摩拉維亞以及在波希米亞的捷克人，始終不安於奧國統治之下，而期望着民族的統一和獨立，或者至少是統一和自治。在大戰期內，他們由一種偉大的自助努力，達到了他們的目的。這種努力充分表示了智慧的力量和堅定的性格；而馬沙克博士便是其中的主腦。

馬沙克 (Thomas Garrigue Masaryk) 生於一八五〇年那個名叫何杜林 (Holonin) 的摩刺維亞城中。他的父親是一塊皇產的獸宛看管人。年輕的馬沙克在維也納一個鑰匠處做學徒，但稍後據說受了家鄉教區牧師的幫助，得進維也納和萊普齊格 (Leipzig) 諸大學。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學生，後來升為維也納的哲學講師，他第一部引人注意的出版物是『自殺為當代歐洲情形的一種病理象徵之研究』 (A Study on Suicide as a Pathological Symptom of the Condition of Contemporary Europe) 他的結論，謂原因是由於『宗教的情感之衰敗』 (註一) 自一八八二年起馬沙克在普刺圭 (Prague) 的捷克大學任哲學教授。他逐漸得到絕大的

(註一) 倫敦 Times 報有其生平介紹，見 Dec. 2, 1918.

勢力並且成爲一備全國知名的人物。他是以他的溫和的見解和明哲的秉性著稱的馬沙克沒有煽動的火把，但是他有一種堅定的信仰在上帝和凡人眼光中的民族『魂』的價值。他的慘淡經營的著作俄羅斯的靈魂出版於一九一三年，表示他對於民族性的深刻的哲學見解。在普刺圭，馬沙克的勢力不但很快地波及於捷克人，而且還及於奧國的南斯拉夫人。擁護克羅地人和塞爾維亞人的結合者，大都是馬沙克的門生，『那位身處普刺圭的寂寞的斯洛伐克人，他是托爾斯泰和魏特曼 (Whitman) 的一種混合物，有些人看他是一個邪說異端的人，有些人看他是一個高士，但一切的人們看他是一個熱心人。』(註一)

大戰一起，馬沙克知道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時機已至。他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離開普刺圭，往意大利，認定捷克民族運動與斯拉夫民族運動的利益一致，於是矢志求此政策的實現。

馬沙克自意大利至巴黎，在該處與朋斯和斯塔方尼克 (Colonel Stefanik) 一同組織捷克斯洛伐克國家議會。此後便是一番繼續不斷的努力，求協商國的承認，並幫助協商國取得勝利。

(註一) Hermann Bahr, Dalmatinische Reise (1907), p. 70, Quoted in Times, Dec. 2, 1918

於是被壓迫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竟能對外談判，並能作戰。牠不徒向協商國要求援助；牠能給與協商國實際的幫助。在奧軍中的捷克兵士投入了敵方；其餘的便在平常作戰時降爲俘虜。在一九一五年終，約有七萬五千或十萬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協約國前線內。他們投效做軍事的工作，編成民族軍團，穿上法國或意國或俄國的軍裝，置身於火線上。他們自動冒着過於通常戰爭的危險。因爲他們都是奧國臣民，被同盟國捉到，便處死刑。

在馬沙克未亡命，仍在普刺圭做大學教授的時候，他已開始進行他的計劃。這是那次打破「德意志無敵之傳說」(Legend of German Invincibility)的麥恩大戰以後的事。有一位矮矮胖胖，鬍鬚不刺的人，等候一位著名的倫敦新聞記者，請他找些方法阻止俄人開鎗射擊實際上想要投入俄方的捷克兵士。這位矮胖子叫做伏斯加(Vosca)，是美國公民，生時是一個捷克人。他從普刺圭來，正要回到美國去，帶來馬沙克的這個訊。這位新聞記者斯帝特(Steed)，竟能與馬沙克約定，要捷克兵士唱他們的國歌Hei Slovane（這在奧國治下很平常的事）並與駐倫敦的俄國大使朋根多夫約定，訓令俄國兵士把歌唱斯洛文國歌作爲一種降順的記號。大戰既終，馬

沙克致書斯帝特說到捷克的成功寫道：『這開始於一九一四年九月我差伏斯加到你那裏的時候。伏斯加是起端。』（註一）

從一九一五年初至一九一七年四月俄國革命爆發的時候，馬沙克的大本營，大都在倫敦。該處有捷克國家議會的組織，但是運動的大本營依然是在巴黎的捷克國家議會。有時候這個巴黎的大本營成了供給協商國關於奧國有用的政治和軍事情報的中心。那裏的主腦（也是後來的兩年做馬沙克左右手的人）是明斯博士，普刺圭的一位社會學講師。明斯，一位矮小，近視的年輕人，他保管着捷克的國民基金，該基金大部分是在美國的八十萬捷克人所捐助的。他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赴倫敦與馬沙克磋商時，被描寫爲『一個奧國大學的標準的年輕教授，不太說法語或英語，但德語很流利。』他成爲一個歐洲最前進的外交家或許是最能以全歐爲懷的外交家，同時他是一個國際聯盟的政治家。但在大戰中他是馬沙克的助手，專心致志於捷克民族的獨立。同時馬沙克的努力也不限於政治的和軍事的事務上：他是新歐洲週刊的主編者之一，該刊自一九一

（註一） Wickham Steed, *Thrush Thirty Years*, (1924), II, 41-5.

六年十月起出版於倫敦，對於中部歐洲和東南部歐洲的事件，大有宣揚的功績。(註一) 這個有影響的刊物到一九二〇年十月停刊了。

巴黎的捷克國家議會實在是一個臨時政府。馬沙克是牠的首領，明斯是牠的外交部長。克里孟梭政府下的外交部長畢勳 (Pichon) 曾代表法政府承認該捷克國家議會為『將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原始基礎』。明斯爵士來到倫敦與外交部長包爾福及次長西薛爾 (Robert Cecil) 見了面。他們不能像法國那樣給他的承認。他們以為承認捷克國家議會為將來政府的『原始基礎』，將剝奪捷克人民自擇政府的權利。可是這點非難，採用了『代理人』字樣以代替『原始基礎』字樣而解除了。明斯博士對於採用這魔術字眼『代理人』 (Trustees) 所得的意外結果，有些驚異，帶着這好消息趕赴巴黎去了。(註二)

馬沙克於一九一八年往紐約。他席不暇暖地奔走，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榮歸普刺圭去做

(註一) Steel, op. cit., II, 97-100, 124, 129.

(註二) Steel op. cit., II, 231-3.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開國總統。這條路在美國已爲他準備了。一九一八年二月捷克人在芝加哥舉行了一次會議，組織了一個美國波希米亞民族同盟 (Bohemian National Alliance)。這個美國的捷克斯拉夫運動的大本營設立在華盛頓。馬沙克來到後，在美國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呈了一個宣言給威爾遜 (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內述捷克人要成立捷克國的確定的宗旨。

(註一)

所以當馬沙克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到紐約的時候，那裏一切事情已由他的愛國同志佈置好了。俄國的布爾雪維克政府這時剛纔完成牠脫離協商國 (如今叫做協商與參戰各國 Allied and Associated Powers) 的行動。捷克斯洛伐克軍團 (五萬人) 因此不能再在俄國旗幟下與同盟國作戰了。可是馬沙克已經與布爾雪維克政府商妥，讓捷克軍隊取道西伯利亞赴海參崴，再從那裏用船載至法國服役。約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馬沙克以捷克斯洛伐克軍總司令的資格，自美發出一海底電訊，命令該軍留在西伯利亞，以備凡爾賽的協約國會議決定要派軍隊

(註一) Current History, Vol. XIX, p. 311.

到那裏去重新佈置『俄德陣線。』（註一）

六月中馬沙克曾與威爾遜總統晤面了一次，八月初英政府承認捷克斯洛伐克國的好消息傳來了。馬沙克立刻拍電給法國外交部長畢勳謂：『獨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國是柏林至巴格達大德意志計劃的最後阻力。』（註二）九月三日國務卿盧辛宣稱，美國承認捷克斯洛伐克爲一交戰國，並承認捷克斯洛伐克國家議會是一個『事實上的交戰國政府，具有指揮捷克斯洛伐克軍事之適當威權。』到了這時候，意大利和日本也承認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牠如今雖然沒有領土，卻是一個國家了，『與比利時和塞爾維亞政府之暫行定都在外國土地，實是同樣的情形。』（註三）

這個秋天，馬沙克在美國都消磨在宣傳的工作上，以及捷克斯洛伐克臨時政府的逐漸加多的外交工作上。該政府依然在巴黎，但牠有一個重要代表機關在華盛頓。十月十八日，臨時政府自

（註一） New York Times, July 28, 1918.

（註二） 馬沙克已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新歐洲發表遺個見解，該文題目爲“Pan Germanism and the Zone of Small Nations”

（註三） New York Times, Sept. 4, 1918.

巴黎發出了一個獨立宣言。他們否認哈勃斯堡王朝統治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一切權利，並宣告捷克斯洛伐克人爲「一自由和獨立的民族和國家。」代表各部分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代表在日內瓦，舉行了一個會議，選舉馬沙克爲該共和國的總統。十一月十二日那天（即對德停戰後一日），美國國務部轉給他一訊，通知他當選了；同訊中催促他立刻到普刺圭去。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馬沙克搭船赴歐。他先到倫敦，十一月三十日蒞臨時，官場正式招待。十二月七日他到了巴黎，十二月十七日他在北意參觀意大利軍隊，二十日他的專車開進普刺圭的「威爾遜車站。」和他一起的有伏斯加，這時在美國軍中爲隊長，代表美國政府。人民歡狂地來看他們的教授和政治家穿了灰色的寬長外套和氈帽，那舊日看慣的打扮，歸來了。他終於回到了他自己的老家。

第十四章 停戰

一九一八年初，協約及參戰各國正期待在十二個月內，使大戰得到一滿意的結束。威爾遜總統於一月八日向美國國會與全世界宣佈他的十四點，爲將來和平的根據。威爾遜在宣佈此項原則前，並未商諸協約國，因此他們也就不受他的宣言的拘束。然而協約國是準備照這些路線議和的。可是德人卻不預備接受一個要德國退出和恢復比利時，以及交還阿爾薩斯羅倫於法國的宣言，來做和平的根據。

春天，德國軍事領袖集中所有可利用的力量，來作攻破西線協約國軍隊的最後努力。這番努力殊不辱德軍偉大的軍事傳統；有幾個苦痛的星期，法人和英人似乎失利。正當軍事形勢依然暗淡可怖，在阿門（Amiens）的大戰仍在交轟的時候，普恩加齊總統，克里孟梭總理，英國戰時內閣閣員米納爾爵士（Lord Milner），貝當元帥（Marshal Pétain），海格陸軍元帥（Field-Marshal

Haig) 以及福煦(Foch), 蒲魯麥爾(Plumer) 賓格(Bryne) 及其他諸將, 在阿門北二十七英里的多倫(Doullens) 地方聚會, 時爲三月二十六日。克里孟梭早就認爲號令應該統一。他所做到的, 只是任命了一個駐在凡爾塞的最高戰事會議(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 可是該會只能討論, 而不能發號施令。

在多倫的會議上, 克里孟梭和米納爾討論過各種的建議。最後克里孟梭在桌旁坐了下來, 拿着鉛筆和紙張。他用法文且寫且說道:

福煦將軍由英法政府派令調節阿門前的英法作戰機宜。

福煦插嘴道:『最好改在西方戰線。』——『你對,』克里孟梭說着就在他的草稿上改正了。接着加上說:

對於此事, 他(福煦) 須和兩位總司令成立諒解, 請他們兩位供給他以一切必要的情報。這樣告成的制度不完全是『命令統一,』但是運用得很好。西線由於福煦的調節而得救。這調節是『商酌多於命令。從這個司令部跑到那個司令部, 忠告着, 建議着, 堅持着, 福煦逐漸地得到

了三月二十六日的危機所賦與他的理論上的威權這要感謝克里孟梭」

四月三日（阿門已經得救）福煦的權限更加擴張了：他有『西線作戰的策略的指導權。』貝當和海格兩位總司令保有在戰術上指導他們的軍隊之權，而且關於福煦的策略上的處置，他們尚有上訴於本國政府之權。（註一）這種上訴權似乎從未用過。

到六月中旬轉機到了。德國長久的努力，以堅持，衝鋒，及生命的犧牲來維持者，到如今是竭蹶了：遇到協約國後退的軍隊的不斷的拼命，和新來的美國軍隊的朝氣，德國的屠殺銷磨了自己。六月十八日福煦的反攻開始了，那是第二次的麥恩大戰。到八月間，德國的高級指揮承認他們不能獲勝了。八月十三和十四兩天在斯派（*Spa*）開了一次政治和軍事領袖的聯席會議。

參與這次重要會議的領袖，有德皇威廉二世，皇太子，首相，黑特林伯爵（*Count Hertling*）陸軍元帥興登堡，魯登多夫將軍，外交部大臣，以及較次的官吏三人。軍事領袖依舊操縱着。前外交大臣辜爾孟曾擬祛除他們的把持政策，於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勇敢地當衆宣稱「絕對的

（註一）以上關於『統一指揮』的事實和引證，取自 *Tardieu, The Truth about the Treaty, Chap. II*

結局，難希望從軍人的獨斷得到。』這實在是承認德國已經戰敗的一種慎重的說法。大本營幹部非常憤怒，牠『從不隱瞞對於外交部缺乏信任的。』（註一）宰爾孟免職了，由奧采海軍司令（Admiral von Hintze）繼任，這樣更保證了軍人派的得勢。奧采不是一個好外交家，可是不用管！——德國與文明世界大部分的外交關係，如今已用不着外交牒文而是用鎗彈保持着。（註二）

在八月十三和十四兩日的斯派會議上，軍人派依然得勢。奧登堡和魯登多夫報告軍事形勢『並不絕望』，但已『變壞』。可是仍『沒有一個人主張對敵人提議直接議和。』國內的戰線『必須使其強固，並且李煦諾斯基（Lichnowsky）必須治以漏洩他倫敦使命的祕密之罪』（註三）

（註一） Ludendorff, General Staff and its Problems II, 576.

（註二） New York Times, July 12, 1918.

（註三） 李克爾時基於一九一三年夏與格萊在倫敦磋商和平，訂有條約，但未得德皇批准，李氏於一九一八年出版

『我底倫敦使命』（Mrs London Mission）大為德軍人派所不喜。可閱 Mowat, History of Diplomacy

Diplomacy 1815-1914, 230.

德皇說道『我們必須準備乘適當的時機與敵人諒解』外交大臣奧采說這勢必對於從前的戰爭目標予以若干限制。陸軍元帥奧登堡謂，不到『西線（德國的）再度獲勝』不應去『佈置外交線。』他力辯『停留在法境上之可能，如是結果可以使敵人順從我們的意志。』奧采看出這等於要他『依據戰勝所立下的戰爭目標』來議和平。（註一）

檢閱斯派會議的議定書，可以看出兩點：一、德國當局依然拒絕考慮不能給他們大部分戰爭目標的和平條件。第二點為德國的政策仍是由大本營幹部操縱。魯登多夫自己的書也證明了軍事當局對民政當局的優勢。例如這裏是首相與奧登堡和魯登多夫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集會時談話的一部分。

首相 假使英國因畏懼完全陷於美國的優勢下面，而竟準備談判，我們聽從她麼？

軍部 自然，軍部從來沒有拒絕不如此做。

（註一）斯派會議的這段紀錄取自簽名的會議稿和奧采的備忘錄，二者俱載在 *Preliminary History of Armistice* (*Armistice Endowment*, 1924) pp. 17-21. 其他的引證採自魯登多夫 *The General Staff and its Problems II*, 585.

但是根本上就不該問軍部以這樣的一個問題。英、法、意各國政府進行談判，並沒有請求他們的參謀部的許可。

所以時機過去了。德政府不復試在協約及參戰各國所能承受的任何條件上謀和了。直到最後他們簡直得不到絲毫條件。這是聽憑軍人控制行政大吏的結果。研究外交史顯露的一樁希奇的事實，是穿軍裝的人失掉戰爭，而穿黑服的人卻獲勝仗。

奧國的卻爾斯皇帝，他的外交部長布林，及參謀部長亞爾次將軍（General Freiherr von Alz）也參加了八月十四日的斯派會議。布林曾明白警告德皇威廉，謂奧國不能作戰過冬。亞爾次將軍像平時一樣地鎮靜和易，與魯登多夫討論軍事形勢，及再行遣派奧國隊伍前往西線的方法，雖然他也說他們不能支持過這個冬天。然後，亞爾次離開了，依然不失他淡漠的空氣，欣然的形容。魯登多夫再沒有見過他，但繼續對他抱着最高的尊敬，像一個人和一個兵士。（註一）

（註一） Indenorff's Own Story, II, 386; 又參 Nowak, The Collapse of Central Europe (1924)

布林的計劃是請協約國，派遣代表在一中立國內作一祕密而不受拘束的討論。德國政府用盡方法阻止他，請泰拉特（他正逗留在維也納）贊助他們的見解，並且使亞爾次運用他與奧皇的勢力。這個奧國牒文，就擱至九月十四日纔發出，而同日德皇威廉還親自拍電，想拿奧德盟約來阻止牠。（註一）奧國的建議卻被拒絕了。

如今來到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三日間的黑暗日子，這時候德意志的命運是註定了。九月二十六日魯登多夫在軍部裏從維也納方面得悉保加利亞正要單獨媾和。派遣『最能幹的德國將軍』率同軍隊往梭非亞的命令立即發出了。駐梭非亞的帝國全權使臣，約定保加利亞的沙伏夫將軍（Gen Savoff）共同『推翻政府』。但是在他能實行這樁友誼的責任之前，保加利亞已與愛斯披來將軍（General Franchet d'Esperey）在沙朗尼加前線簽了休戰條約（九月二十九日）。

同時德國外交部已斷定和平談判必先使政府民主化着手；因為威爾遜總統——德人的主

（註一） Preliminary History of the Armistice, p. 30 （德外交部的報告）

要希望——分明不肯與現存憲法下的任何機關談判的。(註一)帝國政府已有四十七年不肯把關員負責制度賦予民選的立法院，以致毀壞了德國的政治生命，如今採用了這個制度作爲媾和的計策。

在十月一日，新政府成立之前，曾於八月十四日阻止立即議和的軍部，現在突然要求立即發出和平的建議。今日軍隊猶能固守，明日之事不能料矣。同日，另一電報稍後也從軍部裏一個外交部的代表發出，謂：『魯登多夫告訴我，說我方提議必須立即自般恩 (Berné) 發往維盛頓。軍隊不能等候四十八小時。』另一電文報告：『他說他覺得像一賭徒，隨便何時何地也許有一軍團要敗他的事。我得到的印象是，』這外交部代表繼稱，『他們在此全都失掉了神經。』(註二)

此時的魯登多夫常被指爲陷在一種恐慌之中。這點他在所著的書裏加以否認，他寫道：『我

(註一) 德外交部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預備的備忘錄 (見 Preliminary History of Armistice, p. 34.)

(註二) Lasner 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致德外交部的 (Prelim. Hist. of the Armistice, p. 40). 文旁的加註出

於原文十月六日 Von Payer 在會議上與首相談：『Ludendorff 的神經是不可靠的了。』(Ibid., p. 40)

慢慢地達到這個運命攸關的結論』（乞和）（註一）軍部的見解是，現今大戰確已失敗；所以再行繼續，只是徒然犧牲生命。（註二）魯登多夫這樣就爲自己辯白了。德人即使決心繼續作戰，也不會得到更好的休戰條件的。魯登多夫以前之反對言和，也同樣的不容輕易原諒。但是真正的罪惡不在他，而在德國的制度，讓軍部代文官來決定和戰的時間與條件。

在德國開始議會政府制度的德國新首相是巴登大公爵（Grand Duke of Baden）的兄弟。巴登本是德國各邦中最寬大自由的一邦。新首相也是主張自由主義的人。麥克司親王（Prince Max）十月一日下午抵柏林。和平通牒，本希望二日就發出。但是大公爵沒有宣佈他准許麥克司親王接受帝國首相之職。非但是大公爵的准許是必要的，而且在憲法上只有德皇纔能請他出來。要在一晚上把這一切都弄好似乎是不可能的。德皇是在一輛從斯派回到柏林的專車裏，可是電

（註一） Linderdorff's own Story, II, 376.

（註二） Statement of Major von dem Bussche to the Riksdag, Oct. 2, 1918 (Prelim. Hist. of the Armistice, p. 45)

話做了神奇的工作。德皇的火車停在可隆（Cologne）和巴登省府通訊。到當日夜半，大公爵的准許也得到了。（註一）麥克司親王對發出和平通牒略有躊躇，直到後來再聽與登堡說每天過去只使軍事形勢更見惡劣。十月三日，和平通牒由瑞士使館發往威爾遜總統。該牒文請求威爾遜總統根據「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致國會書和他後來歷次的宣言，特別是他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演說裏面所定的方針，」設法恢復和平。德政府並聲請立即締結休戰條約。奧匈也有一個同樣意義的通牒，由瑞典使館轉給了威爾遜。

如今一切全視休戰條件如何。德人希望能議妥一種休戰條約，雖然須退出比利時和法國東北部地方，但是萬一和平談判不成時還可以在法德邊界上作戰。（註二）一種降服的休戰，在軍事外交史上幾乎未之前聞，那是沒有料到的。

威爾遜總統於十月八日答覆德國通牒，謂「他覺得不能隨便向美國政府所聯合以敵同盟

（註一） Ludendorff, The General Staff and its Problems, II, 622.

（註二） Max to Ludendorff, Oct. 8, 1918, Preliminary Hist. of the Armistice P. 51)

國的各政府，提議停止戰事，當該同盟國軍隊猶盤踞於他們國土上的時候。」他還說他是「有理由問這位帝國首相是否僅僅代表一向主持大戰的帝國當局說話。」

經過多次激烈的會議，德國當局於十月十二日答覆威爾遜說，德政府有必要的民衆基礎，而且準備承受美總統關於撤兵的提議。他們提議召集一混合委員會，實行撤退的辦法。威爾遜總統於十四日截然答稱：

(一)必須明白認清，撤退的步驟與休戰的條件，必須憑美政府和協約國各政府的軍事顧問的意見。

(二)本總統覺得責任所在，理應說明，凡不能絕對保障美國與協約國軍隊在戰場上現在所佔的軍事優勢之維持，任何辦法，美政府概不接受。

威爾遜繼稱德人長此繼續「他們不法不仁的行爲，」不能有什麼休戰。該通牒的結論謂德人必須變更向來統治他們的權力。簡直是要求德人，如果要謀和平，必須使賀亨索倫朝去位，並且須取消貴權階級的優勢。

這種質直的說話，以及關於協約國軍事優勢的暗示，自德政府看來，自然是苦不堪言。副相派葉爾 (von Payer) 在十月十六日爲討論該通牒而舉行的會議上，表示了他的見解，謂這通牒完成了德國人民道德上的崩潰：『第二個威爾遜通牒來到的時候，他們的精神破壞了。』(註一) 人民也知道美國援軍絡繹蒞法的數目：『美國的話始終是正確的。』(註二)

十月十七日在柏林召集了一次會議，討論第二次威爾遜通牒，德皇沒有出席。首相麥克司親王主席。魯登多夫也在座。這個通牒實際上近乎要求投降。希爾海軍司令 (Admiral von Scheer) 代表海軍，魯登多夫代表陸軍，現在主張繼續作戰。與采辭職後的外交部長索而夫 (Solf) 提醒魯登多夫意見的突變：那是『一個絕對的謎。』月初魯登多夫力促政治當局『向我們的敵人請求休戰。』海軍部也同樣的昏亂；在一年前他曾明白答應阻止美軍的輸送。『這允許沒有履行。』可是海軍部猶信賴U船 (不管弗蘭德爾 Flanders 海岸和奧國在地中海的根據地喪失便要在目

(註一) Prelim. Hist. of the Armistice, p. 88.

(註二) Colonel Hoyer, 在十月十七日同一會議上說的, Hist., p. 94.

前，)還主張拒絕威爾遜通牒 (註1) 海異大佐 (Colonel Hays) 謂這通牒只有接受或拒絕牠的條文是不容磋商的：『牠是一樁只有答覆是否的事情。』奧登堡從西線來電表示，應該拒絕該項通牒，繼續作戰：『即使我們戰敗了，我們也不致比現在接受一切來得更壞。』 (註二)

德國對威爾遜第二通牒的答覆，終於在十月二十日擬就發出了。內容軟弱而不着實。牠同意把休戰條件交給『軍事顧問去判斷』。沒有說明德國軍事當局是否包括在這一句裏面；但是牠接受了退出佔領區域的條件；牠還擔任保證不擊沉行客船隻。這個通牒並向美總統保證，謂德國如今已有了立憲政府：『將來任何政府不得國會信任是不能任職或繼續任職的。』 (註三)

威爾遜總統於十月二十二日在白宮召集了一次內閣會議考慮這個德國答覆。郵務部長布爾生 (A. S. Burleson) 以為休戰條件如果交給潘興、福煦和海格去議定，恐怕這些軍人大溫

(註1) Prelim. Hist. of the Armistice pp. 96-9

(註2) Ibid., pp. 101, 105.

(註3) Ibid., p. 105-6.

和了。他主張要求完全屈服。財政部長馬克都 (W. G. McAdoo) 謂這樣一種政策，或許會延長戰事。『加之，我們須知財政上協約國，甚至於我們，怕不能照這次戰爭的現在規模再接濟兩年——實在是要求我們接濟。』威爾遜總統說『只有路易喬治與英國工黨表示過同意於他所提出的條件；』並且英人『對於開放海洋問題正在搗麻煩。』開議於是告終。(註一)

翌日，星期三，十月二十三日，總統致德人的答覆，在報紙上披露了。在覆文內，威爾遜聲稱，如果與美國聯合的各協約國政府允許，停戰條件則由他們的軍事顧問以及美國的顧問起草。這些條件在提交德國以前，應經與她敵對的各政府批准。關於德國立憲政府的問題，美總統去開一切婉曲的說法寫道：『普魯士王控制帝國政策之權，並沒有減削。』

兩個在慕尼黑和般恩的德國重要外交家致書德外交部，聲述意見，謂威爾遜通牒最後一節，實在等於要求廢立德皇。柏林的政府正籌思這一步的可能性。新國務員中有一位夏特孟 (Tschirner)。

(註一) 此次開議情形由美國農務部長 David F. Houston 於一九二六年四月五日在 Chicago Herald and

temann) (是一個社會民主黨人) 曾在十月十六日的會議上明白說過：『難道真有人相信，在今日之下，人民中間還有保留德皇的意向，如此堅強，足以叫他們爲他效舉手投足之勞。』十月二十八日公布了一道上諭，吞吐地說道：『德皇之職，依然對於德國人民的是一種服務。』

同時奧皇於二十七日來電，通知德政府說他正預備單獨乞和。同日德外交部簡單答覆威爾遜的第三通牒，牠說德政府如今『等候休戰的提議。』

十月二十八日莫德刺將軍 (General Von Mudra) 自前方被召回來，向各國務員作證，他主張繼續作戰，但是續稱：『假使奧國無條件納降，而且加入敵人方面，我們那就失敗了。』(註一) 十月三十一日的一個電報，宣稱土耳其已簽訂莫德羅斯 (Mudros) 休戰條約。十一月三日奧國簽了一個休戰條約，內許協約國軍隊使用奧國的公路，鐵道及水路。

威爾遜在休戰前的最後一個通牒，發於十一月五日。內稱協約國政府同意美國根據美總統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對國會演說詞中所定條件以及他後來歷次演說所宣布的解決原則，與德

(註一) Prelim. His. of the Armistice, p. 127

媾和。可是對於那十四點，協約國政府有兩點保留：

第二款述及尋常所謂海洋自由，容有種種不同的解釋。所以他們在赴和平會議時，對此必須保留完全的自由。

再者，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他對國會的演說中，定下的和平條件裏，總統宣稱侵佔的土地，不但須退出，解放，並且須恢復。協約國政府覺得，這條文的含義所在，不容有什麼疑義。照此條文他們認為德國應賠償協約國人民及其財產，因德國陸海空的攻擊所受的一切損害。總統繼稱福煦將軍已受命接見德政府的正式代表，並通知他們以休戰的條件。

德政府現已決定接受協約國的條件。十一月三日基爾(Kiel)的海軍叛變了。這運動擴大到後來成爲一個革命。十一月七日十二點鐘德國休戰委員會自斯派乘汽車赴法軍前線。(註一)十一月九日德皇退位，與皇太子逃入荷蘭。

十一月七日離斯派赴法的休戰代表團，包括國務員埃爾茲伯吉爾(Erzberger)，奧本多夫

(註一) Ibid., p. 145.

伯爵 (Count Oberndorf) 陸軍少將溫特凡爾特 (Winterfeld) 海軍艦長萬斯羅 (Vanselow) 還有一個上校，一個翻譯和兩個祕書。代表團曾接到法方無線電通告，謂須到拉卡丕爾 (La Capelle) 路的某一十字路口等候 (Chimay-Fournies)。『這十字路是用探照燈的光線標出的。』(註一) 在兩旁數里之遙，法方停止一切射擊。在下午九時十五分，德代表的三輛汽車到了十字路上。福煦元帥遣派的官吏，迎他們入簾幕垂下的汽車內，開往康本 (Compiègne) 樹林中的佛朗克樸堡 (Chateau Francport)。當夜就歇在堡內。翌日早晨他們搭汽車往萊桑特 (Rehondes) 村，福煦在那裏的專車中，接見他們。除福煦外，協約與參戰國方面在場的，還有英國海軍部第一海軍大臣 (First Sea Lord) 魏米斯海軍司令 (Admiral Wemyss) 和美國海軍司令西姆斯 (Admiral Sims)。英法陸軍總司令海格與貝當是在他們各別的軍中。

『你們希望的是什麼，先生們？』(註二) 福煦在德方代表進見的時候問着，始終是溫文而且

(註一) Current History, XVII, 360

(註二) Buchan, 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IV, 414.

有禮貌。他們把使命說明了。檢閱委任狀後，福煦清清楚楚地宣讀休戰的條件。德國代表們對於完全降服的要求，似乎很驚異。限七十二小時答覆，至星期一上午十一點鐘爲止滿期。埃爾慈伯吉爾請求同時立即暫行停戰。福煦元帥拒絕。

德國代表團決定派一急使往斯派報告並且聽候訓令。可是這位急使因德人正在轟炸拉卡丕爾路不能前去。於是爲他預備了一個法國飛機，但不久從德軍部即來了一訊，謂該路上炮火將停止。當日（十一月八日）下午三點二十分急使海爾多夫（Heildorf）上校即乘汽車出發赴斯派。他好不容易的到了那裏，恰好來得及與柏林作電話通訊，及取得簽字的權力。休戰便於十一月十一日即星期一上午五點鐘在康本樹林的寒冷和灰色的黎明裏簽訂了。牠規定海上立即停止戰鬥（即一俟船隻能夠通知到的時候起），陸上在六小時後停止戰鬥。命令是由戰壕的電線傳達的。

休戰條款非同尋常。他們所規定的，不僅停止戰鬥而已；他們規定了某種降服，使一方在休戰期滿後，不能再戰。根據第三十四條牠的有效期間爲三十六天，還有展延之權（牠實在展延到凡

爾塞條約的簽訂爲止。比利時，法蘭西，亞爾薩斯羅倫，及盧森堡須立即撤退（第二條）。萊因河左岸也要撤退，還有梅顏斯（Mayence），可勃倫茲（Coblentz）及可隆等地方的橋梁，再加上自這些橋頭起在右岸十九英里（三十基羅米突）半徑以內的地方，那左岸，那些橋頭，及那右岸十九英里半徑的土地，由協約國軍隊佔據。在右岸向內展開六·二五英里，還要劃爲中立地帶（第五條）。德人須交出五千尊礮，二萬五千尊機關砲，三千自動礮，和一千七百個飛機（第四條）。德人所俘的戰虜，應無互惠地交還。德國俘虜的交還，須等到和平會議解決（第十條）。自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起，屬於俄國，羅馬尼亞，或土耳其的一切領土，德國軍隊皆須撤退。至於勃來斯里托夫斯，克和布加列特條約，須予撤廢（第十二與第十五條）。海軍的條款，須交出所有的潛水艇五個戰鬥巡洋艦，十個戰艦，八個輕巡洋艦，及五十個驅逐艦（第二十二與第二十三條），以及協約國參戰各國成立的『封鎖』形勢之維持，不過他們須設法在休戰期內供給德國食糧（第二十六條）。

（註）

雖然進行上有很大的技術上的困難，可是這些條件德人實踐了。德軍一翼（約七萬人）在

退却中，經過荷蘭里姆堡 (Limburg) 省南端——這是一種中立的破壞，而為荷人所准許者，他們把軍士的武器和戰爭資料扣留了。(註二) 假使荷蘭政府不准這些軍隊道經里姆堡，那麼這些兵士既未在指定期內撤退佔領區域，就要成為俘虜。協商國政府提出了嚴重的抗議。

曾有人建議，協約國本可以拒絕休戰，而繼續戰爭，以至德軍破碎和柏林佔據為止。又有人建議，或者在休戰時要求完全的降服，就是說，敵方陸海軍的『完全解除武裝與遣散』。(註三) 福煦

(註一) Spa Agreement for provisioning Germany, February 8, 1919, Trier Agreement of 16 February,

Brussels Agreement of 14 March 見 Kraus und Ködiger, Unkunden zum Friedensvertrage (1920), 2, 94ff.

(註二) Pages d'Histoire Chronologie de la Guerre (1919) pp. 305, 307. Japitise, Die Stellung Holland im Weltkrieg (1921) p. 316.

(註三) 這是美國代表布里斯將軍 (General Bliss) 在協約國最高會議的提議(見 Tardieu, The Truth of the Treaty p. 65)

反對末一個提議，他指出協約國在這時候無從監察德軍是否完全遣散；惟一切實的事，是要求一指定數量的戰械，看牠是否交出，並且佔據若干區域。至於要求繼續作戰一層，福煦的見解是：第一，協約國正為強迫德國接受其意志而戰，休戰條件做到了這層：『我們的目標既已達到了，沒有人有再流一滴血的權利』。『人不過爲了結果而戰。』第二，他報告最高會議說：

你們的軍事顧問定下的條件，就是我們在再戰獲勝後所應該和能夠誅求的條件。所以若是德人現在接受他們，那就用不着再戰下去。（註一）

在簽訂休戰條件的時候，德國全權代表抗議，謂『這種協定的實施，將置德國人民於無政府和飢饉之中。』這個預言被證爲不確了。波爾雪維克主義以斯派他主義（Spartacism）之名，在德國爆發了，但是被德政府能運用的並且又堅決又謹慎地用着的許多器械充足的軍隊所制止了，供給德國人口的食料，證明是一件艱難的工作，而且無疑地在封鎖期中，非常慘痛。可是也不能斷定，這種慘痛，是否可因解除封鎖而得到解除，這或許是大戰與停戰後的紛亂所引起的經濟

（註一） Ibid., pp. 66, 67.

狀況的失調所造成的。

第十五章 巴黎會議

德人既然屈服在這種休戰條件之下，便不能不接受協約國的和平條件。這些和平條件的內容，大概見於協約國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對德國第一次和平提議的答覆及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對威爾遜和平通牒的答覆裏面。再則，如十一月五日威爾遜的通牒所說，協約國除了保留海洋自由和賠償人民損失兩項條件以外，已經同意以十四點爲構和的基礎。

在戰亂的最後幾個月裏，主要的協約國與參戰各國已作和平會議的準備。巨額的情報——歷史的，地理的，人種的，與統計的——已經搜集了，印了出來；不過協約國沒有聚在一起，來商妥他們的確定的和平條件。（註一）一則協約國政府的主腦正聚精會神於戰事，再則會集來討論和平條件勢將打破協約國的和諧，而削弱他們的戰事進行。

（註一）Temperley (editor), A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1920), I, 237.

自從一八一四年至一五五年的維也納會議以來，實在沒有開過大規模的和平會議。因此巴黎和會未免稽遲於採取一種合理的進行方針。可是，有一件事大家似乎自始便同意了：就是和會須於巴黎舉行，德國代表不得參加談判。塔列蘭 (Talleyrand) 在維也納會議上釀成各同盟國間不和的那種回憶，也許助成這種見解。一九一八年的協約國，決心擬定條件後，再向德人提出，實質上等於最後的形式了。凡爾賽的和平，不是一種經過磋商的和平。究在何時決定拒絕敵國參與談判，沒有人知道。泰狄歐 (Tardieu) 說協約國中沒有人建議過許他們參與。(註一)

協約國與參戰國的代表於一九一九年初聚集於巴黎。一月十二日工作便開始了。一月十八日會議在法外交部由普恩嘉寶總統正式開幕。根據威爾遜的動議，克里孟梭被選為會長。一位法外交部官吏杜他斯他 (Ducrot) 被派充為祕書長。該會公開發表的第一次會議錄，登載了這些事實，及普恩嘉寶的演說；另有一個附錄，載有和會的規則。最重要的規則是協約國與參戰各國劃分為兩部份：一，參戰國之有一般利益者——美，英，法，意，與日本；二，參戰國之有特別利益者——比，英

(註一) Tardieu, op. cit., p. 98.

屬自治各邦與印度、中國、古巴、希臘、危地瑪拉、海地 (Haiti)、赫甲茲 (the Hedjaz)、宏都拉斯、里比利亞 (Liberia)、尼加拉瓜、巴拿馬、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塞爾維亞、暹羅、捷克斯洛伐克。具有一般利益的五強，可以參加一切會議與委員會。具有特殊利益的十八國，於討論涉及他們的問題時，總能與會。這種劃分，雖說未免招怨，不過不如此會議便不能進行。打勝這次戰爭的，是五強或毋寧說是四強 (英、法、意、美)。他們的意志必須尊重，而從開頭就這樣直說，倒比較妥當。並且，假使允許所有參戰的協約各國，以他們不可勝數而且時常衝突的利益，參加一切會議，該會勢必無法進行。(註一)

該會工作分下列幾部份進行：一、十人會議 (Council of Ten)，由美、法、英、意四強國政府的首腦和外交部長以及日本兩個有大使官級的代表組成。他們自一月十二日起至三月二十四日止，每天開會兩次；三月二十四日後該會議便縮小為四人會議 (四強的總理)。(註二) 討論到任何參戰小國 (或是與德斷絕外交關係的國家) 的特殊利益時，該國的全權代表便出席參加。次

(註一) 比較前舉的 Hist. Peace Conf., I, 249.

(註二) 還有一附屬的五人會議 Council of Five，包括四強的外長與日本代表一人。Hist. Peace Conf., I, 267.

於十人（或四人）會議的是一個起草委員會和五十個以上的別種委員會，其中主要的是關於國際聯盟，關於賠償，關於領土問題等委員會。每一國家除派有全權代表外，更派有許多技術的助理，上至國務員和外交家，下至打字員和排字人不等。英國代表團及書記等，全體不下六百人。

所有各代表團的居住不是一件容易供給的事情。高級的政治家，往往由一巴黎友人或有公共精神的富室供給寓所。威爾遜由法政府供住於美國街（Place de États Unis）的比斯可芬飯店（Hôtel Bischoffen）。四人會議很多次數在該處開會。路易喬治有一位英國貴族的『公寓』，在尼托路（Rue Nitot）二十三號，靠近得勝門（Arc de Triomphe）。英國代表團多數住在大華飯店（Hôtel Majestic），那是英政府特為和會租下來的。全體僕役由英國帶去，代表團的事務，極力設法保守秘密。代表團辦公處設於奧斯托利亞飯店（Hôtel Astoria）與另一飯店，這兩處也完全是由英政府租下來的。廢紙簍的東西每夜都小心收集，付之一焚。其他大國的佈置也相類似。美國代表團住在康可街（Place de la Concorde）的克利隆飯店（Hôtel de Crillon）。於是在大華與奧斯托利亞的英人住在伊里西街（Avenue des Champs Élysées）的上頭，美人住在

下頭。國際聯盟委員會大都在克利隆開會。美國代表團有許多人在克利隆住不下。他們便住於河的兩岸各公寓及房子裏面。

巴黎那時一點也不好玩。沒有人能像李恩親王(Prince de Ligne)形容維也納會議那樣來形容巴黎和會，說是『會議跳舞而不進行』。巴黎的商店差不多是空的。著名的糖果店，除掉供給麵包外，很少其他的東西。飯館裏只有幾種食品，價格卻是高極了。在英國和別的使館裏，舉行了幾次正式宴會。在各代表團住的飯店裏，非官場的娛樂委員會組織了幾次跳舞會。但決不能說是這會議跳舞了。反之，牠工作得極辛苦。假使牠有受累的地方，那便是牠的助手們準備的材料太多。雖然發生的錯誤頗多，但無論如何，憑公道說來，這是一樁想在每個問題上取得完全的情報及辨別證據的誠實企圖。

巴黎和會是一個有力的國際機關，很有趣而且很普及。來往酬酢，非常頻繁；在各代表團員之中及相互之間，有不少的肅靜的招待。除了在和會中任有職務的人以外，幾乎稍有名聲的人，在一月十二日至六月二十八日，都到過巴黎。歐羅巴洲，以各協約與參戰國來代表而論，在這幾月內變

成一個了。自然，各國都有牠自己的偏見與嫉妬；但是他們的代表與他們的官佐全都是和會的份子，他們全都參加過大戰的偉大的合作努力，如今在凱旋的愉悅空氣中，他們全都廁身於和平的締造。這和會令人油然而生彷彿同屬一個教會的共同感覺。牠是一個國際的中心或社會；牠包括所有的協約國家。歐洲合衆國在烏雲再把牠遮掩以前，出現了一會兒。

或許這方面國際團結的現象，再沒有比在大華飯店裏所見到的更動人。這是巴黎一個最大最新最漂亮的飯店：食物也許不夠頂豐盛，但淨窗，明鏡，電光，安樂椅，及氣爐，並不缺乏。在這地方，人們能夠團聚，躲避外面巴黎的潮濕不歡的空氣。英國代表團大概是最大的了；牠的朋友與熟人極多。大華的高大的客廳，成了一種國際的駐驛（*Caravanserai*）。每當旁晚餐罷，英國代表團的團員——除了最重要的政治家以外的人們，——便兩兩三三地在小桌旁的細柳椅中坐着，談談天，看看報，或者就那樣懶洋洋地看着來往不斷的人。各國和各色的人，都從那個阻擋寒風的轉旋門裏進來，走過池子，各走各的道，各赴各的約，一個一個不見了。一位英國的閣員，穿一件厚重的土維特絨（*Tweed*）大衣；一位法國的官吏，穿了整齊的制服——燦爛的肩章和華美的闊紅褲子綫

着一道寬黑邊；一位阿刺伯親王穿着廣大滑溜的白袍子；英國官吏穿着樸實的褐色制服，襟上綴着顏色文雅的紐子，袖上滾着邊；一個法國外交部的官吏，穿着樸實的黑服，看上很整潔像做事的人；美國的海陸軍官，高高的和直挺挺的人，穿着紐子扣到頸上的老式緊身服，看上去總是活潑幹練的；俄羅斯人，波蘭人，烏克蘭人，捷克人，和塞爾維亞人，黑氈帽，黑大衣，和缺少運動而致的淡黃面色的有鬚的市民；日本人，整潔冷淡堅決，好問人家的中國人；紅色的印度親王有着聰明的面孔和可喜的表情，穿了褐色制服，帶一種擺動的軍人的舉止；葡萄牙官吏穿着淺藍色，意大利人穿着灰色；挾着他們的公事皮包的法國政治家，他們的迅速的步伐，和他們更迅速的總明的警視——大華飯店的戲劇，在不斷的表演。在玻璃的圓屋頂下面，小桌旁，許多新來的人，和他們的朋友坐了下來，啜着咖啡，討論他們同僚的過失，他們本國的公正的要求，或是解除世界困難的路徑。人人都知道一些關於和會的事情，運輸問題，多瑙河，煤礦的讓與，托蘭雪而文宜亞（Transylvania）的人種學；但是很少人知道那機關的中心，那神祕的房間，在那裏幾個重要政治家正裁定數千份報告與紀錄的結果，一句一句地在擬定那條約。雖說有許多人在那裏工作，但條約的實際構成，仍包羅

在神祕之中。比斯可芬飯店的高牆，或是陸軍部裏克里孟梭的同樣不可攀登的梯層，使那條約不僅與世界間斷，就是與會議本身也相隔絕。

和會的工作分成兩個很清楚的時期：第一，自一月十二日至三月二十四日。在這時期中，十人會議（協約與參戰各國的首腦和外交部長）從事於條約的構成；第二，自三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這時期中，四人會議（除日本以外的列強首腦）將工作攬在手裏。在第一時期中，成了許多有價值的工作，但條約沒有起草。在第二期，四巨頭感時光的蹉跎，做成了歷史上最大最複雜的條約，並且得到了簽署：一件確實偉大的成就。

一位美國代表看出在和會進行中，有五大危機。（註一）這五個危機是關於委託統治的殖民政策；擬議的國際聯盟；賠償和萊茵左岸問題；阜姆問題；及山東問題。

在和會開幕前就決定了（至少是假定了）征服的殖民地不再歸還德國。所以一月裏在巴黎考慮到處置這些殖民地的時候，瓜分的計劃便提出來了。就全體看來，列席會議的各國的見解，

(註一) Ray Stannard Baker, What Wilson did at Paris (1919), pp. 20-1.

是傾向於合併的。可是威爾遜總統堅決主張委託統治制度。這種觀念是起於英國殖民歷史的各種環境。母國管理她的殖民地，直到他們能夠自治爲止：大英自治領地（British Dominions）就是幾個依此路徑得到自治政府的國家的例子。同樣地，美國之佔領菲律賓，始終認爲是暫時的事。情：美人正在引導菲律賓人向自治的目標進行，最終便是獨立。在和平會議召集以前，一位南非洲代表兼英國戰時內閣閣員斯瑪茨將軍（General Smuts）曾著一小冊子，進一步擬定一種國際聯盟的計劃：在這本小冊子裏面，他曾經討論到國際聯盟擔承某幾處地方的委託或是「委託統治」的可能性。霍斯大佐早在一九一四年六月就有了同類的委託統治的理想。（註一）威爾遜總統便抓住了這種理想，作爲增加國際聯盟勢力，同時阻止歐洲國家的合併政策的方法。經過幾次熱烈辯論以後，委託統治制度便被採取了。

在二月中旬與三月初旬，會務頗受路易喬治和威爾遜缺席的影響。路氏因爲英國國內發生困難問題被召回倫敦，威氏則赴華盛頓簽署若干國會的法令。在一月二十五日和會的第一次全

（註一）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 264, 275

體會議時，便通過了國際聯盟的盟約，應列爲和平條約的一部。國聯是威爾遜所最注意的。他堅持主張國際聯盟盟約應列爲和平條約的一部份，而非另外的一種文件。可是當他三月十四日由華盛頓回來時，他得悉已有一種計畫，要趕快完成預備和約，以解決德國疆界，與解除軍備一類的主要問題，而把國際聯盟留諸最後的條約裏面。威爾遜恐怕這樣會使國聯削弱。因爲預備和約實際便是主要條約；牠是構成和平的；並且他覺得，如果要聯盟堂皇地成爲歐洲公法的一個基本部份，就應該列在主要條約裏。在另一方面，要求迅速締訂一預備和約的民情，確也可以看得出來。一個預備條約可以成立和平，來代替一個不安的休戰；牠可以解除德國的封鎖；牠可以把需要時間的事件留下在一種冷靜的空氣裏面來從從容容地商妥。這是罷戰和締結大規模的和議的『經典辦法』。所以第二個危機發生了，經過一番竭力奮鬥之後，威爾遜又勝利了。預備條約不用了；將聯盟盟約列入所有各國全權都要簽名的最後條約（Final Act）上面。關於和會要人們對國際聯盟計畫的態度會有許多苛刻的議論。威爾遜，斯瑪茨，西塞耳，布爾喬亞（Bourgeois）及包爾福是牠有力的擁護人。其餘的人並無反對的意思，但是願把此事委之於牠的熱烈的擁護者。據說法總

理每天早晨醒來時，常對自己說道：『佐治克里孟梭，你好好信仰國際聯盟吧。』一個更有確實來歷的故事，說有一位意大利代表當人家即以意大利對聯盟態度時，他答覆道：『好，我們相信牠，不過我們要阜姆問題先解決。』（註一）

四月是和會歷史上最惡劣的一個月，也是世界歷史上最惡劣的一個月。匈牙利發生共產革命了。三月四日巴伐利亞也發生共產革命了。協約國不得不撤退阿特沙（Orsha），委之於布爾雪維克人反對布爾雪維克人的革命是在挫敗之中。社會的和經濟的紛擾，鬧動了英國、愛爾蘭正在叛變。和會外面的世界，彷彿正在支離破碎之中。會議自身也被衝突的利益所分裂了。法國正在這種困難情形底下提出了安全的要求。成立國聯基礎的原則已經通過了；解除德國在將來或是一個相當時期內的軍備的辦法，已經討論過，並且沒有多大爭論就解決了。但是德國的裁減軍備，並不能使法國覺得安全。她要求德國的西部疆界應定在萊茵河。她並不是要把這塊土地歸併給

（註一） Baker, What Wilson did at Paris, p. 74. Hist. of Peace Conference, I, 261-2. 威爾遜不在

時，羅斯但曾允許國聯會章可在和約簽署後再說，不作爲和約的一部。據說這就是威爾遜與羅斯疏遠的開始。

她自己。法國在歐洲的領土目的，限於亞爾薩斯羅倫和沙爾區域，前者是在一八七一年被德國奪去的，後者是在一八一五年在她佔有了二十年後被德國取去的。她如今的計劃是要把萊茵左岸——即位於亞爾薩斯和荷蘭邊疆之間的地方——建爲一個自主的中立國。大戰時（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四日）（註二）她爲了此事，曾與俄國訂了一個密約。法國福煦元帥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的備忘錄，及泰狄歐（克里孟梭的左右手）三月二十六日上的備忘錄，都極力爲法國這計劃辯護。（註二）

英人認法國這種計劃是很不切實際的。七百萬團結堅固的德人，與他們在彼岸的同胞毗連着——如果想要使他們與德國脫離，而不致使歐洲局面發生『糾葛和軟弱』，那是辦不到的。（註三）當三月十四日威爾遜總統從華盛頓回來時，他也不太贊成。這是一個煩惱的時期。差不多

（註一） Russian Note, 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載 Manchester Guardian.

（註二） 全文見 Tardieu, the Truth About the Treaty, pp. 145-67.

（註三） 此爲 Mr. Philip Kerr 與 Tardieu 的談話 Mar. 12, 1918 (Tardieu, op. cit., p. 173)

歐洲或者甚至於全世界的政府和君主都來訴冤。西班牙皇帝的意見和行動是當尊重的，他於三月二十五日致書威爾遜，論及布爾雪維克主義，其中附了奧地利前皇却爾斯的一封信。這位不幸的皇帝還住在他那以前的帝國。他的信是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自近維也納的意卡左（Eckartsau）堡發的；他籲請協約國出來阻止多瑙河區域成爲『巴爾幹化』或是比巴爾幹還不如。四月四日那天，革命和共產暴動的消息也來了。『同一日，漂亮的比利時王亞爾培（Albert）乘飛機自布魯塞耳飛來了，堅持比利時人對於賠償的優先權利——這樣加了一個新糾紛。』（註一）路易喬治與克里孟梭彼此間也發生了一場筆墨戰爭，開始於三月二十六日他那著名於今的覺書，書中路易喬治宣稱，施諸德國的領土條件，必須使德國在構和之後不懷恨在心。（註二）克里孟梭不難指出，德國喪失了她的殖民地，她的艦隊，以及她所重視的其他許多東西，無論怎樣，她是必

（註一）四王與奧前皇之信俱見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1922), III, 246-8, 此王事見同書 Vol. I, p. 46.

（註二）此覺書於 Genoa Conference 後在英國印行了（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然要憤慨萬分的。健康大受損傷的威爾遜總統，感到憂慮煩悶，而且差不多絕望了。四月七日，他發了一個海底電訊令喬治華盛頓號戰艦從勃羅克林 (Brooklyn) 開到勃來斯特 (Brest) 候命。這個消息發了給在巴黎的美國新聞局 (American Press Bureau)。如列席柏林會議的皮康菲爾德爵士 (Lord Beaconsfield) 的專車，喬治華盛頓號是隨時準備離去的。

自從喬治華盛頓事件後，空氣漸漸好了。雙方開始互相遷就些。在四月十日與十一日，國際聯盟委員會的末兩次會議舉行了。聯盟照威爾遜主張的路線完成了，準列在和平條約裏面。他終算遂了心願。關於沙爾 (Saar) 與萊因左岸的問題，成立了一種妥協——法人取得沙爾礦區，萊因則由協約國軍隊佔據十五年。並且爲抵抗仍歸德有的萊因左岸起見，英法兩國向法政府獻議了一個安全保障條約 (Guarantee Treaty of Security)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四日) (註一)

(註一)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的法國通牒。文見 Tardieu, op. cit., p. 180. 又 Hastings and Lord, Some

和會裏的，或者毋寧說是四人會議裏的，關於賠償的見解的衝突集中在戰爭費用和人民損失上面。十一月十一日休戰條約第十九條訂定『賠償已造成的損失。』但是牠也包含一句（那長句是用這短句開頭的）『附帶保留，協約國與美國將來有任何要求，仍不受此拘束。』這一點的採取，是協約國與參戰各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日根據法財政部長克洛茨（Klotz）的提議，事後纔想到的。但是經過和會經濟組許多辯論之後，終於議定克洛茨條款僅見於休戰條件，而不載於協約國戰前的通牒裏面，不能擴張該通牒的條件。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休戰前的通牒中，協約國要求『德國應賠償協約國人民及其財產因德國陸海空的襲擊所受的一切損害。』這是協約國在他們致威爾遜通牒中所作的惟一保留，而曾經德人同意的。那麼協約國已分明拘束了自己，不向德國需索他們的整個戰爭費用了。他們只能徵取平民所受損失的賠償。如今的問題是什麼東西能包括在此項損失裏面。『得到所謂四巨頭一致同意的最後議論還是斯瑪茨將軍提出的一個備忘錄。』（註一）

（註一） Rarnuch, *The Making of the Reparation and Economic Sections of the Treaty* (1920), p. 29.
比較 House and Seymour (editors) *What Really Happened at Paris* (1921), pp. 268-72.

在這個備忘錄裏面，斯瑪茨將軍論平民的損失，謂包括戰後回復平民生活的一切人們的所有損失。『這點包括一切戰爭養老金與分離津貼（separation-allowances），這是德國於賠償協約國人民所有的財產損失外，還得負責補償的。』

要德國賠償的清單就是這樣開出來了。比利時沒有參預休戰的談判，這個普通原則對她有一個例外的優待。她直至簽訂休戰條約的一切戰爭損失，都歸德國負擔。

關於阜姆問題的危機，並不像前舉三個危機的危及一般和平解決的前途。意大利固屬一大強國，雖然以退出為威脅，可是並不能以破裂和會來打動其餘三國。四月二十三日威爾遜阜姆通牒向世界公布之後，意大利全權代表確是退出過。但是和會照樣進行，意大利雖然沒有達到他們整個的要求，也很聰明的慨然回來簽訂條約。

問題並不全然起自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倫敦條約（或亞得利亞條約）該約擔保意大利好許多權利，但並沒有許給她阜姆。該約第五條裏一個註釋，把這個口岸及其亞得利亞海的全部匈牙利海岸，許了給南斯拉夫國。可是這意大利問題，並不如外表看來那樣簡單。意大利人

對於向德國提出的和平條件不很注意；他們的爭執是與奧地利。在對奧提出的休戰條件裏，而意大利並沒有拘束自己要在威爾遜十四點的基础上媾和。（註一）所以意大利人有可以堅持履行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倫敦條約的地位。協約國不能自失信用；他們不能拒絕履行倫敦條約。但是意大利人需索阜姆，是超過了倫敦條約。再者，英法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莫利恩會議（Conference of St. Jean de Maurienne）上，締過一個祕密協定，允許意大利取得斯麥娜（Smyrna）。這樣湊在一起，意大利問題據說在巴黎和會所估的時間，多過於其他任何事件。

相持了好幾個星期；意國首相阿蘭多——文雅，有辯才，循循善誘——和宋理諾——諷刺的，冷靜的，堅決的，誠實的——再三陳述他們對阜姆的要求和理由，而且更有甚者。威爾遜建設了一條假定的疆界，所謂『威爾遜線』（Wilson Line），對於倫敦條約，有所截滅，但英法是完全預備履行倫敦條約的。四月二十三日他給了美國新聞局一個他親寫的備忘錄，以便發表，內中他不僅置意大利要求阜姆之議於不論，而且甚至於極力主張修改倫敦條約。翌日阿蘭多和宋理諾便離

（註一）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the World Settlement, II, 133.

開巴黎了。意大利首相隨身帶去了包爾福在同日所寫的一個備忘錄（但是沒有公布像威爾遜一樣）內中該英國外交部長說明，假使意大利還要堅持倫敦條款，英政府準備遵守，不過阜姆不能給他們。（註一）

意大利的退出和會，照當時政治與新聞界的俗語說來，乃是一種『腔勢 Gesture』公衆視之，不免認爲這是一種似乎過激使性的舉動。此事實實際上卻沒有發生很大的惡感，而且從沒當做最後的退會。阿蘭多不過要回意大利去設法取得國人的繼續信託。他留克里斯必（respi）在巴黎，他是意大利的經濟代表，其能力識見使他在和會成爲一個重要的人物。

意相與外交部長在羅馬向一個議會委員會解釋後，五月六日，就回到巴黎了。因此他們能於五月七日，參加與德國代表團的集會，隨後與五月十四日蒞巴黎的奧國代表團集會。可是這阜姆的難題，看來不能解決。牠沒有在和會解決。意大利人簽了對德與對奧的條約；但是直到一九二〇年，再三避免新的戰爭之後，意大利與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人與斯洛文人王國（卽南斯拉夫）纔

（註一） 全文見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the World Settlement, III, 281-6.

一種成立協定，雙方都有相當的讓步。(註一)

意大利危機正鬧得最兇的時候，日本的或是山東的危機也在日形緊張。日本人在和會，正當地堅持他們大國的地位。他們是五人會議的一份子，雖然照例僅在商討遠東事件時，纔應召參加。山東事件是不能拆散和會的；日本人的出席，不像美國或英國那樣不可缺少；但是他們是在場的，他們是固執的。而其餘的列強，熱心要對中日兩方同表公正，便覺得這山東問題非常麻煩。

日人雖只喪亡約四百人，但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七日之佔領青島，及在地中海裏之抗戰德國潛水艇曾經立下過好的功績。他們的地位更有一個未曾公開的協定做保障。這個協定是由英日兩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六日締結的（後來法意也同意了），答應把山東和赤道以北的島嶼給與日本人。這是在和會後的時期中變得那樣尖銳的遠東問題的序幕。另一方面，日本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和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與二十八日與中國所結的協定或是牒文裏，會答應歸還她所佔領的山東土地於中國政府。(註二)

(註一) 見本書末章。

(註二) Baker, *op. cit.*, I, 243-4, *Hist. Peace Conf.*, VI, 374.

山東半島約有五萬七千方英里的面積，德人於一八九七年向中國政府在該處租得約一百七十七方英里的地方，有許多利權。德人在該處並且發展了膠州商埠，建築了青島礮台。該省的主權仍屬中國；德國僅有膠州及其附帶地域的租借權。中國代表根據中國政府曾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對德宣戰的理由，在和會上請求將膠州交還中國。

經過長久討論之後，五人會議在四月三十日成立了一個協定。日本得到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並且訂明在和平條約裏面。但是日本於四月三十日也提出了一個聲明，說她將把山東半島（凡是在她佔領之下的）交回中國，只保留曾經許給德國的經濟特權。此項承諾日本後來在一九二一年至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後實行了。

巴黎和平會議上的意見，頗受各處政治的與社會的騷亂報告所煩擾。布爾雪維克主義似乎跳出了俄羅斯邊疆，正威脅中部甚至西部的歐洲。一九一九年三月，波大卑斯特(Budapest)（匈牙利都城）被共產黨徒攫取了，領袖是一個從俄國回來的俘虜伯拉孔(Bela Kun)。這個蘇維埃的『苦迭打』（譯者按即政變之意）引起了四月羅馬尼亞軍隊的侵入。最高會議不願與匈牙利蘇維

到協議。一九一九年八月羅馬尼亞軍隊佔領了波大卑斯特。蘇維埃政府倒台。伯拉孔逃往維也納。最後逃往莫斯科。羅馬尼亞軍隊在匈牙利征捐極苛，報復大戰期內奧匈軍在羅馬尼亞征取的捐輸。直等到（一九一九）十一月巴黎的最高會議發出了一道哀的美敦書，羅馬尼亞軍隊纔開始退出匈牙利。

第十六章 和約的簽字

德國代表團於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蒞凡爾塞。他們供住於雷實扶飯店（Hôtel des Réservoirs），防衛頗爲周密。他們可以在凡爾塞公園裏操練身體，並且有與本國政府通電報電話的自由。

和約是於五月七日下午三時三十分鐘提出來的。協約與參戰各國的代表們坐在翠恩琅皇宮飯店（Hôtel Trianon Palais）的聚餐室裏的一張桌旁。德國代表們請進來了。所有協約各國的代表都站起來。德外長勃羅克多夫（Count Brockdorff Rantzau），向克里孟梭躬。各人坐下。燦爛的陽光從窗戶照臨這幽靜的房子。飯店對面的公園照耀眼簾。靜默爲克里孟梭打破。他起立作一簡短的演說，開頭是：德國全權代表諸君（Messieurs les Plénipotentiaires de l'Empire Allemand），繼稱凡事將照文明國家特有的禮貌而行。

德國首席全權代表勃羅克多夫朗初伯爵是一個貴族，並且是一個舊派的外交家。他之所以被任命，無疑是因為德意志社會民主共和國認爲他是一個知道正確的進行方式，而且會留心國際禮儀慣例的人，那種禮儀雖遇最棘手的談判也能使之稍爲軟化的。然而這正是帝國官場的產物所不做的事。把他的角邊眼鏡按按好，他坐在椅上屹然不動；甚至在發話時也沒站起，他用一種沉鬱勉強的聲調讀出一篇顯然有十分準備的演說。克里孟梭說的是法文。勃羅克多夫朗初伯爵說的是德文：

先生們 (Meine Herren)

我們被現在的職務，苦痛地累着；因爲這種職務，我們纔來和你們聚會；迅速地給世界一個持久的和平。我們並不自瞞我們戰敗的範圍，我們無力的程度。我們知道德國軍隊的力量是破碎了。我們知道在此地遇到的憤恨的重量，我們已經聽到激烈的要求，戰勝者要責我們像戰敗者去償付，並且要視我們爲犯罪者來處罰。

這位伯爵於是踱入一段頗長，有力的大戰原因的解說，並且承認德國對於歐洲好戰空氣的

引起負有若干責任，但極力駁斥德方是有罪的一造之控詞。他指出各種事情，據他看來，是助成『歐洲的疾病』的，他說俄羅斯的動員『取消了政治家們療病的機會，而把決斷交給了軍事權力的手裏。』

在戰爭禍首的問題以後，他轉論到休戰和休戰後的封鎖；他用辯論的言詞，否認德國是毫無防衛的——她有十一月五日協約國議定書保證她在十四點上構和的公平的原則。他說明德國對國際和平的工作，極願合作；對比利時和法蘭西北部的破壞，極願補償；以及對協約國的財政債務，極願擔負。這演說的後半部是德國意向的一種有力和尊嚴的表示。可是牠並不會除去因演說者在開頭時欠缺禮貌和不合時宜的戰爭禍首的指摘而引起的不良印象。（註一）在這篇演說終了，克里孟梭緊緊的抑住了他的易怒的性子，用乾脆的一句話散了會。

德國代表隨身帶去他們尚未看過的條約抄本。他們可以用書面提出觀察的結果，交與協約

（註一）兩演詞見 Kraus und Röthiger, Urkunden Zum Friedensvertrage, I, 202-8. 在 May 8 一九

一九一九年五月八日的泰晤士報有朗初的演說的全部譯文。

與參戰國的代表，但是他們要等到簽字之日，纔能與他們的對手方晤而斯瑪茨將軍在五月二十二日致路易喬治的一封信裏，(註一)對於條約中某幾點有批評，並且建議召集會議加以討論，但是這個提議被拒絕了。

五月七日至六月二十三日間，通牒的交換頗頻。德國代表團諒必工作得極辛苦。他們的通牒有些很長，而且說理精密，對於該約的條款，有詳細的批評。有些地方他們獲得幾點，但並沒有真正實質上的修正。沒有人在巴黎曉得他們會簽字與否。五月二十日，曾宣布該約條件為不能接受的夏特孟 (Herr Scheidemann) 的政府倒了。(註二) 勃羅克多夫朗初也隨他去職了。古斯他夫包伊爾 (Gustav Bauer) 做了總理，漢孟繆勒 (Hermann Müller) 繼勃羅克多夫朗初之職為外交部長。漢尼爾 (Herr von Haniel) 做了凡爾塞的德國代表團首領。德國代表團

(註一) 全文見 Baker, op. cit., III, 458-65.

(註二)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二日夏特孟在柏林對德國國會演說，謂試問那一個正直的人，不說德國人，能夠接受這樣的條件。(五月十三日英國泰晤士報第十四頁)

准許離開凡爾塞兩夜去韋馬 (Weimar) 和他們的政府商量。協約國議決假使德人至六月二十三日還不答應簽字，福煦便統率協約國軍隊進一步深入德境。克里孟梭在六月二十二日的一個通牒裏說明：『協約國與參戰國認為討論的時間已過了，』並且指出僅餘二十四小時德人能作同意該約的表示。漢尼爾的請求延長為四十八小時，也被拒絕了。同一日漢尼爾通知克里孟梭謂德政府接受這個條約，『但對於這些和平條件的聞所未聞的不公平，並沒有放棄他們的地位。』

(註一)

選為凡爾塞條約簽字地(六月二十八日)的房間叫做玻璃室 (Galerie des Glaces)，在那裏，(一八七〇年法國戰敗後)，德意志帝國於一八七一年一月宣告成立。這是一間長形的華美房子，富麗地裝飾着明鏡與鍍金的雕刻，還有油畫的天花板畫着路易十四大帝和他底元帥們，穿了羅馬的古裝。從一排大窗子裏看到公園的花床，噴泉，池沼和花徑，直看到他們好像熔入天邊的小山之中。

(註一) Notes in Kraus and Pöckiger, I, 697-700.

聚在那裏的政治家也配得上這偉大的風景；他們到處都可以出名的：普恩嘉寶，嚴重，安靜，有把握；那位年老的法國總理，目光如炬，態度有些凶猛；威爾遜，莊嚴，負責任的，略帶倦怠，好像他負着天下的重累；那位英國首相，獅子似的頭，迅速的動作，質直可愛的風度；包爾福，高仁慈，和善，有禮貌，可是也不完全如此；般那勞，小，誠實，好好的，純粹是一個天生的紳士；斯瑪茨，稜角整然的鬚，微紅，有決斷，智慧的脸，和善，有風趣的眼睛（可是現在看來很嚴厲，因為他正要提出一個抗議他將簽字的條約的信）；（註一）巴式照，那位巴爾幹的良相，看起來好像一個聖經裏的大主教，雖然他的敵人把他喚做老狐狸；巨大黑鬚的勃拉地亞奴（Brahannu），瘦削，善言，富裕；威尼柴洛斯，帶眼鏡，禿頭，圓屋頂般的前額；朋斯，小鬍子，頭髮梳作英國式，一種確信無疑的好研究的表情，一個大學教師的風度；那好商量的阿蘭多；那不滿足的宋理諾；那嬌小玲瓏，不可思議的日本人——以上這些人都很容易在那充塞玻璃室的集會裏找出來的。沒有中國人。他們因為條約裏的山東條款不出

（註一）全文見 Hist. Peace Conf., III, 74. 斯瑪茨將軍雖反對和約中的若干條款，卒因他保持普魯士軍國主

席。(註一)高級軍官也列席旁觀，福煦，海格，霞飛，潘興，地亞士 (Diaz) 和其他——他們的軍裝截然對照着黑衣服的政治家們。當全體就坐了，三點鐘德人請了進來——漢孟繆勒外交部長和約罕涅培爾 (Johannes Bell) 殖民部長。他們看來莊重，有一些不自然，但並不喪氣。當他們進來時，沒有人起身。克里孟梭證明置在桌上的條約，和送給德國代表的二百抄本無異。他於是請德人簽名。司儀官引他們到桌旁。他們簽後，協約與參戰國的政治家們，也按照他們國名的法文字碼次序逐一簽字：所以威爾遜首先代表美國 (Amérique du Nord) 簽名，英國次之，其他各國也照同一次序，不過大國是列在小國前面的。

下午三時四十分儀畢。『代表們從屋裏走出來。在花園裏噴泉正跳躍着飛瀑，這在大戰以來是第一次，而羣衆們也吹呼着緊緊擁了上來——盡他們的衛兵所能攔阻的——圍着那四個人，他們從休戰以後便統轄全球，如今又把德意志帝國埋葬在恰正就是牠榮誕的地方。』(註二)

(註一) Lansing, The Peace Conference P. 265.

(註二)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II, 19.

不過這個簽了字的條約所登記者，豈僅軍事的勝利而已。牠包含一種較前公正的領土的劃分辦法，還有在國際聯盟的盟約裏，牠具有保持未來國際社會的康寧秩序的辦法。

第十七章 凡爾塞條約

凡爾塞條約包含四百四十條，分爲十五部分。用的是英法兩國文字。弁言中放棄了『要有永久的和平』那種老公式，只述條約的目的在求一堅固持久的和平。戰爭於該約發生效力後（換言之，即批准後）（註一）停止，與德國的官場關係也於該時恢復。

條約第一部是國際聯盟的盟約。

締約各國

爲增進國際的合作，並保其和平與安寧起見，特允

承受不從事於戰爭的義務；

（註一）第四四〇條。

維持各國間光明公允榮譽的邦交；

確守國際公法的規定，以爲各國政府間行爲的軌範，並在有組織的民族間彼此待遇公平，並恪遵條約上的一切義務；

議定國際聯盟盟約。（註一）

*

*

*

*

接着便是關於聯盟的加入，退出及組織（第一至第七條。）設立一行政院，一大會，及一秘書處。主要的協約與參戰國在行政院有永久席次。大會得隨時斟酌選定國聯其他四會員加入行政院。得大會的同意，行政院能分派永久席次於國聯其他會員（第四條。）除盟約和約另有明白規定者外，行政院或大會的決議必須全體一致。國聯地址定在日內瓦，但經行政院決議，得遷往別處。國聯會員的代表與國聯官吏，享有外交特權與免除權。國聯的建築和財產均不得侵犯。秘書處的經費由國聯會員按照國際郵政會（Universal Postal Union）的國際事務局（International

（註一）見該約第一部的弁言。

Bureau) 經費比例攤派。

行政院審度各國地勢與環境，應制定裁減軍備的計劃，以供各政府的考慮與行動；這些計劃每屆十年應重行考慮及訂正。

決定一切的主要條款是第十條至第十七條，關於有引起戰事可能的爭端。

國聯會員擔承尊重並保持聯盟各會員的領土完整及現有之政治獨立以防禦外國的侵犯，如遇此種侵犯，或此種侵犯的任何威脅或危險之虞時，行政院應籌履行此項義務的辦法。

凡任何戰爭或戰爭的威脅，不論與任何國聯會員有無直接影響，茲特宣言此事係有關國聯全體，國聯應採用妙而且有效的辦法以保持各國間的和平。凡有關於國際關係的任何情勢，足以擾亂國際和平者，國聯任何會員有權提請大會或行政院注意。如遇戰爭或戰爭的威脅發生，祕書長應依國聯任何會員的請求，立即召集行政院。（第十一條。）

國聯會員約定，倘國聯會員間發生爭議勢將決裂者，應將此事提交公斷，或交行政院審查，並約定無論如何，非俟公斷員判決或行政院報告後三個月屆滿以前，不得遽行開戰（第十二

條。)

第十三條關於宜於公斷的案件，第十四條規定國聯行政院應擬定設立經常國際法庭的計畫。第十五條規定凡勢將決裂的爭議，而不適於公斷者，應提交國聯行政院提交的手續，只要爭議的任何一造，將爭議的存在通知秘書長。

* * * * *

聯盟會員，如有不顧本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所定的規約，而從事戰爭者，則據此事實，應即視爲對於所有聯盟其他會員有戰爭的行爲；其他各會員擔任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的關係。……如遇此情形，行政院負有向各關係政府建議，俾聯盟會員遣派陸海空軍力，組成軍隊，以維護聯盟盟約之責（第十六條。）

根據同一條文，國聯會員，應准許任何國聯會員爲協同維護國聯盟約的軍隊假道通過。

如果爭議起於一爲國聯會員國與一爲非會員國，後者得被邀接受會員的義務，以解決這種爭議。如果該國拒絕邀請，而對國聯的一個會員國作戰，則對於採取此行動的國家，即可適用第十

六條的規定。俱非國聯會員的國家得因爭議之故，被邀請爲國聯會員。假如雙方都拒絕，行政院應取足以弭止戰鬪及達到解決爭議的辦法。

第十八條意在成立外交「公開」的一種合理的程度。

嗣後國聯會員所訂條約或國際契約，應立送秘書處登記，並由秘書處從早發表。此項條約或國際契約未經登記以前，不生效力。

第十九條賦與國聯大會權力，向會員國勸令重行考慮已不適用的條約；於是現存條約隨時由相互同意而作必要修訂的機關，也創設了。

國聯盟約撤消牠的會員們所有一切與牠不相容的舊有的各種協約。任何會員將來不得再訂此項協約。

第二十二條是成立委託統治制度的條款。

凡殖民地及領土，於此次戰爭之後，不復屬於從前統治該地之各國，而其居民，尙不克自立於現世特別困難情狀之中者，則應適用下列的原則，即以此等人民的福利及發展，成爲文明的

神聖任務。此項任務的履行，載在本盟約。

*

*

*

*

委託統治地的性質，可按照人民發展的程度，他們的地理形勢，及其他環境而區別之。在某種社會裏，例如舊時土耳其帝國的部份，受委託統治國不過忠告顧問而已。有的卻差不多等於立法的同化。但是無論怎樣，受委託統治國必須維持『國聯其他會員國在貿易上與商務上的同等機會』而且必須作一常年報告於國聯的經常委員會。

第二十三條是關於人道和經濟的條款。依此凡國際聯盟會員必須在他們本國與一切國家內力謀取得與維持勞動的良好情形，力謀交通和運輸的自由，及力謀在有關國際的事件上採取步驟以控制疾病。他們必須信託國聯，對於軍火貿易有控制必要的地方，此項貿易由國聯去爲一般的監督，並且信託國聯去監督關於婦孺販賣和鴉片貿易的條約的執行。國際勞工局也成立於日內瓦，作爲國聯組織的一部份。牠的組織和職務形成和約的第八部。

國聯盟約的修正要俟行政院會員全體一致和大會的多數核准，纔發生效力。

第二部，包括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規定德國的疆界與比利時接壤處微有修正與羅森堡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的邊界，與法國，一八七三年七月十八日的邊界，與瑞士，固有的邊界，與奧地利，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自瑞士至隨後劃定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邊界，與捷克斯洛伐克，戰前德國與波希米亞間的邊界，到恰在紐斯他特（Neustadt）東的一點，在該處捷克與稍後劃入新與國亦即舊邦的波蘭的上塞內西亞部份接壤。德國邊界在紐斯他特轉向北面，穿過相爭的上塞內西亞，接着不整齊地向北進，差不多把整個舊屬普魯士的普生（Posen）省給了波蘭，還有舊屬普魯士的帕滿倫尼亞（Pomerania）省的大部份也給了牠，這樣一來，波蘭就有了今日著名的到北海的『走廊』。東普魯士除掉在西北方面牠不得不放棄尼門河（River Niemen）與古里希哈夫（Kurisch Haf）的斯基爾維斯海峽（Skierwih Channel）北面的土地，實質上仍保有牠的舊疆界，為德國所有。東普魯士根據條約，與德國其餘的地方，被一條波蘭的地帶所隔分了。德國與丹麥的邊界與戰前無異，北希來斯維格（North Schleswig），則聽居民投票的結果。

和約的第三部叫做歐洲的政治條款。第三十一條至三十九條關於比利時。按照第三十一條，

德國承認『造立戰前比利時地位的一八三九年四月十九日的諸條約，不復適合形勢的要求；』所以她『允許撤廢上述諸條約』並且擔任承認任何協約國與比利時政府及荷蘭政府也許要訂的任何新條約。（註一）

按照第三十二條，德國承認比利時對『中立的摩爾斯萊特』“Neutral Moresnet”的主權，這塊微小的土地，是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所未曾分派（至少也是含糊不明）而自後向由普魯士比利時共同管轄的。德國又讓給比利時普屬摩爾斯萊特那部份，一直到里已亞拉什不爾（Liege-Aix-la-Chapelle）路之西；並且還有歐本（Eupen）與馬爾梅地（Malmedy），聽憑居民投票決定。該項投票於下六個月內舉行，結果主張歸比利時者居多數，由國際聯盟核准。割讓於比利時的土地，一起加起來，大約增加了七萬五千人。這番修改，掃除了一八一五年諸條約的含糊地方，還小有裨於比利時的經濟的與軍事的勢力。慣常住在這些轉讓的區域裏的德國人，能在轉讓後兩年中間，隨意保留他們底德國國籍。兩年滿了之後，他們便須遷回德國居住，隨身把

（註一）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止，比荷間的磋商迄無成就。

他們的動產帶走。他們的不動產准許留在比利時。假使他們願留在比利時，他們便自動取得比利時的國籍，喪失他們的德國國籍（第三十六至三十七條）。比利時對於讓與地，必須擔任德帝國戰前公債以及普魯士戰前公債的一個相當的比例（第三十九條）。德政府（第三十八條）允許歸還比政府德國當局在大戰期內取去的檔案和文件，『尤其是取自布魯塞耳外交部的。』因此這些文件如今是回到布魯塞耳的外交部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了，雖然劃着德國官吏的鉛筆痕。比利時外交部圖書館也受了德國搜索的影響；那些書沒有完全歸回。（註一）

第四十條與四十一條關於盧森堡大公爵領地。德國放棄自從一八四二年以來訂的某幾種有利於她的條約的規定。依照這些條約，盧森堡加入了德意志關稅同盟 Zollverein。普魯士獲得了盧森堡鐵道的管轄權。按照第四十條，德國特別承認盧森堡自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起，終止為德國關稅同盟之一部，放棄鐵道榨取的一切權利，並且贊成該大公爵領地中立制度的停止。

（註一）比利時外交部的圖書館員於一九二四年給我看看他們的 *Bourgeois* 的 *Mamel historique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內有一卷缺少，德國迄未歸回。

第四十二條至四十四條成立那破天荒的，雖然單方面的，萊因的廢除軍備，這地方一千多年以來向是法德人的戰場。德國在萊因左岸或右岸東向五十基羅米突的距離內（即三十一英里），不得維持或建築任何礮台。（第四十二條。）在該區域內，她不得維持（無論暫時或永久）任何軍力，並且禁止作一切軍事演習（第四十三款。）假使德國犯這些條款之一，她將被視為對簽字和約的各國犯了一敵對的行動。

第四十五條至五十條包括規定薩爾的條件。薩爾路易斯 (Saarlouis) 與薩爾勃呂克 (Saarbrück) 兩區域曾經一八一四年五月三十日的第一次巴黎條約 (First Treaty of Paris) 分派於法，又在滑鐵盧戰後，經一八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的第二次巴黎條約從法國取去了給與普魯士與巴伐利亞。凡爾塞條約制定的是：

作為法國北部煤礦被毀的賠償並且作為德國對戰事損失所負全部賠償的部份償付，德國割給法國以薩爾區域內各煤礦，其整個與絕對的所有，及其開採的獨佔權，不擔負並且免除一切債務以及任何種的費用。（第四十五條。）

薩爾區域的政府（其所轄邊疆比一八一四年許給法國的擴大得多）委託於國聯。

『在本條約發生效力十五年後，上述區域內之住民，應召集來表示願在何種主權之下。』
（第四十九條。）

管理薩爾的國際聯盟委員會由法國國民一人，非法國國民的薩爾居民一人，及法德以外其他三國國民三人組成之。委員任期一年，但得再任，並得由國際聯盟行政院罷免之。國聯行政院指定薩爾委員會的主席（附約第二章，十六至十八款。）薩爾的住民，保留其現有國籍——普魯士或巴伐里亞；倘有人願取得一異國國籍不得有何阻難，但此項新國籍之取得，同時包含其他任何國籍之喪失』（第二十七款）。在薩爾區域以內，無強迫或自動的兵役（第三十三款）。該區域屬於法國關稅制度（第三十一款）。五年內，薩爾區域裏的產物，免稅輸入德國。同樣德貨在五年內輸入薩爾專供當地消費者，亦免稅。第四十九條制定，十五年期滿，薩爾住民依市鄉或縣區投票表決，於下列三者之中擇一：（a）維持和約所成立的現行制度，（b）統一於法，（c）統一於德。國聯顧及該地居民的願望，將決定薩爾應屬之主權。如果國聯決定維持現行制度，那麼德國便須捨棄其

主權於國聯。如果國聯主張聯合於法，德國必須同樣地捨棄主權於法國。如果國聯主張統一於德，德政府必須照價用金向法政府購回薩爾煤礦（第三十五、三十六款。）舉行居民投票的手續由國際聯盟決定。

和約（第四十八款）所規定薩爾境內的人口約為六十五萬人。

第五十一條至七十九條述及亞爾薩斯羅倫，合併成爲和約的第五節。這節有一弁言：

『締約各國，認定負有道德上的義務，要改正德國一八七一年所作違反法國權利與亞羅二州民望的錯誤，當時德國不顧該二州代表在波都大會 *Assembly of Bordeaux* 提出的嚴重抗議，將該二州自故國分離。

同意於下列各條：

第五十一條把一八七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的凡爾塞條約和一八七一年五月十日的佛蘭克福條約 *Treaty of Frankfurt* 割給德國的土地，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起歸還給法國主權。按照第五十三條，凡根據任何理由，宣告爲法人者，德國擔任不得要求其爲德國人民，但所有

其餘的人，則應接入德國境內——這就是說，法國保留拒給某種亞羅人以法國國籍，而驅他們返德之權利。在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五日後遷入亞爾薩斯的德人，無要求法國國籍的權利。他們只能依據歸化而取得法國國籍（附約，第一至第三款。）

德國將該項土地交還法國，免除一切公共債務（第五十五條。）這個特權是『因為德國在一八七一年拒絕擔任法國債務的任何部份』而許給法國的（第九部，財務條款，第二百五十五條。）

依據第五十六條，法國取得德意志帝國或是德意志各邦在亞羅二州內的一切財產（鐵道包括在內。）同樣地，她取得該處『屬於前德皇或其他德意志君主的』一切財產。德政府負責償付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為止在亞羅二州裏賺得的一切年金。德國必須每年照該年份平均匯率用法郎供給必要的款項（第六十二條。）

第六十七條規定法政府佔有德帝國政府在亞羅二州內管理的鐵道，而不給費。第六十八條規定凡亞羅二州一切天然或製造品輸入德國，豁免關稅五年。德人所稱『西方的漏洞』即淵源

於此。此項輸入額不得超過一九一一至一三年的平均額。

第八十條關於奧地利、德國同意承認並尊重奧國的獨立，至於奧國的邊界則由對奧條約決定之。這種獨立，除非得國際聯盟行政院的准許，不得讓與（譯者按，即不得與德國合併之意。）

第八十一條至八十六條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國。德國承認該國的獨立，及協約與參戰國所劃定該國的邊界。第八十三條給予捷克斯洛伐克一小部份捷克人居住的上塞內西亞，即迄於托羅泊（Tropan）北部的何爾慶（Hultschin）區域。捷克國同意與協約與參戰國訂一條約，保護非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數人民，並訂一條約『保障其他各國的運輸自由和商業上的公平待遇。』爲何爾慶區域的割讓，牠並且須擔任一部份的普魯士公債。如是承認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包括舊屬奧國的波希米亞，摩刺維亞，斯洛伐克亞，奧屬塞內西亞，和向屬匈牙利的盧森人（Ruthenen）的毗連卡派新（Carpathian）的地方。在多瑙河上牠有潑里斯堡（Presburg）埠，和六十英里的邊界。捷克國在勃刺替斯拉伐（Bratislava）對面的多瑙河南岸，甚至也有幾方英里的地方。

第八十七條至九十三條關於波蘭。第八十七條參照和約前面所劃定的德國邊界，劃定了波

蘭邊界第八十八條規定由國際委員會佔領的上塞內西亞那部分地方。該地方將來在該委員會照顧之下，舉行一次居民投票，以決定應屬德國或波蘭。波蘭負擔一部份德國與普魯士的公債，除了爲德國在波蘭殖民所用者外（第九十二條）屬於故波蘭王國的公產，由新國免費取得；其他公產，照賠償委員會所估價值償付。波蘭擔任和協約與參戰國訂一條約保護非波蘭的少數人民，並訂一條約擔保其他各國的運輸自由和商業上的公平待遇（第九十三條）。（註一）

第九十四條至九十八條關於東普魯士。在阿倫斯坦（Allenstein）的隣近，以及馬林維爾特（Marienwerder）與馬林堡（Marienburg）周圍的幾部份，應在一個國際委員會監督之下，舉行居民投票。後來，這些區域投票的結果，願維持與普魯士的聯合。所以除掉馬林維爾特西北的五個村子外，都由大使會議 Conference of Ambassadors 派了給普魯士。按照第九十八條，德國與波蘭同意訂一條約，俾德國在隔斷東普魯士與德國他部的波蘭轄境上，有充分的鐵道，電報與

（註一）波蘭條約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簽於凡爾賽 Parliamentary Papers, Cmd. 223 of 1919. 第一章爲少數民族協定，第二章爲運輸與商務協定。

電話的便利；同樣的，波蘭在隔斷波蘭與但澤（Danzig）的維斯七拉（Vistula）右岸的德國地方，也應予以交通的便利。

第九十九條包含德國對於橫過尼門（Trans-Niemen）區域的放棄，其間最重要的城是梅爾（Memel）。這區域歸協約與參戰國處置，到一九二三年在某項條件下派了給立梭恩尼亞。第一百條至一百零八條關於但澤。按照第一百條與一百零二條，德國放棄但澤市周圍約七百零九方英里的地方，俾該市得以構成一小小的疆土——全體立為自由市，置於國際聯盟保護之下。自由市的憲法，由人民代表會同國聯委派的一位高級長官草訂之（第一百零三條）。協約與參戰國擔任於但澤與波蘭間議定一條約，其目的有一部分如下：（1）實行包括但澤自由市於波蘭關稅範圍之內，並且設一自由地於該埠；（2）於波蘭進出口貿易有必要時，保證波蘭自由使用該自由市境內一切水道船塢；（3）保證波蘭統轄與管理維斯七拉和該自由市內全個鐵路系統（除了街道鐵路以外），以及波蘭與但澤間的郵務電報與電話的交通；（4）規定波蘭擔任處理該自由市的外交關係（第一百零四條）。當本條約發生效力時，但澤的德國人民將喪失他

們的國籍（通常的選擇權仍予保留）而成爲該自由市的公民（第一百零五條與一百零六條）境內的德國公產歸協約國秉公斟酌轉交於該自由市或波蘭。該自由市擔負一部份德國公債（第一零七條與一零八條）。

第一零九條至一一四條關於希萊斯維格（Schleswig）普魯士取得此省所根據的一八六六年的原有條約，規定了在北希萊斯維格舉行一次居民投票。此項條款隨後雖然取消了，（註一）但是在凡爾塞的協約國，又把牠恢復了。他們的第一個念頭是希萊斯維格應分爲三個地帶，其南部地帶應包括弗倫斯堡（Flensburg）。可是丹麥人不願爭這南部地帶。因此和約第一零九條把新的臨時邊界起於弗倫斯堡東北東的十三基羅米突（約八英里），並且將該點以北之地分爲兩個地帶。照例規定了在一國際委員會下面舉行居民投票，和公民選擇權與擔任一部份德國公債。一九二〇年舉行居民投票的結果，是北部地帶派了給丹麥，而南部地帶派了給普魯士。

第一百十五條規定海里哥蘭（Heligoland）與登恩（Düne）諸島的砲台，軍事設備及軍

（註一） Mowat, 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6-1914, p. 195.

港用德國人工並由德國負擔費用去毀滅。

和約的第四部（第一一八條至一五八條）關於德國國外的德國權利（German Rights and Interests Outside Germany）。按照第一一八條，德國放棄在她的歐洲疆界外的任何屬於她或她的同盟國的領土上的一切權利，名義與特權。

第一二八條開始關於中國的各款。德國放棄從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簽訂於北京的最後議定書（Final Protocol）（即關於義和團賠款的條約）（註）取得的一切權利（中國無償取得天津漢口或其他地方德政府的碼頭、礮台與他項財產（外交與領事的住宅或辦公室除外））德國同意撤廢中國政府所給予天津漢口租界的租契；中國恢復這些租界地方的全部主權，宣布把這些地方開放於國際貿易與居住的意向。

第一五六條至一五八條是辯論最烈的山東條款。日本取得該處一切德國權利。

第五部包含關於陸海空軍備的很有趣的條款。該部冠以弁言，鄭重聲明軍縮不是當做單對

（註1） 參 Descamps et Renaux,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Traités du XX^e Siècle*, Année, 1907, p. 80 ff.

德國的片面的事。

爲要使各國軍備的一種普遍限制成爲可能起見，德國擔任嚴守下列各陸海空軍條款。

第一五九條至一六三條規定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後，『組成德意志的各邦的陸軍不得逾十萬人，括包官吏與軍器庫的設置。陸軍應專致力於境內秩序的維持和邊疆的管轄。』官吏實數不得超過四千。德意志參謀部以及一切相似的組織，應予解散，並且不得再假任何形式另行構成。德意志各邦的僱員或官吏，如海關官員，森林守衛與海岸守衛等，其人數不得多過於一九一三年擔任同職的僱員或官吏數目。憲兵數目的增加只能以一九一三年以來人口的增加爲比例。這些僱員與官吏不得集合作軍事訓練。第一六四條說：『軍械火藥與任何戰爭材料的製造，只得於曾經將地址通知主要協約國與參戰國並得其准許的工廠內進行，而且他們還保有限制工廠數目之權。』所有其他這種的設備必須關門（第一六八條）。德國不得輸入亦不得輸出軍械或任何種戰爭材料（第一七〇條）。『窒息的，含毒的或其他的瓦斯，與一切相類的液體的使用，都在禁止之列，其製造與輸入在德國境內是嚴禁的』（第一七一條）。』

第一七三條廢除普遍，強迫的軍事服役。自動應募爲下士和小兵的時期，必須爲十二年。在他們應募期未滿前解職的人數，每年無論如何不得超過總共實數的百分之五（第一七四條。）軍官至少須不斷的服役二十五年。不留在軍中的軍官須無絲毫軍事的義務。每年解職軍官的數目，不得超過總共實數百分之五（第一七五條。）除了那種爲補充業經認可的軍官數目『絕對不可缺少的』以外，所有軍官學校必須廢除（第一七六條。）『教育機關，大學校，退職軍人會社，射擊或遊歷團體，統言之，任何種的組合，毋論其份子的年齡大小，不得從事軍旅之事』（第一七七條。）

第一八〇條規定毀滅萊因展開到東向五十基羅米突（即三十一英里）之遙的地帶內的一切防禦工程。該處不得另新建築。『在東南邊疆上的防禦工程系統，應維持現狀。』

第一九一至一九七條決定德國的海軍勢力。她只許有六隻德意志（Deutschland）或洛脫林更（Lothringen）式的戰艦，六隻輕巡洋艦，十二隻驅逐艦，十二隻魚雷艇；除了擬補充正在服役中的軍艦以外，她不得建築或取得任何新艦（第一八一，第一九〇條。）艦隊全體人員不得超過一萬五千名官員與士卒。

德國海軍人員須以志願訂約的辦法招募，官吏與弁目須連續服役二十五年，小官與士卒須連續服役十二年。德國商船的長官或人員不得在海軍裏受任何訓練（第一九四條。）

德國軍力不得有任何陸軍或海軍的空軍（第一九八條。）

第二〇三至二一〇條關於協約國監察委員會 *Interallied Commission of Control*，監督軍縮條款的實行。

第二一四至二二四條關於戰爭俘虜。按照十一月十一日休戰條約的條件（第十條），所有協約國與參戰國的戰時俘虜，必須立即遣回（包括所有因犯事判罪的人。）和約第二一四條規定所有（德國的）戰時俘虜與被拘禁的平民，包括因不守紀律判罪的人，應在和約發生效力後從早遣回。自開頭時起的全部遣回費用須由德政府負擔（第二一七條。）締約各國相互地捨棄一切在本國國內戰時俘虜的維持費用的償付（第二二四條。）

第七部，『刑罰』第二二七條至二三〇條，實際上產下來便成了具文。

『協約國與參戰國以一種違犯國際道德與條約神聖的最大罪狀，公開控告前德皇霍亨查

倫威廉第二』

於是組織了一個特別法庭來審問該被告，法官共有五人，由主要的協約與參戰國各派一人充任，藉此給他在辯護權上所必需的保證。須去信給荷蘭政府，請其交出前德皇（第二二七條）。很可惋惜，荷蘭政府竟拒絕將被告引渡。以各大國最有權威的法律家，來澈查事實與文件，辯護他們的所見，這種（霍亨倫威廉的）審問，不管判決如何，自然是國際法與道德的最驚人的暴露。良好的國際關係的運動，失掉了一個大機會。

德政府承認協約與參戰國有權把被控為犯破壞戰時法律與慣例的舉動的人，提到軍事法庭；牠擔任把此項被控訴人照協約與參戰國所開的名單交出來（第二二八條）。德國對於這一款提出了抗議，但不過如對於和約其他條款的抗議一樣。因某種不可解釋的理由，協約國僅在這件事上順從了德國的抗議，並且准許在萊普齊克（Leipzig）作敷衍塞責的審問，以代替和約所定的審問。

第八部，第二三一至二四七條，是比其他一切條款置在一起還要使世界騷動的賠償條款。可

是這賠償條款的不能實行是尙待證實的。

第二三一條是所謂『戰罪』“War-guilt”條。

『協約與參戰國政府確定，並經德國承認，德意志與其盟國的責任，在於造成協約與參戰國政府和國民因德意志與其盟國的侵略，加於他們因戰爭所受的一切損害。』

這一條最使德人痛心。他們從沒有終止運動這一條的撤消，並不因為牠使他們賠償，而是因為牠使他們承認是大戰的罪魁。無疑，協約國過去相信——如今還相信——德國是大戰的罪魁。他們的見解在巴黎和會上屢次說明過，並且在協約國答覆德國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草約的批評的那封緘札 (Mantelnote) 裏，最有力的表示過。(註一) 可是和約第二三一條的明白字句，並沒有說德國有罪，只說德國擔任償付一九一四年八月由德人的攻擊或侵略所開始的戰爭所加於協約國的損失。

在第二三一條裏，協約與參戰國認知事實上德國財力不足以完全償回他們造成的全部損

(註一) 原文見 Krnus und Ködiger, I, 530 ff.

失。他們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五日關於十四點與和平條件的通牒，並沒有聲明他們無論如何不能要求戰費全部的償回。(註一)他們卻遵照了包括在該通牒裏的條件，僅規定

『德國擔任賠償在交戰期中加於協約與參戰國人民的一切損失』(第二三二條。)

但是，上面已經說過，協約國在巴黎會議上已議決戰爭年金 Military Pensions 是他們所能需索的平民損失的一部份。(註二)於平民損失之外，德國擔任償回比利時向協約與參戰國政府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為止所借的一切款項。

沒有向德國要求特定的數目，但按照第二三三條，設立了一個賠償委員會來決定賠償損失的額數。該會由美，英，法，意，日，比，和塞爾維克羅地斯，洛文國各派一代表組成(實際上美國從沒有參加過該會。)

賠償委員會關於德國必須償付的款額之決議，須於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或以前通知德政

(註一) 見第十四章。

(註二) 見第十五章。

府。

德國必須供給賠償委員會以一切必要的情報，必須供給該委員會及其職員的薪水與費用，必須給與該委員會及其正式授權的代表有如友國正式委任的外交代表在德國內享受的權利與特免權（第二四〇條。）

在賠償額的完全決定前，德國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以及一九二一年的最先四個月中間，須償付等於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的價值（第二三五條。）

第八部有附約第三號，關於以船運的形式作為賠償。

『德國承認協約與參戰國有權以噸數抵噸數（總噸數 *gross tonnage*）以等級抵等級，來抵償一切因大戰而喪失或損害的商輪與漁船。』惟是德國現存船隻的噸數，不足以抵償，協約與參戰國得接收所有一千六百總噸以上的德國商船財產。

第八部的附約第五號是很重要的，一節，乃關於以煤為賠償的交付。德國擔任每一年交付法國七百萬噸煤，為期凡十年。在同時期，德國又須交付因戰爭被毀的洛德（Nord）與派特卡萊

(Pas de Calais) 等法礦社戰前每年產量與該時期內各年產量的差數；此項再加數額在頭先五年，每年均不得超過二千萬噸，在後來的五年，每年均不得超過八百萬噸。德國擔任交付比利時每年八百萬噸煤，爲期十年，又交付意大利每年自四百五十萬噸至八百五十萬噸間之額數，爲期亦十年；此項常年交付意大利之煤，至少三分之二須由陸上運輸。在賠償委員會斟酌之下，盧森堡亦有要求德國交煤之權。所有這些煤俱由收到之協約國，照德國出礦價外加送至法比盧森堡或意大利邊界的運費償付（此項償付，自然由德國賠款內扣除。）法國又得在三年中間，收受並償付三萬噸亞摩尼亞硫酸物，三萬五千噸朋查耳 Benzol，及五萬噸柏油。

在第二節（第二四五至二四七條）裏，德國擔任歸回法國於一八七〇至七一年戰爭與此次大戰自法取去的古物 Trophies，檔案，歷史紀念品，或藝術作品。特別舉出的是那著名的西客文件（Papiers de Cergay），於一八七〇年十月十日自拿破崙第三的國務大臣羅赫（Rouher）的邸第中取去，且曾經俾斯麥命令公布了一部份。漢志國王得收回阿斯孟大帝（Caliph Othman）的可蘭經，那是由土耳其人從梅迪娜（Medina）取去，而認爲已經贈與德前皇威廉

的英政府得收回德領東非保護國遷去的馬克華華蘇丹 (Mkwana Sultan) 的頭顱；魯文大學 (University of Louvain) 得接收筆札、印刷書籍、地圖及其他貴重物件，其數目價值相當於被德國焚燒該圖書館而燬去者。最後，『爲使比利時完成兩大藝術作品起見，』德國擔任交付在一八二〇年被德國的博物院由收買或賄贈而得的兩件作品——文愛克 (Van Eyck) 弟兄油繪的神羊 Mytze Lamb 三折頁畫 triptych 的諸頁，(舊在開堤 (Ghent) 城的聖巴放禮拜堂 (Church of St. Bavon) 裏) 以及地立克波慈 (Dierick Bouts) 油繪的末次晚餐 Last Supper 三折頁畫的諸頁，(舊在魯文的聖彼得禮拜堂裏) 兩張取自柏林博物館而兩張取自慕尼克的古畫展覽室。假使德國戰勝的話，她同樣會要求這些偉大藝術作品屬於比利時的那部份。

接着有許多條款關於貿易、交通與德國大河流的國際化。

第四二八至四三三條是和約的第十四部，關於保障的。主要的保障爲第四二八條，該條規定佔領萊因河以西的德國土地以及諸橋頭，爲期十五年，自和約發生效力後算起。倘若和約條件忠實履行，該項佔領可以限制，五年後可隆 (Cologne) 區域可以撤退，(註一) 十年後可勃倫茲

(Coblenz) 區域可以撤退，十五年後梅顏斯區域，開爾 (Kehl) (斯托拉斯堡 Strasbourg 對面) 橋頭和其餘佔領下的德境均可撤退 (按現已完全撤兵)。假如十五年期滿，對於德方未被挑撥的攻擊的保障在協約與參戰國政府認為不充分時，則佔領軍隊的撤退，可以展延至視為要得到必要保障所必需的程度 (第四二九條)。假如在十五年以內或以後，賠償委員會發覺德國拒絕遵守和約中關於賠償義務之全部或一部，第四二九條裏指定的區域之全部或一部，可立即再予佔領。假如十五年的時期終了之前，德國遵行和約一切的规定，佔領的軍隊將立即退出 (第四三〇——四三一條) (註二)

末了的第四三四至四四〇各條是繁雜的。按第四三四條，德國擔任承認協約與參戰國將『與在德國一邊作戰的國家』簽訂的和平條約與附加協定的充分效力。第四三五條知照為撤 (註一) 可隆區域於一九二五年底撤退了。

(註二) 依萊因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協定，設一協約國間萊因高等委員會，該委員會有權於必要時發布法令，以取得協約與參戰國軍隊的維持，安全與必需 (Cmd. 222 of 1919)。

消上薩伏夷(Upper Savoy)的中立法政府與瑞士政府所結的協定，一八一五年條約裏關於中立的規定，『是從此取消了』。(註一)締約各國又同意認一八一五年條約關於上薩伏夷和蓋克斯(Gex)自由地帶的規定，已不再適合現在的情形，『由法國與瑞士會同訂約以解決這些區域的地位』。(註二)

和約的法文與英文本都同樣確實可靠。和約指定的時期，從批准文件存案的第一次官府報告算起。(註三)

(註一) 關於上薩伏夷閣 Mowat,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 p. 145 note 1.

(註二) 蓋克斯與上薩伏夷的豁免關稅區域，於一九二〇年由法政府取消了。一九二一年與瑞士得到關於此問題的協定，願未被瑞士人民批准。

(註三) 批准文件存案是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在巴黎舉行，官府報告上的日期亦同，全文見 Kraus und Rodiger, 見前 II, 920.

第十八章 補充條約

與德意志的媾和並沒有立刻驅除戰爭的幽靈。尤其是法國，依然創痛於最近的侵略，覺得沒有信心於德國的解除武裝，而且不相信她的東部邊疆會永不被威脅的。因此，爲法國將來的安全計，爲預防對她的攻擊以演成世界大戰計——『如經驗已充足地而且不幸地證明了的』，（註一）——美國和英國各與法國訂了一個保證條約。按照此項條約，如果德國無端攻擊法國時，美國和英國允許援助法國。該項條約應繼續有效，直到國際聯盟行政院以多數決定國聯本身能供給充分的保護爲止。該項條約須都批准了以後，纔發生效力。既然美國條約沒有批准，兩項條約都作廢了。所以美國，原想在無限的將來，牽入歐洲事件裏去，現在又抽身回到她自己的半球。威爾遜總統自己也不很熱心於該項保證條約。與他一起簽字的蓋辛，以爲這個條約表示了對於國際聯盟

（註一） 這些字見法美條約的弁言。

約第十條缺乏信任，因為第十條是保證國聯全體會員的領土完整與獨立的。（註一）可是法國人繼續主張在盟約第十條之外，還要一個保證專約；他們這種願望，終究在洛加諾公約（Pact of Locarno）裏實現了，雖然沒有美國的合作。

凡爾塞條約擔任的大戰清算，是一極大的部分，但是還不完全。與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和土耳其還得訂約。再加美國，她沒有批准凡爾塞條約，必須與各敵國另訂她自己的條約。

這些補充條約中，第一個在凡爾塞條約後簽訂的是與奧地利的條約，簽於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在法國聖日爾曼盎雷依（St. Germain-en-Laye）宮。

奧地利條約的第一部是國際聯盟盟約。第二部（第二七——三五條）解決國界。勃萊南（The Brenner）山脈成爲與意大利的國界；這樣一來，奧國使喪失了南帖羅耳，包括波琴（Bozen）與托倫特。以外她又喪失了托里斯特與意斯托里亞，以及卡勒羅灣（Gulf of Quarnero）內的大沙（Cherso）和魯新（Lussin）羣島給意大利；喪失了博斯尼亞，赫仔哥維那及大爾馬地亞海

（註一）見薩辛，The Peace Negotiations, Chap. XV, "The Proposed Treaty with France."

岸和羣島給巨哥斯拉夫；喪失了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大部的奧屬塞內西亞、和一部份的下奧地利省（Lower Austrian Province）給捷克斯洛伐克；喪失了加立西亞給波蘭；喪失了波可維拉（Bukovina）給羅馬尼亞；匈牙利完全宣告脫離。這些土地及其民族從奧國解放出來，須費大筆款項。『繼承各國（Succession States）』允出一筆捐款以償付此項費用，但總數不得超過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法郎。（註1）

類乎凡爾塞條約裏的那些公平的條文，規定了公產和割地內公債負擔的轉讓。可是意大利對於在大戰期內佔領之奧國駐羅馬使館（威尼斯宮 Palazzo Venezia），不負任何款額，（第四十條）威尼斯宮在奧國一七九七年割據威尼斯以前是威尼斯共和國的財產。

奧國的獨立非得國聯行政院的准許是不得讓渡的。未得行政院的准許，奧國擔任『不作任何足以直接或間接，或無論如何，危及她的獨立的行動』（第八十八條。）

（註1） 協約與參戰國與波蘭、巨哥斯拉夫、羅馬尼亞、及捷克斯洛伐克關於償付從前奧帝國解放出來的費用之協定。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Cmd. 458 of 1919）。

關於解除軍備，運輸條件，關稅制度，俘虜，奧國犯破壞戰爭的法律與慣例的人，私債，保險契約，以及類此種種，聖日爾曼條約大概是依照凡爾塞條約的範圍。

協約國與參戰國所定關於賠償的條件，也是十分酷肖凡爾塞的條件。此項條件開頭便說（第一七七條）奧國承受加於協約國與參戰國的喪失與損害的責任，『作爲由奧匈及其同盟國的攻擊而加於他們的戰爭之一種結果。』第一七九條規定由賠償委員會去決定奧國應付的賠償。

到亞得利亞海的自由出口許給奧國了。因此她能在前奧匈帝國割讓的區域和商埠上運輸貨物，並且享有關於運費，便利及所有其他事件的本國的待遇（第二八四，三一一條）。協約國與參戰國政府享有通過奧境的國際運輸的自由（第二八四條）。並且，捷克斯洛伐克有權可以把自己的火車在奧國若干鐵道上行駛，以達於亞得利亞海。（第三二二條）（註一）

批准了的聖日爾曼條約有三本——法文的，英文的，意大利文的。倘有差池，規定以法文本爲準，惟第一部（國聯盟約）則英法文本有同等的效力（第三八一條）。

（註一） 參閱 The Treaty of the Trianon, 第三〇六條。

與匈牙利的和平條約，是於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在凡爾塞公園傍邊托里恩龍（Grand Trianon）的長廊（Long Gallery）裏簽字的。馬耶爾人（Magyars）放棄了其以前統治的許多種族的主權；匈牙利四面八方都喪失了疆土；她縮小到僅及從前的一半。

爲了維持這種解決，所以有小協約（Little Entente）的磋商，此事多半由朋斯所主持。組成小協約的第一個文件是捷克斯洛伐克與塞爾塞維、克羅地、斯洛文國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四日簽訂的。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前皇卻爾斯謀在匈牙利實現哈勃斯般復辟以後，羅馬尼亞亦於四月和六月簽約加入小協約。卻爾斯於十月二十一日在匈牙利作了第二次有劇情的復辟嘗試。這使小協約大事活動，與匈牙利發生了戰爭的危機，直到匈牙利政府聲明答應排斥哈勃斯堡皇室全體登基，纔告了事。波蘭亦與小協約有友好關係，雖然她並沒有簽訂同盟條約。照捷克斯洛伐克、塞爾維、克羅地、斯洛文、羅馬尼亞等協定所稱，小協約的特殊目的是在維持托里恩龍條約。（註一）

保加利亞的和平條件載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路意條約（Treaty of Neuilly）。

（註一）關於小協約的來源與發展詳見 Toyube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0—23, pp. 287—303.

她保留了她在黑海的海岸線，但喪失了她所有的愛琴海岸（於希獵），又喪失了若干些微小的，然而在軍事上很重要的區域於她西邊上的巨哥斯拉夫。接受割地的國家，須負一部份保加利亞公債的責任。保加利亞承認對於她所加於協約與參戰國的喪失與損害，有賠償的義務；她允償付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法郎的定額，自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起分三十七年償清（第二二一條）。根據第四十八條，『協約與參戰國擔任保證保加利亞到愛琴海的經濟出路。』

至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在薩佛（Sèvres）簽字的與土耳其的和平條約，蘇丹既未予以批准，也就不過是有考據家的趣味而已。可是一位歐洲歷史家不妨回頭來，對於這個命運多乖的文件表示惋惜，更不妨回想那惡運跟着的歐洲和土耳其人的關係的長故事。這個條約並不像當初所想要的那樣強硬。『大戰的一個主要目的，將歸喪失，』洛其（H. C. Lodge）寫信給羅斯福說道，『如果我們最後不把土耳其人逐出歐洲，佔領君士坦丁，開為國際城市，使海峽永久得到自由。』（註一）她留了歐洲君士坦丁，馬摩拉海（Sea of Marmora）岸，和加里波利半島（Gall-

（註一）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enry Cabot Lodge, (1925) II, 539

ipoli Peninsula) 給土其人。在亞細亞，土耳其喪失敘里亞，巴勒士坦，美索不達米亞，和亞美尼亞，後者成爲一個獨立國。斯滿拉 (Smyrna) 區歸希臘管理，五年後如果當地的議會或平民投票議決歸屬希臘，就得歸於她；厥爾迭斯登 (Kurdistan) 應自主，並且如果平民投票公決獨立，可以獨立。

協約與參戰國除美國外都批准了這一切的和約。這些條約，除凡爾塞條約外，都包含一些關於保護少數民族的條款（大致相同），保障此等少數民族說他們自己的語言，信仰他們自己的宗教，並且與他們國內的多數民族在營業上及任職上，有平等的地位。少數民族保護條約也爲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與希臘所接受了。（註一）

巴黎和平會議還乘機解決了一個不關大戰的重要外交問題。斯必茨伯更島 (Spitzbergen)

(註1) Polish Treaty, June 28, 1919 (Cmd. 223 of 1919); Czechoslovak Treaty, Sept. 10, 1919 (Cmd.

479 of 1919); Rumania Treaty, Dec. 9, 1919 (Cmd. 588 of 1919); Greek Treaty, Aug. 10, 1920

(Cmd. 960 of 1920)

自從一五九六年被荷蘭航海家發見以來，慢慢的在商業上與國際事件上，逐漸重要起來。起初是佃獵，稍後是探煤，使這海島成爲俄人、挪威人和瑞典人中間角逐的標的。在大戰爆發不久之前，該三國的代表在阿斯洛（Oslo）舉行了一個會議，沒有結果。巴黎和會比較有結果，終於一九二〇年二月九日在巴黎由英、美、丹麥、法、意、日本、挪威、荷蘭與瑞典簽了一個條約。締約各國承認挪威在條約規定之下，對於斯必茨伯更羣島的主權，熊島（Bear Island）亦包括在內。主要的規定是締約國的國民從事於漁獵或實業，應享受完全平等的待遇。雖然蘇俄在一九二〇年沒有簽字於該約，她卻在一九二四年二月裏加入了。（註一）

（註一） Paul Knaphund 有一文載於 Current History Vol XXIV, No. 3 (June 1925) 名 Spitzbergen, A New Province of Norway。這個一九二〇年二月九日的條約，由挪威外交部用法文、英文及挪威文印出來
J. St. prp. nr. 36 (of 1924)。

第十九章 威爾遜總統的失敗

一九一九——二〇年的和平條約是新歐洲的根本文件。有着國聯盟約在他們的前面，他們要構成一個歐洲統系，並且是實際上更要偉大些，要構成一個全世界的政治統系，在這個世界的統系裏，國際法應該有最高無上的統治權。很不幸，這制度一開頭就有三個阻礙：美國拒絕了凡爾塞條約；她又拒絕了保障法國條約；而且她從沒有批准薩佛條約。

在美國國內對於凡爾塞條約全體到沒有什麼，但是對於第一部國際聯盟盟約發生了激戰。要說誰是國聯的創始者是不可能的：威爾遜，波喬亞（Bourgeois），斯瑪茨，西薛爾都有份。但是理想並不是新的。但丁的君主，亨利第四（Henri Quatre）的大計畫，都是一個國聯的合理計劃。這理想像羅馬帝國一樣的古老。這次大戰自然然而把這古理想強有力地顯露出來。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有一位英國議員愛牛林威廉（Aneurin Williams）印行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叫做「一個和

平聯盟與國際間互相保護的建議。』『在我看來，惟一有希望的路徑，』他寫道，『爲那酷愛和平的各國，或是其中的若干國着想，須成立一個具體的聯盟，用和平方法來解決一切他們中間許要發生的爭端；假使他們中間任何一國被人攻擊——不論攻擊的是聯盟外的國家，或是聯盟之中的叛徒——全體應採一致行動，互相保護。』（註1）

在美國國內首先有方法來爲國際聯盟立下一個計畫，並發起一個促成運動的人們，要推實施和平聯盟 League to Enforce Peace。這是一個結社，成立於一九一五年六月十七日，發起者爲幾個社會上的名人，美國前總統塔夫特 (W. H. Taft) 便是其中的首領。牠有一個有建設意義的計畫，用一種司法的裁判，來解決許要引起戰爭的問題。牠是一個無黨派的結社，雖然因爲事實上牠的領袖塔夫特是一個共和黨人，牠能從共和黨方面獲得的援助，至少不亞於威爾遜總統隸屬的民主黨。就在那天實施和平聯盟的幾個社員與威爾遜在白宮談話後，威爾遜便發表了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演說，內中他第一次公布了他的國際聯盟的計畫。這篇演說，人家認爲是

(註1) Contemporary Review, Nov. 1914 (Vol. 106, p. 629)

美國政策的革命。(註一) 威爾遜說道：『不管我們願意與否，我們是世界生活裏的參與者。』在美國加入大戰後，實施和平聯盟勸牠的社員們盡『兩個最高無上的責任：第一，打敗德國與德意志軍國主義，以謀世界的安全；第二，成立一國際聯盟，以保持世界的安全。』(註二)每一州有牠的分社，雖然在東部聲勢最盛，但是其餘各處也不少人擁護。牠是無黨無派的，牠像美洲一樣的廣闊。

因此，國際聯盟並不使美國各界覺得意外。當一九一九年七月威爾遜自歐洲歸來，他有理由覺得，雖然國際聯盟戰爭尚沒有獲勝，但是有希望得到一個順利的結果。總之，他不能忘記百餘年來美國的外交政策，是根據『國際』原則的——公海自由，尊重一切現存國家的領土完整與獨立，國際間爭執由公斷解決。當這些與同樣的原則歸在一個普通的盟約裏，令各國簽字，很難想到會被擁護他們最力的人所拒絕的。但事實正是如此。不湊巧，並且或許有些錯誤，竟使國際聯盟沒

(註一)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I. 295

(註二) 見實施和平聯盟在費列德爾菲亞 Philadelphia 城舉行全國大會(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六日及十七日)

的演講錄卷首所載的政策 Platform (*Win the War for Permanent Peace*, New York 1918)

有這個本來應是牠的最熱心而且最有力的會員國家（美國）而創始了。後來西歐各國能奮躍上前，且與南美各共和國合力使國聯底於成功，足見舊世界的之生力沒有竭盡，而對於一個高尚理想的堅決信仰，獲得了牠的結果。

有批准條約的責任的美國參議院，對於盟約裏有幾項規定，有嚴重的疑慮。共和黨在參議院裏佔多數。威爾遜和兩個在巴黎的美國和議代表是民主黨人，但第三個代表是共和黨人，第四個是一軍人。（註一）在巴黎會議期間，當盟約正在起草時，美國和平代表團的一份子亨利懷特（Henry White）於三月九日發了一個海底電訊到華盛頓的參議員洛其。該電詢問在盟約的草稿裏須作何種變更可以得到參議院的核准。參議員洛其商諸參議員魯特（Root），後者不主張答覆此項詢問，因為這樣一來便預先拘束了參議院對於國際聯盟的核准。洛其疑心威爾遜總統是這個電訊的主動者。事實上，威爾遜三月九日那天正在大西洋上，返巴黎的途中。亨利懷特自動私

（註一）藍辛與霍司二人為民主黨人。亨利懷特為共和黨人，但彼為職業外交家，大概無政黨政治的色彩。第四代表為

Tasker Bliss 將軍，係大戰時期美國列席協約國最高會議的代表。

下拍這個電給參議員洛其，而且從沒有告訴威爾遜此事。這個電訊的目的，純在於設法使草約能適合參議院的見解，並未絲毫侵犯參議院核准與否和約各部的權利和義務。（註一）

沒有知道此事，威爾遜自以為把門羅主義插入盟約後，他已經消除了參議院的主要疑慮。第二十一條爲：

本盟約並不得妨礙維持和平的國際契約的效力，如各項公斷條約或像門羅主義的地方諒解。

威爾遜回到華盛頓後，於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九日在白宮接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會談情形是完全公佈了。威爾遜受了參議員們一番極深刻的審問，他們恐怕第十條將使美國沒有選擇的可能，而捲入戰爭。第十條爲：

國聯會員國擔任尊重並保持所有國聯各會員國的領土完整與現有之政治獨立，以防禦外來的侵犯。如遇此種侵犯的任何威脅或危險之虞時，行政院應勸告履行此項義務的方法。

（註一）見 1925, Nov. 9, 懷特在 New York Times 的宣言。

威爾遜指稱第十條並未特定戰爭爲對付一個叛國的通常制裁；而且國際聯盟無論怎樣只能勸告會員們關於他們應取的步驟。第十條，他解釋道，並不包含美國方面任何法律的義務去實施國際的裁判，雖然牠包含了一個極強的道義義務：『在道德的義務裏面，始終保留一個人有自行判斷在這種環境下做那件事是否是本分之權。』可是好些參議員未被說服。他們空虛地感覺到第十條似乎把（根據洛其的有些拖泥帶水的感情話）『打發我們的孩子們去作戰的權利』（註一）轉移給國際了。威爾遜力辯國際聯盟是防止戰爭的機關，不是製造戰爭的機關，但是也徒然。洛其和許多共和黨人很懷疑。『一樁極危險的事，』洛其曾寫信給羅斯福道，『是這個謀和平的聯盟。』（註二）共和黨在參議院和衆議院都佔多數。

威爾遜決心直赴民間，中西部和西部；至於美國東部，他知道，除參議員洛其和他的徒衆外，都

(註一) Speech at the Jackson Dinner, Jan 8, 1920.

(註二)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enry Cabot Lodge, II, 547 (Lodge to Roosevelt Nov. 26,

是做他後盾的。他的朋友和醫生們都勸他不要去。他像平常那樣有禮貌地聽着，但仍維持他的決心。『我知道我快支持不住了，』他說，但是他接着道：『目擊世界現在所遇見的那個大悲劇，沒有一個正當人能打算自己個人的幸福。』（註一）那個籠罩世界的大悲劇，便是國聯盟約或許要遭拒絕。大戰前霍司大佐曾寫信威爾遜說道：『他有一種英雄之氣。我怕這是他的命運，將依附於某種與他同沉的東西。』（註二）

西方宣傳——稱之爲思想主義而奮鬥的運動將更適當——開始於渥海渥州（Ohio）的哥倫布斯（Columbus）的演說，這是中西部一個重要的鐵道交叉點和城市，時間是一九一九年九月四日。這正是經過巴黎和會的過度和長期的勞頓之後沒有好久。總統的祕書們曾擬於行程中在可洛拉多（Colorado）的大峽谷（Grand Cañon）就攔一星期。但是威爾遜拒絕道：『人民將永不原諒我，如果我在這樣所擬議的旅行中休息了。』因此自九月四日起至九月二十八日

（註一） Tammly, Woodrow Wilson as I knew him, p. 135.

（註二）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I, 134.

止，排定每日每晚他都要演說；一其他想作一百次以上的演說。這番努力毀了他，但是他的工作就只差一簣沒有完成。他勉強支持着，直到九月二十六日中風倒了。

在威爾遜離開華盛頓的那天早晨，美國律師公會的一個特別委員會同時在波斯頓開會，報告謂贊成無條件的批准，雖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芝加哥每日講壇報（Chicago Daily Tribune）那個中西部有勢力的新聞紙，在封面上有一張大諷刺畫，那位代表美國的沙姆叔（Uncle Sam）面上帶一付詫異並且痛苦的形容，正在掛一個『外國戰爭勳章』在他的胸襟上。諷刺畫上面寫道：這是他的獎賞，如果他採取國聯盟約第十條。（註一）該報用大號字標題，介紹威爾遜在西方宣傳的第一篇演詞，說：威爾遜云國聯未必可以止戰。（註二）這樣一來，威爾遜總統的坦白，反被人用了來攻擊他自己。

當威爾遜的專車於九月四日『從渥海渥流域的霧和細雨裏』駛進車站的時候，雖不怎樣

（註一） Chicago Daily Tribune, Sept. 5, 1919.

（註二） Ibid.

擁擠。可是有大批的人在哥倫布斯歡迎他。他午刻在該處向一萬三千人作他的第一次演說。同日晚在印地安拉帕立斯 (Indianapolis) 作第二次演說。在哥倫布斯他動人地說：『全世界在等着美國。在印地安拉帕立斯，他向批評他的人挑戰，要他們在國聯外另行提出一種計劃，說道：『如果許我用一種家常的俗語，我要對那些批評這條約的人說：這時候應該提出辦法來，或是免開尊口。』

翌日，九月五日，威爾遜在聖路易斯 (St. Louis) 演說，受着熱烈的歡迎。次日他在特斯夢尼 (Des Moines) 演說。這樣進行着，趣味始終不減，廣大的西部，都驚動了要來看他，要來聽他，全世界的視線都聚在他的一身。所有這些時候，威氏沒有表示苦痛，沒有表示失望，沒有表示恐懼。他給他的敵人有力的打擊，但總是公道的。他拒絕辯論：從最初起，他就宣布了他要解釋蘭明和約，不願辯論。他是文雅而沉靜，在演說之餘，像他娛樂時的樣子，怡悅高興。

總統的遊歷進行着，同時在華盛頓的反對方面也繼續增加對於凡爾塞條約的壓力。他們的警議很多——山東的解決尤其是非難的目標。但反對方面很快就集中在一點上，隨着真相畢露：

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反對第十條；他們不願冒險。他們通過一個決議，『不保證第十條所規定的各國領土的完整。』紐約時報對這個決議評道：

這個無異告訴一切尚武的國家，謂他們能照德國一九一四年所做的做去，在美國方面是如此。自然，後來我們可以干涉，像我們在一九一七年所做的一樣。所以，這全個提議是把世界回復到一九一四年的形勢裏去。（註一）

威爾遜總統從明尼梭他（Minnesota）演說到大可他斯（Dakotas）和蒙他娜（Montana）然後發生令人驚愕的布立特（Bullitt）事件。威廉布立特是一個新聞記者，曾受僱於駐巴黎的美國和議代表團。在九月十二日他在參議院委員會前證稱，威爾遜總統的國務卿藍辛本人也反對該條約——那個他簽了名的條約。布立特稱藍辛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對他說過：『我認爲國際聯盟在現時是完全無用的。』（註二）九月十三日，總統的私人祕書看見他坐在專車裏讀

（註一） New York Times, Sept. 8, 1919.

（註二） Chicago Daily Tribune, Sept. 13, 1919. also Treaty of Peace with Germany,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f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 1919), p. 1276.

布立特證明的報告。他很憤怒，覺得他受了暗刺；他覺得他自己的國務卿賣了他。雖然藍辛在致威爾遜總統的一個電報裏和在隨後出版的一本書裏解釋他自己的說話。（註一）但這損傷是去不掉的。藍辛承認自從一九一九年一月以後，他不同情於威爾遜對和平及其締造方法的見解。他合理地說，威爾遜和他都以爲辭職，將引起激動，是害多利少的。可是怎樣他能繼續佔居國務卿與和議代表的要職，或是怎樣威爾遜能够默認，至今還是一個神祕。威爾遜內閣的一位閣員在他的日記裏寫道：『根據我所聽到的種種，我心中發生了這問題，爲什麼不早一些請他走呢。』（註二）

九月十三日威爾遜總統的專車抵太平洋岸邊的西雅圖（Seattle）。成見不能減低歡迎的誠懇與熱烈。三萬人民聚攏來聽他演講。

（註一）R. Lansing: The Peace Conference (1921). 藍辛於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一日被請辭職，翌日他就辭了（見該書 p. 3）。

（註二）D. F. Houston: Diary of Woodrow Wilson's War Cabinet, in Chicago Herald and Examiner, April 8, 1926.

車站旁的羣衆裏面不作聲的人，只有那幾百個纏着「釋放政治囚犯」徽章的。這些是在西北部世界工人同盟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和其他騷動時期中被拘禁的人。(註一)

假使這些人就是美國西部反對國際聯盟的主要敵人，這事實對於參議員洛其和他的朋友們是不很光榮的。在落機山 (Rockies) 的太平洋的一方面，威爾遜總統向和約的敵人們表示妥協。這似乎有些理由，說是威氏對於盟約的保留條件拒絕考慮未免太絕對了。但九月十二日在華盛頓州的斯樸康 (Spokane) 演說，他稱他準備接受「解釋 (和約) 的保留條件」，只要這些條件不放在和約的批准書裏。批准書裏的保留條件，將遷延時日，並且或許要把和約再交到巴黎會議討論。和約外的保留條件將載在紀錄上，作為美國對於該條約含義的解釋，這就無妨。塔夫特與實施和平聯盟贊助威氏很力。但是無法轉移參議員洛其和波拉 (Borah) 對於第十條的反對。

(註一) Chicago Daily Tribune, Sep. 14, 1919.

可是威氏正在得勢，甚至在舊金山方面。紐約時報認爲該處的演說是這番遊說的轉變點。
(註一) 威氏雖然沒有使加里福尼亞州贊成國聯，但是他留了一個大印象。可是這並不能確定美國會批准這個條約。『這是一種希奇的命運的嘲弄。』克里孟梭在巴黎說道，『但是沒有美國人，國聯也能存在。』(註二)

在九月二十六日的清早，威爾遜中了風。這勞動過度的身體破碎了，和平的運動上多了個烈士。在將近一萬英里的旅途中，除了三夜外，他都在火車裏過夜，一地方演說過後，便又奔往另一地方。(註三)

如今華嚴的棟樑摧了，

冲天的烽火消滅在烟霧之中。

(註一) New York Times, Sept. 19, 1919.

(註二)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 26, 1919.

(註三) 同上, Sept. 28, 1919.

第十九章 威爾遜總統的失敗

鼓角的清聲寂然無聞。

小山上靜靜的守護人。(註一)

參議院繼續牠的漫無盡期的條約的考慮。這條約的草訂費了十六個星期，但是參議院需要約三十星期來討論牠。在白宮裏的威爾遜總統既然有病，又只能作一半工，再沒有強有力的人鼓動輿論來擁護國際聯盟了。參議院直等到一九一九年九月五日纔開始正式宣讀外交委員會的報告。十一月六日，洛其提出這條約和保留條件的修訂表，計有十四條。第一條如下：

參議院所採取的保留與諒解，應作為批准決議的一部和條件。

所有保留條件性質都極嚴重。單舉第三條便够了：

美國不負第十條所規定保持任何其他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是干涉各國（不論是否是國會員國）間的爭執之義務，或負在該條約任何條款下面為任何宗旨運用美國陸軍或海軍之義務，除非根據憲法有宣戰，或下令運用美國陸軍或海軍獨權之國會，在特殊事件裏面，以法

(註一) 這四行詩是 Sir Walter Scott 在 *Marmion* 一詩中弔英首相 Pitt 的。

律或正式決議有此種決定。(註一)

參議院中關於批准問題的辯論，繼續到一九二〇年間。一月三十一日格萊有一封信在倫敦時報披露了，他從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二〇年一月三日曾奉特別使命到美國爲使臣。在該時期內，他未能見到或是接近威爾遜總統。(註二) 威總統這種奇怪態度的理由，似乎是因爲格萊急欲美國接受該項條約，雖有洛其的保留條件亦所不計。(註三) 威爾遜就美國而論，決定與其接受保留條件，毋寧任其作廢。格萊代表首相聲稱英政府不以此項保留條件妨礙美國爲國際聯盟的會員。爲了請求英國對於美國態度的耐性與同情，格萊故寫了這封信給時報。不幸他想一秉至公，卻做了一段增加反對盟約者的氣勢的文字。格萊寫道：

如果國際聯盟盟約不改，將來代表（美國）總統出席國聯行政院的美國代表所承認的

(註一)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58, pp. 8022-3.

(註二) Amin, Woodrow Wilson (New York, 1926), p. 320.

(註三) 格萊自稱他之不能得見威氏，僅因威氏抱病之故 (Twenty-five Years, II, 206)

政策，立法機關，不予以批准，那不是不可能的。

這封信在美國引起了一個不良的印象。(註一)華盛頓報 (Washington Post) 對此有報告，所用的標題是原信沒有的。根據洛其的要求，轉載了在國會紀錄 (Congressional Record) (參議院的議事錄) 上面。(註二)洛其此舉的目的，不在於破壞該條約，而是像格萊那樣，要證明即使附有保留條件，美國也能加入國聯爲一有用的會員。洛其又獲得在國會紀錄裏印出潘恩維 (Jacques Bainville) 爲同一宗旨接見基督教科學報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訪員的報告。潘恩維代表法國人民說：『美國參議院要對第十條有保留條件以及其他的保留條件，在我們看來這是最自然的。』(註三)

洛其決議案一至十四都通過了，表決是分別舉行的，其多數自十六至六十四票不等。每個決

(註一) *Annin op. cit.*, *loc. cit.*

(註二)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59, p. 2335

(註三) *Congressional Record* p. 2337.

議案得到的平均多數爲二十八票。(註一)批准和約的決議及其形成批准的一部份的保留條件，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在參議院表決。計有四十九票贊成，三十五票反對。因此這決議歸於失敗，沒有得到必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數。(註二)

這個結果是由於威爾遜總統而然。他在參議院裏仍可命令充分的民主黨議員，足以阻止該條約，附着該項保留條件，爲三分之二的多數接受。『沒有他的運動，』參議員洛其說，『這條約今日已接受了。』(註三)二十四個屬於威爾遜自己的黨(民主黨)的參議員，投票反對這個附有保留的條約。所以這個『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人類最高尚的夢』(註四)暫告失敗了。這幾句話是在最後一天的批准辯論裏，出於一個『保留主義者』奧溫 (Owen)，一位渥克拉河麻州 (Oklahoma)

(註一)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59, p. 5422

(註二) 同, Vol. 60, p. 4519.

(註三) H. C. Lodge, Senator Lodge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15), p. 214.

(註四) 比較 C. S. Groves, Henry Cabot Lodge (1925), p. 97 ff.

的共和黨參議員之口。這位參議員已經看出威氏的勢力，將使附有共和黨認為必要的保留條件的批准決議，歸於失敗。因此美國沒有加入國聯。但是，參議員奧溫又說，『美國在適當時期內是要加入的，不管有沒有第十條，或者用不用對於第十條加以保留條件。』

既已拒絕了國際聯盟的盟約，美國於是拒絕了盟約居其中一部份的凡爾塞和平條約。因此美國於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單獨與德國，於八月二十四日單獨與奧國，於八月二十九日單獨與匈牙利分別訂立了和平條約。至於對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美國從沒有宣戰過。

第二十章 波羅的海各國

在和平條約簽訂後，歐洲有（除了若干臨時過渡政府以外）六個新的國家。此外，有幾個舊國家改換到幾乎不能認識。德國喪失了四百萬以上人民居住的領土（除了殖民地以外）；奧匈帝國喪失了三千八百萬至三千九百萬的人民。

大戰和一九一九年的條約反轉了數百年來的一種程序——即是小國併爲大國的程序。凡是根據民族的範圍的擴張像意大利，或大體根據民族的範圍的擴張像德意志，結果便成功廣大，有效率和鞏固的政治單位。但凡犧牲了民族而成的擴張，結果國內便有分化的被壓迫勢力，只要政府一軟弱，這種分化勢力便要伸張起來。大戰的勞困，破壞了俄奧兩國政府對於被壓迫種族的桎梏。在大戰期內，協約國的宣傳很活躍地助成了奧國的分解。和平條約則完成了這種分解。因此，西部和中部歐洲的面目改變了，同時俄羅斯在波爾雪維克政府下面，因爲否認牠的債務

和對歐洲社會制度宣戰，把自己擯斥於法外了。因此新歐洲與舊歐洲有兩點不同。牠包括六個新國家；牠以蘇俄西部邊疆爲止境。蘇維埃聯邦共和國還不完全限於歐洲。

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引起了該國的分解。辜爾孟在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會議上曾談及德國承認毗鄰德國東部或東北境的新『國家單位』。此種國家單位業已存在。第一個是芬蘭，在波爾雪維克黨人攫得俄國政權以後，立即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宣布獨立了。芬蘭自一八〇九年由瑞典割與俄國後，向爲一個自治的大公國，受俄皇個人的管轄。俄皇大體上尊重芬人的權利；芬人自己有參議院，就是在大戰期內也沒有被徵入俄軍。

一九一八年一月，芬人宣布在大戰裏保守中立。他們自己國裏的內戰已够他們忙了。芬蘭共產黨亦即波爾雪維克黨攻打了四個月，謀取得政府與社會的統治權。

俄國波爾雪維克黨人曾宣告承認人民有自決權，即使因此將與其所屬國分離，亦所不惜。俄人依此見解，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與德國訂的勃來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同意了放棄從利加（Riga）書至烏克蘭邊界的一條線以西的所有領土。這個協定僅僅從俄國主權下分去坎蘭，里梭

恩尼亞，與波蘭；所以如此者，顯然因為德國政府想把這些『國家單位』歸入德帝國內，或至少與德國有相當聯合的形式。（註一）提出了許多的計劃，要使德國的親王做這些新國的君主。

在波爾雪維克黨人還沒有承諾勃來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時，霍夫孟將軍已派遣軍隊佔領甚至利加以北的區域。條約訂立之後，德軍由海道載往芬蘭，在四月裏幫同平定了芬蘭的波爾塞維克黨人。德政府於是與芬蘭訂了一個商業條約，芬政府允以德皇內弟赫斯卻里親王（Prince Frederick Charles of Hesse）為國王。但是德國正在她的軍事佔領最廣，外交協約最佔優勢的時候，便在那裏崩潰了。按照十一月十一日的休戰條約，德國允諾將勃來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作廢。她在波羅的海的德意志帝國的春夢，也跟着化為烏有了。休戰條約第十二條規定德軍須撤退屬於戰前俄羅斯的一切領土。卻理親王也『表示了德薄能鮮，』不接受芬蘭的王位。（註二）

（註一）該線見 Article of the Treaty of Brest-Litovsk and Annex I 並附地圖 March 3, 1918, 載於 Texts of the Russian Peace (Washington, 1918).

（註二）“The Baltic and Caspian States”（見 the Nations of to-day），由 John Buchan 所編（1923），p. 46.

從波爾雪維克和德意志帝國兩種勢力的下面解放了出來，芬蘭立刻廁身於歐洲的布爾喬（即資產階級的）共和國裏面。她有兩個棘手的領土問題要解決，一個是與瑞典關於亞蘭羣島（Aland Islands），一個是關於她和俄國的陸地邊界。亞蘭羣島如芬蘭一樣，自一八〇九年以來，便屬於俄國。瑞典人雖不願要回芬蘭，但他們是要亞蘭的，因為那裏大多數居民是瑞典種族，說的是瑞典語言。該項爭端，根據英國的提議（按照盟約第十一條），於一九二〇年六月提交了國際聯盟行政院。行政院派了一個委員會去考查這個問題。這個委員會呈了一個報告給行政院，該院於一九二〇年九月在巴黎開會。該報告稱亞蘭羣島問題按諸國際法不屬於芬蘭國內司法權限；並稱『不管俄國在大戰期內曾在該羣島上有建築砲臺等事，一八五六年的和平條約與協定，關於亞蘭羣島解除軍備的條文，現在仍然是有效的。』（註一）國聯行政院將該問題再加考查之後，議決『承認亞蘭羣島的主權，屬於芬蘭。』

（註一）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Oct. 1920 p. 395. 亞蘭羣島協定爲一八五六年三月三十日結

奧克利米亞戰事的巴黎條約之一部份。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日，英，芬，德，丹，愛沙尼亞，法意，拉脫維亞，波蘭，與瑞典在日內瓦簽了一個條約。芬蘭擔任不在亞蘭羣島上築礮臺。在該羣島低潮標準三海哩之內，不得有任何戰備或作戰根據地之設。除戰時外，一切戰艦，如不違禁，有經過該羣島領海的自由；戰時則該羣島及其水面應視為中立地帶。為保證該地帶的中立，芬蘭在戰時得暫行埋置水雷於該處。（註一）

亞蘭羣島民的政治權利，由芬蘭與瑞典在國際聯盟行政院的代表，訂了一個協定；由行政院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會議予以許認，作為擔保。該羣島有自主權，在市鄉學校內教授的文字，應為瑞典文。（註二）

亞蘭羣島問題不僅關於中立，而且是關於自決的難題。在芬蘭三，三六六，〇〇〇人口中約佔二萬的亞蘭島人，似有合併於瑞典之意。一個特別任命的國際法律家委員會，在他們一九二〇年

（註一）關於亞蘭羣島的廢除戰備與中立化的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日的協定，見國際聯盟的 Treaty Series, Vol.

IX, p. 213.

（註二）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Sept. 1921, p. 701.

十月送交國聯行政院的報告裏，頗詆責人民自決權的無限制的要求：

因為他們願望或高興退出，便准許在言語或宗教上的少數民族，或是全人口中的任何一部分的人，有從他們所屬社團退出的權利，勢將破壞國家內部的秩序與安定，造成國際生活的無政府狀態。

除亞蘭羣島問題外，芬蘭對白海（White Sea）上一個口埠還有領土的要求。芬蘭與蘇俄正在交戰狀態之中。最後蘇維埃政府接受了芬蘭的要求，訂了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四日多彼特和平條約（Peace Treaty of Dorpat），以為解決。（註一）該條約用瑞典、芬蘭、俄羅斯三國文字，結束了戰爭，締約兩國並約定『維持將來的和平狀態與親睦鄰誼。』第四條把貝興加（Petschenga）區域和凡大（Vaida）灣上一個不凍埠給予芬蘭（在挪威與俄國中間之北岸）。芬蘭擔任在北冰洋屬於她的海岸上不作任何海軍根據地，亦不置備四百噸以上的任何戰艦。兩國在芬蘭灣的領海各自海岸起擴充為四海哩。兩國各同意擁護芬蘭灣與波羅的海中立的原則。兩國俱不要求

（註一） Leag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III, p. 6.

他們彼此交戰的賠款。芬蘭對於俄國因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戰所舉的一切債務不負責任，彼此對另一國的公債與信約都不負責任（第二四、二五條。）

愛沙尼亞，牠的首都在來佛耳（Revel），大學在多彼特，是蘇俄第二個邊境國家（次於芬蘭）。一九一八年該地是在德國軍隊佔領之下，德皇威廉曾宣稱將使該地與德意志帝國有一種永久的聯絡。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休戰條約，對於許許多多的新舊國家真是一個關鍵的日期。已經成立的愛沙尼亞臨時政府，與德國佔領軍隊，訂了一個撤軍的辦法。於是來了一個紛擾的年頭，在這十二個月裏面愛沙尼亞人零碎的與殘留的德軍戰，與俄國波爾雪維克黨人戰，與像伯爾滿大佐（Colonel Bernhardt）等投機者的流寇軍隊戰。英國接濟愛沙尼亞人軍械武器，還有一隊英國軍艦保護他們的海岸。愛沙尼亞發見了一位能幹的司令賴唐南（General Laidoner）將軍。並且在愛沙尼亞有許多反波爾雪維克的俄國人，余登尼其將軍（General Yudenitch）便是從這裏發動他對彼得堡的勇敢，有希望，但是未成功的襲擊（一九一九年十月。）愛沙尼亞人和反波爾雪維克的俄人合不上來，因為可爾加克海軍上將（Admiral Koltchak），鄧尼金將軍

(General Denikin) 和其他的俄國志士不願承認這些邊境國家的脫離而獨立。余登尼其把他進攻彼得堡的失敗，歸咎於愛沙尼亞人接濟的缺乏。

俄羅斯波爾雪維克黨人既已宣布一切人民的自決權，他們準備承認愛沙尼亞的獨立。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克刺新 (Krasnin) 和越飛 (Yoffe) 代表俄國，樸斯加 (Poska) 代表愛沙尼亞在多彼特舉行會議。和平條約便於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簽了。字愛沙尼亞不負俄國一切債務的責任。一個很堅固的邊界，根據挪伐河 (Narva) 北潑斯湖 (Lake Peipus) 及其他天然的地勢劃定了，沿這邊界並設了一個廢除軍備的區域。愛沙尼亞政府允許將來佛耳做一個俄貨進出的自由商埠。

雖有多彼特條約，愛沙尼亞和俄羅斯的關係仍不良好。如果想到所有波羅的海邊境國家 (Border States) 各自孤立時的軟弱，自然便以為有一個聯合的政策出來。可是這種趨勢僅僅表現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日愛沙尼亞與拉特維亞的一條同盟條約。這兩個國家約定，若任何一國無端被人攻擊時，另一國須出面幫助。他們又訂了一個經濟協定，同意組織兩國關稅同盟。

(註1)

向南走，其次的邊境國家是拉特維亞。牠的首都和大學都在美好的漢撒 (Hanseatic) 古城利加。一九一九年那位聲名狼籍的伯爾滿大佐便是在這地方施行他的作戰計劃。伯爾滿 (即 Avaloff Bermond) 是一俄國軍官，自稱爲俄國西部各省一切軍隊的司令官。他自行加入哥爾茲將軍 (General von der Goltz) 在波羅的區域所統率的德國軍隊。這些德俄聯軍是反波爾雪維克的，他們當時似乎志在波羅的海邊樹立德國統治，以補償該國在大戰裏所喪失的土地。到一九一九年底，伯爾滿和哥爾茲的冒險事業是失敗了；伯爾滿自己托庇於德意志。

俄羅斯拉特維亞和平條約簽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一日。(註二) 俄國無保留地承認拉特維亞的獨立與主權。該條約劃定的疆界，沒有天然的勢力。拉特維亞必須依靠其他波羅的海國家如愛沙尼亞等的合作，並須依靠國際聯盟。

(註1) Toynbe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0—23 (1925), p. 244, L'Europe Nouvelle, Jan. 12, 1924.

(註11) Leag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II, p. 212.

里梭恩尼亞本是一個大封建采邑，直到一三八五年耶吉洛親王 (Prince Jagiello) 娶了波蘭的耶特維加皇后 (Queen Jadwiga)。從那時候起，里梭恩尼亞便合併於波蘭了。

一七七二，一七九三，和一七九五歷年的瓜分，把里梭恩尼亞給了俄國，而波蘭則由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三分。在十九世紀裏，波蘭人始終保留他們的民族意識。所有的或是大多數的受過教育有政治頭腦的里梭恩尼亞人顯然都以波蘭人自視，直到一八八三年左右，纔有里梭恩尼亞的民族運動開始。(註一)

在大戰期內，里梭恩尼亞被德軍佔領了，並且被德軍的徵發和苛捐，弄得很窮乏。勃來斯特里托夫斯克的俄德條約，承認了里梭恩尼亞土地完全脫離俄國獨立，正當里梭恩尼亞要併入德意志帝國的過程中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休戰，突然倒轉了幸運的飛輪。

在德軍佔領期間和波爾雪維克革命以後，里梭恩尼亞便樹立了一個國民政府，以美麗的歷

(註一) R. H. Lord, Lithuania and Poland, 譯 Foreign Affairs (American Quarterly) June, 1928

註一：該文爲波蘭與里梭恩尼亞整個問題的最好的一篇文章。

史的維爾那 (Vilna) 城爲首都。一九一八年底德軍退出後，波爾雪維克俄羅斯於一九一九年一月把里梭恩尼亞政府驅出了維爾那，但是在同年四月他們自己（俄人）又被波蘭軍隊驅逐了出去。同時波蘭政府在那位心胸寬大的愛國志士巴特利斯基 (Paderewski) 擔任總裁之下，曾提議里梭恩尼亞和波蘭聯合——這一個聯合可以免得許多的流血與慘痛（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二日的通牒。）可是里梭恩尼亞人拒絕了。波蘭和里梭恩尼亞雙方的軍隊於是在維爾那附近打起來了。同時俄國和波蘭的戰爭沒有停止。

一九二〇年七月紅軍衝過了波蘭的防線，踏過了維爾那，直叩華沙 (Warsaw) 的門戶。里梭恩尼亞政府於是又佔領了維爾那。他們沒有在那裏很久。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四日發生了破天荒的維斯士拉之戰，波蘭、波爾雪維克戰爭的『馬恩』紅軍狼狽地被逐出了波蘭。波蘭和里梭恩尼亞軍隊又在維爾那接觸了。國際聯盟派了一個委員會趕來調停。十月七日蘇華爾基 (Suwalki) 的休戰條約簽了字。根據該約波蘭人保守維爾那以南二十五英里的一道線。但是休戰條約墨瀋未乾，波蘭將軍徐立古斯基 (Zeligowski) 率了一旅之師，越過休戰線，佔領了維爾那。徐立古斯

基的行動，在技術上是一種反抗本國政府的暴動。按照國際法或國法，他沒有什麼權威。但是既佔了維爾那，他不走。他和他的軍隊是否繼續向波蘭陸軍部領餉，那是很有趣去知道的事情。

一九二〇年底的整整一個冬季，維爾那的局面在國際法上，始終是反常的。國際聯盟派了一個委員會來接洽平民投票，並且預備要派國際聯軍來佔領這爭論的區域。瑞士政府因為這種擬議的國際軍隊，勢必要在日內瓦會集，通過牠的領土，故予以拒絕。國聯放棄了這個計劃。國聯不去舉行平民投票，而請里梭尼亞與波蘭彼此交涉，以解決他們的爭端。一九二一年夏在不魯塞耳開了談判，進行約有五個月，由國際聯盟委員海門士（Hymans）為主席。海門士的計劃是把維爾那在保證牠的自治的條件下，割歸里梭尼亞，同時又使里梭尼亞和波蘭實現一個聯邦的結合。雙方都不接受這個提議。國聯行政院於是『勞頓地擺脫這一件事情，請兩造盡力自行解決』。

（註1）

一九二二年一月波蘭政府在維爾那區舉行普通選舉，召集國民會議。該會召集之後，表決維

（註1） R. H. Lord, *op. cit.*, p. 51

爾那應爲波蘭共和國的一部分。再過了一年，維爾那纔被認爲在國際法上屬諸波蘭；最後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五日大使會議接受了這已成的事實。維爾那區人口約有九十萬，其中有十萬人據稱是里梭恩尼亞人，其餘大率爲波蘭人（但也有猶太人和白俄），至是纔算爲波蘭的土地了。

因此里梭恩尼亞國只能定都於庫扶諾（Kovno）。然而在別方面，牠卻得到了領土的利益。在北面，里梭恩尼亞包括舊屬俄國坎蘭省的一部分。在南面，牠有梅梅耳（Memel）城及其區域，這是一九一九年凡爾塞條約割自德國，經國聯的一個最高委員治下約有四年，迄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六日由各國大使會議幾經遷延的決議，劃歸了里梭恩尼亞。因此牠得到尼門河做南部的邊界。如果里梭恩尼亞沒有失掉維爾那，那麼大使會議也許把梅梅耳規定爲一個屬於國際聯盟的自由城市，像但澤那樣。

維爾那區在波羅的海領土系統裏的意義是這樣的：在波蘭治理之下，牠給了波蘭共和國一條到拉特維亞邊界的『走廊』，使波蘭與一切『邊境國家』毗連，而波蘭是存心要和他們訂立一個防守同盟的。倘在里梭恩尼亞手裏，維爾那將使東普魯士直通俄境；因爲德人經過里梭恩尼

亞比經過波蘭要容易得多。維爾那割去以後，里梭尼亞與俄羅斯便完全不接觸了。

波蘭共和國是一九一九年的條約重創的，但是疆界好幾年沒有確定。波蘭和波爾塞維克俄羅斯之間，迄一九二〇年秋天爲止，有一種戰爭狀態存在。這個長期的火併，以一九二〇年八月紅軍流星似的直搗華沙，和他們在維斯斯拉之戰同樣戲劇式的失敗，爲臻於極點。自此以後波爾塞維克人承認他們的軍力至少暫時是破碎了。俄波兩國的代表團會於拉特維亞的利加，到了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二日，便簽訂了一個預備和平條約。外附一草約，規定停戰，並以兩方軍隊間十五基羅米突（十英里）之地爲中立區。最後的和約，是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在利加締結的。（註二）最後和約第一條，簡直了當聲明『戰爭狀態已不復存在』於締約國之間。在第二條裏，締約雙方『遵民族自決的原則，承認烏克蘭與白羅宋尼亞（White Ruthenia）之獨立。這是一種間接的說法，波蘭放棄烏克蘭與白羅宋尼亞而承認事實上這些地方現在蘇維埃俄羅斯聯邦裏面。這又等於說波爾塞維克人承認烏克蘭以西的區域，即東加立西亞的區域（包括達奴普耳 Tarnopol）

（註一）

預備和約見國際聯盟的 Treaty Series, Vol. 27, p. 32. 最後條約亦載該 Series 內 Vol. VI, p. 122.

隸於波蘭國內。俄國允償波蘭三千萬金盧布，「理由爲波蘭共和國轄地在前俄羅斯帝國的經濟生活，曾積極參加過。」還加入了一項條文，謂雙方「俱不得作一切鼓動，宣傳或任何種干涉，也不獎勵任何類此的運動。」這種條文在各國與赤俄所訂的條約裏面，已成爲很普通的了。

從各方面看來，復活的波蘭從一九一九至二三年的掙扎和紛爭裏，結果可說是很好。她從里梭尼亞得到維爾那，得到東加西亞（舊屬奧）在北面，一九一九年各條約給了她在東西普魯士之間直到海口的「走廊。」這有名的地帶，最狹處，在牠臨海的地方，約有二十二英里寬，在內地，闊處達六十五英里左右。這走廊不包括但澤；牠自己在國際聯盟下面有一種特殊的制度。走廊裏的生活是幽靜的。那裏沒有大城市；人民以農爲業，雖從一七七二至一九一九年併入普魯士，並無親德的傾向。在軍事形勢上，這走廊無疑是軟弱的。在經濟上，他把東普魯士與其餘的普魯士割開，對於德國不便。可是這種不便，業經德國與波蘭（牠同時代表但澤）及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巴黎簽訂的協約而減除。按照這個協約，波蘭給了德意志在東普魯士與德國他部之間人民，貨物，船隻，車輛，郵件，電報與電話的通過自由。同樣的自由給了經過但澤的領土和領海的德貨。

德國兵士可以運過走廊，至於平常火車禁運的軍隊所有物，包括武器軍火等，每星期得對開軍貨車一次通過走廊。波蘭軍隊的輸送，可以引用同一條件，經過維斯克拉右岸的普魯士領土。

特許通車的旅客無需護照。(註一)

波蘭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三日與羅馬尼亞訂了一個防守同盟。(註二)與法國，波蘭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九日在巴黎簽了一個條約，規定兩國政府關於外交政策上的一切問題，應互相商酌。(註三)看起來，法國與波蘭似乎結了一個軍事協定，可是沒有公佈出來。

在一切波羅的海國家中，波蘭的國家意識最濃厚。她的人民甚至於對俄人在佔領時期在華沙所建的華嚴闊大的教堂，也看不入眼。因此在一九二四年波蘭政府實行拆除這正教教堂(Orthodox Cathedral)，回復牠校場的舊觀。

(註一) 國際聯盟 Treaty Series, Vol. XII, p. 68ff. 該協定是根據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凡爾賽條約的第九十六與九十八兩條而訂的。

(註二) 國際聯盟 Treaty Series, Vol. VII, p. 78.

(註三) 同上, Vol. XVIII, p. 12.

第二十一章 會議外交

一九一九至二四年是一個會議外交的時期，使人回想到拿破崙戰後的會議時期。國際關係通常是各政府間交換通牒而進行。這些通牒由大使們遞交，大使並可遵照訓令用談話補充。這種國際接觸的辦法，大使泰半是溝通的機關。

如果在談判裏面時間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交換牒文的溝通辦法是最適宜的；牠是審慎的，或許遲慢，但是穩當。然而有許多時候，牒文的交換徒然無窮。當和議條件須討論時，常有許多問題待解決，而且要迅速解決，那麼各國的元首或他們的代表就有會合磋商的必要，以個人的同意，及共同斟酌而定的相互遷就的辦法，來解決事件。

雖然會議外交在一八一四至二二年頗通行，雖然遇到其他國際大事件如巴黎公會，柏林公會，海牙會議等亦被採用，但是直到這次大戰牠纔成爲國際接觸的一種慣常的辦法。在戰前「慣

例差不多都是由中間人經手交涉——老練圓通的中間人，不是由負最後責任的人們出來交涉。』

大戰造成了各國有關係閣員們時常直接磋商的辦法，繼續迄今不但列強間如此，即小國間亦同樣採用，尤其在大戰期內創此習慣的國家更爲通用。故我們的敘述（按指議會外交）當自大戰始。（註一）

在大戰期內，協商國政府的負責領袖時常會議共同行動，交換意見，並確定政策。這種聚會常在各便利的地方舉行，但以凡爾塞爲最普通；這些會議後來稱爲最高會議。十一月十一日休戰之後，這個團體成了一種整理全歐的內閣；在巴黎會議期間，以『四人會議』或『協約與參戰主要國家』的名義，牠不僅改造了一大部份的歐洲，而且改造了一大部分的世界。巴黎和平會議的末次會議，是在凡爾塞條約交換批准以後，於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舉行的。此後，最高會議之名雖間或引用，但逐漸消滅了。最高會議本身在一九一九年各項條約締結之後，實在可以說消失

（註一） Hankey, 'Diplomacy by Conference', in the Round Table, Vol. II, p. 288.

了，因為牠的份子漸以代表其本國政府自視，而非一個『歐洲內閣』的閣員。不過以前協約國這輩首腦雖然不復以一團體自視，那集合會議的有用的習慣卻留下來下。『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的組織依然存在，不論牠的會員的遺缺和牠的見解的紛歧。

監督一九一九年各項條約的實施的每日或每週工作，交了給駐巴黎的各列強大使，他們會同法國外交部的一個代表，組成了大使會議。

各國負責的閣揆或重要閣員於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二日在倫敦舉行了一次會議。克里孟梭不復是法國的總理了。他在和會舉行末次會議的那天去職，在倫敦會議上新總理米列蘭(Villierand)代表法國出席。意首相尼蒂(Nitti)，比首相特拉克魯(Delacroix)，巨哥斯拉夫外交部長托蘭比煦(M. Trumbich)均到會。美國不復出席。

這個在唐林街十號舉行的倫敦會議(一九二〇年二月)所討論的主要問題，是阜姆，戰爭禍首及君士坦丁的前途。關於戰爭禍首，協約國起草了第二個通牒給荷蘭(第一個是於一月十五日發的)，內中建議，以荷人既經拒絕交出德前皇威廉，請他們把他送到歐洲以外的地方去。

(顯然指爪哇)對於德政府，協約國讓步，准將戰罪犯控人的審問在萊普齊克最高法院舉行，不在協約國的法庭舉行。在這種讓步之下，約有十四個不重要的人物，受了輕的處分。至於君士坦丁，決議許蘇丹與土耳其人留在該處。這個泰晤時報(Times)指稱爲『很可注意的決議』(註一)後來在薩佛和洛桑條約裏登記了。關於阜姆，協約國無能爲力。他們聰明地議決讓意大利和巨哥斯拉夫去解決，他們相信這兩個協約國必能秉公處理。(註二)該會議開到了月底。唯一的結果，即君士坦丁仍歸土耳其所有，這絕非由於法國的壓力，而是由於英國印度部(畏懼印度回教徒)加於路易喬治的軟弱的意志的影響而致。

其次的協約國會議是在意大利桑來木(San Remo)舉行，時間是一九二〇年四月的最後兩星期內。法英兩國政府已不如先前的融洽。法人懷疑德國軍人派的圖謀。三月十四至十七日(一九二〇)的『卡普政變』(Kapp Putsch)(亦即企謀的苦迭打)證實了法人的所見。雖

(註一) Times, Feb. 16, 1920.

(註二) 見本書末一章述國聯時。

然卡普博士只做了一百小時的總裁，可是共和政府在該時期內被迫離開了柏林。保皇黨人與軍人們總算是『顯了身手』。卡普政變之後，繼以魯爾 (Ruhr) 區域饑餓的工人們的斯派他 (Sparta-streik) (德國共產黨) 暴動。在征服這次暴動時，德國常備軍 Reichswehr 進入萊茵右岸的廢除軍備區域，違背了凡爾塞條約第四十二條。法政府因此派兵佔領了佛蘭克福與大姆斯達 (Darmstadt) (一九二〇年四月六日)。路易喬治對於法國此種單獨的行動，提出了抗議，通牒措詞很有點嚴厲。桑來木會議是在這種環境之下，於四月十九日 (一九二〇年) 開幕。

該會議的會場是在可愛的特伐長別墅 (Villa De Vachan)。尼蒂，他是一位胸襟寬大，或許稍帶感情的政治家，以主持會議的意政府的首相地位任主席。尼蒂和路易喬治互相維護甚力，同是主張凡爾塞條約的寬緩解釋的。英國外交部長歐重爵士 (Lord Curzon) 亦到會，他使英國政策較為切於『現實』，維持與法政府的合作。米列蘭總理代表法國到會；日本駐巴黎大使松井 (Matsui) 代表日本出席。德國常備軍挾全部軍器而入魯爾的中立地帶，使半歸擱置的德國解除軍備問題，頓形緊張。這是桑來木討論的主題之一。

除解除軍備外，委託統治與土耳其問題佔據了該會議。如今土耳其既留在君士坦丁，海峽問題自形嚴重。在桑來木，協約國同意了海峽國際化的原則。於是一種好工作完成了。可是國際聯盟拒不接受亞美尼亞（Armenia）的委託統治。這種決議也許是避免不掉的，因為國聯存立未久，殊不能保護亞美尼亞，以敵土耳其的侵略。亞美尼亞的朋友們，希望桑來木會議拯救亞美尼亞。這個不幸民族的子遺，卻交了給他們在黑海區域（托利比莊 Trebizond，埃爾仔爾魯 Erzeroum）的主人翁土耳其人及裏海上亞塞爾拜姜（Azerbaijan）的韃靼共和國的波爾雪維克人。（註一）

解除軍備的問題在桑來木引起了一些齟齬。根據凡爾塞條約，德國軍隊到四月六日須減至十萬人，但是協約國曾許展期至七月十日。魯爾事件——德國常備軍的侵入中立區域——驚動了法國人。這是對凡爾塞條約的一種違犯。路易喬治相信經濟的壓力，足以使德人恪守條約。米列朗不相信。英法兩方負責人物都相信有五十萬德人可以立即作戰。（註二）西克特將軍（General

（註一）關於 Azerbaijan, 參 O. Baldwin 的 Six Prisons and Two Revolutions, (1925).

（註二）Times, April 22, 1920.

Yon Seucke) 儘量欺哄協約國監察委員會的通告，業已暴露了一種表面標着 *Waffenmeister Komme* (武裝主人來了) 字樣的信號準備散佈了。(註二) 同時德政府有一公文到桑來木，要求常備軍由十萬人改至二十萬人，直等到德國准許入國際聯盟爲止。這要求，經米列朗的堅持，被拒絕了。路易喬治建議謂協約國從沒有與一個真正著名的德人接觸過，應請德總理來參加會議。這一個『嚇人的提議』(註三) 幾乎拆散了桑來木的集會。可是協約國諸閣揆維持了良好的社交關係，在一起吃飯，並且在會外作非正式的談話。空氣改善了。法國得到敘里亞的委託統治權了，英國得到巴勒斯坦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委託統治權了。根據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包爾福以英國外交部長的資格所發的宣言，巴勒斯坦應爲『猶太人的民族家鄉』。該會議於四月二十六日散會，仍沒有把亞得利亞問題解決。可是全體協約國具名發出了一個滿意的通牒給德國，聲稱德國必須實行凡爾塞條約所有的規定。

(註一) Times, April 22, 1920.

(註二) 同上。April 24, 1920.

這個通牒包含一個很不尋常的邀請，要『德國政府的領袖』來到一個議定的地方和協約國政府領袖商議。條約實行上的困難，也許可『因各政府領袖意思的交換，比通牒的交換，爲較易解決。』協約國閣員這樣便確定了他們所奉行的會議外交的政策。

特殊國家操縱天然財源或原料的問題，在經濟界裏，引起了意見。爲避免關於油儲藏的爭執起見，英法於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桑來木會議上訂了一種協約，規定公平分配他們的殖民地或是他們國人管轄的租讓地的生油產額。他們議定，由英法官方在羅馬尼亞磋商所得的何租讓地內，英法的利益應平均分享。在美索不達米亞，英國所得生油，應以百分之二十五給予法政府或其委任人，按照市價付值；否則英政府便須把所有開發美索不達米亞油田的公司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給予法政府或其委任人——此項股份之價值應與其他股東所付者相同。法國擔任給予建築油管經過法國委託統治地（即敘里亞）以達地中海的便利。在法國殖民地與英國皇家殖民地（British Crown Colonies）內，兩國人民俱應給以取得油租讓地的各項便利。

四月二十六日，桑來木的會議告終。德國政府不久便撤回了魯爾區內中立地帶的軍隊；因之，

法人於五月十四日開始退出佛蘭克福，大姆斯達，與哈羅（Hannau）（註1）這時候揭露了協約國在萊因的軍隊，只有一四五〇〇〇人，預防更加需要。

凡爾塞後第三個會議於五月十五至十六日（一九二〇年）在靠近希西（Hytthe）的林本（Lympe）村舉行。與會者僅有英法的閣揆和『專家』（這是近來對於技術顧問——海軍的陸軍的和經濟的——的名稱。）米列朗和路易喬治招待於培爾加（Belcaire），這是菲列普沙遜（Sir Philip Sassoon）在林本的鄉居；會議就在那裏舉行。林本會議是非正式的，僅為下一月舉行的斯派會議（Conference of Spa）的先聲。

在林本確定的英法協商（Franco-British Entente）是有極大意義的。一九二〇這年對於歐洲負責的政治家是一個極度不安與困難的時期。波蘭人，他們的東方邊境沒有議定，這時候佔據了東加立西亞，與赤俄捲入了一場大戰——在這一戰裏，赤軍看起來彷彿會衝進中歐的。斯派克黨人正風起雲湧於德國各處。甚至堅實的布爾喬的瑞士也有騷動和總罷工的威脅；瑞士當局不

（註1）Hannau 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四日為法軍所佔。

得不採取嚴厲的手段。(註一)國際聯盟既覺得無力擔當亞美尼亞的委託統治，土耳其問題更難應付。亞美尼亞的委託統治，其次請美國擔任。威爾遜贊成接受，但是五月二十八日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報告反對，跟着參議院和衆議院都同意這個報告。

在與德人在斯派的大集會舉行之前，尚須兩個非正式的會議。這兩個會議的第一個於六月二十日在林本舉行。米列蘭再度越過海峽，宿於款待殷勤的培爾加別墅。有些事件要待討論。德國各報紙曾提議舉一筆國際借款；這筆款在協約各國勸募之後，給予德國，德國便以此償付協約國到期的賠款。這個提議在這時候不大受歡迎；實在這樣的借款很不見得能於一九二〇年舉借，特別因為德國不願接受協約國對牠財政的管轄的緣故。(註三)不過，這是一九二五年陶斯計劃 Dawes Scheme 所採取的方策之一。在這個林本第二次會議上，除英法的閣員外，希臘總理威尼

(註一) New York Times, May 2, 1920.

(註二) 同上，五月二十八日，六月二日，六月四日，一九二〇年。

(註三) Le Temps, June 20, 1920.

柴洛斯亦到會。土耳其國家主義者勢力的復活，引起了近東地位的很多不安。英國在君士坦丁及其附近仍有二萬二千人在米恩將軍 (General Milne) 指揮之下；因此維持了一個溫和的土耳其內閣在朝，(註一) 但是在大戰後西歐普遍厭惡戰爭之中，無論英國或是任何協約國的衛戍軍都不能在君士坦丁永久留着。威尼柴洛斯請求法英允許他派希臘軍隊插入國家主義者基瑪耳將軍的軍隊和馬摩拉海岸的中間。英法政府恐怕又牽入戰爭，勉強地允許了。希臘人進行得很順利。(註二)

第二次林本會議後，路易喬治·米列朗和威尼柴洛斯立即渡海峽至布龍尼 (Boulogne)。意大利新大使斯福蘭伯爵 (Count Sforza) 也從巴黎到了那裏。尼蒂政府已倒，由喬涅立蒂 (Signor Giolitti) 內閣繼之。比利時和日本的代表亦出席。討論的主題 (六月二十一日) 是解除德國軍備和毀滅德國過剩的戰爭材料的必要辦法。在協約國的閣員們自信能赴斯派和德人直接談

(註一) *Le Temps*, June 21, 1920.

(註二) A. J. Toynbe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0—1923*, p. 12.

判之前，還須開一個經濟專家會議，這會議於七月二日至三日在不魯塞耳的研究院(Palais des Academies)舉行了。

在斯派會議前數日，德政府有公文致協約國，請注意德國災禍的流行。財政部長魏脫博士(Dr. Wirth)曾在國會宣稱，該年度政府財政不足二七〇億馬克。(註一)德國之有大痛苦，以及財政之愈趨愈下，是無可疑的。但是這種破產大半為德政府自身軟弱所造成，牠既不拒絕增加開支的要求，又懦弱地濫發紙幣以應付增高的開支。法國人自然說，如果德政府自陷於破產，牠決不能避免債務，惟有接收牠的產業。(註二)話雖如此，這個將臨的斯派會集頗為德人所企望，因為這是德國與協約國不復以寇讐相見的第一次。(註三)

斯派會議於七月五日(一九二〇年)開幕。德國代表是總理范倫巴赫(Fehrenbach)，外

(註一) Le Temps, July 3, 1920.

(註二) 同上。

(註三) Köhlsche Zeitung, Wochenausgabe, June 29, 1920.

交部長西蒙斯 (Simons)，財政部長魏脫。他們居於別墅旅館。協約國的代表們，如米列朗、路易喬治斯、福蘭等則住於別的華美的邸宅中，這種邸宅在那風景最佳的亞登消夏地 (Ardennes wintering-place) 非常的多。會議在德皇威廉一九一八年住過的佛倫陸宮 (Chateau de la Frimont) 舉行。技術專家們觀於在不魯塞耳搜集情報的種種便利和斯派的散漫無端，不禁嘆息。

(註1)

比利時首相特拉克魯 (Delaet) 爲會議主席。第一次會議於七月五日舉行。德總理范倫巴赫似乎是一個平談無奇的人。他任事未久，對於複雜的制裁問題的討論，自認尙未熟悉必要的詳細情節。他是個高大魁偉，年近花甲的人，有一種鎮靜，無關，及疲倦的表情。他說，他曾試打電話到柏林囑多派專家前來，但沒有成功。現在，他正試用電報去召他們來。協約國對這種冷淡漠視微有愠意。會議展期至翌日的下午。

此後在會議上德方由西蒙斯主持。德人希望斯派會議能減輕他們的負擔。這可不成。特別是

(註1) Le Temps, July 6, 1920

關於煤和軍備的凡爾塞條件，較前更爲確立堅固。（註一）

德國那樣毫無預備的來赴斯派會議，真是一件奇事。當七月六日下午四點三十分，開第二次會議時，國防部長蓋斯勒（Herr Gosler）到了。他承認德國沒有按照凡爾塞條件解除軍備。他的話是這樣的冗長和空泛，以致毫無進展，直等到路易喬治插進來，『敲敲桌子說，協約國之會集，乃是來討論確定的日期和數目，不確定是不成的。』（註二）蓋斯勒承認德國常備軍裏現有二十萬人，而不是凡爾塞條約所規定的十萬人。范倫巴赫答應實行和約——這是再確實沒有的了。『路易喬治說他對於這個答覆很失望。』德國參謀總長西克特將軍在七月七日舉行的第三次會議上，說話比較確實一些：他要求十五個月以裁減常備軍。路易喬治答稱除常備軍外，德國尚有他種軍人按照西克特將軍自己所承認，尚有一百萬軍士，和二百萬來復槍沒有下落。七月八日協約國准許德國延期六個月，以完全履行解除軍備的條件。如果迄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解除軍備

（註一） Kölnische Zeitung, Wochenausgabe, July 21, 1920.

（註二） Times, July 7, 1920.

沒有完全，協約國得佔領魯爾或德國其他地方。七月九日德國代表們對包含這些條件的議定中簽了字。

關於煤的交付，法總理米列朗聲稱在凡爾塞條約裏，德國擔任每年供給法意比三國總共三九〇〇〇〇噸；煤；賠償委員會鑒於德國的特殊困難，曾將這個總額減至每年為二一〇〇〇〇噸；可是德國只交了該額的一半。

七月十日的那次會議是紛擾和令人觸怒的。德國煤主和實業領袖斯汀斯 (Tino Stinner) 以專家資格對會場發言，發表了一篇不幸的，惱人的演說，他說到協約國『感受』『勝利的疾病』的痛苦，他藐視他們用『黑人軍隊，那有價值的政府的工具』去佔領魯爾。路易喬治 憤怒了。米列朗起來答覆，因為法國是與煤的賠償最有關係的國家。米列朗以受過教育的法國人的溫文禮貌，自稱他只向德國代表團說話（斯汀斯並非代表團中人），要請原諒。接着他要求德國提出一個每月交煤的計劃；末了他說協約國『認德國是歐洲家庭，少不掉的而且有用的一員，決定幫助她恢復元氣，只要她是同樣的決心履行她的條約義務。』（註一）

七月十四和十五停會兩天，俾協約國代表與福煦將軍討論德國的軍事制裁。七月十六日會議再開，德代表團簽了關於賠償與煤的斯派協定。賠償協定的第一條載稱：

根據凡爾塞條約第二三七條，從德國收到的賠償一項，應照下列的比例分配：大英帝國百分之二二；法國五二；意大利一〇；日本·七五；比利時八；葡萄牙·七五。

尚有賠償額百分之六·五，保留給希臘，羅馬尼亞，塞爾維克羅地，斯洛文國及其他應得賠償而未簽字於協定的國家。（註二）

按照斯派煤的協定，德國擔任在下六個月內，每月交煤二百萬噸。此項煤照德國出礦價（Head Price）加上運費起算，在德國賠款賬上扣除。為鼓勵並幫助德國礦工增加煤產額起見，收受煤的各國，在協定訂後六個月內，對交到的煤每噸給以五個金馬克的獎勵金。此款全部用於為德國礦工購買食物。協約國並允借一筆債與德國，其額數為在六個月期間內交付的德國全部賠

（註一） Times, July 12, 1920.

（註二） 全文載於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Vol. 114, p. 550.

價煤之成本價格與世界輸出價格的相差數，這筆借款，德國應按利息六分償還，至遲不得過一九二一年五月。（註一）

斯派煤協定的整個目的，端在激勵德人產煤至最高限度，以履行賠償的交付。在協定所定的六個月內，確是非常順利：德國交付的數目，與議定的總數極近。待協定期滿，德人不得不像在協定簽訂前一樣，繼續交煤，而無現金獎勵。交煤數不久就落後了，直等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賠償委員會正式宣布德國沒有履行協定。

一九二〇年間還有一個會議，那是八月八日在希西舉行的。實在這是兩個人的會議，米列朗和路易喬治，外交部長厥重爵士亦到，還有福煦元帥，威爾遜·Sir Henry Wilson 以及其他技術專家等。兩國同意幫助波蘭，看起來該國已為波爾雪維克人所壓倒。所謂幫助，便是由法政府派遣魏剛將軍（Weygand）和他的屬員隨帶軍械前往。這種幫助，以及波蘭人的自助，結果於是有八月十四日維斯士拉一役大敗波爾雪維克人的勝利。同時路易喬治急於與波爾雪維克人妥洽，

（註一） Toynbee 同前，p. 122. L'Europe nouvelle, July 25, 1920.

故法政府恰於此時承認龍格爾將軍 (General Wrangel) 的克利米亞政府，使他不免有點生氣。協商中間的小小裂口又鬧起來了。可是米列朗不復爲總理了，因爲法總統特肯納爾 (Doussanel) 患病，他於九月間被選爲總統。新總理李古 (Leybaert) 十一月來到倫敦，維持了良好的關係。

在一九二一這年裏，協約國計有六個會議。第一個舉行於巴黎，自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三十日止。白里安 (A. Briand) 始終與英國的政治家很和洽，現在做了總理。德國的賠款和解除軍備是討論的主題。關於這些問題的通牒擬就了寄給未有代表與會的德國政府。

二月二十一日，這年最重要的會議在倫敦開幕了。泰半是關於賠款問題。凡爾塞條約第二三五條規定了德國應用現金或貨物，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以前，償付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據賠償委員會核算，德國在這次倫敦會議時（一九二一年二月至三月），對於此數只用貨物交付了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左右。（註一）

再則凡爾塞條約規定（第二三三條）賠償委員會應於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或以前核算

（註一） *Forster*, 同前, p. 138.

並通知德國政府德國所負賠償的總額，並擬具付償的計劃。在另一方面，德人如果願意，協約國可以請他們『在簽訂凡爾塞條約後四個月內提出建議，以解決她在每項損失下應負的債額。』

(註一)曾經提出過幾種建議，但沒有議妥。倫敦會議的召集，便是爲討論這種事情。

會議於二月二十一日在聖詹姆士宮 (St. James Palace) 召集。西蒙斯他在斯派使人人都覺得他是德國代表中的最能幹的，如今是德方的領袖。他帶了那位勇猛的斯汀斯做技術顧問；斯汀斯是一個世界上最有錢的實業家，一個黝黑的猶太人似的，笨拙地穿着士維特 (Tweed) 呢的衣服。白里安，漂亮，挑戰的，獅子似的表情，代表法國。別的主要協約國家都有代表。那裏有希臘的總理——不復是著名的威尼柴洛斯，而是加洛格羅撲洛斯 (Kalogeropoulos)，他是如今常在調換的好些希臘首相裏的一個；還有一大隊的土耳其人，有些魁梧強有力的像他們的領袖貝克爾沙米 (Bekir Sami)，有些瘦小伶俐——或許不是土耳其種，而是土耳其官廳裏常用的許多異民

(註一)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的信，載於 Kraus und Hediger, Urkunden zum Friedensvertrage, I, 570

—1.

族的人。路易喬治，強活潑，敏感，有些爆裂性，做主席。

會議的起頭幾天，都用在調和土耳其人與希臘人，這兩國正在小亞細亞交戰。這種調解的努力是失敗了。不過白里安解決土法關於敘里亞邊界的爭執，卻成了功。（註一）賠償問題目於三月一日提出來了。德國代表們是二月二十八日到。

協約國一月二十八日（一九二一年）在巴黎發致德國的一個通牒裏，曾要求二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的總數，分四十二年償付，再加上四十一年的德國輸出貿易價值的百分之十二。（註二）德國代表團由西蒙斯領袖，與協約國於三月一日，在蘭加斯特屋（Lancaster House）會見，因為聖詹姆斯宮（St. James Palace）已作為英皇朝會之地。西蒙斯看上去不像平常的德國官僚或政客。不像普通德國人那樣圓的頭，剃光的後腦，和硬挺挺的身體，他有的是一個漂亮的橢圓面孔，一抹整潔的鬍子，一個高額，而且頭髮像個英國人，邊上分開，平滑地梳了下來。但是他的

（註一）見 *L'Europe nouvelle*, March 26, 1921.

（註二）*Current History*, Vol. 14, p. 27. *L'Europe nouvelle*, Feb. 5, 1921.

動人的形容，在斯派留了那樣一個好印象，卻不能克服三月一日他的宣言所遇到的厭惡。

西蒙斯博士開始說德國不能接受協約國一月二十八日在巴黎所提的提議，所以德政府不能不提出牠自己的提議。這些提議是，簡言之，即賠償賬單應在不久的將來由德國償付。西蒙斯根據這個觀點，接着把協約國要求分做四十二年償付的賠償額打個二折。這樣使該額數減少至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可是在上面的數目內，還要減去德國已付的貨物價額。西蒙斯定該額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或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因此德國的賬單再減少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照西蒙斯的說法，德國所能償付的已盡於此。她將舉一筆國際借款為數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這個有舉借可能的最高數）每年償付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為期五年。五年滿期之後，賠償欠額的償付辦法，如未經先前議定，就得重行考慮。（註一）

要明瞭這個提議給予協約國閣員們感情上的影響，有三件事要置在心頭的。第一點，協約國

（註一） Times, March 2, 1925.

在一月二十八日巴黎備忘錄裏要求了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二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德人僅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第二點,德方提議沒有顧到協約國在該備忘錄裏另外要求的德國輸出額百分之十二的征取。第三點,德國提議是要看五星期內舉行的上塞內西亞平民投票的結果而定。

三月三日,路易喬治用嚴厲的口吻代表協約國答覆。他說,一月二十八日協約國的提議實在把凡爾塞條約整個的要求放鬆了。『那對方的提議(德國人的)對於該約未免開玩笑。』路易喬治所以抱此見解,不僅是由於檢查這些提議本身,並且由於研究西蒙斯博士先前的演說,特別是在斯多加特(Suttgart)的演說,『那次他否認了德國對大戰的責任。』(德人老是回到這個題目上,不知破壞了多多少少次的外交上的接近努力啊!)

路易喬治繼續指出協約國對德國所負大戰的責任,必然看做一件已經判決的事情(Thesen-jugee)。協約國是不想壓迫德國的;他們認為『一個自由的,滿足的,和興盛的德國於文明爲必要。』他們並沒有要求大戰的費用,像德國在一八七一年對法國的要求一樣。『我們審慎地沒有在凡

爾塞條約裏面向德國要求償付協約國在大戰時因自衛而支出的費用，一個紙馬克。『協約國要求的不過是『對於我們各國財產所受的物質損失，和人民所受生命與肢體的傷害之賠償。』』

路易喬治於是舉出法國所遭蹂躪的數字；他指出德國沒有受損傷，她的工廠安全無恙；協約國有巨大的債務，德國內債因為貨幣跌價相形見小。而且她的賦稅比協約國輕得多，德國政府正費大宗金錢於津貼鐵道和食糧的供給。他結論謂德人是故意不履行義務，除非他們於星期一接受巴黎決議，協約國將實行制裁。

這些制裁包括萊茵河右岸杜斯堡 (Duisburg)，路落特 (Ruhrort)，和地實爾多夫 (Düsseldorf) 的估價；包括估價區域邊界上德國關稅收入的扣押，包括所有協約國人民購進德貨應償款額的一部分的扣留；包括在萊茵河上及協約國軍隊所佔領的橋頭 (têtes de ponts) 設置關卡線——在這線上的稅率，將由萊茵地 (Rhineland) 協約國最高委員會決定向輸出輸入貨物上征收，歸協約國所有。(註一)

(註一) 演說詞見 Times, March 4, 1921.

在協約國的條件與德國的提議中間，想找一可以接受的調解的嘗試，是失敗了。在星期一，三月七日，路易喬治告訴德國代表團，謂裁制將施諸實行。西蒙斯，他的時髦的『外交部』的服裝和容貌不能掩飾根深蒂固的普魯士的冥頑，他仍不能自禁在最後一次演詞中說道：『戰罪誰負的問題，用條約，用承認，或是用制裁都不能決定；惟有歷史能够決定誰負大戰的責任。』

軍事的制裁於三月八日（一九二一年）實行了。經濟的制裁也迅速地引用了。英國賠償回復條例（The British Reparation Recovery Bill）在國會通過了，於三月二十四日成了法律，使英政府可以扣留自德國輸入各貨價格的百分之五十——令德政府去賠償牠人民此項損失。協約國的關卡設立在佔領區域和德國其餘地方的中間。這些方法所得到的款額，並不小。至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止，英國賠償回復條例收進了二，二四一，〇九八鎊。（註一）

爲什麼協約國在倫敦會議上忽有那樣的斷然行動呢？據說是他們相信在德國實業家方面有一種絕對決定和毫不讓步的消極抵抗，反對他們。協約國存心打破這種抵抗。（註二）

（註一） *Times*, March 2, 1921, p. 18.

（註二） H. W. Harris, "The Conference that failed", in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119 p. 441.

斯汀斯與（英國）首相當面會於斯派，他們觀面的性質是這樣的：那位德國富豪給予首相的敏感的心上的印象，與其說是一種個性，無寧說是一種典型——那種工業貴族（Junker）的典型，像軍閥貴族一樣的驕橫殘暴，在這時候是更加來得危險。

杜斯堡，地實爾多夫，和路落特的佔據，自然在德國引起極大的騷動。同時又有一個英法會議於四月二十三與二十四日，在林本的培爾加邸舉行，與會的有白里安和路易喬治。那重要的五月一日是近在眼前，屆時德國應償付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註一）並由賠償委員會決定她全部的債務。林本會上決定，如果德政府拒絕協約國的條件，即行進佔魯爾。

四月三十日（一九二一年）協約各國在倫敦開會——白里安代表法國，耶斯泊（外交總長）（Jaspar）代表比利時，斯福閣，駐法大使，代表意大利，小林男爵（Baron Hayashi）代表日本。路易

（註一）凡爾塞條約限德國付第一筆賠款計 1,000,000,000,000 鎊，非官場的一種估計，謂到五月一日止，他共

約付出 400,000,000,000 鎊，大部分為貨物。但稍後官方（協約國）估計，謂迄一九二一年四月三十止他所

付共 384,500,000 鎊。（Times, Aug. 9, 1921; 並閱 Hansard）

喬治爲主席。會議在唐林街十號舉行。既然德政府已由西蒙斯在上月著名的倫敦會議裏拒絕了「巴黎條件」，這些條件的提議作爲無效，如今由賠償委員會所定的總額代之。這個數目要小得多，共計六，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亦卽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協約國在會議上議定，在實行佔據魯爾之前，他們准許德人有六天的考慮。協約國的條件又涉及戰爭禍首的審問和軍備的解除。（註一）法國公衆對於這六天的情面，深爲失望，他們原盼望一俟賠償委員會在五月一日宣佈德國不履行義務，就加以制裁。

在這個哀的米敦書發出前，范倫巴赫總理和西蒙斯博士的政府已經倒了。牠的賠償政策的失敗，以及上塞內西亞大部分將喪失於不久便要舉行的平民投票的形勢，使他不能站住。沒有人願意擔任德國總理的任勞任怨的職務。愛培爾特總統（President Ebert）僥倖請到了魏特斯博士擔任組閣。魏斯是一個羅馬天主教徒，中央黨黨員，前財政部長。他已經六十二歲，有好的決斷力，總是趨向緩和，重公義，愛國家。五月十日他組成了一個內閣。當晚他向國會提出對協約國哀的

米敦書簽字與否的議案，結果是命他簽字。結果在困於長期煤礦罷工，各業凋敝的英國是歡慶非常，如釋重負；英國人民都以為對德再行進兵徒然遷延了歐洲的經濟復元。法國認為協約國方面應以全力促軟弱而有好意的魏斯政府履行對德所提出的要求之責任。（註一）

魏斯政府開始牠的工作。牠努力按照規定額數，交煤於法比意三國，成效很好。在解除軍備方面，牠也努力照規定的步驟做了，不過成效沒有那樣好。五月二十三日，一個被控為違犯戰時法律和習慣的兵士，初次開審於萊普齊克的高等法庭。七個穿紫袍的法官，審一個圓頭的德國軍曹，這人對於訴訟的進行是又氣憤又莫名其妙。他虐待了一個拘禁營裏的英國俘虜。他如今被判了十個月的監禁。

按照（一九二一年）五月六日德國同意的哀的米敦書，德國應發行三種公債票（稱為A, B, C, 公債），票面總值為六,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這便是賠償委員會所定德國的全部債務數額。在那些公債未收回以前，德國自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起，每年應償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註一） Le Temps, May 12, 1921.

鎊（分季交付），外加她的輸出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五。業已過去的第一第二兩季的款額，應於五月三十一日交付。

第一批五〇〇〇〇〇〇鎊的款額，確於五月底交清了。另一批五〇〇〇〇〇〇鎊的款額，在八月底交到賠償委員會。這兩次的繳款，顯然竭蹶了德政府的財政。五月三十一日馬克價值約二四五抵一金鎊。六月底爲二八〇；七月底二九五；八月底三二五。將來的形勢更不能擔保。政府支出超過收入之大爲記載所未有。自從四月一日起，收入總共有一五〇億馬克，支出達三八〇億。協約國固然不肯坦白承認德國已竭盡了收入的來源，卻不能否認德國財政是在危急之中。（註一）要在交易所（*Bourse*）購買外國匯兌，是一天比一天困難。（註二）德國解往賠償委員會的款子不見得能够源源持久。

六月十九日英外長厥重，法國白里安，和巴黎的意大利大使，爲了希土戰爭，有一會議。停止雙

（註一） *Le Temps*, Aug. 24, 1921.

（註二） *Kölnische Zeitung*, *Wochenausgabe*, Aug. 24, 1921.

方作戰的努力，歸於毫無結果。（註一）

八月八日，有一個相傳爲大戰結束後最重大的巴黎會議。該會所處理的是德國的解除軍備，戰爭禍首的問題，希土間的戰爭，奧地利的形勢，以及上塞內西亞。所有協約各國的代表都到了，在法國外交部會議，美國駐英大使哈維（Harvey）也代表美國列席觀察。會議的結果是『此路不通』。按照凡爾塞條約第八八條，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上塞內西亞舉行平民投票了。十一分之四的人民投波蘭票，十一分之七的人民投德國票。（註二）英國八月裏在巴黎的提案，主張分上塞內西亞四分之三給德國；反之，法國的提案差不多要把四分之三給波蘭。（註三）雙方面都宣稱工業區域不應分開——英方從德人的觀點出發，法方從波蘭人的觀點出發。不論英法代表間有極好的私人關係，不論克利隆飯店（英首相所居）的招待，和路易喬治白里安的長談，也不論全

（註一） *Le Temps*, June 20, 1921.

（註二） 票數計波蘭 469,000 德國 707,000 郡縣的投票計波蘭 678, 德國 844 (*Times*, Aug. 9, 1921)

（註三） 圖見 *Times*, Aug. 10, 1921.

體代表到浪波列 (Rambouillet) 拜訪了總統米列蘭，終沒有得到調解。八月十三日會議告終，塞內西亞的問題送給國際聯盟去解決。有人想這次會議（實在就是戰時的協約國最高會議）的失敗，也許就是國際聯盟的機會。（註一）交給國際聯盟，免了協商間的破裂。（註二）

國際聯盟行政院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公布了牠的決議。牠劃了一條分界線穿過塞內西亞，這條界線是英法意見的調和，但是比較上是傾向英方的。（註三）雖然這判決割開了格來維茲 (Gleititz)，巴屯 (Bautzen)，和加士維茲 (Kattowitz)（授與波蘭）那個『工業三角』，卻規定了這條分界線（亦即國界）在十五年内對該平民投票區的天然物產不得徵稅。（註四）

其次的一個會議，乃是一九二一年最末一個會議，自十二月十八日起至二十二日止在倫敦

（註一） 圖見 Times Aug. 13, 1921.

（註二） Le Temps, Aug. 13, 1921.

（註三） 判決書及地圖俱見 Times, Oct. 12, 1921.

（註四） 上塞內西亞問題之詳細而有利於德方的分析見 Osbourne, The Upper Silesian Question (1921)

舉行。該會開時華盛頓會議猶未散場。白里安這時仍是法國總理，華盛頓會議初開時曾經出席，十二月一日他回到了巴黎，如今又到倫敦來和路易喬治討論賠償問題。協約國漸漸看清了德政府或許不會償付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應繳的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賠償委員會到過柏林，並且於考察德國的情形後，曾用通牒力勸德政府『儘量設法取得必需的國外匯兌數額；或向擁有此項國外匯兌在手爲人所共知的本國人民，或向外國借貸人取得之。』

收到這個通牒不久，德總理魏斯即通知賠償委員會稱德政府無力償付按照一九二一年五月倫敦表上所定一月十五日（二千五百萬鎊）和二月十五日（一千二百五十萬鎊）到期的賠款。

即使用盡方法，不顧牠自己預算的需要，德政府除貨物的交付及賠償回復賬上的收賬以外，籌不出一五〇或二〇〇兆金馬克以上的按期攤款。（註一）

換句話說，德政府是破產了。世界聞名最大帝國之一，竟不能應付牠國內的開支，並且得不到

(註一) Times, Dec. 16, 1921.

一千萬鎊以上的借款了！白里安和路易喬治於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倫敦討論這種形勢，也只有決議在下月再於康尼斯（Cannes）舉行一個大會議。在一九二二年底，馬克跌至七九〇換一金鎊。

赴康尼斯會議的各國代表於一月四日絡續到齊了。協約國全體到會。美國有一個『觀察人』英法比意都由他們的總理以及其他閣員大臣們代表。英國的代表團尤其是顯赫：除路易喬治外，還有外交部長厥重；另有其他三個閣員在康尼斯或其附近。會議在海員俱樂部 Cercle Nautique 舉行，這個俱樂部是堂皇的門楣和壯麗的房間，配得上這個時機。賠償的問題，法國的安全，普遍的不侵犯公約，俄羅斯的恢復和牠的回到歐洲國家系統裏面，以及全歐經濟會議，是康尼斯會議的主要序目。會議的目的在『消除歐羅巴制度的瘋癱。』（註一）除各政治家間的私人話談外，正式的會議於一月六日開始，於一月十三日告終。

賠償問題討論的結果是召德人前來與會。德外交部長拉生洛博士（Dr. Rathenau）於一

（註一）、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的決議，全文見 Times, Jan, 7, 1922.

月十一日蒞臨，但當晚白里安到巴黎去對付一個鬧潮去了。他到後就辭了職（一月十二日）。新總理是前總統普恩加賽，他於一月十三日履任。出席會議的代表同日前赴康尼斯。拉生洛和他的同僚曾出席會議，並且使會上相信關於一月十五日與二月十五日到期的現金償款，必須許德國展期。（註一）會上又決議組織一個國際的新迭加（Syndicate）（企業聯合），與各國的新迭加（C. I. N. O. A.）舉行的會議。（註二）

康尼斯會議在經濟方面有些結果。德人的償款展了期，俄人到了庚洛亞。可是那擬議的國際新迭加並沒有成立。不侵犯和法國安全的問題，必須等到後來解決。安全問題的解決離成功不遠。

流產的一九一九年保障條約，事實上法人並不喜歡。「牠是片面的，屈辱的，」這話是白里安

（註一） Le Temps, Jan. 12. 1922.

（註二） 此爲在康尼斯最高會議採取之決議。

後來向厥重說的。(註一)牠只要英國(和美國)去協助法國；但是牠沒有提到法國要協助英國的任何義務。然而路易喬治一九二二年在康尼斯準備訂的條約仍是這一種。他願意和法國訂一條約，規定「如果德國無端侵略法士，英國人民必出兵助法。」(註二)他想輿論不容許他作更寬泛的協定。

這個建議被白里安拒絕了，他在他的答覆裏說「在法政府心目中，任何防守條約，必爲屬於雙方面的性質。」他指出謂，觀於戰爭的新方法與新機械，英國的地位也未必不可動搖，反之，或許有一天她會歡迎法國幫助的保證。

同時法國輿論界與法國國會大爲驚訝，深恐白里安喪失了關於賠償與安全兩項法國的利益，把他召回巴黎，隨着褫去了他的職權。等到一九二四年與英國擬訂的條約的官場文件，印行之後，白里安的政治手腕及他的堅持法國利益，纔得大白。

(註一) Dec 5, 1921. 見 *Parliamentary Papers, France, No. 1, 1924*, p. 108.

(註二) 同上 p. 116.

康尼斯會議的失敗，對於歐洲所有的友人們，自然是一大失望。一個法國刊物譏諷地說道，看得見的結果，只有一個，便是法國因慇懃招待費去了六百萬法郎（一二〇〇〇〇鎊）（註一）

協約國在康尼斯決定召集的庚洛亞會議於四月十日在山基阿基阿宮（Palazzo di San Giorgio）開第一次會議。到會有二十九國的代表，蘇俄在內，但無土耳其。

會議的主席自然是做主人的意大利首相法克他（Signor Facta）。路易喬治帶了大批僚屬代表英國出席，但是沒有法國總理在庚洛亞。普恩加賚顯然已經決定他對其他政府意見能够接受的程度；他再不肯放鬆一步。他的外交政策的原則既經這樣固定了，他最好還是在巴黎指揮。他派司法部長巴士（Barthou）帶了很嚴密的訓令來到庚洛亞（註二）法國公衆對於這個會議也少信任，而且不免爲羅馬教皇庇亞斯十一世（Pius XI）四月七日寫給庚洛亞大主教一封信的態

（註一） Times, Jan. 14, 1922.

（註二）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Conférence économique internationale de Gènes (French Yellow Book, 1922)

度所騷動。教皇『對於第一次在這個光榮的城市，使勝敗兩方聚集重開和平，討論的第一次國際會議的時機，』表示愉快。他表示他希望『各國代表將願意用一種不僅是靜肅而且是要在公益的祭壇上作犧牲的精神，來考慮全人類受苦的惡劣環境。』對於以上的話，沒有人能反對；但是隨後的話似乎是在批評法國：『所不容忘懷者，即安寧之最好保障，不是槍砲如林，而是相互信任和友誼。』

這個信，產生了若干的惡感，會議開後更見增加。法克他致開幕辭，路易喬治接着解釋康尼斯決議召集庚洛亞會議的由來。他開頭（忘記了維也納會議）說這是『在這大陸上空前最大的歐洲國家的集會。』他繼稱邀請的各國在庚洛亞定下的條件，『同樣的實施於一切國家。』這些條件是向來為一切文明社會所承受為國際善意的基礎的。他們本身便是光榮的。他們為國與國間的任何交際所必要的。他們並不損害國家的完全主權。我們自己全然承受他們。他們是我們答應與別國交接的惟一條件。我願用兩三句話述其梗概。

第一是當一國對另一個或其人民因受到價值而負有契約上的義務時，無論這一個國家的

政府改變，那契約於該價值未償回前，不得否認抵賴。

第二是任何國家不得對另一國的制度施以攻擊。

第三是一國不應對另一國的領土作侵略的行動。

第四是一國的人民在另一國的法庭裏，應受大公無私的裁判。

在巴士的演說之後，德總理魏斯博士發表了一篇『三國文字不能瞭解』的演說（註一）其次就是其克林（Tchitcherine），俄國的首席代表。他穿了正統的『早晨』服或稱黑尾服，這種服裝已經代替了雙行鈕對襟大衣 redingote 的大禮服，算是外交家和政治家們的衣服了。他看來像一個活潑的『布爾喬』，但是他的表情缺少歐洲政治家們晤面時的顯而易見的溫和自然。他的面目間若有憂鬱驚心不安似的，不過毫沒有自覺卑下的意思。有時候裝作神聖，始終帶一點傲慢，他進行引着會議東向波爾雪維克的星辰。他用高的鼻音，宣讀一篇預備好了的宣言，先是用法語，再用英文讀出。他的演詞大半是無懈可擊的，例如他說到戰爭的耗廢：他不過在回響千百年

（註一）全文見 Times, April 11, 1922. 魏斯用德文演說，他的演說譯成了法英兩國文字。

來不辯自明之真理。但當他宣布他對波爾雪維克主義的信仰，而且差不多同時說起世界經濟改造的前途時，他是時時有失脚的危險的。他的保證太普通了。蘇維埃政府『新近的決議』他說，給予布爾喬國家的貿易充分的法律保證；在互惠，權利平等，完全承認蘇維埃現行政制的基礎上，『俄羅斯自動準備開放她底邊界，以創造國際溝通的道路，且貢獻千百萬畝世界上最肥沃的良田，以供開墾。』（註一）他提議委派技術委員會去定出世界經濟建設的計畫。軍備應加限制，『雖然本共產黨員的立場，他們認為俄國以外的現行社會制度延長一日，戰爭與經濟危機的原因即一日無祛除的可能性。』（註二）

這一點使法國的巴士站了起來。庚洛亞會議根據的是康尼斯的方針，軍縮是不在其內。如果俄羅斯提議在會內討論軍縮，法蘭西的答覆是一個『確定的，絕對的，最後的，決然的否字。』（註三）

（註一） Times, Aug. 12, 1922.

（註二） 同上。

（註三）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1922.

波爾雪維克人討了便宜。如果他們能得列強承認他們的政府，那是（對於他們）再好也沒有。假如不然，他們無論如何獲得大放厥辭的機會。

庚洛亞是波爾雪維克人的大機會。代表們在那些繁華的街道和最奢靡的酒館裏成了熟客。拉可夫斯基 (Rakowski) 給新聞記者的日常會面，到的人最多，許多波爾雪維克政策的『生動的談話』就這樣披載到布爾喬的報紙上面去了。四月十四日路易喬治把波爾雪維克代表團邀到寓所裏吃飯，在那亞爾培別墅 (Villa d'Albetta) 裏，他們討論到俄國的債務。就在這時候波爾雪維克人提出了他們驚人的『承認』債務（約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的計劃，反向協約國要求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以賠償亞長格爾戰役 (Archangel Expedition) 以及但尼金 (Danikin)、可爾札克 (Kolchak) 和龍格爾 (Wrangel) 諸戰中協約國加於他們的損害。

(註一)

(註一) Times, April 17, 1922. 數字係按李維諾夫與 New York Times 報訪員談話所述，計俄國負債爲 5,000,000,000 金法郎，但其反要求卻有 125,000,000,000 金法郎。(New York Times, April 18, 1922).

亞爾培別墅聚餐以後不久，會議的驚人消息就傳來了。據稱德國和俄國的代表團，利用他們出席庚洛亞的機會，簽訂了一個承認和通商的條約。這條約由拉生洛與其克林於四月六日，星期日，在庚洛亞東南十八英里半的拉派洛 (Rapallo) 簽字，並在翌日德代表團的官報裏公布了。這條約被認為簡直是向歐洲挑戰。

四月十八日，召集這會議的五強代表，與小協約國家（捷克斯洛代克，巨哥斯拉夫，羅馬尼亞）（註一）的代表，以及波蘭，開了一個會，草了一個通牒給德人。這通牒聲稱『德國一邊參與根據康尼斯規定要和俄國磋商歐洲和平的委員會和分委員會，一邊該委員會裏的德國代表卻在他們同事的背後，和俄國秘密簽了一個條約，所關涉的問題正是他們已擔任要和他國代表們忠誠會同考慮的問題。』這個通牒結束稱，德國既自行與俄訂立協定，不得再參與關於俄國和其他國家訂立協定的各種討論。有了這個諒解，會議繼續進行。

（註一）小協約的條約簽於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與六月七日，條約規定如有一國無端被匈牙利攻擊，其餘諸國

這會議分明是不順利。蘇維埃政府要外國金錢來恢復牠的毀敗的實業，而得不到。除德國外，其他國家不能和俄國意見較前接近。在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從遠處用無可掩飾的厭惡來觀察會議動靜的普恩加齊，在巴勒杜克 (Barle-Duc) 宣布了他的政策。這簡直就是凡爾塞條約。『我們今日所要求的一切，是這個條約的執行。』他提及德國方面的危險和拉派洛條約。德人對大戰全不悔禍，他們依然在相機推翻凡爾塞條約。五月三十一日的日期是近了，那時德人必須承受或拒絕賠償委員會定下的條件；假使德人不履行，

協約國為保護他們的利益起見，有採取辦法的權利以及義務，這種辦法如協約國間能會同採用施行，無疑是最好不過，但是按照凡爾塞條約的條款，任何有關係的國家，得於必要時採行，德國按照該約不得認為是戰爭的行為。

如是普恩加齊已經逆料到魯爾的佔領，並且宣布了法國有單獨行動之權。路易喬治覺得這種宣言甚非維持協約國內『合作』之道。(註一)庚洛亞會議的命運完了。協商的命運好像也完了。

(註一) 此為英首相私人秘書 Sir E. Grieg 之宣言發表於 Times, April 26, 1925.

四月下旬，財政的代表和顧問們正在草訂與蘇俄恢復常態關係的條約。草約於五月二日就緒了，當即交了給其克林（註一）但在蘇維埃政府簽字與否尙不可知的時候，比利時政府已經宣稱牠不能接受這個草約。巴士被召回至巴黎，五月三日出席法國內閣會議。他也授命不簽字。因此與蘇維埃政府的庚洛亞協約流產了。牠泰半是英國和意大利的勞績，並且代表路易喬治要使俄國回到歐洲政團裏的最大努力。這個草約的失敗似乎是不幸的，因為牠規定了俄國應償付債務。牠壓制了狡猾和惡毒的俄國反要求，而且只要蘇維埃政府忠實履行該約，牠可以使俄國走上繁榮和與歐洲合作之路。但是即使比法簽了此約，牠仍等於廢紙：因為蘇維埃拒絕了牠。（註二）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九日，在各代表一般的疲乏中間，庚洛亞會議宣告終了。牠有一個決議，定於六月二十六日在海牙召集一個經濟專家會議，藉以再行考查歐洲可能的經濟的恢復。在這個

（註一）全文見 *Temps*, May 4, 1922.

（註二）俄代表圖答覆全文見 *Le Temps*, May 13, 1922; 又 *Papers relat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t Geneva* (Parliamentary Papers, Cmd. 1667 of 1922) p. 38.

時期內會議各國，尤不互相攻擊。從未來的海牙會議閉幕後算起，以四個月為期的不侵犯公約，便是庚洛亞會議惟一堅實的結果。牠或許免除了波蘭和俄國間的一場戰爭。（註一）這公約裏包括的規定，已經包含在國際聯盟的盟約裏；不過俄德是不在國聯裏的，也加入了這個約有六個月時效的公約。其時歐美報紙上始終不斷的報告，謂俄德的拉派洛條約附有一個秘密的軍事協定，但沒有找到證據。

（註一）Leading Article in *Washington Post*, May 13, 1922. 不侵犯公約全文見 *Parliamentary Papers*, Cmd. 1667 of 1922, P. 50. 海牙會議曾經舉行，但因俄國內外人私有財產問題無結果。

第二十二章 華盛頓會議

卻爾斯，意文斯，休士 (Charles Evans Hughes) 這位在一九二一至二五年哈定 (Harding) 總統的內閣裏的美國國務卿，是華盛頓會議的創議人。這是他的創議，抓住了一個時機可以召集會議來限制軍備，並且使牠有確實的結果。

七月八日，由美國總統的授意，國務院非正式詢問英，法，意，和日本，問他們是否贊同在華盛頓舉行一個會議，討論軍備的限制，至於會期則由大家同意決定。這個詢問附稱軍備限制的問題，分明對太平洋和遠東問題有密切的關係。這個提議被接受了，正式的請帖於八月十一日發給四強，還有比利時，中國，荷蘭，和葡萄牙都被邀參預該會議關於太平洋和遠東問題的討論。該會定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即歐戰休戰節日，在華盛頓舉行。(註一) 代表們於協定的日期聚集了，但是爲了使他們能赴亞林頓墓地 (Arlington Cemetery) 參與無名英雄的葬儀起見，該會延至

十一月十二日纔開幕。會議在獨立紀念館 Continental Hall 中舉行。

會議進行由哈定總統開幕。

由英國總代表包爾福的提議，議決美國國務卿許士爲會議主席。設立了兩個委員會，（一）五強（美，英，法，日，意）代表組成的委員會，討論軍備問題，（二）九國（外加中，比，荷，葡）代表組成的委員會，討論太平洋與遠東問題。

兩委員會的工作沿平行線而進，各不相礙，有所決議各自隨時報告於全體會議以備採納。每一委員會得設必要的附屬委員會以應付技術問題和擬稿事宜，故提出會議的一切問題咸能依最敏捷之途，作澈底的考慮。（註二）

(註一) Conference on Limitations of Armaments, Senate Document No. 125 of 1922, p. 3; Conference on Limitations of Armaments, Sessional Papers of the Dominion of Canada, No. 47 of 1922. 這些文件分別包含英國及坎拿大代表團的報告。

(註二) Senate Doc. 125 of 1922, p. 9.

這兩個委員會開會禁止旁聽，但於每次會畢向各報紙發出一個官報『大概說明委員會裏經過的種種，並且指出曾經注意到的任何重要事件。』（註一）該會議的全體會議共有七次，而且是公開的。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的末次全體會議上，該會議所認可的條約都簽了字。除構訂這些條約外，還乘列強和其他關係各國出席的機會，解決了若干當前的懸案，雖然這種懸案並不在會議本身範圍之內。此類懸案中，有日本在山東的權利，及美日間關於雅普（Yap）島的爭執。會議的正式語言是法語和英語；在各條約與各決議裏兩種文字本俱有效力。（註二）

限制軍備的問題在會中早就弄明白了。『一開頭就認定了要在這次會議裏規定陸軍的限制是困難的，倘使不是不可能的話。』（註三）在英美兩國方面，這種困難是沒有的。美國陸軍自大戰後早已裁至十六萬人；至於英國（印度陸軍在外）已減至十五萬四千人，此數普通認為是最

(註一) Senate Doc. 125 of 1922, p. 9.

(註二) Report of the Canadian Delegation (Sessional Papers 47 of 1922, p. 11).

(註三) Report of the American Delegation (Senate Doc. 125 of 1922, p. 13).

小限度了。(註一)意大利代表稱意國已把陸軍裁至二十萬五千人，並且還擬再加裁減；不過他說必須『考慮到戰後新創或改形的國家的軍備』。這是昭然若揭的指塞爾維亞和匈牙利的軍隊。日本代表說：『一國陸軍的大小應決定於牠的特殊的地理形勢和其他環境，而這種基本因素是錯綜複雜到差不多無從作一最後的比較。』白里安總理爲法國說話。他說，法軍業已減去三分之一，而不久將減至一半。如果列強願意分擔法國的危險，尙能再加裁減。法國並不希望其他強國方面作這一種犧牲，但是，他再說：『如果法國還是孤立，諸君不要否認她因保障安全起見而需要的東西。』美國代表團的報告說：『進一步的考慮更分明見得這時要有限制陸軍的協定是不成的。』

(註二)

論及限制軍備的問題，美代表團舉出兩個原則：一個是『困難的核心在海軍方案的競爭。』競爭不僅是引起戰艦數目的繼續增加，而且是引起繼續增加戰艦體積的。『因此只要繼續的能

力存在一天，這競賽將繼續一天。』惟一停止競爭的辦法是停止現在建築中的戰艦。這點將牽涉到很大的犧牲。美代表團所提第二原則是『任何海軍強國不應令單獨作這種犧牲。』

除非包括法意在內，任何限制軍備的協議是沒有效力的。同時大家認為不能希望這兩國因為一個限制海軍的相當協議所要求，而為充分的犧牲。『可是這種犧牲能够合理地望之於美，英，日三國，而這三國正是在實際上作造艦競爭的。』美國的計劃基於四個普通原則的施用：（一）一切主力艦（註一）建造方案，無論為實際的或設計的，應該放棄；（二）應從若干舊艦的廢棄，着手進一步的裁減；（三）在大體上應注意到關係各國現有的海軍力；（四）主力艦的噸數應用作海軍力的測量，而補助戰船則按照比例予以規定。』論及切實的細節，美國自行提議毀滅她一九一六年全個計劃的結果，就是說，在建築中的十六隻主力艦，九隻戰艦，和六隻巡洋艦。她更擬『廢棄所有較舊的戰艦以迄於（但不包括）台拉維爾（Delaware）與北大可他（North Dakota）兩艦。』這樣要棄於垃圾堆上的艦數，總計有主力艦三十隻，總噸數（凡建造中的艦當

（註一）凡非航空母艦的軍艦，其排水量在萬噸以上，或裝置八寸以上砲口的砲，均為主力艦。（Senate Doc. 125 of

1922, p. 26）。

做已完成計算）有八四五，七四〇噸。

不用說得這個建議的提出是預定英日兩國將行擔承的犧牲應與美國的犧牲『堪相比擬』的。因此這個提議復提出英國應停止四隻新何茲 (Hocks) 的建築，（這四隻新的主力艦尙未建造，但已費去金錢在這上面；）他並須『廢棄她的前無畏艦 *Pre-dreadnaughts* 11 等戰艦，以及頭等戰艦，以迄於（但不包括）喬治五世 (King George V) 的那級。』照此應毀的總噸數，計五八三，三七五噸。同樣的，日本須拆毀艦數達四四八，九二八噸。在協定訂後三個月內，三國的海軍應以某等指定的軍艦組成，其數英爲二二，美十八，日本十。總噸數是英六〇四，四五〇，美五〇〇，〇〇〇；日本二九九，七〇〇。自該協定訂後十年期內，不得建造補充的噸數，而且不得超過下列最高限度：英美爲各五十萬噸，日本爲三十萬噸。（註一）按照此項條件，主力艦達二十歲時得建築新主力艦補充，但任何新主力艦不得有三萬五千噸以上的排水量。

（註一）最後允許日本不拆毀新近完成的暮楚 *Mutsu* 艦，因此補充的噸數改爲英美 225,000 噸，日本 315,000 噸

美國提議採取的比例是三國實際現有的海軍力量。沒有這個原則，沒有成立協定的可能。國家的需要，志願和期望，政策與方案之一的考慮，每一國儘能提出以證實海軍勢力之某種假定的關係，然其結果無非費時無益的討論罷了。解決之道只有根據各國實際現有的勢力。因為除非一國能在競賽裏獲勝（而會議的宗旨即在制止競賽），沒有一國能改善牠的相對地位的，此理彰彰明甚。（註一）

英美日三國間主力艦的比例探定爲五——五——三。

日本聲說她不能接受這個比例，『假使美國政府要在太平洋裏修築礮台或加建海軍根據地。』所以決議在海軍條約簽字的時候，簽字各國在其海島領土與屬地上，關於礮台和海軍根據地的原狀，除了某種例外，應予以維持。美國能自由造新礮台或海軍根據地的那些例外，是毗連美國海岸的各島，阿刺斯加（註二）（Alaska），巴拿馬運河區域，以及夏威夷羣島。英國擔承維持香港與

（註一） Senate Doc. 125 of 1922, p. 21.

（註二） 但亞流星羣島 Aleutian Islands 不在內，該羣島的現狀仍須維持。

東經一一〇度子午線以東的海島屬地的現狀，(註一)但奧大利亞共和國及其所轄土地及新西蘭和毗連加拿大海岸的各島不在內。

英美日所接受的軍縮計劃，包括拆毀主力艦達固有軍力的百分之四十。可是大家認為法意的主力艦若要作相當的減縮，勢將超過所能希望這兩國接受的數目，他們現有的海軍是不很大的。所以議定他們得保持原有主力艦的噸數，法國爲二二一，一七〇；意大利爲一八二，八〇〇。在規定的十年之後，他們能够補充的主力艦總噸數，各爲一七五，〇〇〇噸。

美國關於補助艦的提議，不得完全放棄。原計劃本定補助艦——即（一萬噸或以下的）巡洋艦，小艦隊領袖艦 *Flotilla leaders*，驅逐艦，和潛水艇——應照主力噸數的比例加以限制。可是日本和法國都反對這個計劃。法國代表特別說明謂法國需要九萬噸的潛水艇和三十三萬噸的巡洋艦和其他補助艦來保護她的領土和交通，然而照擬議的裁減辦法，將使她只有三萬噸的潛水艇及十五萬噸的其他補助艦。法國殖民地部長沙勞 (*Sarraut*) 切實聲稱法國代表團會

(註一) 這不包括星加坡，該地在106度之四。

受命『對於以上的數字不准讓步。』這種宣告引起了大失望，因為牠阻擋了關於限制補助艦的任何協定。

潛水艇問題的討論在會中引起了若干的齟齬。英國海軍部樂願把全世界海軍裏的潛水艇完全取消，這樣的一個提議的確是提出來了。

美國代表團反對這個提議，發了一篇言之成理而且寫得很和平的備忘錄。會場一般的意見似乎以為廢除潛水艇戰爭最有利於海上稱霸的英國。法意日反對英國的提議。會議本身的平靜的表面為之波動了。英國代表團提及法國海軍喀斯塔克斯艦長 (Captain Castex) (地中海第二艦隊司令的參謀長) 一九二〇年一月在海洋雜誌 *Revue Maritime* 裏刊出的一篇文字，其中主張無限制的潛水艇戰爭。(註一) 據說白里安對英法見解的異趣曾有句話：『或許英人要用他們的主力艦去捕沙丁魚好，我們要潛水艇來研究海底而層以為我們的植物學會之助。』(註二)

(註一) *New York Times*, Dec. 31, 1921, p. 2.

(註二) 同十, Nov. 24, 1921, p. 1.

因此潛水艇戰爭的方法仍然保持了，但有一大例外：就是牠不得用於商船的破壞。

涉及潛水艇的規則包括在簽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的一個條約裏。（註一）可是，鑒於公稱按這些規則從事潛水艇戰爭的『實際的不可能性，』那麼較爲簡單的完全廢止潛水艇戰爭的英國提議未被採用，或許是可惋惜的。不過一九二一至二二年的國際形勢是不利於這個提議的；但將近一九二五年底，這個提議又復活了（雖然仍未被採納，）那時候洛加諾條約的締結已使列強對彼此的軍事計劃懷疑較少。

華盛頓的海軍協定雖然只包括一萬噸以上的戰艦，依然算得是趨向普遍裁軍的一個切實步驟，並且打開了一條很有希望的路徑。華盛頓會議又成立了一種地方的協定，如十九世紀裏有過的並且結果良好的關於歐洲某部分的協定。不過這裏所協定的地方是會議諸國在太平洋裏的島嶼。

太平洋上的政治情形正在引起美日英和英屬自治領地的焦慮。美人相信英日同盟之締結

（註一）該約內又宣誓禁止一切毒氣的應用，如多數文明國家所締結的各條約已宣布者。

與按時重訂，『乃是對俄德遠東政策而作的一種保衛的手段。』他們覺得這樣的保衛自從歐戰（一九一四——一八）以來是不再需要的了。因此美國人民不斷地說道：『原來的危險的根源既已消除了，這同盟維持着是對付何人，爲什麼目的？』（註一）反之，英政府看這同盟依然很有價值。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一日，當時的首相路易喬治在下議院說道：『我們又願與日本維持我們的密切的友誼和合作。那種寶貴的友誼之最大價值，在於諧和和這兩個最大的亞洲強國的勢力與活動，因而對於大英帝國的福利和東方的和平，構成一個必要的保障。』（註二）

加拿大政府對英日同盟並不見得感到任何強烈的興趣，南非由於牠地理的位置，亦是如此。南非總理斯瑪次將軍在帝國會議上說：『那裏（在太平洋）是歐亞的交點，而且在那裏，我相信，人類歷史的下一大章將要制定。』（註三）他分明是贊成修正英日條約的。反之，澳大利亞的休

（註一）美國 Senate Document 125 of 1922, p. 44.

（註二）Parliamentary Paper 1474 of 1921, p. 4.

（註三）同上，p. 25.

「士非常贊成這同盟，附着某種保留：『廣言之，我們贊成牠的重訂。不過……絕對需要規定者，將來與日本作任何條約，要使澳大利亞滿意，必須特別避除與美國戰爭的可能性。』新西蘭政府也主張重訂甚力。總理麥塞 (Massey) 相信『下次海軍戰爭將在太平洋發生。』

英日同盟是一種繼續的條約，在任一方聲明廢棄後十二個月期滿即告廢止。自從牠在一九一一年重訂後，國際聯盟發生了效力。英日政府曾發通告，謂在盟約與英日條約抵觸的地方，盟約的條文應佔優先。(註一)這宣言無疑是非常誠實的，卻不能治愈美國人民對該同盟的憎厭。太平洋中有一種『國際緊張的狀態』存在。(註二)人民開始黯然談到那裏的第二次大戰的逼近。日本顯然是願依附這同盟的，英國不想開罪於日本或美國。華盛頓會議英國總代表巴爾福說英國是『在兩種誤解的可能性之間——一種誤解是如果他們保持這條約，一種誤解是如果他們廢棄這條約。』(註三)因此，這是各方都與有光榮的，在華盛頓，在會議開幕一月後，大家同意

(註一) July 7, 1921 (Parliamentary Paper 1474 of 1921, p. 4).

(註二) Senate Dec. 125 of 1921, p. 44.

(註三)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在會議上的演說 (全文見 Canadian Sessional Paper 47 of 1922, p. 59).

了用一個四國條約（英、美、日、法）來替代英日兩國同盟以維持太平洋的原狀（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四國條約的重要條款是第一條：

締約各國互相尊重他們在太平洋裏的海島屬地和海島統治地的權利。

他們更進而議定倘太平洋問題發生任何糾葛，（註二）倘非外交所能解決，締約各國須互邀赴一共同會議，將該問題付諸該會議考慮和調處。假使任一締約國爲任何另一國的侵略行動所威脅，他們允竭誠互相商量『俾達到一種諒解共同地或分別地，採取最有效的手段以應付特別情形的緊急。』

美國的傳統政策，使牠不致加入任何『糾纏的同盟。』四國條約不是一個同盟，而是一個極確實的地方諒解。第一步，牠有十年的年限；過後則繼續有效，但任一締約國得於十二月前通知廢止。這條約適用於四國所有的海島屬地，而且起草時本意要包括日本諸島以及澳大利亞和新西

（註一）凡按照國際公法完全屬於一國國內司法範圍內之糾葛，例如移民或關稅問題，均不在該約範圍內（*Conte*）。

Doc. 125 of 1922, p. 45.

蘭。可是美國和日本的輿情反對包括日本本部諸島在內，因此四國隨後簽了一個協定限制該條約的範圍關於日本的屬地定爲庫頁島的南部。(註一) 台灣，硫球島，和在日本委託統治下的各島。(註二)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卻仍留在牠的範圍內。主約(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規定於交換批准後，英日同盟條約立即終止。

四國太平洋條約並沒列入會議的議事程序裏，而且嚴格說來也從沒在會裏討論過。(註三) 山東懸案亦是如此。牠是由英國包爾福和美國休士於會議期內在外部談話調停解決的。

一八九八年，按照中德訂的一個條約，德國獲得膠州灣、青島和五十基羅米突(三十一英里)半徑區域之九十九年租借權，以及若干鐵道讓與權利。一九一四年九月，日本助以一小队英兵，奪取了德人佔據的區域。日本政府在進攻青島前發給德國當局的哀的美敦書裏，自稱她的行動宗

(註一) 庫頁島北部屬俄。

(註二) Senate Doc. 125 of 1922, p. 47. 赤道以北的舊屬德國諸島均在日本委託統治之下。

(註三) Canadian Sess. Paper 47 of 1922, p. 12.

旨在把租借地最後歸回中國。可是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佔了青島之後，便向中國政府提出了若干條款，即後來所謂二十一條要求。其中有一條（第一種要求）即是中國政府須同意日後日本政府與德國關於山東權利的任何解決。（註一）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國便答應這個要求了。（註二）有一個時候，山東問題發出來的熱氣幾乎把巴黎和會鬧翻了。按照凡爾塞條約（一五六——八條）德國放棄她在山東的權利與日本，同時日本宣布她準備把該地主權完全交還中國，不過經濟的特權卻要保留，中國政府認為這個宣言不滿意，拒絕承受凡爾塞條約。迨至華盛頓會議，中日間對於山東問題殊無協議的可能：這問題懸著『要算是遠東一般局面裏最騷動的原素了。』（註三）

山東的命運既是根據凡爾塞條約，那麼這事不是華盛頓會議所能干涉的。然而會議場上國

（註一） *Ibid.*, p. 35. *Temperley,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註二） 中國承受第一至十四條及二十條全文見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VI, 631-4.

（註三） *Canadian Sess. Paper 47 of 1922*, p. 35.

際的局勢和妥協的空氣頗宜於兩關係國的談判。這空氣又是非常有利於中國。中國代表們高尚的道德態度，國際的眼光，美滿的說明，加上他們國家無助無告的境遇，引起了華會之善意和俠義，以及美國熱烈的輿情。一種友誼的環境，『凡有外交經驗的人都知道是很重要的。』（註一）

關於山東的談話繼續了好幾個星期，『雖然冗長和仔細到了相當的程度，』（註二）但表示了很大的好感。結果中日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簽了一條約。日本允於六個月內將從德國所租膠州產業以及該地一切公產，除在日本佔領期內所加之改良外，概不取費，交回中國。膠濟鐵路由中國以約計五千三百萬金馬克的款額贖回，該款本是賠償委員會向日本所徵收，算是一九一四年日本從德國取去鐵路財產的價值。應僱一日人為車務總管，受中國路局局長的指揮。日本放棄樹立獨佔的日本租界之要求；同時中國開放全境，對外通商。

騷動國際的二十一條就這樣取消一條了。雖然路易喬治在巴黎和會自己承認從沒聽到該

（註一） Report of Chinese Delegates. 見 Tynbe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3-4, p. 459.

（註二） Canadian Sess. Report 47 of 1922, p. 36.

等要求過。(註一)山東消磨了政治家們不少的心力：『我們費了許多時間討論遠東一條小鐵路上的一個車務總管，包爾福在二月四日華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如此說道。這次圓滿的解決，多半要歸功於日本政府，牠差不多處處都要讓步。然而英國政府立刻跟上來做了一個慷慨的讓步。牠由包爾福代表宣稱願將威海衛歸還中國，惟英國太平洋艦隊得用牠做消夏休息之所。

在太平洋與遠東問題委員會第十二次會上關於中國租借地有重要的討論。中國顧維鈞聲稱租借地(註二)的存在，原是由於德國的壓迫，她的強佔山東的一部，逼中國政府於一八九八年

(註一) R. S. Baker, Woodrow Wilson at Paris, II, 354.

(註二) 外人在中國佔據的土地有三種：(一)居留地 Concessions。牛莊、天津、漢口、九江、鎮江、廣州等地都有。在居留地裏面，地皮是整個租與外國政府，然後分租與外國商人。(二)租界，在這種劃定的區域裏面，外人可以直接向中國業主租用，如上海公共租界。(三)租借地，即一八九八年德俄英法所租借的地方，在該區域內租借的政府有權駐紮軍隊及建築軍備。在租界與居留地裏面外人享有地方自治政府及治外法權。依特殊條約，有些強國並且在若干地方有駐兵權，如北平的使館區域（見結束義和團之亂的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的議定書。）一八九八年的租借及義和團事件議定書見 MacMurray,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1894—1919 (Carnegie Endowment, 1921).

三月六日許以膠州灣九十九年的租借權。俄國隨即於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要求租借遼東半島，旅順大連在內；同時還要求築一鐵路，從旅順和大連北連西伯利亞鐵路，東接海參崴，經過滿洲，由俄國兵士保衛。這就是後來日俄戰爭的造因，結果於一九〇五年由中國同意轉讓旅順、大連與滿洲特殊權利於日本。自租借膠州灣於德，旅順大連於俄之後，隨着法國於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從中國取得廣州灣的九十九年租借權。英國於同年六月九日獲得九龍區域（註一）與附近領土與靠近香港的水面之租借權，爲期亦九十九年，又於七月一日取得威海衛的租借權，『爲期與俄國佔據旅順同一長久。』英法都是拿保持遠東均勢做他們要求租借的根據。（註二）

（註一）該區域用地圖標明，附於 1908, June 9 的協約上，見 MacMurray,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1894—1919 I, 130. 因此香港在大陸上有二十英里的半圓徑地，不至受砲火的威脅。

（註二）Minutes of Committee on Pacific and Far Eastern Questions, 見美國 Senate Document 126 of

顧氏辯稱自准許此項租借（其目的純在保持遠東的均勢）後，已經有二十年之久，情形完全變了。德俄無復握有中國領土了。門戶開放與中國完整的確立原則，應該使均勢的維持成爲不需要。『既然沒有這種必要，中國代表團相信這時候關係各國應放棄其租借地的管轄。』（註一）

列強代表對於中國的請求，答覆各異。費維雅尼（Viviani）代表法國聲稱『法國政府準備參加中國租與各國的領土的共同的回。』日本代表埴原（Hamihara）謂日本經包爾福與休士的周旋已經在準備把膠州歸還中國。此外惟一的日本租借地，便是由旅順和大連組成的行省。該省的取得，係經過日俄戰爭的犧牲，及得中國的同意，日本『現無放棄的意思。』牠形成滿洲的一部，而滿洲鄰近日本，日本在那裏有重大的利益。日本政府聲稱那裏『土地的鄰近，』已由各國在新銀團協定裏承認爲構成一種『重大利益』的。（註二）日本的保留旅順大連，在她的眼光裏認

（註一） Senate Doc. 126 of 1922, p. 539.

（註二） 見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New Financial Consortium in China 載於 Parliamentary Papers 1914 of 1921, pp. 40, 51. 英美承認日本有保障牠的經濟生活與國家安全的（與他國相同的）普通權利；但英美並未因此贊同日本獨佔中國任何部分的要求。

爲與十一月二十一日華會採取的決議案不相衝突。

包爾福代表英國說話，他稱英國政府準備把威海衛交回中國，『算爲總解決的一部。』後來日本答應將膠州交回中國，他宣布英國立即歸還威海衛之意。他相信該地定能繼續供駐於中國熱帶地方的英艦避暑或休養的『無損有益的宗旨』之用。

可是關於另一租借地九龍，包爾福沒有允許什麼。『理由是，沒有這塊租借地，香港便完全不能防禦，任何地方只要有新式大砲都能隨意加以宰制。』這，包爾福又說，不僅是英國的利益；牠是一種國際的利益。『他據悉香港很容易躋於全球商埠之首。』接着他便取讀美國政府的中國商務誌裏涉及香港卓越的商業形勢的一段文字。包爾福繼稱凡使在安全中的國家的信心動搖的任何事件，是一種普遍的不幸。『他希望他無須贅辭解釋九龍區域是別爲一類而必不可與那種以全然不同的動機取得的租借地同日而語。』（註一）

會中另外又處理了兩件關於中國和其他各國的重大事件。一爲治外法權，二爲關稅。

自一八四二年訂立南京條約以來，歐洲各重要國家和美國在中國擁了許多年的治外法權。他們的國民，在中國貿易，向來只受本國領事法庭的裁判。例如英國，她在中國的各大城市裏有領事法庭，在上海有最高領事法院。這種制度存在的理由，是因為中國向無滿意的司法。然而中國政府漸把治外法權看做牠的主權與行政自由的束縛。但在裁撤治外法權前必須有的一種條件是，中國人應自行樹立一種相當的司法制度。日本曾經樹立這樣一種制度，因而得於一八九八年與列強協議解除這種治外法權的束縛。英國於一九〇二年九月五日，美日於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先後訂約允幫助中國改良司法制度，並且宣稱只要中國法律情形，及其施行設備和其他條件可以保證，他們可以放棄治外法權。（註一）在華會上中國代表團喚起注意於這種宣言。華會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十日決議任命一個委員會考察並報告中國的司法制度。該委員會由中，美，英，日與其依據條約有治外法權而願遵守該決議案的國家的代表組成之。因此治外法權似乎已不能復存於中國，雖然她內部的戰爭和行政的紊亂使該委員會無從建議任何立即達到這個目的的步骤。

(註一) Canadian Sess. Paper 41 of 1922, p. 37.

驟大戰末了，俄、奧、德三國拋棄了他們的治外法權。

關於關稅，如司法一樣，中國政府因條約受了若干的限制。這種限制開始於中英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南京條約。在此之前，中國在理論上至少是不與外國通商的。按照南京條約，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開放通商，而且應公布一種公平劃一的進出口稅率。通常稅率定為從價百分之五。(註一)美國和其他國家相率以『最惠國』條款，得到同樣的待遇。一八五三年因為太平天國之亂，中國的海關行政不能維持，為應付這種變故，遂有一個外國稽查部的任命。這便是中國海關稅務司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的起源，在一九一四年計有員司七四四一人，其中一三五七是外人。只要英國貿易在中國居首位，海關的總稅務司應為英國人。(註二)迄一

(註一) 見 Treaty of NanKing (Aug. 29, 1842), 第十條, Treaty of Tientsin (June 26, 1858), 第二十六條; Hertzel, Treaties, etc,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and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1896), I, 8—26.

(註二) 中國外交部通牒, Feb. 13, 1898 (MacMurray op. cit., I, 105)。

九〇二年止，關於海關稅率，從未訂約作重要的改變，到該年纔准對外國貨物加徵一種附稅。

中國海關稅務司徵收關稅，成績非常良好。華會上中國政府宣布牠並不想改變這種行政制度。同時華會諸國容許進一步的修正中國的協定關稅。因此而有一九二五年秋的北京會議，該會許給中國規定海關稅率的完全自由。這種自由要從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起實行。中國政府在北京會議上自行宣言裁撤釐金。

『華盛頓的精神』對於中國是光明樂觀的，而且在英國政府宣言將牠的一部分庚子賠款爲中國人謀利益一點上，反映出來了。美國已將牠的庚款部分用於中國派遣留學生。然而列強與中國的關係仍是複雜棘手，不過在華盛頓會議上已做了不少的簡單化的工作，並且產生了良好的感情。和美國的休士同爲代表中成功翹楚的包爾福在第六次全體會議上說得很不錯：『我堅決相信，將來雖然會發生困難，人民決不至於再回到這次會期前的路上去了。』

第二十三章 魯爾

魯爾的佔據或許是戰後歷史上一切駭人的事變中間最驚目並且最特別的行為。一九二三年，大批法國軍隊，鋼盔鐵甲，帶了大礮，坦克，和現代戰爭的全副行頭，侵入了魯爾。可是這一種侵犯，按之現行國際法不能視爲一種戰爭行動，而且事實上，沒有遇到抵抗。

凡爾塞條約裏有兩個條款關於魯爾的事變：

如果德國不履行本條約本部（第八部賠償）規定的任何義務（賠償）委員會應將這種不履行情形立即通知各關係國，並得建議在牠認爲必要的應付方法。如果德國故意不履行，則協約與參戰各國有權採取的辦法，可以包括經濟上與金融上的封禁和報復，以及諸如此類其他的辦法，爲各政府在這種環境裏面所認爲必要者，這些辦法，德國允許不認爲是戰爭的行為。（註一）

（註一） Sections 17 and 18 of Annex II of Part VIII of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第一款是十分的清楚。賠償委員會能全體一致或以大多數通過宣布德國爲故意不履行。第二款是含糊的。『經濟上與財政上的封禁與報復，以及諸如此類其他的辦法』的意思，是不是所謂『其他的辦法』必須限於財政的，抑是指任何種的辦法？英國政府辯稱所謂辦法只能爲經濟的，如前而所說『經濟的與財政的封禁與報復。』法國政府則謂條約所容許的是任何種的辦法。第二所謂『各政府』“respective governments”的意思，是否是各個政府單獨行動，抑是全體一起行動？法國政府辯稱條約的措詞，准許各個政府自爲行動。這點法國方面分明似有理由，而在一九二〇年英國政府亦抱這種見解。（註一）照凡爾塞條約的文字解釋，法國佔領魯爾是在她的權利內行動；並且假定這條約的草訂，有如何其他法律文件，是存心要依照牠的文字解釋的。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賠償委員會集議於巴黎，宣布德國故意不履行該年度對於法

（註一）見財務大臣張伯倫 A. Chamberlain 於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衆議院的敘述，此段文字分明許各政

府自行決定在此段文字下必要採取的任何行動 (Hansard, 5th Series, Vol. CXXXIII, p. 1922).

國的木材交付。一月二日協約各國總理在巴黎開會——普恩加齊代表法，般那勞代表英，探尼斯(Thénis)代表比(以上諸人皆爲各該國總理)，托來他(Marguis della Torre)代表意。英國提出了一個還款計劃包含四年的延緩償期；法國也提出了一個計劃，包含兩年的延緩償期，但以取消法國對英國的戰債爲條件。巴黎會議於是無結果而散。

賠償委員會八月三十一日容許的六個月的延緩滿期了，德國應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五日償付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一月九日，賠償委員會(英代表不贊成)便宣布了德國沒有履行煤的交付，一月十一日法比軍隊於是進據愛生(Essen)與魯爾全境。

魯爾事件，其性質是一種長期的苦楚，逼得英法協商達於破裂之點。協商之沒有完全破裂，仍是歷史上幾乎難於解釋的一件事實。不錯的，牠以前也時常緊張過。譬如在華盛頓會議上，法政府的態度曾『暫時拂惱』過英人的感情；然而『與法完滿持久的和洽』仍是英國『固定的政策』。(註一)可是關於魯爾問題，英政府以及英國人民大部分，(雖非全體)的意見是絕對反法的；還有普恩

(註一) New York Times, Jan. 12, 1922, p. 16.

加賚的談話與文字，其冷冷的又常帶逼人的格調絕不能緩和英國的感情。也許普恩加賚沒有錯。魯爾的佔領和對德國消極抵抗的不斷打擊，產生了『憤憤的意志』，否則陶斯計劃將成廢紙。

法國侵入魯爾的開始，是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從地實爾多夫 (Düsseldorf) (該地自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以來即佔據了作為一種『制裁』) 出發兩師軍隊到愛生 (Essen)。鐵甲車一路當先。『從這些不露人面的兇很很的車子裏，露出機關槍槍口，對於悻悻的羣衆一個無聲的威嚇。』(註一) 蔚藍色的騎兵，插着刀，背着槍，放馬緩緩在後；隔一會走着散步的法國步兵的急速的腳聲來了。幾日之內，魯爾全境和里培 (Lippe) 地方被佔了，西至多特孟德 (Dortmund) 為止。法國有比軍的合作，和意軍的少數工程師爲助。但意大利不久便撤回了她的分隊。法國簡直是孤立着。她在歐洲既少幫助，而對於大西洋彼岸又不能有什麼指望，雖然居於領導地位的美國意見並不是不同情於法國的見解。(註二) 然而事有可慮者，魯爾的佔領不但會重新引起歐洲的戰

(註一) Times, Jan. 12, 1923.

(註二) 比較 New York Times, Jan. 20, 1923, p. 12, 題爲 A German Miscalculation

爭心理，並且會使牠繼續存在。（註一）。

這時候孔諾（Cuno）總理的政府正在德國秉政。這位總理和內閣如今不得不做一種攸關萬千無告生靈的命運的重大選擇。德人接受法國的懲罰，並且如像法國政府所要求，提出繳付賠償的計議乎；抑將斷絕國交，甚至停止煤的繳付，拒絕任何合作并消極抵抗法國一切的努力乎？孔諾政府決議採取後一個辦法，因此使德國陷於飢餓，貧窮，和國恥的無底深淵。據說孔諾政府是被輿論的力量逼迫到作這種決議的，因為全國都痛恨法國的侵佔。但是為拯救國家起見，如有必要，輿論可以不顧，這正是政府的職責。在危難的時機，政府應該明敏，不應盲目照羣衆的心理行事。一個政府的不可饒恕的事便是失掉了牠的性子。

這是可以想像的，孔諾政府之下令對法消極抵抗，固為憤怒所激，但也受政策的推動。牠或許指望從英美得到鼓勵或精神的援助。（註二）牠或許計及英法協商的破裂，牠甚至於抱有消滅法

（註一） Wisconsin State Journal, Jan. 13, 1923, p. 31 (主文名, War Clouds)

（註二） 德國預計美國的贊助的（此為 New York Times, Jan. 20, 1923 引德報 Vorwärts 的話 p. 12）

人的決心之空想。如果牠有這一類的希望，那他是完全失望了。

或因爲政策的關係，或因爲軟弱的關係，孔諾政府竟屈服於滋蔓全德的怒潮之前，下令被佔區內全體住民不得償付落入外人手裏的任何關稅，煤稅，或是輸出稅。（註一）法比的賠償繳付是停止了。各礦的總經理和職員拒絕法人的要求。許多人被捕了，並且被法國軍事法庭判決苛重的罰金。（註二）德政府竭盡能事，只沒有公開的抵抗，以反抗法國的努力。牠拒絕了開駛通車。牠停止了巴黎至布卻利斯特和巴黎至普刺圭的快車。法國對付這末一項的消極抵抗是進佔南德意志的巴登（Baden）及佔領亞本維爾（Appenweiler）的鐵道交接站。二月十一日法比政府通知德政府，謂因德政府發給其官吏的各項命令之故，他們已決定禁止佔領區內一切製造品的輸出。區域內所有的煤業已悉聽法當局的支配，如今魯爾的經濟包圍是完全了。許多人失了業，食物缺乏，情感惡化；總之，生活在魯爾是一樁沉悶悠長的痛苦。德國的工人餓着肚子；同時泰半由於消極

（註一） Times, Jan. 20, 1923

（註二） Thyssen 被罰 500,000 法郎。他拒絕償付罰款。

抵抗而致的馬克的暴落，把同樣淒苦的境遇加到德國各處的中等階級。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法軍進魯爾時的德國馬克價值已够低了——四七〇〇〇抵英金一鎊。此後牠的跌落是狂慘的，雖非一直繼續的向下。一月十八日牠過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以上抵一鎊。二十日，馬克稍爲好一點。這時的稍好是暫時的。二十六日匯率是一二〇〇〇〇〇馬克抵一鎊。二月一日牠是二〇〇〇〇〇〇，但在幾天之內，馬克又改好了，或許因爲德人維持消極抵抗的決心感動了外人之故，並且無疑也是因爲德人正在賣出他們的外匯差額以取得原料并維持馬克。二月底牠略逾一〇〇〇〇〇〇〇抵一鎊。三月裏牠始終維持得很好。四月底，牠是一四〇〇〇〇〇〇；五月底，二八〇〇〇〇〇。此後是一瀉而下。八月底一金鎊換五十五兆馬克。

在魯爾，那沉悶的鬭爭還是繼續着。一月三十日法當局宣布該地軍事戒嚴。起初本是打算佔領是『看不見』的，如今成爲一種極公開和劇烈的軍治。德政府的官吏，拒絕與法合作，不是自動離境即被逐出境。所有的高級軍官都走了。法人不得不從本國鐵路上調來大批的鐵路人員。路政起初是壞極了，但漸漸改善了。法國在魯爾的鐵路管理成爲一個自給的單位。甚麼都不能搖撼普

恩加賚的決心。正如法國的路員接管魯爾的鐵道，法國的工程師同樣的接管了煤礦。食物准許運入該地以供口糧。但如有金錢的進入，一經查出，即予沒收。德政府不願自己的毀滅，去津貼被逐的官吏，『罷工』的礦工，並用其他多種方法來支持消極抵抗。這不快活的試驗到了最後，德政府每星期要化費令人咋舌的三五〇〇托利安 trillion（每托利安即一數附加十八個〇）馬克之數於消極抵抗。

無論如何協商倒忍耐了這種緊張。謠傳有一個新的大陸結合在談判中，將英國排除在外。（註一）這個結合的計劃有時被指為意大利墨索里尼的主動。（註二）然而負責的法國意見，在領袖的報紙刊物上，表示不贊成這計劃。協商所以繼續存在是因雙方都沒有通知對方解約；如此而已。兩國結合的不絕如縷可見之於般拉勞首相在下議院的『魯爾』辯論裏提及協商的言辭。他彷彿在主持牠的葬禮：

（註一） J. R. Macdonald 在下議院 March 6, 1923 (Hansard, 5th Series, Vol. CLXI, p. 318)

（註二） Times, Jan. B, 1923, p. 8.

這至少是一個大打擊，如果我所希望爲我們政策的根本，即與法國協力再建歐洲，是要完全放棄的話。我認定這是一個大打擊，而且我實在相信今日發言的諸君心中多具此感。只要可以避免，他們不想和法國交關。（註一）

最後——至少外表是如此——厥重爵士用他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一日的通牒割斷了這絲縷。好幾個月來人們就在那裏說英政府必須有所動作——但是沒有人提出具體辦法。當外交大臣，他是一個意志堅決並暢曉國際事務的貴族，發出和公布了那個有名的通牒，衆望算是實現了。這通牒導源於德政府發動的一個通訊事情的經過如下。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德政府提出重行繳付賠償（除交煤於意大利外，賠償業已完全停止）的建議。德國現擬用現金及貨物繳納賠償，總數計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但此數第一步須得之於國際借款。另一條件是魯爾撤兵。

這建議被拒絕了。牠被視爲不值得鄭重考慮的。該德牒的結語，重述『必定』字樣很欠圓通。

（註二） March 6, 1923, Hansard, 5th Series, Vol. CLXI, pp. 369—70.

再則，法政府既經到魯爾去奪取『生產的擔保品』，又在那裏遇到了繼續的消極抵抗，牠爲了自身的尊嚴計，不能隨便離開魯爾，非要等德人降服了不可，就是說，要他們允許停止消極抵抗。這時候歐洲的政治系統彷彿在那裏脫底。馬克是跌至二千萬抵一鎊，革命似乎在萊因或者德國其他地方爆發着，歐洲的人民都喪魂落魄的覺得大禍將至。

七月七日（一九二三年）德政府又發一通牒提出新意見來解決賠償繳付的問題，並沒有提起魯爾或德國被佔的地方。消極抵抗仍在進行，所以法政府拒絕這通牒，如像牠拒絕前一個一樣，厥重爵士得悉這種決定就寫了一封頗『硬』的通牒給法政府問道：『法政府所作停止消極抵抗的要求究竟真意何在？』（註一）

法比兩政府的答覆很客氣，他們在（八月三日）通牒裏解釋——並不如何費力的工作——他們所謂『停止消極抵抗一語的命意』簡言之，他們意謂德政府應解除牠的魯爾的緊急命令，

（註一） Marquess Curzon to Count de Saint-Aulaire, June 13, 1923, 載於 Parliamentary Papers, Cmd.

俾回復一月十一日佔領前的合法的原狀。法牒優雅地提出『厥重爵士函中顯著的友誼精神。』這真是在厥重爵士頭上潑火加油；但是普恩加賚他有權利像英國的外交大臣一樣粗莽，他總不能老讓人家打了左面耳光再給右面的。

七月二十日（一九二三年）厥重爵士又讀了（無寧說是寫了）一篇論文給普恩加賚聽。他開頭提起德政府以前的建議，繼及英政府向法比兩國提出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答覆仍不完全除去時局不安定的罩幕。』接到了這些文字——那不是外交的言語，而是一個聰明的大學生的口氣——普恩加賚仍表示耐性。法國外交部（*Quai d'Orsay*）的文體不至於被英外交部的新語法所誘壞。

普恩加賚七月七日致厥重爵士的通牒聲稱『法政府已盡其能力以答覆英政府提出的各問題。』他允許如有問詢，當再答覆，『但我們必須直即重提英政府自我們佔領開始以來即已洞鑒的原則——就是，法比撤兵魯爾須依德國政府繳付賠款的程度而定。』而且無論如何，德國必先停止消極抵抗和遵守凡爾塞條約。

英法的文字糾紛並不在幫助賠償問題的解決。再則，七月二十日的英牒的精髓所在，不是任何寬容德國的建議，而是一個建議謂協約國應（一）勸德國放棄消極抵抗，（二）召集『不偏的專家』來確定德國繳付的能力。法政府對第二點完全置之不理，比政府反對『不偏的專家』一名詞，以為含有誹議賠償委員會之意；至於意政府對牠的解釋則『認為上項計劃將包括協約國間債務問題的解決。』（註一）

英政府與英國公衆誠心相信魯爾的佔領和德國經濟與政治系統的瓦解，不僅破壞德國而且破壞歐洲。大家覺得『非有所動作不可。』

該通牒開頭聲稱『英國政府接到法比政府七月三十日對於牠上月二十日的通牒的答覆，起了最誠懇的失望。』牠指出『從法比閣員們親自或代表所發表的官場的或半官場的宣言看來，可見法政府意欲堅持除付英美債額外，最少須給他們二萬六千兆金馬克；但是按照現有協約，法國欠英美的債額，超過她應得之數為十九兆金馬克。』

(註一) Marquis della Torrella 致 Marquess Curzon, Aug. 2, 1923 (四十一)

於繼續討論所擬議的『專家考察』以後，該牒提到困難而又易起辯論的魯爾佔領是否合法問題。爲解決此點的任何疑義起見，英國政府願意將法律上的效力問題交海牙國際法庭解決。英國政府之所以一直隱忍至今，『不正式爭辯法比佔領根據條約（譯者按指凡爾賽條約）是否合法者』，乃欲『避免使牠的協約國發生不需要的礙難耳。』

該牒其次涉及的問題，便是佔領的時期。法比曾經（該牒如此說下去）『用帶空泛的話』提醒說，消極抵抗停止的時候，他們將『共同商議他們將如何減輕魯爾的軍事佔領所加於該地的負擔。』但是他們拒不允諾撤退該區，不過可以『按照德政府償付的程度』而相當予以撤退。關於此點既一再聲明，同時又堅不減讓賠償項下德國十三萬二千兆的總欠，這樣分明存心繼續佔領魯爾若干年，最少是三十六年（這是『繳付程序表』上所定償清債務應攤派的最短期限），而且鑒於一般承認該程序表完全實施的不可能性，佔領期即使不是永久的，也可無限的延長。

牒中最後的幾句話說到協約國間的債務。當從事確定能從德國取得的實際賠償額的時候，

「不列顛政府準備儘環境准許的程度，同時顧及盟約各國償付的能力，來慷慨地討論他們欠她的債務。」英政府「仍然準備對於盟約各國所欠她的巨款，除了連同德國所付賠償，足以抵償英國所欠美政府之戰債外，不多索取。」（註一）

英國國內對該通牒的負責批評，說牠是「強硬的，但並不過於強硬。」然而英國公衆最所關心的並非該通牒的強硬與否，而是牠可能產生的效果。「英政府在牠最後的通牒裏預示了牠爲自身計而採取別種行動的可能性。」（註二）這是人人所預期的——英政府的「別種行動」無論如何會在魯爾的「絕境」裏找條路出來的。這是協商歷史上最有劇情的時期。法政府將聽受英國的忠告，抑將拒不接受，而任憑協商破裂？牠拒絕了，但協商沒有破裂。英政府對魯爾佔領既提出了最嚴重的抗議，又發覺這種抗議未被注意，卻罷手了。真的牠不能做什麼。英國的抗議徒鼓勵了德人的消極抵抗。（註三）使協商破裂徒然使德國更興奮。雙方都沒採取任何正式的步驟去割

（註一） 這個是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包爾福通牒裏定下的原則。

（註二） Times, Aug. 13, 1923.

（註三） Kölnische Zeitung, Wochenausgabe, Aug. 13, 1923, p. 7; Aug. 22, 1923, pp. 2—3; Aug. 29, 1923, p. 3.

斷束縛英法的細絲縷，所以這絲縷仍然留着。

在巴黎，厥重爵八月十一日的通牒被認為譴責法國是一個『暴漢』“bully”（註一）但是並沒有引起驚慌。這也許因為（雖然表面上看不出）法國正得到勝利。孔諾的內閣在八月十二日辭了職，斯脫拉斯孟（Stresemann）的新政府就了任。孔諾的辭職無異承認他的消極抵抗政策失敗了。新政府雖然不能立即承認這一點，（註二）牠顯然是負有使命要取唯一可能的路徑，即停止消極抵抗，來解除德國魯爾的困難。

這時候奧斯汀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他不是英政府的一員）說過，『協商是懸在絲上。』於是——不能不承認他很招怒——普恩加費答覆了。顯然的，他的怒氣發了，但是約束得很嚴：那就是說，他在八月二十日發給英政府的通牒，本身是十分客氣的，在實質上和形式上都是如此。牠控訴德政府處理財政的揮霍而且（普恩加費說）存心浪費的。牠又一再耐心地解

（註一） Tache de bully la France: Temps, Aug. 14, 1923.

（註二） Temps, Aug. 16, 1923: M. Stresemann ne nous donné a ce côté aucune déception.

釋法國對於魯爾佔領和協約國間債務的見解，隨着便是一個附件，逐點答覆八月十一日的英牒。既已在他的通牒裏曲盡外交的禮貌，在附啓的自由園地裏普恩加齊『放任他自己』用的雖依然是十分沉靜的文體，但是悲痛而且尖刻。他沉靜地責備英國的採取公開換文的辦法；法政府願意單用外交的途徑來論辯英法間的異議。他憤然駁斥法政府意欲割據魯爾的暗示。他宣布法國願意償還債務，但非德國的賠償繳付後牠纔有力履行。厥重爵士在他的建議裏曾謹慎地保留英國的權利。普恩加齊亦然。『我們很了解英政府保留着牠的權利。無疑間，牠將了解我們對於德國保留着我們的權利。』最後還是普恩加齊的話佔優勝。協商依舊繼續。

第二十四章 德國的破裂與挽回

魯爾正沉淪在長期痛苦中的時候，當着法國兵士的眼前，發生了一個暴烈的革命運動，目的在成立一個萊因共和國。這個革命大概是起源於反國家觀念的德國共產黨人的運動。法國既然期望在法德之間創立一個緩衝國家，法國的佔領當局，對於這種運動，自然抱一種好意的中立態度。這理想早已見於八四三年凡爾登的瓜分 Partition of Verdun。該項瓜分在東西法朗克 (Franks) 的全部邊境上創立了洛沙林基亞 (Lotharingia) 王國。一九一七年二月法俄兩國的『中立國』協議的基礎，也就是這種理想；(註一) 一九一九年巴黎會議上法國要人曾爲此力爭，雖然沒有什麼成功。三月裏，一位有勢力的法國人在魯爾公布他的意見，說『法德惟一的真正保

(註一) Parliamentary Papers, 1924, Cmd. 2169, p. 7. (俄國外交部長致駐彼得堡法國大使, Pub. 1/14, 1917). 按此, 在法國外的萊因河左岸的地方將成爲一個自主中立的國家。

障便是在兩國間建立一個獨立國家，受國際聯盟的保護。」（註一）

在德國方面這種脫離運動（Separatist Movement）可說是發動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日休戰後可隆（Cologne）地方一次萊因要人們的會議。這時，革命正在德國進行，波爾雪維克主義的成敗猶未可知。（註二）但波爾雪維克或是斯派他主義的迫切危險過去了，萊因的保守的脫離運動也跟着消散。可是當魯爾被侵入以後，德國金融狀況崩潰到面目盡變了的時候，頗有保守的人民，豪富的商賈，銀行家以及其他人等，他們渴慕法郎的高價和穩定，雖沒有歸順法國之意，至少想到終有一天要和德國馬克幣制脫離關係。但是製造一九二三年萊因脫離運動的人並非他們這班人。

萊因脫離主義的首領是德國一個富商的兒子，叫做亞丹陶爾登（Dr. Adam Dorten）。陶爾登職掌律師，在大戰裏得過鐵十字獎牌。在靠近維斯巴頓（Wiesbaden）的產酒區域，他的勢

（註一） Times, March 17, 1923, p. 10.

（註二） Ibid., July 18, 1923, p. 12.

力很大，也就是在那裏，他的萊因共和國活動進行最力。他在一九二〇年所發表的第一次的脫離（德國的）宣言，發生的唯一有劇情的結果便是被普魯士當道公訴擾亂治安，被判了一萬馬克的罰金。（註一）魯爾的佔領和德國一九二三年普遍的苦難，給了陶爾登又一個機會來實現他的計劃。英美的佔領軍隊絕對沒有參加這種運動。法政府也守中立；但是有若干在維斯巴頓，斯比爾司（Spire）以及魯爾的法國官吏，給了脫離黨人非官場的鼓勵。陶爾登的目的在使萊因脫離普魯士而非脫離德國。他要使萊因成爲德國的一個實行憲政的邦，不受柏林的官府統治。但是法人在魯爾所設的關卡，和協約國間的『萊因最高委員會』按照協約國賠償政策在他處所設的關卡，早已在經濟上割斷萊因和德國其餘各地的關係。假使萊因變成了德國內的一個分立的邦，牠難免傾入於法比的經濟範圍裏去。

據報告說法國兵士——當然不是官場的行動——教唆脫離黨人去攻擊市政警察。這類的事不僅此一端，但這或許是最壞的一樁。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在地實爾多夫有這樣的事發生：

（註一） Current History, Vol. XIX, p. 764ff.

我剛纔重進旅館門，心想什麼事都完了，就在這時發生了也許是地質爾多夫的『紅星期日』裏最可怕的事變。一打的『萊因武裝黨』(Rheinwehr)率領了二十個法國騎兵向着貼近旅館的一個綠色警察衝去，包圍他繳他的武器。這事做罷，脫離黨人就用鉛管子打他至於死去。苦命的警察用手掩了面孔跌下去。幾十記拳頭雨一般落在他的身上送了他的命。(註一)

萊因運動的另一首領是斯米次(Smets)。他曾參加過一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握了幾天的可隆政權的蘇維埃。如今他是萊因共和國(Rheinische Republic)報紙的主筆，他主張萊因完全分立，作為法德間的緩衝國。

第三個領袖而在該運動的後期或許是最重要的領袖是麥第斯(Matthes)。據說他是巴伐利亞人，一個社會主義報的編輯，曾因誹謗當地市長判了六個月的監禁。他逃入佔領區域求庇，據說做了法國的密探。(註二)

(註一) 泰晤士報訪員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的報告。

(註二) Times, Nov. 2, 1923, p. 12.

所以在萊因裏一切釀成大亂的條件，內部的和國際的，都具備了：政治煽動，災難，外國陰謀，金融紊亂。一九二三年是暴動的年份，脫離黨人對統一黨人，共產黨人對其他全社會。這是常例，時局一亂，流氓地痞都出頭了。作奸犯科的人都加入了脫離黨人的集團。

脫離運動不僅澎湃於普魯士萊因而已。一種更大的脫離運動發生於巴伐利亞的派拉丁納特 (Palatinate)。這省在萊因左岸，北與普魯士和赫新 (Hessen) 土地接壤，南連亞爾薩斯。牠的重要城市是二不呂根 (Zweibrücken)，斯比爾司和魯特維格夏芬 (Rudwigshefen)。第一次的爭鬪就發生在這地方（派拉丁納特），法國當局差不多公然贊助脫離黨人，也就在這地方，到後來終於用外交手腕解決了這個悶葫蘆。

一九二三年十月，這個『共和帝國』的德國看來似乎真在分解了。（巴伐利亞的）第七師常備軍被巴伐利亞政府從柏林政府手裏調回去了；帝國國防部長蓋斯南 (Herr Gessler) 的權威被否認了；而且說巴伐利亞師只效忠於巴伐利亞政府。共產革命起事於漢堡，該地發生公開的爭戰；全部萊因，從亞拉什不爾 (Aix-la-Chapelle) 到梅因斯 (Mayence)，處處的脫離運動在

激烈進行。十月二十三日泰晤時報 (Times) (該報是不贊成脫離運動的) 刊了一張德國破裂的地圖。十月二十四日派拉丁納特地方議會在斯比爾司開會宣布成立一個派拉丁納特共和國。大家相信在派拉丁納特的法軍司令梅茲將軍 (General de Metz) 是直接在那裏贊助脫離黨人。(註一) 該省又集費募兵組織了脫離黨的軍隊，政府之在自主黨人手裏者約有三個月。按照凡爾塞條約，德軍是不能進派拉丁納特的。最後，經過了很多的流血，『一位英國官吏受命判決該運動的命運，雖然這運動是在法國佔據地內。這事變於是告終。』(註二)

一九二四年一月初英政府訓令慕尼黑英領事克乃夫 (Olive) 往派拉丁納特考查政治與經濟情況，並作一報告。(註三) 這種使命自是領事的本分，英政府的委派克乃夫也沒什麼不尋常。

(註一) Times, Oct. 25, 1923, p. 12.

(註二) Dr. Doreau, The Rhineland Movement, 載 Foreign Affairs, Vol. III, p. 410.

(註三) 英政府初意從隆英軍司令部派一代表前去，但是法政府表示反對 (Hansard, 5th Series Vol. CLX

可是這時佔據派拉丁納特的法國對於克乃夫的使命不能無疑。英法兩國的外交部對此事處理得很好。英政府把擬派克乃夫考查一節通知了法國。法政府表示擬派一官吏隨他前去察訪。英政府覺得法國的要求沒有什麼不合情理。所以克乃夫就在一個法人監視下進行考查。派拉丁納特的人民顯然認他是一個公道的使者。他的察訪很能圓通和氣將事，到處受人的歡迎。他來過後，萊因的協約國間最高委員會也接踵前來。一自派拉丁納特的事件直接接受了國際的注意，緊張的局面開始慢慢地緩和下來。雖有一時很猛烈但從沒有很強大勢力的脫離運動衰落了。到了三月，據報告謂形勢已經回復常態。好鬪的脫離黨人在派拉丁納特失了廝戰的機會，使到法國國外軍隊裏找了工作另行活動。（註一）

對於派拉丁納特事件有清理之效的克乃夫報告從未公布。但是英外交次長麥克勒爾 (Ronald Menell) 曾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宣讀該報告的電文節要。這節要的重要部分如下：

（註一） New York Times Feb. 28, 1924, p. 21.

費了五天功夫，聽過派拉丁納特各階級各地方的民意，我得到的結論是：極大多數人反對自主政府。

這個政府若無法國援助決不會存立，並且法國援助一斷，將立刻被逐。

據該政府名義上的首領白萊 (Blay) 承認，脫離黨人百分之七十五來自派拉丁納特之外。此輩不問可知包括大批的舊罪犯，是完全不諳政治的。

在農工階級中厭戰之心極強，願出任何代價以求和平。(註一)

古斯他夫斯脫拉斯孟 年四十五。在大戰前與大戰時期的政治裏他以國家自由黨被知自老練的巴塞爾孟 (Ernst Bassermann) 於一九一七年死後他便繼為黨魁。國家自由黨人在共和政體下改名為德國人民黨，志在措德國政治於溫和合憲的路線上。如今斯脫拉斯孟的工作很困難，因為德國差不多在潰敗之中了。這國家只有一個機會。德國必須放棄消極抵抗的政策，就是，必須屈服於法國在魯爾的行動之前。需要幾個星期來佈置民意；還需一二星期和法國磋商此事。普

恩加賚是不願談條件的。斯脫拉斯孟和法國駐柏林大使馬格利 (Margerie) 間的談話沒有結果，在九月底前，好像絕對在停頓之中。普恩加賚的勝利近了一步，或許猶未自知。他不肯做普通外交上的錯誤，於成功的最後五分鐘的時候讓步。不讓步是他的口號。忽然在九月二十六日德政府開始停止消極抵抗。在最後一星期資助魯爾內外的消極抵抗者費去了三五〇〇屈林 billion 馬克。然而消極抵抗的放棄好像就是把德國政體打成碎片的最後的一震。斯脫拉斯孟用一番驚人的努力控制了最後的高潮，駕駛他的險舟到達平安的港埠。停止消極抵抗宣布後一日，德政府便宣布全國戒嚴。雖然巴伐利亞師有所怨望，軍隊仍然全體效忠於政府；鋼帶縛攏了全國。同時舊的馬克任其廢棄，以金融上一樁英勇的行動，用德國人民的全部資產為擔保的一種新幣發行了，那便是穩定的朗特馬克 (Rentenmark)。總統愛爾伯脫，總理斯脫拉斯孟，財政部長路得 (Luther) 這三個強有力的人物，『對於國家並不懷心』把德國從魯爾的痛苦裏救了出來。

十一月三十日賠償委員會開會採取那謙遜的但是重要的步驟，即設立兩個專家委員會，一個職在考查使預算均衡的辦法和使幣制穩定的策劃，一個職在考慮如何估計自德流出的

現代歐洲外交史

資本價值和如何使牠回來的辦法。

第二十五章 陶斯報告

舉行專家委員會的主意似乎發動於一九二二年美國國務卿休士。那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在紐海芬 (New Haven) 的美國歷史學會演講時，他提議召集一個『各國金融界最有權威的人』的獨立委員會來商議歐洲的戰爭賠償問題。(註一) 專家委員會的設立正就是厥重爵士在他八月十一日的著名而不幸的通牒裏所擬議，而被普恩加寶斷然的，並且用了微帶輕視的文字拒絕了的。假使普恩加寶仍存心阻擋一個考查德國償付能力的委員會的成立，他本可以辦到，因為由於賠償委員會裏法國主席的投票，他可以控制該會。明白得很，如今他已用不折不撓的意志贏取了普爾的勝利，普恩加寶是準備通融的。因此厥重爵士在他永別外交部前，還能看見他的政策開始成功。種下的果實留待麥克唐納 (Ramsay MacDonald) 的採掘。

(註一) New York Times, Dec. 30, 1922, pp. 1, 2.

十一月終斯脫拉斯孟的政府在德國倒了，新總理麥克斯（Marx）在位，可是用着那位缺少不得的斯脫拉斯孟做外交部長，十二月十五日普恩加齊在巴黎接見了德代表代理大使賀煦（Hösch），這是魯爾開始佔領以來第一次。

賠償委員會設立的第一個專家委員會，要考查使預算均衡和幣制穩定的，在該會巴黎會所亞斯托利亞旅館（Hôtel Astoria）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四日開第一次會。委員有美國的陶斯將軍（General C. G. Dawes）和楊格（O. D. Young），英國的金特士來（R. M. Kindersley）和斯當普（J. Stamp），法國的派孟地（Parnentier）和阿利克斯（Allix），意大利的皮乃里（A. Pinelli），博士和弗洛拉（F. Flora）教授，比利時的霍達特（Houtart）和弗朗葵（E. Franqui）。開幕時陶斯將軍說到阻礙世界政治常識的通路的困難。這種對於常識的抗拒，使坦白的公民震驚：

他初未認清必先掃除的阻礙，這種阻礙起於國家的驕傲自大和各盟約國官吏的自私自私，因為他們的權力是要受任何強制的協約國間的協調所影響的；（這種阻礙）又起於各國的國

家主義的煽動家，那輩齷齪逐臭的兀鷹的不斷的誣詞捏造，和令人不耐的驚歎詞句，他們是想要在普遍的不幸中間出風頭的。

陶斯將軍隨着指出所有的軍事當局怎樣的相信統一指揮之必要，可是直要經過四年的不順利的戰爭纔能誘引協約國政府成立統一的指揮。促成協約國在戰時完全的合作的是什麼呢？『沒有什麼，只是一個極大的危急而已！』一個平常的賠償計劃，把常識注入在協定裏面，這便是陶斯將軍略舉的第一個委員會的目的。法國的公衆因他沒有說到法國要求的公正，覺得失望。法國既是被認為『握有時局的鑰匙』的，法國的善意顯然是像專家委員會的技術和常識同樣地重要。所以兩委員會的最後成功不但要推崇專家們，也應推崇法國的公道。

第二個委員會，職掌估計自德流出的資本價值和如何使牠回來的的工作，於一月二十一日在巴黎亞斯托利亞旅館開第一次會。委員是美國的羅賓生 (H. M. Robinson)，英國的麥金那 (R. McKenna)，法國的勞隆阿塔林 (Laurent-Athalin)，意國的亞爾培 (M. Albert)，和比國的姜生 (A. E. Janssen)。主席麥金那答應委員會當前的問題要用商業精神來考查，並且

要用無畏精神來宣布其結果。美國人的出席於委員會，不但提及了，而且歡迎了。美人僅以私人的資格來會，但大家知道美國國務部准許了他們接受委員的職務。可是他們是完全自由完全獨立的；他們的費用由自己掏腰包。（註一）

隨後的兩三個月賠償的外交，暫時風停雨息。法人依然在魯爾，但是這種估領是儘可能的變爲無形的。向來要一百萬鎊一個月的估領開支（註二）這時減少了，煤的繳付與煤稅的收入是增加了。協商復歸和好。然而在美國有種談論——似乎是無稽的——說是英法或許要開戰。（註三）但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九日英首相包爾溫（Baldwin）從亞來朋（Aix-les-Bains）短期休假回來，曾抽身到巴黎訪普恩加齊。這兩位政治家找出了一個簡單的公式來重訂協商。

當日下午的官報載道：

（註一） New York Times, Jan. 9, 1924.

（註二） Times, Nov. 27, 1923.

（註三） New York Times, Aug. 14, 1923, p. 2.

不要希望，普恩加費和包爾溫的會晤能有任何確實的解決。但他們覺得很高興的成立了一個共同的諒解，並且發見了在任何問題上概無宗旨的不同或原則的相反，能妨礙兩國的合作，而這種合作與全世界的安定與和平是大有關係的。

可是要鞏固協商非一紙官報就能濟事的。真使協商的鞏固成爲可能的，乃是魯爾消極抵抗的停止所給與普恩加費的勝利。當麥克唐納做了首相時，他就抓住這個空氣漸佳的機會，向普恩加費伸手言好。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這是他做首相後第四天，麥克唐納便發了一封和善直爽的信。普恩加費一月二十八日的回信是同等的和善直爽。其中一段有深深的意義：

假如我們必須顧及各自國內的輿論，假如我們都必須保障自國的利益，我相信，各在自己的範圍內，以你所云有力的行動和善意來解決起於我們間的種種問題，必能維持英法間的合作政策，這種政策對於我們兩國和世界的安寧都有切要關係。

二月二十一日麥克唐納擬使協商更形親睦，特向普恩加費解釋英國公衆所反對的法國政策裏的那幾點或是假定的那幾點。

麥克唐納表示「安全」問題是糾紛的根本，但安全「不僅是一個法國的問題，乃是一個歐洲的問題。」他建議不妨用局部的解除軍備或是在若干國家間創設中立的地帶以解決這個問題。爲要討論賠償問題（該問題與協約國間的債務，在麥克唐納意中都可以解決的），專家委員會的報告是必須等候的。

普恩加賚的答覆特別否認法國志在大陸的霸權，或是除阿爾薩斯以外她有取萊因爲國界之意。這答覆是妥協的而且是健全的。感情之全然滿意的表示。但這種首相與總理間的信札交換，曾否使協商有所改善，還是疑問。

第一個專家委員會，即陶斯委員會，和第二個專家委員會，即麥金那委員會，他們的報告於四月九日（一九二四年）交到賠償委員會並於同日公布了。第一個委員會的報告附帶了一封信，其中陶斯將軍聲稱報告裏包含的計劃是根據「公平，公允，和相互利益的原則，不僅是德國的債主和德國自身，並且全世界對此都有重大持久的利害關係的。」該委員會構造這個計劃時採用的簡單規律是這樣的：

既然因大戰的結果，德國的債主們正竭盡能力在付納賦稅，那麼德國亦必年年竭力納稅。第一個委員會的特定目的是在顯示德國如何纔能均衡預算和穩定幣制的方法。牠發覺第一個先決條件是回復『全德財政的和經濟的統一』。這點的意思，即是所有被佔領的和未佔領的德意志關稅障壁必須撤除，法國的鐵道管理必須廢棄，而任何稅捐除歸入德國國庫者外均不得徵收。在完全的財政和經濟統一的假定上（委員會寫道）『樹立我們的整個報告的基礎。』

『如果德國的現狀正確地反映她的潛伏的能力，』那麼委員會的工作將沒有成就的希望。但事實上德國有着滋長和勤勞的人口，技術的藝能，高度發展的農業的堅實基礎，水礦林木的物質儲藏，將來繁榮所必需的元素全都有了。還有大戰以後，德國『器械設備正在改進。』電話，電報，運河，和鐵道各項交通工具全都改良了。沒有吝惜費用。『末了，實業家得能更增加那種完全新式的裝置，到如今應用於無數工業裏，生產的數額較之大戰前大得多多。』德國現時真正缺少的唯一的東西是信用：陶斯委員會有一個計劃來應付這種困難。『毫不過分樂觀，可以預料德國的生產使她能滿足自己的需要並能籌出本計劃擬定的數額以履行賠償義務。』

該委員會首先着手幣制穩定的問題。自從用了『倫吞馬克 Rentenmark』得到了幾個月的穩定，『但其基礎如無其他種辦法只能是暫時的。』委員會如今提議把所有多種行使於德國的紙幣逐漸收回，另成立一個有獨家發行（註一）鈔票權的新銀行（或者把國家銀行（Reichsbank）改組。）新鈔票須有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的法定準備金。這樣幣制就會穩定下來（並假定預算也均衡了）——對全社會是一大福利。雖然有些人民會從『與貨幣騰價俱來的財產的驚人轉手』裏獲得利益，卻『對於勞動階級，不穩定完全是罪惡；牠甚麼賠償都沒有。』幣制過後，該報告轉到預算問題；爲使牠均衡起見，『該預算須解除條約上的迫切繳付，這點雖置預算於鞏固的地位，但並不包含爲協約國所不可缺少的貨物繳付的停止。』

該委員會於考慮德國能賠償若干的時候，認爲有兩個原則必須認爲基礎的。一個是德政府的內部開支必須減至最低限度。

第二個原則是一方面德國的債主固應分享該國繁榮的任何增加，但不應有一種無限責任。

（註一）若干邦銀行的有限制發行鈔票額不在其內。

最後關於償付的辦法，該委會建議加於德國納稅人的負擔，應相稱於協約國納稅人所負擔的；國家歲入超過最低必要的內部開支的賸餘，應以金馬克記入協約國的帳上；而且這些馬克應隨時『按照（當時）匯兌地位的實在能力』折成外國貨幣。因此在賠償委員會的計劃裏兩個問題是分開的：第一，籌出最高可能的款額以付賠償的問題；第二，將該款的價值用現金、貨物或服役轉送入協約國裏。

根據以上這一切原則，賠償委員會提議謂德國應從三項來源償付：（一）從她的平常的預算；（二）從鐵路公債票和運輸稅收；（三）從實業的債券。

關於第一點，委員會相信假如條約的繳付能以暫時的解除，那麼一九二四年——二五年的德國預算就能『以一種有力的國內的努力』得到均衡，用不到借什麼債。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的預算也許稍爲有些賸餘，但委員會仍建議不應令牠勉強擔承任何條約的償付。所以這種償付（從預算的擔負一方面而言）只能從第三年（一九二六——二七年）開始。要在預算裏提出的償付應如下列：

一九二六——二七年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

一九二七——二八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

一九二八——二九年與此後各年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

所以，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是應付賠償的時期內要從平常預算項下取償的標準數。

第二，該委員會提到鐵路問題，按自休戰以來，各鐵路的經營向在繼續增加的損失中。

德國的鐵道管理對兩樁嚴重的控告，無可聲辯，只能服罪。第一樁，雖說八小時工作制的引用以及和平條約上的義務足為暫時紊亂的口實，但用人仍嫌過於濫多，這點可以現在能辦到的裁員為證明。第二樁，該管理任意作浪費的資本費用，這點官方的藉詞，謂從事建設大半為的是對付失業問題。

該委員會相信鐵路於開銷外，能提出一大筆贏利以作賠償的繳付。委員會所諮詢的鐵道專家們勉強地得到了一個結論，說是要獲得贏利非將鐵道的經營權從政府手裏取出來不可。『過

去政府經營鐵道的整個精神端在爲德國實業謀利益，至於增加政府收入僅其次要者，故他們的意見以爲必須完全斷絕舊時的習慣。」

委員會提議鐵道應照公司組織來經營，與政府脫離關係。各鐵路的資產總值估爲二六〇億金馬克。此數內以一〇億抵發第一抵押公債，利息爲百分之五，並以百分之一爲減債基金。這些債票發給協約國，把利息算做賠償的一部分繳付。在平常年度利息與基金總計可達六六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但在一九二四——二五，二五——二六，二六——二七諸年份，特許減少繳納。

(註一)

(註一) 陶斯委員會建議的數額如下：

1924—25.....	330,000,000	金馬克
1925—26.....	465,000,000	金馬克
1926—27.....	550,000,000	金馬克
1927—28與此後各年	660,000,000	金馬克

除一一〇億公債票外，該鐵路公司須有二十億優先股分與一三〇億普通股分的資本（合成二六〇億總資本）。二十億的優先股中，應以十五億售諸私人，以供鐵路上未來的開支；其餘五億的優先股與所有的普通股都歸德政府掌握。

該鐵路公司應由一董事會主持，董事十八人，其中九人由德政府與優先股的私人股東派選；此外九人則由公債票的受委託人指定，其中五人可為德籍。

既討論預算和鐵道籌款作賠償繳付的問題以後，委員會繼即提議從德國實業內作常年的繳付：

委員會深覺從德國實業內籌款以應賠償的公允和妥善，其數不下五十億金馬克，以抵發第一抵押公債，擔負百分之五利息並百分之一常年減債基金。此項公債票額較之大戰前德國實業的總債務為小。那種舊債務多半已用跌價的貨幣有名無實的償付了，有的簡直是消滅了。

鑒於事實上德國國內流動資本枯竭已極，委員會建議此項實業公債票的利息第一年應完全免除，在第二年内應為百分之二·五，第三年内為百分之五；此後均按百分之五利息與百分之

一 減債基金償付。

假如上項規定完全實施，那麼德國在標準年（即第四年以後）裏總計應償付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亦即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鎊。第一年裏只須從外債與鐵道公債票利息項下償付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該款按照斯派協定（Spa Agreement）規定的比例，攤派於協約各國。

一切賠償賬下的繳付應付入發行紙幣的銀行（爲統轄德國幣制而設）存入『賠償繳付代理人』名下。這個代理人是賠償委員會下面的一個有協調作用的官吏。他應由五個熟諳國外匯兌與金融事務的人襄助，這五人代表五個協約與參戰國。他們協同組成一個委員會，購買外匯以輸送現金於協約國，並且規定賠償繳付內用貨物交納部分的程序。

陶斯委員會又建議，爲擔保賠償的如期繳付起見，海關煙草酒精啤酒糖各稅應歸一公正的管理機關經手。該管理機關應先將條約上的繳付扣除了轉入協約國賬下，每年以餘數交於德國。在該委員會計劃實施的第一年內，委員會以爲德國必須借一筆外債，計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金馬克。這樣取得的款額應用於設立發行紙幣的新銀行，用於穩定幣制，並用於資助貨物的交納及德國境內佔領軍隊的消費，以及諸如此類對協約國的債務而不必運現金出國境者。

該委員會的計劃規定一個發行紙幣銀行的長官，一個鐵路的長官，一個管理國家收入的長官，和一個賠償繳付總經理。該總經理不僅應接收賠償賬下的繳款，並調度將該款輸往協約各國，並且是各長官與各副官中間的一個協調官吏，和賠償委員會與各長官間的一個中間人。賠償委員會仍保持牠在凡爾塞條約下最高權威的一切原有權力。此外還要有一個鐵路與實業兩項公債的受委托人。該總經理與受委托人俱由賠償委員會指派。照這個陶斯計劃成立的組織的各項經費，及佔領軍隊的消費，都包括在德國規定應償的年金裏面。

按照陶斯計劃，在一標準年裏，德國總共繳付之數，可減免協約各國納稅人二五億金馬克（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鎊）並外加德國的繁榮指數而定的增加額。在他方面，對於德國納稅人只須擔負該繳付數的一半，其餘之數由鐵道與實業兩公債的利息供給。這種利息本身不能視為一種新的負擔，因為此數僅及德國戰前的鐵道與實業債務額的百分之三。按此項債務自大戰以來

已因馬克跌價而消滅了。該委員會並不佯稱牠使德國輕而易舉，但聲稱牠使『一個本來是，也應該是，難重的負擔』(註一)變得切實而且可以忍受，而且還能很快的清償。可是德國必須繳付的賠償數額僅抵她本來要付的內國戰債的一半，假使馬克的跌落沒有把戰債實際消滅的話。(註二)末了，陶斯將軍在他的與報告一起送往賠償委員會的那封信裏，他稱頌他的同事們的見解，卓然獨立的思想，和高尚親愛的精神：

要是他們的工作，我如今奉上的，可以幫助你們履行你們的偉大的任務，這便是他們的祈禱，如果這點做到了那就是他們的圓滿的報酬。(註三)

麥金那主席的第二個委員會與陶斯委員會同時報告。牠的目的是估計馬克跌價時流出的

(註一) Report of First Committee of Experts, Part I, § XIV.

(註二) 同上 Part II, § II. 協約國同時亦在償付自身之戰債計六十億(金馬克)。

(註三) 該項報告發表多次了。美國官方的抄本，連同麥金那主席的第二個委員會的報告，於一九二四年由華盛頓政府印刷所印行了。

德國資本額和使牠回來的的方法。

自從休戰以來，泰半由於把紙馬克賣給外國人，德國的資本流往國外，外國的貨幣到了德人手裏。關於這點，該委員會報告道：

這是值得注意的，照這種方法取得的外國資財總計自七密略特（Milliard）（十億）至八密略特金馬克之間，此數由於馬克最後跌價的結果全部為百萬以上曾經購進馬克信用的外國人所喪失。

這些外來資財自被德人取得之後，曾用掉一部分；該委員會以為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德國所有國外的總金額是六十七億半金馬克。此外還有外國貨幣在德國內的計約一千二百兆金馬克。

至於第二問題，即如何使輸出的資金回來，該委員會認為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祛除流出運動的原因。濫發紙幣必須永久制止。』馬克一旦穩定了，信用與貿易的需要將使輸出的資本回來。

在德人掌握中的六十億或七十億外國幣制，如能汲取，可以形成一筆有用的款，從中德政府便能重新起手繳付賠償。卻是照陶斯計劃協約國後來所採取而為德國所接受的辦法，（註一）並沒有向這筆款打主意。無疑地根據對外貿易的平常行動，外國幣制帶回到德國來了，並且有助於德國經濟的正常運用，這種正常運用為賠償的繳付所繫。

（註一）陶斯計劃建議，除固定的數額外，德國須按照混合的指數表繳付一種變動的額數。以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為根據，拿這幾年的平均數為基礎來計算，如果鐵路運輸，對外貿易，煙的消費等等增加，那麼陶斯每年償金便隨之為比例的增加，不過德國須保留增加的大部分，使她仍然有向前發展的原動力。

第二十六章 倫敦會議

普恩加齊老是說法國要照德國實際的繳付之數纔能比例地撤退魯爾。事實上，自從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魯爾佔領後，德國無論現金或貨物都沒有償付法比絲毫。(註一)可是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因在普選裏擁護他的人大告失敗，普恩加齊便辭了總理之職。究竟這次失敗是由於法國選民對普恩加齊的外交政策的反動，(註二)或是由於法人對直接徵稅的顯然難犯的嫌惡，殊未可知；因為普恩加齊終於停止用借款的方法來補足預算的政策，並且於擲節行政經費至四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之多以外，又提議對賦稅作動人心目的增加。

總理之後，繼以總統米列朗一向太明顯的贊助普恩加齊的政策，以致如今，因為輿論反對普

(註一) 德政府對意大利的煤的繳付仍繼續至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一日為止。

(註二) Mr. George Glasgow 相信確因外交政策之故，見 Macdonald as Diplomatist (1924出版) p. 77.

恩加賈頗烈，只要米列朗在位一日，沒有人肯出擔任總理。有一個強幹的人物馬沙爾（François Marsal），他確出來接事組織了一個幾小時的政府，但不能得到國會的信任票。米列朗的任期還有三年，他不能做沒有總理的總統，於是他便辭職了（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六月十三日加斯東杜美格（Gaston Doumergue）被選為法蘭西共和國第十二任總統。杜美格是一個『靠得住的』人物。他擔任過許多職務，包括總理一職在內；他自從一九一〇年以來便是參議員；他曾不響的與晚近十五年來一切重要的政務發生過關係，並且沒有做錯過什麼。他的堅固的才能像愛爾伯總統（President Albert）對於德國那樣的有用於多事之秋的法蘭西。

赫禮歐（Edouard Herriot）於六月十四日以國會大多數的信任就總理職，他是衆議院急進政團的領袖。赫禮歐是一個有文學及研究趣味的人，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向為參議員，到了那年因為要做衆議員便辭了參議員之職。他在里昂市長任內，贏得了有效能的名譽。『赫禮歐本人是心廣體胖，不甚注意修飾，一個吸煙筒和喜歡好食品與美酒的人。他讀書很多，藏書也不少。』（註一）

赫禮歐接事時聲稱接受陶斯計劃爲他的政策之一。這一點既然也是英政府的意見，欲謀英法合作殊非難事。赫禮歐赴英的行程預備好了。他於星期六下午抵維克多利亞火車站。他從倫敦逕乘汽車赴英首相的鄉村官邸乞坎司（Chequers）麥克唐納（像法新聞記者所記）穿着運動衣——短袴和哥爾夫短褂在那裏接待他。赫禮歐也帶了同樣的輕便衣服來，翌日就穿了和英首相在官邸的場地上散步，吸煙，在草茵上閒坐。他們前一晚上從十點鐘談到了早晨兩點鐘。赫禮歐在星期日下午回到倫敦，訪了英國無名英雄之墓，便於翌晨渡海峽回至巴黎。

倫敦發出的官報聲稱乞坎司的非正式討論啓示了英法政府間的普通的協議。並且決定了視其他協約各國政府的便利與否而定，至遲不過七月中旬在倫敦舉行一個會議；又決定了英首相與法總理應一同出席於日內瓦的國際聯盟大會的開幕。

倫敦會議於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六日開幕。雖然環境不甚有成功的指望，可是有三件事是大有利於牠的。第一，牠有個完密的計劃——陶斯計劃——來討論。第二，牠不僅有美國代表們的出

(註1) New York Times, June 15, 1924, p. 3.

席，並且還有他們的樂願懇摯的合作。第三，牠只有一件事要商議；其他兩個——安全與協約國間債務——爲向來的會議裏所常有而且妨礙會議進行的問題，延至將來的會議討論。

會議在英國外交部舉行。麥克唐納膺選爲主席。想起他在大戰時期內的堅主和平的態度，他的歡迎『在大戰時與我們共同在一邊作戰的各國代表諸君』的開幕致辭，洵屬他接受已成事實的一種優雅的表示；既做了英國的首相，他就承認他本國在戰爭裏與和平裏的一切責任。他對於戰後國際交涉的按語是同等地警闢：

戰後的問題是錯雜而且很多，照天然之理我們不能常常把他們一一看個清楚。但我們每經一次意見的差異，我們每有新的證明：如果我們的勝利真要使歐洲大國小邦都享太平，就非團結一致不可。

自大戰以來西方國際政策上最險惡的地方是牠不僅『沒有產生預期的賠償』而且還打開了『一種迫切危機的暗慘的瞻望』。『陶斯計劃的善意接受和協約各國的此次聚會造成了一個機會，這機會必須把握去『創造比較歡愉的瞻望』。一件事是必要的：陶斯委員會的報告，倘如

採取，必須整個接受：『我們切莫去更改他的細節，否則我們將退回到舊日意見差異的境地。』
他的題目（麥氏意指安全與協約國間債務）必須嚴握諸討論之外：『把一問題牽連另一問題的要不得的習慣，對以往任何問題都解決不下的失敗，負有大的責任。』

一言以蔽之，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的利益與我們的政治智慧的概念能否調和一致？』『我相信他們能夠的，』麥克唐納斷然說。他的信仰，他的退讓的辦法，他的耐勞忍苦的魄力證實了他的信念。

倫敦會議的成功人物是麥克唐納與開洛格（Kellogg）。這位美國首席代表，同時又是派到聖詹姆斯（St. James）的大使，他曾以共和黨參議員的地位，投票贊成美國加入國際聯盟的。前此諸次會議上美國曾遣派『觀察人』出席，但這是第一次會議，在其中商酌的計劃是美國政府曾經誠摯認可而且亟欲觀其實現的開洛格和他的同事洛更大佐（Colonel Logan）並不是正式到會的代表，但他們這次以觀察人的資格出席所包含的意義不僅止於旁觀的。該會議是『得到正式的保證：美政府很關心陶斯計劃的實行。』（註二）據一個『陶斯專家』（相信是

楊格) 接見柏林時報 (Berliner Zeitung) 記者的談話, 稱陶斯計劃成功所繫的那筆貸給德國的借款, 大部將於美國募集。(註二)

該會的工作, 像其他許多會議一樣, 委員會的工作多, 全體會議的工作少。列強在各委員會都有代表參與, 委員會計有三個 (關於制裁, 德國財政與經濟的統一, 和賠償繳付的移轉。) 各小國——希臘, 葡萄牙, 羅馬尼亞, 和巨哥斯拉夫——共在每個委員會裏只有兩個代表, 不比每個強國都有三四個代表。

否戰是在第一個委員會裏發生的, 該會職在考查德國故不履行的制裁問題。爲德國籌措一筆協約國間借款的可能與否, 須視這個問題的解決; 而整個陶斯計劃的成功又繫於這一筆借款。如果賠償委員會裏面有了法主席的表決投票, 始終惟法方的意見是從, 能够宣告德國故不履行; 再者, 如果法國按照凡爾塞條約第八部附約二的第十八款能够採取單獨行動並且實施制裁, 那

(註一) New York Times, July 1924, p. 12.

(註二) 同上, p. 1.

麼沒有一個投資家願借一文錢與德國，因為他們沒有保證再佔領魯爾時，不會驅德國入於絕境。赫禮歐已許下法國議會，謂在倫敦會議上，法國的凡爾塞條約權利不會減少的。因此有名的凡爾塞條約第八部附約二十八款不能有所改變。法國保持她在侵入魯爾時所實施的單獨干涉的權利。那麼實行陶斯計劃（包括那筆國際借款）的真關鍵分明是在賠償委員會。如果這個仍有職責宣布德國任何種不履行的機關繼續在法國控制之下，那麼各國的投資者決不肯冒險借款給德國的。當然，要是美國能按照凡爾塞條約原議派一代表到賠償委員會，該會的形勢就完全不同了。如今在這種僵局裏看來毫無出路，直到制裁委員會在第一次開會時，開洛格的同事洛更大佐被問到，若是一個故不履行的問題要待決定時，美政府肯否派一代表出席於賠償委員會。

這使該委員會裏的法國總代表白勒地 *M. de la Peretti de la Rocca* 吃了一驚，他

（洛根）立刻答道他的政府對此事不致反對。這種宣言是戰後諸會議裏最有劇情的事端之

一（註一）

（註一） *Glasgow, Macdonald as Diplomatist, p. 157.*

除掉得到一個美國代表的大勝利之外，該制裁委員會又能議定任何德國的富源凡保證擬募之借款者，對於『凡因實施制裁而發生的任何富源』應有絕對的優先權。牠又規定假如不履行時，關係各國政府應會同商議應採的制裁的性質。因此按照附約二第十八款的法國單獨干涉的形勢無論如何是太太的減少了。（註一）

據說自從倫敦會議接受了制裁的各條款後，『德國覺得很整慌，威廉街（德政府所在地）爲之震動』（註二）只有國家黨是欣喜的。他們以爲這樣一來，會議草約將爲德國人民所拒絕，他們就能推翻麥克斯的政府。（註三）可是倫敦的外交空氣繼續有進步。七月十九日美國國務卿休士蒞臨出席英美律師協會。他堅稱此來純屬私人性質，全無官場作用，但他竟至聲稱『美國輿論非常贊同原定的陶斯計劃。』

（註一） Le Temps, July 19, 1924.

（註二） New York Times, July 20, 1924, p. 1.

（註三） New York Times.

七月二十八日會議差不多到了悲境，因為要負責發行那筆國際借款的全部或大部分的英美銀行家，他們認為如果故不履行的決議與隨後的制裁繼續籠罩着德國，德國不能為該借款提供適當的擔保。比首相兼該會議代表的採尼斯的一切坦白的建議，和開洛格與洛更的一切聰明的言語，都不足以解除這困難。再者，赫禮歐在巴黎的地位是很不穩固的，但是他勇敢地不放鬆他在倫敦的工作。終於在八月二日得到了一個協議，可以滿足銀行家們的合法的疑慮。新的方式是如果賠償委員會僅以多數表決宣告德國故不履行，少數能向一個公斷委員會上訴。這個公斷委員會由賠償委員會全體一致通過委派，任期為五年，如果得不到全體一致，那麼就由海牙國際永久法庭長委派。一切都準備了以待被邀蒞會的德政府代表們前來。法國巴黎的時報 (Temps) 在一篇明達的社論裏否定柏林傳來的驚人的謠言，並稱德國的政治與經濟情形是充分地良好，不致於引起德國代表們的膽怯或是不安。(註一) 這種話也可以拿來說倫敦的情形。

德總理麥克斯，外交部長斯脫拉斯孟，和財政部長路德於八月五日晨抵倫敦。他們是里

(註一) Le Temps, Aug. 4, 1924.

(Ries) 旅館裏的英政府的客人。正午會議在英外部聚集，德國代表們出席，麥克唐納向德人作了一篇客氣的但是堅決的演說。『本會議的唯一業務』他說，『是討論施行專家報告而起的事件，我以主席地位必須約束本會注意於這一點。』麥克斯的答覆頗蒙稱善，因為他沒有提及戰爭禍首的問題。他是一個有數的德國政治家，雖在最微妙的談判裏能不談到這個問題的。

法比兩國政府允諾把一切『魯爾』的囚犯，除非犯殺人和同盟罷工毀壞財物罪的，都宣告大赦。關於軍隊撤退問題，以及法比鐵道人員的僱用，認為這些問題不在陶斯報告之內，所以不在倫敦會議的範圍以內。他們必須由德國與法比直接交涉處置。德人同意了。據說美國務卿休士，他的私人旅行從倫敦推廣到了柏林，他竟越出了他慣有的緘默，告訴德國領袖們說倫敦會議是他們最後的機會。(註一)

八月九日，星期六，法國有一個內閣危機。赫禮歐已赴巴黎與他的同僚會晤，徵求他們的同意，尤其是陸軍部長諾爾列特將軍 (General Nollet)，關於十二個月內魯爾撤兵的同意。『諾爾

(註一) New York Times, Aug. 7, 1924, p. 1.

列特將軍的約制，助以福煦元帥慣常的溫和中庸，挽回了一個內閣的危機和該危機必然造成的倫敦會議的破裂。〔註一〕『倫敦會議繼續』法國時報得意地宣稱。〔註二〕

德國代表們依然希望達到魯爾立即撤兵，據說德國人民的輿論現狀不准他們代表在這點上作任何讓步。德國國家主義派在國會裏用和平辦法或用苦迭打，不但常有推翻麥克克斯的政府的機會，並且實在很有可能。據說愛爾伯總統個人出來干涉，警告德國各政黨說是赫禮歐政府在巴黎立定或推倒全在一個十二月撤兵期的問題上面。赫禮歐的推倒無異是法國國家主義派的勝利，與普恩加賽的回來。〔註三〕這種前途，他們一旦認清了，分明足以使德國各黨同意赫禮歐的二個月期間。赫禮歐在他的方面放棄法方保持法國人員於萊因鐵路上的要求（比利時也允撤退他的鐵路人員）在這些條件上，麥克克斯纔能於八月十六日簽字在倫敦草約和牠的附約上面。

〔註一〕 Glasgow Macdonald as Diplomatist, p. 173.

〔註二〕 Le Temps, Aug. 11, 1921.

〔註三〕 New York Times, Aug. 16, 1921, p. 3.

馬克唐納在末次全體會議上說，『我們供獻的是大戰以來第一次真正商就的協定。』這位英首相主持倫敦會議的那種技術，忍耐，堅定，圓通，宜受很高的讚譽。倫敦會議是他的一生的高峯，他應享不朽的高名；爲了這樁良好的工作，他犧牲了許多別的利益，並且讓他的政府的政策走入危險的路中。但是倫敦的磋商矗立於一切錯誤之上，並且把他與偉大的和事老，那些自從中世紀結束以來建起歐洲局面的公會政治家，並列同稱。

會議的協約包括一個草約和四個附約。草約列舉派有代表出席倫敦會議的各國——比利時，大英帝國，法蘭西，希臘，意大利，日本，葡萄牙，羅馬尼亞，巨哥斯拉夫，和德國——會同受有特別規定的權限的美國的代表們。『賠償委員會的代表們亦到會。沒有實際的條約，但這草約登記了一個有約束力的協議，等於一個條約，牠要實施專家們的計劃。』

這草約結束了大戰以來最成功的會議。美國大使開洛格在一篇最後的演說裏宣布他的信心說『賠償的解決，國家財政的調整，和德國的恢復，是歐洲明日興旺的根本。』（註一）他着重該

（註一） Proceedings of the London Reparations Conference, July and August, 1924 (Omol. 2270 of 1924), pp. 97-8. 此項英國議會文書 (Parliamentary Paper) 包含有最後草約，各附約及其他公文。

會議的另一個特質：『把解決國際爭執付諸公斷的原則之承認和推廣。』

第二十七章 俄羅斯

任何國家不能無行政官吏，任何國家不能無外交關係。俄國一九一七年的波爾寧維克革命，凌亂了沙皇的文官制度，毀壞了俄國與其他各國的交際。這兩件事是必須恢復的。行政系統並沒有完全毀壞。公務人員除非是兇狠地被驅逐，總是留在他們的衙門裏處理他們的平靜的工作的。所以，如法國幾次革命發生的情形一樣，在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一九年的革命月份裏，始終有一批熟練的僚佐聽受抓到政權的那輩人的命令，執行各機關的事務。處理公務常規的方法沒有改變過，那些新部長或『人民委員』自然去適應那原有的辦公技術。不僅是下級的僚佐們留在他們的公事桌旁邊；在每一機關裏有些地位很高的官吏，也與新統治相切合。因此，如外交部或軍政部的組織雖在蘇維埃的下面，但與舊日在沙皇的下面並不像預想那樣的不同：全體人員只有部分的更換；可是效能的標準大大減低了，原因是引用了因政治關係得到位置的不相宜的人物。

如果外交部是立即改組了，國際關係卻並不這樣容易回復。蘇維埃政府曾宣言階級鬭爭的存在；牠曾聲明牠對世界革命的同情；牠並且否認了俄羅斯一切的國際條約，政治的或金融的。明顯的，牠一天抱着這些見解，牠一天不能進到通常的國際關係。可是一個國家要沒有外交關係而生存，比之一個人要沒有社會關係而生存，差不多同樣的不容易。在實際上，假如不在原則上，蘇維埃政府漸漸地自安於承認其他歐洲各國的現存尋常的制度的必要，並且自安於遵照國際禮儀的公認習慣來處理牠的國際事務。

可是在俄國能夠進到常態的國際關係以前，牠顯然有停止內戰的必要，特別因為知道外國政府是在援助內戰裏的反革命勢力。

在巴黎和平會議上曾擬使俄國所有的各派聯做一起。反波爾雪維克的派別早已有他們的代表在巴黎。路易喬治提議邀請蘇維埃政府的代表前來。可是又慮他們到巴黎不合適。於是就選了馬爾摩拉海裏一個小島名普林基撲 (Prinkipo) 爲集會地。請帖於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發出了，並且用無線電傳播到莫斯科。當時在巴黎的人，大家應記得這個提議引起的騷動。但是

牠沒有結果。蘇維埃政府準備蒞會，但以列強允許『不干涉俄國的內政』爲條件（註一）然而反波爾雪維克各派不願意，並且事實上法國政府也不願意。

可是不久之後，另一顆星，顯然有光明的希望之星，升起了又降落。這便是威廉布立提的使命。布立提是主持美國和平代表團的情報的一個新聞記者。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他由藍辛派往俄國，耽擱了一星期。（註二）布立提取得了蘇維埃政府對協約國條件的接受回來，這是外交部人民委員其克林和他的助理李維諾夫（Litvinov）代表政府允許的。主要的條件是承認舊俄帝國對外國的金融債務。此外還有關於大赦政治犯，及關於通過舊俄羅斯帝國各部的權利之條件。其中關於外債的擔任顯然是最重要的，因爲否認了這些契約，所以蘇維埃政府纔和歐洲割斷了，纔和一切契約的關係割斷了。

（註一）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VI, 313.

（註二） The Bullitt Mission, Testimony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New York, 1919).

蘇維埃政府對牠的這樣讓步附帶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在四月十日前接受他們。布立提回到巴黎時，他起初頗受路易喬治和霍司大佐的鼓勵，但不久就冷淡了，最後蘇維埃的條件終成了陳蹟。布立提把這個結果歸之於科爾札克 (Admiral Koltchak) 主持的渥姆斯克 (Omsk) 政府的軍隊突然挺進了一百英里；農民起來反抗蘇維埃，波爾雪維克人的末日似乎將臨了。

蘇維埃不難與東方的隣居，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中國規復外交的關係。蘇維埃割了卡爾司 (Kars)，阿達汗 (Ardahan)，給土耳其，保持了巴士姆 (Batoum)；並且允許取消投降條約。中國人很高興於蘇維埃之允許廢除治外法權。蘇維埃在東方極力宣傳共產主義。

與西方文明各國，蘇維埃很少進展，除了在一九二二年商訂了拉派洛條約的德國以外。美政府不願理會一個不守契約的政府，因為契約是一切文明生活的基礎。法國想到承認一個共產主義政府後可能的社會影響，深覺不安。可是英國她大感戰後貿易蕭條的痛苦，至少急想和俄國通商。

因此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英國政府和蘇維埃政府便訂了一個通商條約。在弁言裏蘇

維埃擔任不作『任何企圖或爲軍事的或爲外交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行動或宣傳，以鼓勵亞洲的任何民族作反對英國利益或大英帝國的任何形式的敵對行動，特別在印度和阿富汗獨立國。』按照該約第一條，雙方都允『除去以往加於英俄間通商的回復之一切障礙。』（註一）

這條約有的是失望的結果。牠可以宣告除去貿易的障礙，但牠未能除去一切障礙中間最大的障礙，就是，俄國所有的對外貿易不論進出口都須由蘇維埃對外貿易委員經手。英政府又懷怨東方民族間的反英的共產宣傳沒有停止。

不列顛和蘇維埃政府發覺他們間的來往益見困難，因爲蘇維埃沒有遵守外交上的普通禮貌。一九二三年三月三十日英政府用非常溫和的文字申請蘇維埃政府輕免俄國羅馬天主教總牧師波克維基（Monseigneur Butkevitch）的死刑。類此的干預在文明國間發生過不少次，而且是不認爲越出國際禮儀的範圍的。

（註一）該約由英國 Sir Robert Horne 與俄國 L. Krassin 所簽，全文見 Parliamentary Papers, Cmd. 1207 of 1921.

蘇維埃政府的答覆是一個通牒，具名的是『維斯坦因』“G. Weinstein”（一九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內稱英國的申請是『一個不友誼的舉動並且是被俄國人民曾經勝利地排斥的干涉政策的重演。』維斯坦因又覺得『須提起』接到愛爾蘭共和國一個有關的消息，云及『英政府的偽善的干涉，對於愛爾蘭政治犯的被暗殺須負責任，在那裏因為英國的主使，男婦，和少女受野蠻及非人的待遇者有一萬四千人，同時因為英國的控制電訊，使文明世界無從知道這些獸行暴舉的駭人聽聞的詳細事實。』

維斯坦因的末了一節是這樣：

如果考慮到類同的事實，發生於不列顛治下的印度與埃及，那麼對於這種假名於人道與神聖的申請似難令人信服。

英國駐莫斯科的代表霍格生（R. M. Hodgson）翌日（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的答覆是：

『我良以為歉，閣下署名的三月三十一日的通牒，按其現有形式，我不能接受。』維斯坦因又覆一通牒：

職掌外交的人民委員以爲憾者即閣下認前請轉致貴政府的通牒爲不能轉致，故惟有另尋他法以其內容告知英政府耳。

蘇維埃政府隨即將該通訊公布了。

這種侮辱行爲的堅持引起厥重爵士草了一個覺書（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授命霍格生讀給其克林或李維諾夫或加拉罕（M. Karakhan）（主要的人民委員）聽。這覺書用了厥重爵士擅長的寬大服人的文格，細述近二年來蘇維埃政府破壞商約的種種行動，諸如反英的宣傳和對於英國的人民的暴行。至於維斯坦因的通牒，據厥重爵士說，不過是『在許多深思熟慮的侮辱裏』最近的一端，英國政府不能不要求（一）否認反英宣傳的行爲與代理人；（二）賠償受非法待遇的英國人民與船隻；（三）『明白收回維斯坦因具名的兩個通牒』。英國政府『不希望也不願意加入一種長時期的和有惡化可能的爭論』，故特知照必須在十天之內接受這些要求，否則商約即告終止。（註一）

（註一）維斯坦因諸通牒與厥重覺書俱載於 *Parliamentary Papers 1869 of 1923*, (Russia, No. 2).

實際上這哀的美敦書的時間是延長了，因為關於網魚船的三英里限度問題，以及關於犯反英宣傳罪的官吏問題，有些錯雜糾紛之點發生。可是在六月九日（一九二三年）的一個通牒裏，蘇維埃政府終於順從了英國的要求，維斯坦因與他的著名通牒不再現於外交的幕上了。在後來的交涉裏，蘇維埃政府的函件都寫得很不錯，措詞明白，謙遜，並且合於外交的文字。（註一）

蘇俄這時候在名義上與英法，是在一種交戰的狀態裏：換句話說，這三國與俄羅斯沒有訂過確定的和平條約，而且他們也沒有承認蘇維埃是合法的俄羅斯政府。或許確定的和平條約是無須的，因為戰鬪已經停止了，並且事實上，也沒有對俄宣戰過。如果西方列強承認蘇維埃政府，便可結束這種反常的國際關係情形。蘇維埃曾自行設法使牠的地位入於常規。一九二一那年俄羅斯發生飢荒（大半為共產黨充公和反對私有財產的政策所造成），蘇維埃便定下了新經濟政策：就是牠『恢復了私有貿易，私有小營業，及大營業的讓與和租借』（註二）大約同時蘇維埃又

（註一） Parliamentary Papers 1890 of 1923 (Russia No. 4)

（註二） 其克林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致威莊通牒，載 Parliamentary Papers, Cmd. 1546 of 1921 (Russia

宣稱『俄羅斯政府聲明準備承認一九一四年以前沙皇政府所欠其他國家與其國民的國債，但應有特殊的條件與便利，俾能實行此事。』這宣言是於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發的。(註一)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秉政的英工黨政府首相兼外交部長麥克唐納用電報拍一通牒往莫斯科承認 U. S. S. R.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爲『舊俄羅斯帝國所轄並認從其權威的土地的合法統治者』。在該牒內，英政府邀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派一代表至倫敦起草一個完全條約的預備基礎。這個請帖被接受了，會議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十四日在倫敦舉行。

主持倫敦磋商的是英國外交次長潘森比 (Arthur Ponsonby) 和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委員拉可夫斯基 (M. Christian Rakovski)。經過很長久和困難的談判，以及國會裏工黨議員們的不少干預之後，兩份草約 (一份總約和一份商約) 終於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簽了字，可是仍得聽候批准。

(註一) 其克林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致歐重通牒，載 Parliamentary Papers, Cmd. 1546 of 1921 (Russia No. 3)

這些條約從未見諸實行，但是在外交史上是很可注意的。以麥克唐納那樣最審慎守正的人，並且處處是他本國外交關係的光榮的保護者，他又是忙於德國賠償的偉大倫敦會議，他竟會把俄國談判交給他那輩空言理論昧於事實的人主持，那是出於故意，可想而知。結果是一個奇怪的條約，麥克唐納的名字雖然列在潘森比之前，算是第一全權，但他並沒有主持其事。即使麥克唐納沒有參加，這條約的形式和條款依然是不可解釋的。外交部的官吏諒必經過潘森比邀同參預草訂。如果有他們參預，這草約如何能經過他們手裏，而仍照最後印出的形式發出，真是莫名其妙。

且說那總約有一個最不平常的弁言：『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爲一方，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爲一方。』英王的尊號略去了，據推測的說法，算是對於蘇維埃情感上一種讓步。首相麥克唐納後來聲稱弁言中王號的略去，是因爲這是與一個無單一元首的政府訂約的通常形式，麥克唐納諒必誤聽人言了。美國的締結條約權並不在一個單一元首，而在總統和參議院。然而英美條約的弁言是這樣開頭的：『大不列顛與愛爾蘭聯合王國的君王陛下和美利堅合衆國。』

第二個奇異之點是蘇維埃政府一邊承認俄羅斯帝國借款與市政借款的英國債主的權益，同時英政府也准許蘇維埃有反要求，其根據是大戰期內波爾雪維克革命後英國之干涉俄羅斯。這無異是英政府承認了『間接的要求』“Indirect Claims”，這種間接的要求可以差不多無限制的。大家都知道波爾雪維克人開出戰費的估計，數目大過於他們曾經否認的應付的帝國借款。

無論怎樣，那項交回英國公債持票人的金錢，惟有出諸另一筆英國借於俄國的借款，按該草約第十二條英政府允勸國會擔保該款。

那個通商草約也有牠的潛伏的危險。第一條內稱『鑒於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對外貿易之權獨屬於其政府，』俄國貿易代表團的人員應視為蘇俄聯邦大使館的人員，應享受完滿的外交特權與免除權。這樣說來瑞士聯邦鐵道的官吏在倫敦也有同樣的理由，取得外交免除權了。

第十九條承認蘇維埃政府保留牠全部海岸貿易於俄國船隻的權利。既然，沒有規定地理的

限制，這條約分明使蘇維埃政府能阻止英船貿易於亞更吉爾（Arkangel）和巴士姆之間，這兩個都是俄國海岸的商埠，雖然整個北海地中海，和黑海隔在他們中間。（註一）

自那些草約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印行之後，輿論繼續不斷的反對。自由與保守兩黨都反對，這兩黨要是一致合作，可在議會裏佔多數。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議會解散了。十月二十九日舉行普通選舉。

自保守黨以大多數回到議會後，新外交部長張伯倫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一個通牒裏聲明英政府不能將俄約推薦於國會。

除大不列顛外，意大利也在一九二四年裏承認了蘇維埃政府，繼之以法蘭西、斯坎丁那維亞諸國、奧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與希臘。（註二）

（註一） 總約與商約的條文俱載於 *Parliamentary Papers, Cmd. 2215 and 2216 of 1924.*

（註二） 閱 *Toynbe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4, pp. 260-1.*

第二十八章 土耳其的復興

土耳其人簽了麻特羅斯休戰條約（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便聽憑協約國來處置他們自己。韃靼尼爾和博斯福拉斯砲台，交了給協約國軍隊；全個土耳其軍隊，除了爲衛戍邊疆和維持國內秩序必需者外，概須解散。休戰條約簽字之後，協約國的戰艦駛經韃靼尼爾海峽，拋錨於君士坦丁外面。（註一）

協約國官場中一般認定土耳其政府勢必離開君士坦丁。路易喬治的著名宣言（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我們作戰也不是爲要對土耳其，其褫去牠的首都或是小亞細亞與慈乃斯（Thrace）富沃馳名之地』——是有條件的一種獻議，要土耳其於該時該地停止對協約國作戰。

（註一）該城本身直到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六日纔由協約國軍隊佔據。閱 Grinnell Mears, Modern Turkey (1924)

p. 631; Select Document No. 19.

既然堅持作戰到一九一八年十月，土耳其人已經放棄了對那個約言的任何要求。困難之點在於找一個所有協約各國都能信託的佔領者。無疑的，英國可以證明是一個忠實的佔領者，但是要望別的協約國對這個解決稍加考慮，卻談也談不到。俄羅斯的波爾雪維克政府已宣言放棄沙皇條約裏的一切權利，不會接受君士坦丁，就是協約國也毫無把此地獻給牠的意思。那個把君士坦丁許給俄國的一九一五年三月的協定仍然是有效的。協約國仍然相信波爾雪維克政府也許會顛覆，有一個復起的俄羅斯的『布爾喬』政府能出來要求履行一九一五年的信約。如果這點落空，也許那人人相信的美國可以勸令接受君士坦丁的委託統治。『我們不能解決土耳其，除非我們知道了美國擬採的行動。』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七日路易喬治在歇非爾特 (Sheffield) 如此說道。時光這樣奔去。

君士坦丁這問題，普恩加費寫道，走的一條路徑簡直是來了又去了，去了又復返。畢勳 (M. Piclion) 在外交部長任內準備了一個『非常的備忘錄』申說，據他所見，協約國應留蘇丹在君士坦丁的理由。克利孟梭挾着這個備忘錄做武器，跑到倫敦和路易喬治商議，堅持這個提議。可是路易喬治

決然主張驅逐。亟欲遷就英方的意見，克利孟梭乃退而贊成『他的熱烈精幹的對手』因此當他回巴黎時，留下了法外交部一個重要官吏在倫敦，這位官吏是截然反對維持土耳其於歐洲的。到了巴黎，克利孟梭經過進一步的研究，又回到畢勳的結論上去，並且『以新生的元氣』主張維持蘇丹於君士坦丁。湊巧路易喬治也給他本國內的幾個顧問改變了信仰，如今在下議院裏『以最光彩的議論』贊助克利孟梭在倫敦主張過的，而且他曾經勸過克利孟梭無論如何暫行放棄的，那個見解。（註一）

既經決定蘇丹應該留在君士坦丁，又知道如今美國不肯接受委託統治，協約國於是能够在比較簡單的路線上與土耳其議訂最後的和約。但是土耳其人，他們有的是眼睛和耳朵，已知道協約國對土耳其問題並不十分一致，所以他們開始用他們的老辦法，閃爍規避，希望獲得有價值的讓步。也許是爲了遏制這種趨向起見，而有二月（一九二〇年）底英軍在君士坦丁登陸之舉，再有三月十六日米恩將軍（General Milne）統率協約國軍隊正式佔領陸軍部和海軍部以

（註一） R. Poincaré, 見 *Revue des Deux Mondes*, March 15, 1920, p. 478.

及市政府。

協約國允許蘇丹留在君士坦丁的決議，在一九二〇年二月底之前已經公佈。多遷延和多變化的政策給了蘇丹政府在談判裏相當的利益，可是牠終休想有良好便宜的條件。和平條約最後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在薩佛 (Sevres) 簽了字。(註一)

像牠在一九二〇年那樣的力竭，崩倒，無主意，土耳其的復興真是歷史上一件奇聞，不愧爲土耳其人民的元氣和他們的政治家的能力之一樁明證。這位政治家是瑪斯他法基瑪耳。

當蘇丹的大臣們正驚弱地在巴黎談判，協約國的軍艦正耀武於君士坦丁的時候，基瑪耳是在黑海濱的安實盧 (Erzeroum)。

這位非常人物是一個沙隆尼加 (Salonika) 的土耳其人。他於一九〇〇年畢業於君士坦丁的軍事學校，較他的勁敵恩佛帕夏 (Enver Pasha) 遲二年。既在巴爾幹戰爭裏露了頭角，他就被任命去統率衛加里波立 (Gallipoli) 的一師兵，立下了大大的名聲。大戰將終時，他是土耳其

(註一) 薩佛條約的條款。見本書第十八章。

其與同盟國接洽的委員，設大本營於君士坦丁。他曾主張土耳其與協約國趁早磋商和平。自然，休戰以後，他的名譽日隆，而恩佛則因粗莽囂強招致土耳其在麻特羅斯之降服，以致名譽日削。恩佛冒險前往高加索，後來死於土耳其斯坦某次真相不明的革命裏。基瑪耳被大丞相勿立特帕夏（Ferid Pasha）因公派往安拉托里亞（Anatolia）。不聽統率協約國軍隊於君士坦丁的米恩將軍之勸，基瑪耳和一批精選的僚屬，凡四十二個土耳其軍官，被派往小亞細亞。（註一）所以當恩佛東行赴死之日，正基瑪耳起程取天下之時。他如今握有第三軍巡閱使的職務，至少也是擁有這個名義（因為沒有什麼事可作）。這時正是土耳其命運最惡劣的時候。希臘政府與亞美尼亞國政府好像已訂了瓜分黑海上土耳其領土的協定。（註二）希臘軍隊為要取得牠所要求的斯滿拉州（Smirna）起見，五月裏在斯滿拉登了陸，差不多如入無人之境的正在佔領這地方。這種在亞洲大陸上的戰事的重演激起了公憤，燃燒了回教徒的心。基瑪耳利用這種情緒，邀了安拉托里

（註一） Mustafa Kemal, H. G. B. 所撰見 Contemporary Review, Nov. 1922, p. 510ff.

（註二） Revue des Deux Mondes, Feb., 1922, p. 551.

亞的縉紳和教中名人聚集開會。他們於一九一九年九月至十月間在西拉司地方集會，拍了一個長電給君士坦丁的蘇丹政府。在這個電報（實在是哀的美敦書）裏，該會否認割讓任何土耳其的領土；牠後來著稱爲國民公約。（註一）

要是這電報得不到一個滿意的答覆，該會勢必迫於自行採取禦侮的方法。沒有接到答覆，至少沒有接到滿意的答覆。基瑪耳於是命令東小亞細亞各省一律選舉代表，開一個國民會議。土耳其的官兵監視各處的選舉。基督教徒不參加投票。君士坦丁協約國軍隊的登陸和米恩將軍宣布佔領該城的消息傳來，益發燃起安拉托里亞土耳其人的愛國心。國民大會就在這樣的環境裏選出來的。牠於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安哥拉（Angora）地方開幕。這地方後成爲土耳其的國都。

國民大會必須着手的第一件事是組織政府。因此就任命了一個內閣，以基瑪耳爲之長。安哥

（註一）國民公約的日期通常均作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這天蘇丹在君士坦丁召集的下議院也採取了牠。這個

議院的議員，後來大部分到安哥拉加入那裏的國家黨去了。

拉和君士坦丁的裂痕擴大了，前者是自由和獨立的在濯濯的邱山之中，後者是被看守在協約國森森的鎗刺之下。安哥拉，不用說得，早已自視爲對斯滿拉州裏的希臘人在開戰。反對希臘軍的戰爭組織起來了。基瑪耳起初利用原有的不整齊的隊伍，並且組織了別的隊伍；逐漸的，在這些隊伍後而又造成了一個常備軍，軍官很好，很有訓練。軍火器械都購自歐洲。安哥拉政府好像從不缺少款項；很明顯的，安哥拉的金錢可以在歐洲大陸上購買器械的國家不僅俄羅斯一國。

一九二一年初，安哥拉政府派了培基爾沙米（Bekir Sami Bey）赴倫敦會議，但不能締訂與國民公約規定的範圍相符合的任何協約，也不能稍使安哥拉滿意（一九二一年五月）。希軍的長驅，雖然被擋住於飲哀魯（Im-Ermi），但是在一九二一年的上半年裏始終可說是大獲全勝，直到沙卡利亞河（R. Sakaria）爲止。在這裏，離安哥拉約二百英里，希臘軍隊被打住了。基瑪耳軍做了一次很好的防禦；希臘方面因遠出根據地外，漸感軍械的缺乏。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蘇維埃政府和安哥拉政府間在莫斯科簽了一個同盟條約。這時候，生活在安哥拉度過去，不完全是恬靜的，卻也沒有嚴重的阻擾。這是一個瘠小的城鎮，

其著名處端在古羅馬帝國的一種光榮的遺蹟，就是一塊碑，叫做 *Monumentum Ancyranum*，上面有奧格斯他大帝 (*Emperor Augustus*) 刻着他的治績。國民大會開會時，常是慷慨激昂，人聲漶雜的。每當這位少年將軍（基瑪耳年僅四十）登場的時候，鼓噪之聲加倍。小小的身裁，整潔玲瓏，捲角的鬚鬚和向後梳的整齊的頭髮，瑪斯他法基瑪耳看起來正是恩佛一流的標準土耳其軍官。但是每當他開始演說的時候，人們中的領袖頓時出現了。起頭是靜靜的，用一種低音的調子，他立刻抓到了會場的視聽。轉瞬間他的聲音提高了，他的言語加快，他的感情迸爲火花，於是整個大會着了火。『歡呼這位民族英雄。』（註一）

土耳其的老官吏接受安哥拉統治。衙門組織了，悉如君士坦丁的大機關：外交部，軍政部，財政部，公債部，煙草局，一個渥托孟銀行。小亞細亞的國賦收存了，此項收據則送往名義上仍是最高無上的君士坦丁政府。外國人爲安哥拉服務並且給與技術的幫助，特別是在軍事組織方面——俄羅斯，保加利亞，和德意志的軍官。內地天天有募兵來到；士兵填塞街巷。那裏有一種熱誠，希望愛國

（註一） *Perron, Revue des Deux Mondes, Feb., 1, 1872, p. 207.*

的空氣，使法國的觀察者回想到在國民會議時候的巴黎歷史。

安拉托里亞的國民運動如今是一樁必須承認的事。法政府是西洋列強中首先對這事立下決心的。法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法朗克林·蒲朗 (Franklin-Bouillon) 負了使命往安哥拉，於是有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日的協約的成立。(註一) 英法兩國政府俱已在同年八月十三日宣布對當時的希土戰爭守中立；可是英國對希臘是好意的中立。法國的中立如今是有助於土耳其的。可是照刊布的法朗克林·蒲朗協約，其中並沒有包含法國援助的任何約言。牠全部都是關於敘里亞與西里西亞間的法土邊界和由此而起的問題。(註二)

一九二二這年給了安哥拉非常的幸運，同時給了希臘昏倒的災難。這年實在是被稱爲希臘全部現代史上最不幸的一年。(註三) 列強曾屢次設法調停希土戰爭，但這種努力因希臘撤退斯

(註一) 法國按照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的協定，已與安哥拉政府劃定敘里亞的邊疆。

(註二) 全文載 *L'Europe Nouvelle*, Nov. 6, 1921.

(註三) *Annual Register*, 1922, p. 210.

滿拉的問題而失敗了。

七月二十九日，希臘政府採取那種可能引起協約國反對安哥拉的最後的步驟。牠宣布有佔領君士坦丁的意思。

二萬五千希臘兵果然在馬摩拉海北岸的羅多斯托 (Rodosto) 上了岸。可是盤踞君士坦丁的協約各國在公道上不能拒絕安哥拉當局，單放進希臘進來。經協約國警告謂嚴重的結果將隨佔領君士坦丁而起後，希臘政府便停止了。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這天，一拳打了下來。基瑪耳的國家主義軍隊對阿非姆卡拉希沙 (Afium Karahissar) 附近的希軍陣線開始總攻擊。戰場遂漸展開得很廣。在兩星期內，節節失利的希臘軍陷入紛擾之中。先是總退卻，迅速地變成潰敗。一個驚呆了的歐洲突然發覺希臘方面是不可挽回地失敗了，而勝利的土軍正在掃蕩希人入海，還有一部分土軍正長驅直奔君士坦丁對岸的非戰區域 (Demilitarised Zones)。

阿非姆卡拉希沙的一戰，對於欲囊括一切說希臘話地方的大希臘的願望是一個制命傷。士

耳其軍隊於九月九日進斯滿拉，成千累萬的希臘農夫以及敗遁的希軍在他們前面逃跑。這城市的大部份是燒了。協約各國以及希臘政府派出的船隻裝載了逃難的人民。他們被載至沙隆里加和其他埠頭，廣大的收容所臨時在那裏築了起來。康斯坦丁王的政府站不住，阿非姆卡拉希沙慘敗所致的恥辱。一個軍事暴動（或稱 *Pronunciamento*）迫得他於九月二十七日退位了（第二次）。兩個月後他的五位大臣和陸軍總司令由一個革命委員會下令審訊並且執行鎗決。

這時候另一戰雲陡然彌漫於歐洲之上。勝利的土軍於九月九日進了斯滿拉。幾天之後，自特得了勝，相信他們是天下無敵的（東方人在勝利後往往如此），他們迫近了加里波利半島對面在察拉克（*Chamak*）附近的中立區域，這是協約國軍隊按照薩佛佛條約佔據着的。英政府的見解是：海峽的自由不惜任何犧牲是要保持的。九月十六日英國泰晤時報能夠載稱英法意對這點均已同意。但海峽的自由，據英政府解釋，含有必須尊重非戰區域中立之意；這就是說，必須不准土軍進入這些區域。如果土耳其人擬犯這些區域，法意兩國政府並不準備有所行動的。

九月十五日，據說土耳其軍隊是極近察拉克區域了。如果他們經過這區域遇到抵抗，便會發

生戰爭。歐戰餘生疲疲不堪的歐洲人民，他們消極地希望至少一百年內不再有戰爭——難道他們的政治家能够叫他們在近東再捲入新的戰事麼？

在另一方面，土耳其軍勢的重振，希臘兵一蹶不振的潰敗，已減低了歐洲的威望。全個亞細亞激動如沸。如果土耳其人向歐洲挑戰，毫無阻擋的進了非戰區域，一種叛亂的新潮流或將由此開始；近東的歐洲勢力或將於焉告終。一個更直接的結果或許是君士坦丁的基督教徒的屠殺。據說在土軍進斯滿拉後的凌亂焚燒中死了十二萬人。（註一）

路易喬治對於他眼前的可怕的路徑倒不畏縮。如果協約國對近東的政策自從薩佛條約以來一向是軟弱怕事和舉棋不定的，現在至少有一國要表示決心。九月十六日從唐林街十號裏發出一個半官的宣言，稱英國『準備盡他的一份力量去維持海峽的自由和中立區域的存在；』並稱爲了這種宗旨，英國指揮下的軍隊將要增防。該宣言又說：『英政府……已下令地中海艦隊用一切方法反抗衝犯該區域者或是土耳其人渡登歐岸的任何嘗試。』

（註一）Times, Sept. 16, 1922. 這估計是美國救濟委員會 John Manola 所發表的。

無疑的，英政府寧願作戰，不願土耳其人進入中立區域。牠邀請巴爾幹諸國協同加入防禦，又發出了同樣的邀請到不列顛各自治領地。

法意兩國政府都不贊成增兵於受威脅的區域。事實上，他們的不干涉政策反益見完全了。九月二十一日，他們從意斯米德 (Ismid) 和韃靼尼爾兩區域撤回他們的現有的部隊。察拉克的英軍被孤單地賸下着。

厥重爵士的急公好義的行動，阻止了英法兩國政策的完全決裂，他不顧自身的健康，於九月十九日匆匆的前往巴黎。這番使命成績很好，與法政府重結了契合，雙方都認為必須立刻舉行和平會議。厥重爵士的行動挽救了英法關係於一髮千鈞之秋。

同時英政府決然堅持牠維持中立區域與海峽的不可侵犯性，必要時採取單獨行動，也所不計。海軍部確信以海軍獨力能够阻止基瑪耳軍的渡過韃靼海峽。但是如果基瑪耳軍，滿懷戰勝了基督教徒的信心，竟進入察拉克區域時將怎麼辦呢？那裏僅有英軍一隊。於是迅速增派防軍，電網也築了起來。當法意軍隊撤去時，把守察拉克的英軍很是鞏固。四隊守衛軍也準備從英格蘭下船

開往近東。可是形勢依然萬分的緊張。九月二十日晚，不列顛近東總司令哈林頓將軍（General Harrington）從君士坦丁堡發出一個宣告，謂『任何破壞中立區域的嘗試，將以所有的海陸軍力抵禦。』安哥拉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哈米德（Hamid Bey）接到哈林頓的通告後，覆稱『國民政府不願開戰，但決心追逐其潰敗的敵人入慈乃斯。』哈林頓允將哈米德的意見轉達英政府，但『以兵士資格』警告他，謂越進中立區域，當以武力抵抗。（註一）

法政府自法朗克林、蒲朗協約以來，向與國家主義派有很好的關係。如今，雖然牠拒絕參加防禦中立區域，但是牠與英政府協同商議和平。可是在九月二十三日有些土耳其騎兵進了察拉克區域，這時險惡的形勢發生了，和戰的關鍵全在磨拳擦掌的長官和士兵的紀律與自制。一個硝兵的鎗機一扳，可以陷近東於重新的戰爭。

同時厥重爵士，他於九月二十四日公畢離開巴黎，已與法總理普恩加齊和意大利大使斯福蘭伯爵（Count Storza）議定發一公共通牒，請希臘和土耳其其開和平會議。該通牒『贊同』土耳其對

慈乃斯的要求至馬利剛 (Maritza) 和亞得利洛堡 (Adrianople) 爲止。可是土耳其政府必須在相局未定前不派軍入『該區域，其臨時的中立性業經協約國政府宣告。』協約國政府重行保證他們在先前三月間所稱一俟和約實施，他們的軍隊即行退出君士坦丁之約。(註一)

九月二十三日，進入察拉克區域的土耳其軍隊在二十四日退出了，但二十五日又回來了。他們每次都遇到第三輕騎隊的巡邏兵，然而沒有發生戰爭。英方的勢力遂天增厚，如今約有一萬名有經驗的軍隊守着基馬耳約有七萬人靠近這區域；他們爲數固衆，殊不能猛襲英軍的壁壘。(註二)

哈林頓將軍應付這局面的方法真值得贊譽。一位訪員報告道：『他又審慎又冷靜，決不去挑釁，也決不讓人家挑釁。他的坐鎮近東是避免衝突的最大保障。』(註三)

另一位有名的軍人兼政治家是在土耳其大本營裏主持作戰。瑪斯他法基馬耳，像撒多瓦戰

(註一) 約文見 *Times*, Sept. 25, p. 10.

(註二) General F. Maurice 曾於此時到過察拉克有文發表於 *Contemporary Review*, Nov. 1922 p. 560.

(註三) *Times*, Sept. 29, 1922, p. 10.

爭後的畢斯麥，不得不與同仇敵愾的得勝將領奮鬥。他不得不重政策而輕矜譽，並且不得不在勝敗無常的戰爭裏爲將來着想。他個人的私願必不亞於他的將領那樣亢奮地迫着要去接受英人的挑戰，而長驅直入察拉克。反之他決定與那位英國將軍見面談判，因此所獲的勝利更大於阿非姆卡拉希沙；他克制了他自己，他的將領，和安哥拉的狂熱的國家主義者，而且他不再費一人一彈，贏了一場光榮和有利的和平。

基瑪耳同意所開的休戰談判在瑪當尼亞 (Mudania) 舉行，該地處馬摩拉海南岸，約在察拉克與意斯米德的中途。該會議於十月三日開幕，與會者爲哈林頓，夏貝 (Charpy) 和莫培利 (Mombelli) 諸將；意斯麥特將軍 (General Ismet Pasha) 代表基瑪耳；還有馬開拉基斯將軍 (General Mazarakis) 代表希臘。會議起初不很順利，因爲意斯麥特不肯讓步。再者，法英兩國內閣對近東問題所見又不盡同。還需要英國外交部長厥重爵士再跑一次，和普恩加於十月七日親自談商後，纔能再得到協議。終於在十月十一日，在那安靜的瑪當尼亞小鎮上，那裏人民的生括始終未爲會議所擾，一個休戰條約簽了字。新的中立區域應加劃定並應予以尊重；希臘軍隊須

撤退慈乃斯；土耳其人在最後的和局未定以前不得越進該地方。休戰條約的弁言裏載稱協約國政府已決定把東慈乃斯和亞得利洛堡交給土耳其。

在休戰條約簽了數週之後，在最終和平會議未開之前，安哥拉國民大會決議廢除蘇丹王制與帝國政府（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蘇丹麥默特六世（Sultan Mehmed VI）乘了一隻英國戰艦逃往馬爾達（Malta）。土耳其成爲一個共和國了。這時回教教皇已由國民大會推舉的阿卜多麥吉特（Abdul Mejid）（故蘇丹亞西士（Abdul Aziz）之子）繼位。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大會又把這回教教皇之位（Caliphate）取消了。按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時英國印度部就因爲顧慮這回教皇位，所以反對把土政府逐出君士坦丁的計劃，由此看來，未免沒有意識。試觀土耳其人自身能够不驚動東方而廢除這位置，那麼對於回教皇位和穆罕默德感情也許不值得如此顧慮。

巴爾幹域內的寶座正在顛覆之中。歷史的蘇丹制既在君士坦丁消滅了，同時雅典城中一座後起的王位也在破碎之中。康士坦丁王自阿非姆卡拉希沙慘敗後便站不住了。他已於一九二二

年九月二十七日退希臘王位。(註一)他的兒子喬治二世 (George II) 繼位，經過洛桑會議的時期，但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又離國了。希臘也變成了一個共和國。

(註一) 康士坦丁於翌年一月死於Palermo.

第二十九章 洛桑條約

瑞士聯邦總統的一篇演說揭開了洛桑會議之幕。該會議是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洛桑的滿地賓朗卡新洛 (Casino de Montbenon) 舉行。在這篇圓通的演詞內，這位總統贊譽雙方的軍士，稱『他們毫無躊躇的各在本國的祭壇上犧牲他們自己。』他提到『昨天的兩個對手所信仰的，並且由此榮養他們的文明的兩大宗教，』又稱他們現在相遇於和平的共同目標上。厥重表示他希望這個會議是『近四年來爲締結和平而舉行的各次會議中的最末一次；』他又稱這是在瑞士舉行的第一次和平會議，『牠（瑞士）對全歐洲示了一個愛和平有秩序的社會之榜樣。』土耳其總代表意斯麥特拍夏 (Ismet Pasin) 演說謂『土耳其作了超人的犧牲，』已『贏得牠在文明人類裏的地位，具備爲生氣蓬勃的國家所固有的那些生存和獨立的一切權利。』

與會的國家除希臘與土耳其外，有英、法、日、美、羅馬尼亞、和巨哥斯拉夫。

會議開幕後，會議都在歐齊離宮飯店 (Hôtel du Chateau d'Onchay) 舉行。官場用的語言是法、英、意三國語。討論到海峽制度的時候，俄國的代表亦參加。會議的主席由英、法、意輪流擔任，這三國是『邀請國』。意斯麥特要求土耳其應輪做主席；但厥重指稱邀請國的充當主席，『並不包含任何失禮於土耳其代表團的意向。事實上會議的責任落在召集該會的各國；這就是他們要主持會務的緣故。』土耳其代表團在會裏始終極關心於土耳其的尊嚴以及她與別國的平等，許多的時間是銷磨於消除那許多小爭點上面。

該會採取委員會與分委員會辦事的方法。全體會議很少。美國代表團出席一切的討論『與其他代表團完全平等』，但牠認為這與實際參加談判有分別，牠沒有簽押什麼文件，也沒有加入任何協約。(註一)

(註一) Lausanne Conference on Near Eastern Affairs, 1922—23, 載於 Parliamentary Papers, Cmd.

1814 of 1923, p. 11; Child, A Diplomatist looks at Europe (1923), Chap. IV.

洛桑會議陷入兩個顯明的部分。第一期自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起迄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止；第二期自四月二十四日起至七月二十日止。該會第一期沒有達到一種確定的協議，這時的英雄是厥重。那緊張的勞動，中庸適度與謙讓精神，圓通禮貌和閱歷，以及他勸人契合時的感動的呼籲，表現這位偉大的公僕的特性，到了他的極點。在第二期裏，君士坦丁的英大使倫巴德（Horace Rumbold）是主要的主席代表；這時候達到了一個確定的結論。該會自始至終，首席全權土耳其爲意斯麥特，希臘爲威尼柴洛斯，俄羅斯爲其克林。

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草約呈在與會各國前面了。它擬議把土意國界規定於馬利開（Mariza），但是終點火車站（非卡拉加煦（Karagach）該地仍歸希臘）則定在西面。木蘇爾（Mosul）由國際聯盟去解決。關於施行於外國人的特殊制度的治外法權應予廢除。海峽（註一）開放於一切的商船和限定數目的戰艦。關於這些條款厥重公平說道：

我們要是把以前塞佛條約和本約比較其條件來看，我想沒有人再會埋怨說是缺少寬大

（註一）譯者注——本書中凡單舉海峽之名者，類指土耳其的韃靼尼爾與博斯福拉兩海峽，按英文爲The Straits。

或讓步了。事實上，或者有人要怪我們走得太遠呢！並且這種改變不僅是由於土耳其人在與希臘戰爭的後期裏奏了勝利的事實，卻是由於對他們自己的國家統一的願望有了增加的與誠懇的認識之故。（註一）

草約條款雖然寬大，意斯麥特要求八天的考慮。這些條款既然都已經在會裏充分討論過，並且草約在發出前的三天既然已經交到意斯麥特的手裏，因此厥重對於這個請求很不高興的訝異道：

我不能無限期地延長我的離別，也不能留在此地八天，但是我願意盡力留到二月三日甚至二月四日的晚上。到那時候這條約交到土耳其代表團也有一個星期了。我是，像意斯麥特拍夏一樣，是一個工作勤勞的人，時常工作到夜深的。我只高興把整個時間銷磨在工作上，並且與意斯麥特在一起，只要他願意。如果這時期告終，他還不能說明土耳其代表團的見解，這就稀奇了。（註二）

（註一） *Cmd. 1814 of 1923*, p. 430.

（註二） *Parl. Papers, Cmd. 1814 of 1923*, p. 446.

厥重對意斯麥特很有希望。『我二月四日動身的時候，』他說，『我希望和他親熱地握手，並且慶賀他一個共同的勝利。』

土耳其政府遲疑不肯簽那草約，究竟是出於牠自己的本意，或是因為俄國態度的關係，這是不可得知的。其克林和他的代表團絕對反對該約關於海峽的那部份。

『再沒有什麼比一個會議更使性的了。今天世界得救；明天便可沉淪。』（註一）洛桑會議第一個時期的悲慘的最後一幕發生於二月四日，星期日的下午，在厥重的波利瓦其（Beau Rivage）旅館房間裏。會議於下午五時四十分開始。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意斯麥特對於修正的草約全部都能同意，除掉某幾項司法和經濟的條款。在這點上會議便破裂了。厥重、蓬派（Bompard），加隆尼（Marquis Garroni）一個一個的用最感動的話求意斯麥特不要在所獲已不少後再破壞這條約。加於這位土耳其將軍的攻擊諒必是不好受的。俄國代表團已離去了。除掉他自己的兩位助手之外，意斯麥特沒有一個朋友在室裏。他們根據人道政策，正義，友誼，懇求他簽字。他始終不為所動。

（註一）見 Child op. cit., p. 113.

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經過一篇強有力的演說，內中他描寫重新開戰的恐怖——也許是歐洲的大戰——厥重在七時四十分說他的火車定於九點鐘開行。意斯麥特可否去考慮一番，在半點鐘裏回來簽這條約？『意斯麥特和利爾路爾（*Riza Nur*）於此起身告別。』他們並沒有回來。九點鐘厥重搭特別快車離開了洛桑。

幸而，這會議不過是間斷而已。雖然厥重明白聲稱這草約與二月四日提出的修正已代表讓步的限度，法政府卻表示一種不同的態度。在一月三十一日寄給土耳其代表團，並發往羅馬與倫敦的一個通牒裏，法政府表示牠不認為草約是協約國的最後的訣辭。（註一）

明白得很，法政府雖然願意給土耳其更多的讓步，但牠並不願在這方向走得很遠，意斯麥特是一個很機警的外交家，或許他已認清了這點。他回到安哥拉去，但是留了一個秘書在洛桑。協約國祕書廳的中心份子也沒有走。安哥拉的國民會議拒絕了這草約，但同時准予繼續磋商。牠發出一個一一五頁的通牒，用着溫和的文字建議，除其他事件外，謂經濟的條款必須從草約中分而出

另行討論。美國的意見以爲一一五頁的溫和文字可以引起和平。(註一)幾天來聚攏的戰雲爲之吹散了。

厥重立刻採取了安哥拉通牒裏的意思，邀協約國會於倫敦。在英國外交部舉行了一個簡短的會議，自三月二十一日起至二十八日止，到的有蓬派和加隆尼。協約國商得了同意，於是發了一個通牒給土耳其政府。在該通牒裏協約國拒絕把經濟條款和其餘的條約分開。基於這種諒解，洛桑會議於四月二十四日復行開會。這次由駐君士坦丁的英國最高委員兼大使倫巴德爲英國總代表並主席會議。君士坦丁的法國最高委員貝爾將軍 (General Pellé) 是法國的總代表；蒙他那 (Montagna) 代表意大利；意斯麥特代表土耳其；威尼柴洛斯代表希臘。駐瑞士的公使格魯 (Grew) 是美國的代表。

洛桑會議的第二個時期比第一個時期還長。牠的厭煩的會議似乎是無窮期。可是牠的大體的結果是不成問題了。土耳其人與協約國既以一種融洽的精神回到洛桑，不會再不簽字。然而許

(註一)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23, p. 14.

多枝枝節節，大多爲經濟的與司法問題的，不得不重新來過。蘇維埃的代表團，由伏鹿夫斯基 (V. Lovsky) (駐羅馬的蘇維埃代表) 爲領袖，前來表示牠對海峽協議的意見。五月十一日，一個最不幸的變故發生了。伏鹿夫斯基，當他在所居的西雪飯店 (Hotel Cecil) 裏坐着進餐的時候，被一個曾在俄軍中服務的瑞士公民擊斃了。蘇維埃政府抗議謂瑞士政府對伏鹿夫斯基未加適當的保護。這種控訴似乎是十分無據的。蘇維埃政府在隨後兩年裏始終與瑞士政府關係很不好。

土耳其與協約國間的經濟的、金融的、與法律的糾紛是能够調整的已經交與國際聯盟的木蘇爾問題是能攔延的。真正的障礙好像是卡拉加照，那是往德特加照 (Dedeagach) 及君士坦丁鐵路的亞得利洛堡的火車站。卡拉加照雖是亞得利洛堡的車站，可是位在馬利開的西邊。希臘政府自然是亟欲保持這個地方的，並且準備爲這個問題流血的。希臘的「迭克推多」彭加洛斯總理 (Premier Pangalos) 有一支軍隊在馬利開的休戰線上，而且是準備渡河向君士坦丁。(註一) 威尼柴設法阻止這種事變，終於同意把卡拉加照給土耳其人。因此「又一次在早晨

(註一) Times, Oct. 10, 1925.

是「不可避免」的戰爭，到晚上便風消雲散了。」（註一）大家相信每個人如今都準備簽字了。可是還得需要兩個多月的功夫。遲至六月二十二日據巴黎消息靈通方面的意見，猶以爲金融的條款證明仍是一種無法處置的障礙；看起來『毫無結果』——除非協約國再讓步。（註二）最後，讓够了。於是七月二十四日意斯麥特準備簽字。洛桑條約是他的條約。

各項文件的簽字是在洛桑大學一個叫做盧明宮 *Palais de Rumine* 裏。瑞士聯邦的總統舉行開會禮，他稱讚該會的工作，雖然冗長，終算告終了。君士坦丁熱誠地歡迎這個消息。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簽字的洛桑條約實質上與二月四日意斯麥特所拒絕的無異。土耳其得了卡拉加煦和馬利閣河右（西）岸的一個火車站。在會議的第一個時期內，曾經許土耳其一個火車站，但不是卡拉加煦。締約國的賠償損失的要求互相對銷了，土耳其不用作任何繳付。這一項也是二月四日厥重最後五分鐘的貢獻之一。反之，在小的經濟問題上面，對土耳其的讓步

（註一） *New York Times*, May 29, 1923.

（註二） *Le Temps*, June 22, 1923.

總計也許有相當數額的金錢。總而言之，土耳其因爲意斯麥特在會議的第一個時期態度堅決，所得很爲明顯。

第一條採用現有的土耳其保加利亞國界從黑海上的里伐牙河 (Rezva) 起向西迄至馬利開與希臘國界相遇處，在亞得利亞洛堡的西北。從這點起一條新的希土國界是劃定了，沿馬利開的河道而行，除了卡拉加照的附近劃出一角把這個城區與火車站圈與土耳其外。與敘里亞的國界，採用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日法國與安哥拉的協議。與伊拉克 (Iraq) (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的國界，由土耳其與英國 (伊拉克的受委託統治國) 在九個月內用友誼的磋商決定之。如果得不到協議，這爭執應交於國際聯盟行政院。

在海上，除馬摩拉海裏的各島外，土耳其得有應不羅斯 (Imbros)，鄧尼杜斯 (Tenedos)，拉必特羣島 (Rabbit Islands)。這些島控制着韃靼尼爾海峽的進口。其餘一切島嶼都由希臘保有，其中除羅德斯 (Rhodes)，喀斯特洛利佐 (Castellorizo)，和多德康尼斯 (Dodekanese) 三處土耳其放棄她的一切權利與意大利 (第十五條)。

土耳其自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五日起放棄她對埃及和蘇丹 (Sudan) 的一切權利和名號；她同時解除一切以埃及貢稅爲擔保的渥托孟 (Ottoman) 借款負擔，這些借款此後形成埃及公債的一部分 (第一七、一八條)。土耳其承認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五日英國宣告的塞普拉斯 (Cyprus) 的割讓。

締約國儘本身範圍所及，各自承認治外法權條約的完全廢除，這就是說，以往居住土耳其的外人所享受的特殊和專利的制度完全廢除 (第二八條)。

第三八至四四各條涉及對少數民族的權利的保護，並且宣告爲土耳其的基本法而非其他法令規章所得超越者 (第三七條)。這些條款由國際聯盟保證 (第四四條)。諸如此類的少數民族，(不信回教的土耳其人民) 應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及與回教徒相同的公民權和政權。渥托孟公債應由土耳其和一九一二至一三年巴爾幹戰爭後取得渥托孟帝國領土的各國分派 (第四六條)。

附於主約而有同一效力者是幾個重要的協定。

關於海峽制度的協定，承認『韃靼列爾斯海峽，馬摩拉海，和博斯佛拉斯的海上空中運輸航行的自由之原則。』另有一個附件，開列了這種自由的行使的規則。和平時候應有完全的自由給予任何國旗與任何種貨物的船隻，日夜無阻的通行，不得有形式手續之繁，稅捐徵收之費，惟諸如領港等服務當隨意給資者除外。戰時若是土耳其守中立，航行仍按上項規定辦理。戰時若是土耳其為交戰國，那麼不挾帶違禁品的中立國人應有航行的自由。土耳其並有搜查這種船隻之權。

戰艦在和平時期應享有日夜的通行自由，惟規定任何一國派遣入黑海的最高限度軍力不得大過黑海沿岸諸國的最強的艦隊：無論如何，每一國派遣艦隊不得超過三艘，每艘不得超過一萬噸。

戰時若土耳其守中立，一切戰艦享有完全的通過自由，日夜不論，惟受和平時期同樣的限制。然而此項限制不得施於任何交戰國致其交戰權利有損。這句話意謂假定一國與俄羅斯交戰的說法，能够派遣他的全部海軍入黑海，無論其海軍如何強大。可是在海峽裏不得有敵對行為。

戰時若是土耳其為交戰國，中立國戰艦應享完全自由通過。土耳其可以阻擋她的敵人的戰

艦。

宣告韃靼列爾斯兩岸（加里波里與察拉克 Chanak）為程約計沿海岸七十五英里，向內地約三英里至十五英里，為非軍事區域。同樣地，博斯佛拉斯兩岸的全長度與九英里半的深度，都須廢止戰備（按即君士坦丁半島和意斯米特半島）在君士坦丁城及親王羣島（Kizil Adalar）裏土耳其政府有權維持一二〇〇〇人的守衛，君士坦丁得築一兵工廠和海軍根據地。除親王羣島外，馬摩拉海中所有各島均宣告解除戰備。在愛琴海中，土屬應不羅斯和鄧尼杜斯和拉必特各島，以及希屬來門諾斯（Lemnos），薩木慈乃斯（Samothrace），密帖倫（Mytilene），覺斯（Chios）薩木斯（Samos）尼加利亞（Nikaria），諸島均廢止戰備。在最後列舉的四島，希臘政府得保持攤派於該地的軍役額，並得在該地訓練。土耳其政府有權運送軍隊經過非軍事區域及土屬各島。再有，在戰爭時為『行使他們的交戰權利起見』土耳其或希臘得修改海峽協定裏包含的解除軍備的規定，惟僅以戰爭期內為限（第九條）。

為監察海峽協定的實施起見，應有一個委員會由土耳其代表為主席，英，法，意，日本，保加利亞，

希臘，羅馬尼亞，和俄羅斯（註一）各國代表爲委員，視各該國簽名於本協定與否而定。美國於承諾該協定時亦得派一代表。派有代表在委員會的各政府給付他們代表的薪俸。該委員會在國際聯盟贊助下行使其職能，並應送一常年報告於國聯。

土耳其與保加利亞間及土耳其與希臘間的陸地疆界的廢止軍備，由一個叫做慈乃斯協定（Thracian Convention）的條約保證之，這協定是補充洛桑條約的。兩方的邊界從黑海上的里伐牙河起，越境至愛琴海上的里伐牙河盡頭止，凡三十基羅米突（十八英里半）內均宣告爲廢除軍備區域。不得維持任何軍力於該區域內，除了最高限度土耳其能駐五千名戍兵，及希臘與保加利亞各能駐二千五百名戍兵以外，在該非軍事區內不得有礮隊，軍備僅許有銃鎗，刀劍，來復鎗以及每百人四尊路威斯（Lewis）礮。

在一個關於住居，貿易，和司法的協定裏，治外法權條約的廢除是說明了。第十七條稱：

土耳其政府聲明土耳其法庭對居於土境的外籍人民，其生命財產均按照國際法及其自

（註一）俄國於一九二三年八月一四日簽字於海峽協定。

國通常採取的原則辦法加以保護。

關於個人身分的事件，諸如結婚，離婚，承繼等，則由此等人民的本國法院辦理。

土耳其政府復聲明立即聘用歐洲法律顧問，任期不得少於五年，該等顧問無干涉之權，但督察司法的行政與接受不平的怨訴。

一個商業協定宣告現行有效的進出口稅率爲土耳其在大戰期內自由採取的一九一六年九月一日的稅率。該稅率僅可按金鎊與七四五土耳其披亞司脫爾 (Piastres) 紙幣的匯率漲落而差異（這是一九一五年九月一日的定率。）

有一個協定關於希土人口的交換。這種辦法是對於土耳其政府的民族政策的一種讓步，而爲所有簽字各國所扼腕的。厥重在洛桑會議期間曾稱之爲「一種全然惡毒不良的辦法，將使世界受害一百年。」（註一）希臘與保加利亞已經有過一種自動交換人口的辦法，但是希土的辦法

（註一） Parliamentary Papers, Cmd. 1814 of 1923, p. 212. 該交換協定簽字於 July 30, 1923, 係在主約與

上述各協定簽字六天之後。

是強迫的。凡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前已經安居於君士坦丁的希臘住民除外不算。同樣地所有安居於西瑟乃斯屬希臘管轄的回教徒也不在交換之內。在土耳其的希臘人或是在希臘的回教徒，他們的一切財產權和金錢資產俱不因交換而受損害。

按照一份與主約同時簽字的草約，英、法、意三國政府擔任一俟國民大會批准該約，即把他們的軍隊從土耳其領土撤回。

最後，雖然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主要的薩佛條約從沒有批准，因此也沒有發生過效力，但是協約國如今覺得必須把薩佛所訂的兩個補充文件使之有效。這些文件是協約國與希臘間關於保護少數民族的協定（尋常的少數民族條約，由國際聯盟保證）和關於瑟乃斯的條約。該條約給予保加利亞自由通過希臘領土而達德特加照埠，並在該埠領有一個自由區域。

在洛桑的條約和其他文件裏的有趣的一點，是絲毫沒有提起希臘教長的統治區。土耳其政府曾擬在條約裏填入遷移君士坦丁的教長統治區的規定，但終於遷就了希臘人（由約協國的援助）的願望，維持了希臘正教的元首的原狀。教長統治區的地位因此仍由牠舊時的特權和權

利規定。

洛桑條約的結果使土耳其完全從國際臣服裏解放了出來，使她的國債減少了很多使她在歐洲鞏固地保有一大塊土地，及其重要的城市，又保障了她的最危險的疆界以避免戰爭的無常——對於土耳其人正是一番可喜可賀的事件，從此可以廁身於今世進步和平的國家裏面。

大戰又使土耳其的其他舊屬地必須成立一種新制度。土耳其加入大戰反對英國後，英政府便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五日割據了塞普拉斯。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英政府宣布埃及及爲保護國。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牠宣布了該保護國的終止，並承認埃及及爲一獨立國。該宣言包括重要的保留：『下列各事件絕對保留聽英國政府決定，迄至雙方可用自由討論與親善協調以締訂英埃協定的時候；（甲）不列顛帝國在埃及的交通的保障；（乙）外國對於埃及及直接或間接的侵略或干涉之防衛；（丙）外國在埃及的利益之保護與少數民族的保護；（丁）蘇丹。』（註一）

在一個發往英國駐外的外交代表以便轉達所在國政府的通告裏，英政府通知謂：『英國對

（註一） Cmd. 1502 of 1922, pp. 29—30.

埃及保護的終止，並不牽涉其他國家在埃及地位的原狀之任何改變。」這通告末稱：

埃及的福利與完整是切要於不列顛帝國的和平與安全，所以不列顛帝國認為是重要的利益，須始終維持他國政府所久已承認的牠與埃及間的特殊關係。這些特殊關係已在承認埃及及為獨立主權國的宣言裏敘過不表。英國政府認定他們與英帝國的權益有密切的關係，而不容許他們為任何其他國家所疑問或討論的。依照這個原則，英政府將視他國干涉埃及國事的任何嘗試為一種不友誼的行爲，並且將認對於埃及領土的任何侵略為一種應以全力驅逐的行爲。（註一）

這個通告由當時的外交大臣厥重署名。觀於該項宣言措詞的堅決，可知是他的手筆，也可見英國埃及政策的永久定義。

（註一）發出日期為 March 15, 1922 (Cmd. 1617 of 1922).

第三十章 洛加諾

「那個專家計劃設計的實在是一種國際善意的實驗。」這話載在賠償繳付總經理的實施陶斯計劃的第一次半年度的報告裏。註二倫敦會議定下的一切協定和條件都正式付之實行了；但是他們的成功全賴各方面，特別是出錢的德國政府的忠實施行。專家計劃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起發生效力。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這位總經理竟能證實『為該項計劃根本的友誼合作精神』的存在。按照一九二四年——二五年的預算表，德政府的歲入表現有相當的剩餘。德國的紙馬克債務，因紙幣的跌值，如今為值僅有一千金馬克（五十英鎊）。（註三那筆國際借款已經發出並且募足了，國家銀行已經重新組織了，新的鐵道公司已經成立了，加於德國全部實業上的百分

（註一）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Aug. 1925, p. 559.

（註二） 同上, p. 558

之一的債券已經創辦了。由總經理轉手付給協約與參戰國的已有六二〇、六八九、四一九金馬克了。此數於減去若干優先繳納之後，都按照斯派協議的百分數攤派，惟有一修正點，即准付與美國政府百分之二·二五〇。美國的攤額也是常年要繳付的，算是償付美國政府以前估領軍的費用。

專家（陶斯）計劃並沒有涉及德國賠償的總數，該項總數還是照倫敦表（London Schedule）所規定的數目，共爲一、三二〇億金馬克，最少分三十六年償還；但陶斯計劃是一種逐漸清償該款的實行辦法。從失意與破產裏面，德國昇到有信心和希望的地位。這不完全是由於陶斯計劃。魯爾的教訓沒有忘記；牠打破了德國抵抗大戰處分的意志。（註一）再加上麥克斯（Marx），路德（Luther），斯脫拉斯孟（Fressmann）諸人的高尚的政治手腕，使德政府倡謀國際的進步，貢獻一個不侵犯公約和萊茵的局部中立。

德政府提出那種獻議確是一件高尚政治手腕的作品，因爲陶斯計劃雖然進行得很順利，但（註一）法政府聲稱魯爾估領獲純利近4,000,000,000紙法郎；這種報告是可以批評的，不過「以其爲外交的武器

而言，魯爾的估據可稱成功的」（見 N. Roosevelt 在 Foreign Affairs 所作文 Oct. 1925, p. 121）

在他方面德國政治的空氣殊不利於和解。如果德國已履行凡爾塞條約第四二九條的義務，那麼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便是協約國佔領第一區可隆（Colonne）應該撤退的日期。協約國認為德國沒有完全履行該約的裁軍條件，爰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拒絕於該特定日期退出可隆。說明裁軍條款仍未完全做到的監察委員會的報告，要在五個月後纔能出來。（註一）魯爾的『經濟佔領』已在九月間停止，但是軍事的佔領，以一種逐漸減少的形式，繼續到翌年（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洛加諾條約是解決歐洲安全的大問題的第一步成功（過去五年都失敗了。）

引起歐洲戰爭的最有力的原因是那不安全的感覺。因為這種感覺，各國纔要大兵在握；因為這種感覺，他們的政府纔心神不安，而謀攻人以自衛。英美兩國都有海洋為阻，海軍為衛，或許覺得安全。大陸諸國有着長遠的陸地邊界，與隣人的刀光鎗影相去僅有一間，便不能有那種安全的感

（註一） June 4, 1925. "Note Presented to the German Government," *Parliamentary Papers*, Cmd.

2429 of 1925.

覺。

巴黎和會始終想要尋出一種保障安全的方法。凡爾塞條約勒令德國軍縮以及萊茵以東五十基羅米突距離內不得建築礮台之條款，顯然減少了戰爭的機會，但離該問題的完滿解決還遠。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路易喬治、威爾遜、克利孟梭簽名的保障法國條約，既未得美國參議院的批准，從沒有發生過效力。此後法國的不安全感，似乎在繼續增加。英國人民承認這種情形，雖然保障條約已經毀滅，他們對於法國仍負有一個義務。法比兩政府最是神經過敏，但德人必定覺得最不安全；魯爾的侵佔表明了以軍隊而言，他們簡直是孤立無援。

國際聯盟盟約的草訂是爲了要保障守法的國家的安全，但這時候輿論的形勢不允許在盟約裏明定任何具體的制裁；此外，俄、德、土耳其，以及美國，都非國際聯盟的會員。康城（Cannes）會議上提出的法國安全案沒有結果；庚洛亞的不侵犯公約只有六個月的法定生命。一九二三年九月的第四次國際聯盟大會，起草了一個互助條約，並且交了給各會員國政府。牠的目的是要明定盟約第十條和第十六條下應採取的辦法。第十條爲會員互相保證領土的完整，第十六條爲行政

院應建議執行國聯義務的方法。

這個草約接到十八國政府在原則上的認可，（註一）但是英政府於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用書面拒絕了。

這封信毀壞了互助條約，不過草創該約所做的研究和牠所引起的注意自然沒有浪費。牠在下一次的國聯大會（一九二四年九月）有了結果，那時由法英總理赫禮歐和麥克康納的動議，重新下一種有系統的努力來促進和平與軍縮。此舉的結果便是如今有名的日內瓦草約（Protocol of Geneva）。希臘的樸立替司（Politis），他是討論公斷的第一委員會的報告委員 rapporteur，他在大會上一篇可欽佩的演說裏解釋了草約的內容。這草約是遠過了國聯盟約的範圍。牠擬議消滅戰爭，而代之以強迫的公斷。『國際間此後不容有純粹的私戰。』擬議的公斷完全是新的一種。按照日內瓦草約，公斷員不能藉詞國際法對某種特殊案件沒有規則或原理因而不下判決。『他們必須在公道的立場進行，因為在我們的系統裏面，公斷終須引出一個確實解決紛爭

（註一）『國聯第五次大會：公斷、安全與軍縮：草約與決議』（Cmd. 2273 of 1924），p. 6.

的辦法。』一切侵略的戰爭是禁止的。草約第十一條說：

按照盟約第十六條第三段，簽字各國共同的與個別的擔承援助被攻擊或被威脅的國家。草約又建議設立非軍事區域，並且規定了分別誰爲侵略國誰爲自衛國的辦法。草約第十七條規定於一九二五年六月舉行軍縮會議。草約要俟第十七條所規定的軍縮計劃被該會議採取後纔能發生效力。捷克斯洛伐克的朋斯博士 (Dr. Benes)，他是討論制裁與軍縮的第三委員會的報告委員，他鄭重聲言：世界的和平在此一舉；接着熱誠地把這草約推薦於大會和各國政府。可是，這日內瓦草約雖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二日爲國際聯盟大會採取了，（英、法、意三國的代表都在內）終因英政府的行動歸於失敗。

英政府聲稱牠寧願有地方的公約。

那位主張消極抵抗的不幸的總理孔諾博士曾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提出一個地方公約的建議，保證萊茵原狀三十年。這一點，是他對於政治的唯一貢獻，必須算是他的一種實在的成功。牠的收效在德國駐巴黎大使代表路德政府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致法政府的一個覺書裏面，當

張伯倫公布英政府對日內瓦草約的拒絕時，他無疑有這個通訊在心，所以他暗示有締結地方公約的可能。

德政府的提議完全是嘗試的。牠建議謂與萊茵有關的各國——尤其是英、法、意、德——也許可以加入『一種長時期（隨後加以確定）的神聖義務，由美國政府爲信託人，約定不對一個締約國作戰。』

該覺書裏還有個進一步的提議，主張有『一公約明白保證萊茵現在的領土狀態。』如能保證德國履行凡爾塞條約第四十二條與第四十三條裏她已經承擔的廢除萊茵岸戰備的義務，那麼這種公約益見有力。

最後該覺書聲稱：

這是值得考慮的，究竟是否合宜把這個安全公約訂定得可以開一個沿日內瓦草約路線包括所有各國的世界協定之先聲。

這覺書所撒佈的種子有好些沒有着落。特別在這個時候要請美國爲一個歐洲的不侵犯條

約做信託人是辦不到的。第三個提議，謂可以開一個沿日內瓦草約路線的世界協定之先聲，沒有加以重視，好比一種崇高的願望在這種時機無論如何是不切實的。但第二個亦即居中的一個提議，主張保證萊茵現存的土地狀態卻生了根，雖則約有五個月的時間牠是很嬌嫩的植物。

這個提議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公布的時候，法人頗爲關心，因爲牠等於德國方面的一種重新而且這次是自動的放棄阿爾薩斯和羅連。因爲同樣的理由，德國的國家主義派看到這麼一個大的放棄爲之大動義憤。英國方面對於這個破天荒的獻議的注意比較少；而且牠所得到的注意有不少是反對的。因爲，在有些擁護國際聯盟的人看來，一個特別的萊茵公約好像是一種舊式外交的嘗試，欲謀在國聯外另有所作爲。這個提議也許會因疏忽漠視而歸於消滅。『不知怎麼牠倒是生存着。』只有倫敦泰晤士報不斷給以冷靜的贊助。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牠刊布了一位通訊員的信，說到德國獻議的那個安全公約：『在歐洲不安的將來，這個獻議確是有希望的最大根據，而且是大戰結束以來最好的一件事。第一，牠大可以趨於消除歐洲和平的最嚴重的危機——恢復失地主義（Irredentism），而且尤其是法德邊界地的恢復主義，爲了這個邊地自從查爾孟

〈Charlemagne〉大帝時以來每十年或二十年必發生戰爭……第二這公約可使德國回入歐洲
協調裏面。』(註1)

此後這一個安全公約的提議彷彿睡了幾個月。實則英法兩國外交部的機器是繼續不斷的在那裏工作，雖然德政府或許如像外界的公衆一樣的未曾察及。很明白的，差不多有三個月德政府對於牠的提議所聽見的只有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法政府發出的一个簡略的通牒，內稱牠『以興趣並以一種不忽視任何有裨歐洲與世界和平的決心』讀過了二月九日的覺書。

以安全公約的提議而言，四月是過去了，只有法政府在那裏起草一個理性的答覆給德國的覺書。草稿到五月十二日(一九二五年)完成了，即送與英外交部批評。張伯倫於五月十九日拿許多很直爽的問題答覆法政府。同月二十二日法外交部針鋒相對的回答了這些問題。這個回答一方面表示了兩個協約國的合作融洽無間，一方面也表示了相當的意見不合。尤其是法政府期望英國加以保證萊茵以外的地方。可是在一個說理周密的答覆裏，英政府拒絕了。

(註1) Times, March 30, 1925, p. 15.

法政府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的回答，以同樣的忍耐力，迎合英方的見解，這是牠在這次事件裏始終所抱的態度。牠承認英帝國統治地四散各處，誠使英政府不能不限制牠在歐洲大陸上的責任。可是法國所處的地位不同，對於歐洲其他部分關於土地改變的企圖，與萊茵一樣，『不能坐視無視』。

這便是爲什麼，在他們（法人自稱）答覆德國提議的草稿裏，他們認爲必須保留幫助他們所認爲必須予以擔保的國家的自由，蓋非此則擬議的萊茵公約反將於他們有阻礙，不利於他們……據我們的所見，這是擬議的公約之一個重要條件。

英政府立即贊同上述一節中所包含的意思。擬議的萊茵中立化，不能容許德國因爲西部特有公約的保護，沒有戰爭之虞，而與東鄰破約失和。

可是這些磋商，雖在進行，卻是很慢。尙在開會中的巴黎大使會議，關於裁軍問題在六月四日發了一個通牒給德國。在這個通牒裏，該會爲協約國政府不於一月十日撤兵的行動辯護：『這是要德政府忠實履行牠的義務纔能得到第一佔領區撤退的利益，如（凡爾塞條約）第四二九條

所規定者。』並且指出了許多德國違犯凡爾塞條約裁軍條款之處。這時候拍發這麼一個通牒，會被貶議爲不圓通的外交，但無寧說這個通牒是一種調和德政府與協約國的槓桿。因爲德政府能够合理地希望一個萊茵公約的締訂，可爲和平行動的充分證明，以取得至少是第一佔領區的撤退。

磋商繼續進行，但是——儘公衆所能判斷者——裏面活血少得很。英國的公衆聚精會神在煤礦業的危機裏面；公約問題似乎已經忘記了。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倫敦泰晤時報上一位訪員寫道：

安全公約——現行國際問題中最重大而且同時是最有希望的——如果沒有聰明的輿論的贊助，便沒有機會。危險是牠也許被我們國內緊急的問題推出於視線之外。

英國人民應瞭然在心的一點是：無論這安全公約已否簽字，將來如果有人攻擊歐洲的西方疆界，英國將鐵面無情的被牽入戰爭漩渦。我們加入該公約後的唯一差別，便是牠將使這種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大爲減少……這安全公約的理想是發動於一種熱誠切實的嘗試，要從國

際對峙和用兵必爭的危險的領域裏取出那塊歐洲的大「盤根地」『Burgundian』區，這地方路易十五久已說過『是我們一切戰爭的來源。』（註一）

實際上海外交家在那裏所做的遠過於公衆所知道的。法國外交部長白里安來到倫敦，於八月十二與十三兩日和張伯倫談判。到下一個法國通牒於八月二十四日交給德國外交部的時候，駐柏林的法大使麥吉利（Margerie）口頭傳達了一個法政府的建議，謂不妨有一法律家的委員會來從事於起草方式，以為相反的意見之『橋梁』。德國的答覆差不多馬上就來了。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晚上，巴黎的德大使漢希（Hoch）給了白里安一個通牒，內稱德國接受協約國的邀請，准赴倫敦參加法律家的會議，並且指明了牠所派的人——古斯博士（Dr. Gauss），德外交部法律司司長。『德方這種敏捷行動，在巴黎產生了一種良好的印象。』（註二）

法律家委員會於一九二五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裏在倫敦開會。與會者英國是西錫爾赫斯

（註一） Times, July 23, 1925.

（註二） New York Times, Aug. 27, 1925.

特 (Sir Cecil Hurst) 法國佛羅曼哲 (Fromageot) 比國羅林 (Rollin) 意國披洛地 (Pilotti) 德國古斯博士。這是意政府第一次積極地參加安全條約的磋商。三個萊茵公約的稿本——英、法、德——是準備了。當這些法律家工作完竣的時候，國際聯盟的第六次大會在日內瓦開會了。臨時主席是法總理班樂衛 (Painlevé)，他在大會開幕時聲稱世界崇高的希望不能一躍而就，只能按步實現。日內瓦草約沒有得到接受而失敗了，但是班樂衛預言『一種逐漸的運動，以達世界和平的鞏固。』真的，在那個光明的九月，在日內瓦的湖畔，有兩個可能的運動傳出來了。一個是美國加入國際常設法庭的問題。第二個是安全條約的磋商。這些事情並沒有正式提出國聯大會，但是在每個人的心頭。英法兩外長，張伯倫與白里安是出席的，還有那位活動和遠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朋斯博士，和波蘭的斯克靜斯基 (Skrzyński)。大家承認『那合於邏輯的步驟應該是把中歐公斷條約與萊茵條約同時草訂。』(註一)

九月間路德總理政府始終在棘手之中，因為擬議的萊茵公約顯然蘊有德國永遠放棄阿爾

(註一) New York Times, Sept. 11 1925, p. 22

薩和羅連之意，大爲國家主義派所反對。可是九月二十二日，巴黎就知道協約國和德國的政府已同意於十月五日舉行會議。選定的會議地方是洛加諾，在瑞士的美汲湖 (Lake Maggiore) 盡頭。德國的國家主義派依然阻礙這些談判。他們要求路德政府應請協約國收回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會上所加的戰爭禍首的判詞，算爲安全條約的一部分。(註一)

撤消戰爭禍首的要求，是德國任何政治家所不能漠視的。德國的公衆對此是堅持的。每次磋商都有這個要求的滲入，以致雙方接近的努力都歸徒然。英、法、比三國永遠不見得肯收回他們官場說過的話；凡爾塞條約與巴黎和會的紀錄必不容動搖。惟一有政治手腕的舉動是把陳蹟付之以往，另行開闢和平與親睦關係的系統。如果路德和斯脫拉斯孟可以自作主張，他們是會這樣做的；但爲了俯順公意起見，他們只得在洛加諾會議前的通牒裏提出撤消戰爭罪的要求。可是，當協

(註一) 戰爭禍首的定讞，根據凡爾塞條約的第三一條者少，而根據凡爾塞會議時協約國致德國代表團的若干通

牒者多。最好看 Kraus und Rodiger, Urkunden Zum Friedensvertrage von Versailles, I, 557

約國冷靜堅決的加以拒絕時，他們就很機警的不敢堅持了。既已滿足了公意，又蓋過了面子，斯脫拉斯孟很圓通的再不置辯，專事安全條約的磋商，多謝戰爭罪一端終算平穩過去了。

路德與斯脫拉斯孟是十月三日，星期六，到了洛加諾，偕行者有外交次長修佩爾特（Schuberl）與古斯博士，白里安同日亦到，張伯倫四日纔來。比國的樊迪文（Vanderelde）和意國的謝洛亞（Scialoja）也到了。五日，星期一，會議準備開工。遲到會者是莫索里尼和捷克與波蘭的代表團。洛加諾的旅館容不下這許多的外交家和新聞記者。德國代表團住在城外四英里，一個旅館裏面。會議在洛加諾的正義宮（Palais de Justice）開幕時，張伯倫說道：『我們在這裏是要除去那次大衝突的敵意，爲未來的和平奠下基礎。』斯脫拉斯孟說道：『我們在這裏都是平等的，德意志所要表示者，卽爲她之需要和平不亞於其他國家。』如今提出萊茵公約計劃的是德國代表團，因爲這是德國首創的提議。斯脫拉斯孟前一天曾私自告訴張伯倫說他不提那麻煩的戰罪問題。張伯倫也曾經告訴他說：『如果各國不能掩埋過去，他們無從爲將來設計。』（註1）

（註1） New York Times, Oct. 6, 1925, p. 2.

這會議始終不很正式。在正義宮二樓上，那間法堂裏，明窗巨櫺，美湖在望，代表們隨意侃侃而談。沒有主席或會長。美國人說老歐洲的外交正在效法新世界的『短衣』外交。會議的第二日，斯脫拉斯孟病了，協約國代表們到他牀邊訪問。若是怕洛加諾的市聲喧噪，白里安與路德便驅車十里之外，在披雪的高山脚下，臨湖的小園裏面，小坐移晷，暢談歐洲的調整。十月十日的一個下午，英、德的代表們鼓棹湖上，霞光在水，風靜波平，會議便渡過了最後的困難。

可是，會議的真轉機是在十月十日，這時莫索里尼尙沒有來，他的代表謝洛亞在這天聲稱意大利將與英法協同保證這萊茵公約。意政府直到這時候止沒有確實的諾言。西方列強的團結如今是宣布了；這效果顯然可見。會議自始至終，這位意代表謝洛亞『多方設計，解決糾紛，表現了非常妙的才。』（註一）

十月十四日，路德與斯脫拉斯孟接到他們柏林閣僚對草約條款的准許，這些條款是用急電發出去的。十五日，莫索里尼到了。同日，在美汲湖上的那間法堂裏，對於萊茵公約，法德與德比兩個

〔註一〕 “Notes From Locarno,” by H. F. Spender, in *Fortnightly Review*, Dec. 1925, p. 756.

公斷條約的條款得到了一致的同意。五個組成洛加諾協定的條約於十月十六日傍晚簽了字。會議於是告終了，秘書們把吸墨紙蓋上新簽字的條約，並且整理各項文件，這時候政治家們愉快地來到窗前，平眺美汲湖上拖長的影子。不知誰推開了一扇窗戶，向外面的羣衆宣布了這場大事，羣衆便歡呼起來慶祝這些和平公約的簽訂，大戰創痕的治愈。

很少會議比洛加諾更祕密，也很少比牠更成功。然而對於外交協定能合理要求的惟一公開之點，也不過是應把他們交付各國議會公開批准而已。協定的磋商不能公開從事。張伯倫在洛加諾對好管事的新聞記者解釋這點：

在外交的交涉裏，政治家所取地位實際上是準備退讓一部分的，但既經報紙把起初的地位作爲官場的地位而公布了，那末從國內的與政治的觀點上而言，再要退讓是非常困難。(註一)

在洛加諾會議期內，所有的政治家不得不顧到那不明真相而且不完全合情理的輿論，這種輿論在法德兩國是尤其敏感和激烈的。會議的祕密造就了牠的成功。一切條約仍須經過各國立

(註一) New York Times, Oct. 13, 1925, p. 22.

法院的批准，纔能於十二月一日在倫敦作最後的簽字。這個經過倒很順利，在十二月一日那天，洛加諾會議認可的條文便成了倫敦的條約。

那個最後草約和六個附約合併成了洛加諾與倫敦的外交文件。

條約和附約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個（a）德意志、比利時、法蘭西、大不列顛與意大利互相保證條約。弁言內稱締約各國亟欲滿足一九一四——一八年戰爭中遭難人民要求安全之心，鑒於比利時中立條約的廢除（註一）深覺有保證常為歐洲衝突出事地點的那個區域的和平之必要；並且樂願在國際聯盟約與各簽字國間現行條約的體制內給以補充的保證，爰議定如下。隨着便是這條約的十個條款。按第一條

締約國，以下列各條款所規定之行爲，共同的與個別的擔保：（一）從德意志與比利時間及德意志與法蘭西間國界產生的領土現狀之維持；（二）依照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爾塞條約或由該約所註定的上述各國界之不可侵犯性；（三）該約關於廢除軍備區域的條

（註一）凡爾塞條約第三十一條（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文第四十二與第四十三條之遵守。(註一)

按之第二條

德意志與比利時，以及德意志與法蘭西，互相擔任無論如何決不互相攻擊或侵犯或興兵互戰。

這一條特許的例外是那種合法的自衛，或一方對凡爾塞條約第四十二與第四十三兩條有『罪惡昭彰的違背』，而此種違背是未被挑撥的侵略行動。還有一種例外，是按照國際聯盟盟約第十六條或按照第十五條而定的國聯決議之行動。(註二)

第三條規定德意志與比利時間以及德意志與法蘭西間的一切爭執，凡不能用尋常外交方(註一) 凡爾塞條約第四十二條禁止德國在萊茵左岸或右岸以東五十基羅米突之內有任何武備，第四十三條禁止在該地維持或召集軍隊，或任何種的軍事操演。

(註二) 國聯盟約第十五條如下：『聯盟會員國彼此約定，如聯盟會員國間發生足以決裂之爭議，而未照第十三條辦法提交公斷者，應將所爭事件提交行政院……』

法解決者，應提交司法裁判或一個調解委員會。

第四條規定任何一締約國，凡訴稱對第二條已犯有違背情事者，必須立即提出該問題於國際聯盟行政院，當國際聯盟行政院認定已犯有違背情事時，該院應通知本約簽字各國，「他們（簽字國）個別同意在此種情形下，決立即各自赴援該背約行為所加害的國家。」可是，如果對第二條已犯有「罪惡昭彰之違背」，每一締約國擔承即時赴援該被攻擊的國家，不必等候行政院的通告；不過行政院的建議，一經發出，他們便須同意。

第五條規定關於爭端之和平解決，置於締約各國擔保之下；換言之，即各國必須赴援（第四條規定者）任何願用和平方法解決爭端之簽字國家，以敵對任何拒絕這樣做之簽字國家。

第六與第七兩條保障締約國在凡爾塞條約與關於陶斯計劃的一九二四年八月之協定下面的權利，以及國際聯盟的權利義務。第八條制定謂該條約應在國際聯盟註冊，並且應繼續有效。迄至國際聯盟行政院據任何締約國之請求，而以三分之二多數決議由國際聯盟給予各締約國充分保護時為止，該約在此項決議後一年期滿時，停止發生效力。

第十條稱該條約應經批准，而批准書應存入國聯檔案內。該約應在批准書歸宗後及德意志加入國聯後立即發生效力。

第二個協定是德意志與比利時的公斷協定，牠規定用尋常外交方法，用公斷程序，或由國際常設法庭和平解決該兩國間的爭執。牠設立一個永久的調解委員會，這委員會應設法在提交國際常設法庭或一九〇七年海牙協定所規定的公斷法庭之前把一切爭執解決。

第三個協定是一個德意志與法蘭西間的公斷條約。其內容與上述協定相同。

第四個是德國與波蘭間的一個公斷條約。這個與法德及比德的公斷協定相同，惟有一更爲詳細更有意義的弁言。因爲在洛加諾無人不知德國已從此放棄牠與法蘭西和比利時的國界任何修正的要求，而關於波蘭並沒有爲同樣的放棄。德政府所允許者，不過說是決不用戰爭方式企圖修正牠與波蘭的國界；但牠彰明昭著的希望能用協議做到這點。德比公斷條約因此聲稱締約國『決心維持德國與波蘭間的和平，特保證兩國間可能發生的爭端之和平解決。』他們宣稱『國際裁制必須尊重由條約所成立或從國際法所產生的權利；』他們同意『一國的權利非得其

允許不能修改。』隨着便是公斷條約的各項條款，規定用尋常外交方法，用一個永久的調解委員會，或者再不成便由一九〇七年海牙協定規定的一個公斷法庭或由國際常設法庭來解決爭執。

第五個條約——德國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斷條約——內容與德波的條約相同，包括弁言在內。

一般的洛加諾協定裏的最後一個，是由出席洛加諾全體國家發給德國的一個共同通牒，保證謂如果她擔任國聯會員國的義務，她的解除武裝的情況不會暴露她於意外的危險。

除上述的草約與六個附約以外，還有兩個條約，嚴格講來並不是洛加諾協定的一部，但是確係在洛加諾議訂的，而且是補充那些協定的。這兩個條約的所以訂立，乃由於英意兩政府按照互助條約僅擔保了德國與法比的國界，以及法德與比德的公斷協定。關於東部（德波和德捷）國界，英意兩政府可沒有任何擔保。然而法政府在這些磋商裏而始終認為法國的安全不僅繫於牠在萊茵的地位，而是繫於她在東歐的聯盟。（註一）因此在洛加諾，白里安訂了兩個條約，一個與波

（註一）法國波蘭條約，Feb. 19, 1921；法國捷克條約，Jan. 25, 1924；見 George Glasgow, "From Danes to Locarno," (1926), pp. 105-7.

蘭，一個與捷克斯洛伐克締約國，『按照國際聯盟盟約第十六條行事，』承諾『互相給與立即的幫助。』如果任何一國『遭受一種不遵守他們與德國間本日所定的契約。』實際上法國擔保的是德國應遵守東部的公斷條約，波蘭與捷克斯洛伐克擔保的是德國應遵守西部的條約。

第三十一章 歐洲政團

洛加諾的協約大有助於歐洲國家系統的恢復，這系統業經一九一四年——一八年的事件破裂得那樣的可悲。給予新制度以重要性的，不僅是國際爭執用和平解決的保證與機關；在這一切之上，公共事務裏起了一種新的潮流，那便是通常稱做『洛加諾的精神』。在該會議上盛行的好感後來還維持不衰。當德國各代表邁返柏林的時候，法大使前往去接，隨後大家看見他和斯脫拉斯孟從車站裏出現，把着臂，露着笑。在十一月九日的基爾特廳（Guild Hall）宴會上，張伯倫飲過合歡盃後，立即以自然動人的儀態，把孟子遞給德國大使，於是引起了一大鬧動。洛加諾的精神即是調和的精神。若是這種精神成爲全歐的態度，那麼到和平之路便安穩了。洛加諾議事桌上德國享受的平等與款待，大大減殺了凡爾塞『獨裁』的和平所遺留下來的感情。（註一）

（註一） Deutsche Rundschau, Nov., 1925, p. 195; "Die Konferenz von Locarno."

洛加諾會議表顯了歐洲威勢的復活，這威勢在一九一四年——一八年的大戰與戰後的幾年裏已減少了許多。歐洲威勢的衰退，同時引起了遠東與近東方面法律和秩序的廢弛。土耳其成功了一次回教對歐洲霸權的反抗。中國人堅持廢除多數歐洲國家享有的治外法權的要求。敘利亞與摩洛哥的一部份在一九二五年秋是在烽火飛揚之中。

洛加諾會議的成功，使歐洲以外的世界頓時另眼相看。歐洲關稅同盟被認為很可能，而且「一個歐洲合衆國也已經被人談起來了。」（註二）歐洲合衆國一語在美國報紙上是時常提到的，美國報紙並且「承認歐洲正開始恢復其領袖地位。」（註一）托奈齊加（Troitschke）的名言又證明了：「歐洲將永為世界的中心，」因為牠在以往根深蒂固，文化與政治的傳說又已完善確立。

歐洲的系統這時更因國際聯盟威權漸張而大見強固。柯夫事變（Corfu incident）的解決

（註一） New York Times, Oct. 19, 1925.

（註二）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 Oct. 13, 1925.

證明了國聯爲善的勢力雖然沒有表現得有聲有色。

是在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七日，重訂阿爾巴尼亞與希臘國界的國際委員會裏意國的委員們從瓊尼那 (Janina) 到桑地可隆他 (Santi Quaranta) 道經希臘領土時突被襲擊。德里尼 (Tellini) 將軍，科地 (Cori) 少佐，與邦拉新尼 (Bonaccini) 大尉俱被殺死。

莫索里尼治下的意政府發了一個哀的美敦書給希臘政府，提出若干要求，內中包括由意國官吏一人前往暗殺地點調查，以及償付五千萬意幣里拉爲賠款。接到一個答覆，他認爲不滿意，莫索里尼便下令佔據柯夫，由意艦砲轟該城，於八月三十一日實行佔領。約有十五個市民死於砲轟之下。(註1) 可是莫索里尼在一紙官報裏宣稱柯夫之佔領爲暫時的並且非戰爭的行動。然而歐洲的輿論自然很烈的騷動了。有些人深深擔憂，恐怕意政府或許像以前的保持多特康尼斯一樣，保持柯夫。歐洲的燎原之災似乎已有了成分。

希臘政府勉自抑制，把這事照國聯盟約第十五條提交國聯行政院。湊巧國聯大會和行政院

(註1)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Nov. 1923, p. 1277.

九月裏正在日內瓦開會。

羅伯特西薛爾 (Robert Cecil) 說，國聯行政院不能承認強國與小國的區別：『他們全都平等的要遵守他們簽字於國聯盟約後而發生的義務。』(註一) 意政府由沙朗特拉 (Salandra) 代表出而否認國聯有處理該案之權。巴黎的大使會議纔是負責實施和約的機關。劃清希臘與阿爾巴尼亞國界的國際委員會，乃是大使會議根據實施和約的責任而設立的。希臘政府在事實上對暗殺的責任問題，曾同意接受大使會議的決議，但意政府未加許可。

國聯行政院於九月六日致一信於大使會議，鼓勵該會對該爭執覓一解決，可是保留行政院對於自身處理此案權力的見解。因此該會議能於九月八日聲明如果希臘政府接受某種條件，柯夫可以撤退。主要的條件是希臘政府應在雅典與法利龍 (Phaleron) 作儀式的道歉，並派一國際調查團往瓊尼那調查罪狀。

這個通牒把瓊尼那的暗殺及其責任的事件，從意大利手裏取出來，由大使會議承辦，算是三

(註一)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Nov. 1923, p. 1279.

協約國（英、法、意）的一個問題。因此，不論最後的條件何若，希臘能够無損尊嚴的讓步，因為她所服從的不是意大利的武力，而是大使會議的司法的意見。國聯行政院用牠對意大利的壓力和牠的公開宣傳，頗有助於這種政治手腕的解決，那是無疑的。

九月十日規定的儀式平平穩穩的在雅典和法理龍舉行了。國際調查委員會到九月二十五日既未能查出暗殺意大利官吏的凶手，大使會議便在九月二十六日發往希臘政府的一個通牒裏，決定認為這次事變已告結束，命令希臘償付意政府五千萬里拉，作為未能保證凶手之捕獲與懲辦的罰金。』（註一）希臘早已把這筆錢存在瑞士國家銀行裏以表信用；如今便付了給意大利政府。

所以國際法的統治得了拯救。國際聯盟誘引了大使會議受理這個問題。大使會議把牠的威權加在了希臘和意大利兩政府的上面，而起初自稱有獨立行動之權的意大利政府，又接受了會議的判決的確，牠服從這判決是因為得到了原來要求的五千萬里拉的款額。許多人批評這種損

（註一） Annual Register, 1923, p. 225.

失賠償爲過分。在另一方面，大使會議明白表示了意大利在賠償的要求滿足後，必須立即撤退柯夫以及牠所佔據的任何埃阿寧羣島 (Ionian Islands)。再者，莫索里尼原來的要求，謂偵查法庭須由一個意國官吏主持，亦被該會議所推翻。柯夫於九月二十七日便撤退了。

在柯夫事變的進行中，莫索里尼曾否認國聯處置任何從和約發生的問題之權力。這次發生暗殺的實際事變雖委於大使會議解決，同時國聯行政院卻乘機證實牠的權力。

行政院委員同意，凡國聯會員間任何勢將發生衝突的爭執，都是在國聯行動範圍之內，並且如果此種爭執不能以外交、公斷，或司法處理解決時，行政院責任所在，須按照盟約第十五條應付之。

行政院決議這些問題應指令一個法律家特別委員會表示意見加以答覆。(註一)

關於行政院『抓住了一個爭執』時的行動的自由問題及其所得答覆，在大體上是有利於國聯的。(註二) 法律家承認的唯一限制是在盟約第十五條第八段之下，這一段載着：

(註一)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Nov. 1923, p. 1551

(註二) 問題與答覆載 Official Journal, April, 1924, p. 521

如相爭的一造，對於爭議自行聲明並為行政院所查悉，按諸國際公法，純屬該造本國法權範圍以內的事件，則行政院應據情報告，而不必為解決該爭議的建議。

『一點又一點』與『一線復一線』可為國聯的格言。第二次一個歐洲國家對另一歐洲國家的戰爭行動，國聯決然的出來干涉了。這事發生於一九二五年十月的希保爭執。

十月十九日靠近德美加普 (Demirkapu) 地方的希臘和保加利亞國界上發生了鎗擊。邊境的常備軍隊也加入了，『雙方的軍用房被據了而在短時期間保加利亞人與希臘人便互相佔據疆土了。』(註一)希臘的參謀部聞耗大為激動，深恐馬其頓 (Macedonia) 與慈乃斯的希臘當局間的交通被割斷。(註二)該部立即派出沙隆立加的第三軍團，佔領一大塊保加利亞的領土，並且砲擊了彼特里希 (Petrich) 城。發了一個哀的美敦書給保加利亞政府，要求賠款二百萬金法郎。十月二十三日保加利亞政府向國際聯盟抗議希臘政府的行動。

(註一) Crawford Price 有文發表於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19, 1925.

(註二) 國聯調查委員會報告見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8, 1925.

保加利亞的控訴從國聯的祕書長處交到白里安，他是國聯行政院的主席，同時又是法國外交部長。白里安立刻發出一強硬的通牒給雅典與蘇非亞兩國政府，要求各個政府的軍隊立即撤回至各自邊界以內，並且在行政院調查該問題期內不得作新的軍事行動。

四天之間，一個普遍的巴爾幹戰爭籠罩着歐洲。巨哥斯拉夫（牠與保加利亞關係極爲險惡）能否保守中立很是問題。據云保加利亞在列強裏面有牠自己的朋友，希臘亦然。大家深怕在巴爾幹多事之地，表現西方列強的對峙。當十月二十四日希臘政府宣佈允許，在保加利亞退出所佔希臘的條約上，撤退牠在保境的軍隊，這時候歐洲纔爲之釋然。希臘政府承諾『接受行政院的權力』。（註一）十月二十六日華盛頓的希臘使館公布雅典來的一個電報，稱希臘的同意國聯通訊，乃是由於羅馬尼亞的一個請求，該政府『勸希臘政府證明牠的和平意向』。

國聯行政院於十月二十六日在巴黎的外交部開會，由白里安主席，張伯倫與其他八個歐洲政治家出席。聽了保加利亞與希臘駐巴黎公使們的陳述以後，行政院通過下面的決議案：

（註一）希臘通牒全文載 New York Times, Oct. 26, 1925.

行政院必俟軍事行動業已停止與軍隊撤至國界以內時，方告滿足。因此牠請兩國代表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報告保加利亞與希臘政府已無條件地命令軍隊撤回至各自國界以內，並在六十小時以內——即星期六開會時——報告所有一切軍隊已經撤回至國界以內，一切的戰鬥已經停止，並且所有的軍隊已加警告謂再敢開鎗者將受嚴厲的處罰。

『必須明白認清者，』白里安對希臘與保加利亞的代表說，『即這種時限乃是從現在算起。』
(註一) 行政院的要求被接受了，國聯派了一個小的委員會往德美加普去調查這件事變並決定責任。

調查委員會的主席是英國駐西班牙大使霍來士倫波特。該委員會包括一個法國軍官，一個意國軍官，一個瑞典公民，和一個荷蘭公民。牠的報告使國聯行政院深信希臘的侵略保加利亞領土沒有理由，雖然確立了一個事實，即希臘一哨兵與一官吏拿了面白旗在十月十九日（事變的第一天）被殺。委員會計算保加利亞所受的損失約四萬五千英鎊。國聯行政院派了一個委員會

(註一) New York Times, Oct. 27, 1925.

以張伯倫爲主席，審查了該項報告，並決定了希臘是有過失的，應賠償保加利亞三千萬里伐 Leva，約四萬三千至四萬五千鎊。

德美加普事變剛洛加諾和平的明日，陡然散放了戰爭的禍患，牠的和平了結是國聯最奇偉的成功。有人批評國聯行政院對待兩個巴爾幹小國則猛，對待柯夫案中的意大利則寬。別的人，比較寬大些，認爲列強，尤其是英、法、意之稱頌國聯行動，已『爲他們將來的行爲給了擔保。』（註一）將來如果列強間發生危機，國聯處置德美加普事件的判例勢將斷然引用，再如果美國的權力與原則是贊助國聯的話，那就更有力了。（註二）

在早先五年裏，歐洲另有一個傷痕，曾由兩造直接磋商治愈好了。

亞得利亞問題在和會裏曾使威爾遜與其他政治家爲之束手無策。意大利得了托利斯脫

（註一） 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 Oct. 31, 1925.

（註二） The Milwaukee Journal, Oct. 29, 1925. 美國 Middle West（中西部）對美國的參加不甚贊同，但

德美加普事變的結果，使 Milwaukee Journal 該期社論中發生這樣的期望。

(Trieste) 和伊斯屈利亞 (Istria) 半島，巨哥斯拉夫得了大部分的大爾馬地海岸，但阜姆是一塊爭嘗的鼎鑪。牠本由協約國軍隊佔領，但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二日有名的詩人，小說家兼當過大戰裏的兵士的加布里鄧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 領了一小隊的義勇軍佔據了這個城。協約國軍隊爲避免引起意巨戰爭起見便撤退了。

意政府很願意與巨哥斯拉夫公道辦理，但是牠頗受強烈的輿論所左右，牠不敢對鄧南遮和他的義勇軍以兵戎相見。終於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喬渥立帝與巨哥斯拉夫締訂了拉派洛條約 (Treaty of Rapallo)。根據這個條約，巨哥斯拉夫取得所有的大爾馬地海岸，除了柴拉 (Zara) 劃歸意大利外，阜姆則爲一獨立國家。拉派洛條約公布了。同時意外交部長斯福蘭 (Forza) 送了一封密札 (日期爲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給巨哥斯拉夫外交部長托蘭比煦，聲稱託博羅斯 (Porto Barros) 應屬巨哥斯拉夫，該地是阜姆東南角上一塊人造的盆地。這封信未經公布，因爲在那時公布只有激動意大利的輿論。拉派洛條約有一項規定，稱阜姆獨立國應有一條走廊邊岸，西北至意大利邊界。

拉派洛條約被意大利國會批准了，喬涅立帝自覺力能逼近阜姆，向鄧南遮表示，謂假如任何一切俱不能使彼幡然變計，惟有用武力作斷然處置。故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天鄧南遮宣告爲武力所屈服。他於是離開這個有一個時候繁盛過的城市，如今卻是街上長了草。

阜姆獨立國於是這樣成立了，但牠的生命很短。志在歸併意大利的國家黨在這小國裏鬧成了嚴重的騷擾（國中只有四萬人口）。最後意政府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三日派了一個欽使前往治理阜姆。斯福蘭在意大利國會裏承認樸託博羅斯屬於巨哥斯拉夫。（註一）這個報告益加增進了國家主義者的煽動；因爲樸託博羅斯雖是巨國蘇沙克（*Sushak*）城的必要的出口，卻也被認爲對於阜姆的經濟繁榮有同等的需要。

解決這問題的是莫索里尼，他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法西斯蒂革命後做了意大利的首相。他有力地聲稱準備保守拉派洛協定。他與巨哥斯拉夫政府開談判。然而阜姆簡直是在那裏當做一塊意大利屬地治理。拉派洛協約分明必須修正。意巨雙方都願磋商。最後，在一月二十七日

（註一）見 *Toynbe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4, p. 413.*

(一九二四年)雙方政府簽訂了新的文件。阜姆自由邦是取消了。樸託博羅斯與附近的新那河(Recina)的三角洲認爲屬於巨哥斯拉夫，外加了一塊伸出的土地。該獨立國其餘各地，包括那條邊岸(減小了)則歸併入意大利。因爲單是樸託博羅斯一地不足爲巨哥斯拉夫內地的埠頭，因此把阜姆主港裏的一塊盆地借了給巨哥斯拉夫五十年。這個協定更因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所訂的一個錫誠合作公約(Pact of Cordial Collaboration)而益見鞏固。(註一)所以時常有一觸即發生戰爭的巨哥斯拉夫與意大利，終於用忍耐和外交解決了這個長期爭鬪的原因。

國聯直接有關的一次爭端是英國和土耳其關於土耳其與伊拉克的邊界。英國是伊拉克的受委託統治國，負有保障該國利益之責。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洛桑條約第三條內稱：

土耳其與伊拉克的國界，應由土耳其與英國在九個月內用友誼的處置規定之。如果在前述限期內兩國政府不能達到任何協議時，此項爭執應提交國聯行政院。

(註一) 國際聯盟, Treaty Series, vol. 26, 1924, No. 637. 締約雙方協議如雙方的共同利益受危害時，將共同

一致行動。

爭執的地方是在舊土耳其的伊拉克省的北部，通常稱爲木蘇爾區。英國更擬把若干爲亞西利亞基督徒所住的區域歸入伊拉克，俾他們可從土耳其人迫害之下救出。爭執所在的全部土地很是重要，在軍事上，伊拉克無此地便難防守，在經濟上，這地方蘊有油產。

英士間一九二四年裏的磋商都沒有得到什麼協議。因此英政府於洛桑條約所定的時限過後，便把這個爭執提交國際聯盟。同時土耳其似未遵守土地的原狀。土軍開入了條約簽字時沒有駐兵的地方。英政府因此請國聯行政院明定英士政府曾允遵守的土耳其與伊拉克的邊疆地位。行政院在布魯塞爾開會，畫了一條臨時的邊界；土耳其同意遵守這條『布魯塞爾線』迄至最後的解決爲止。（註一）

國聯派了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前往伊拉克，最後在一九二五年八月裏向國際聯盟報告了。委員們建議謂邊界應照布魯塞爾線而定。（註二）把木蘇爾和亞馬地亞（Amudiah）劃歸伊拉克。

（註一）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No. V, 1924, pp. 1648-54, 1659-60.

（註二） Times, Aug. 8, 1925. 並見 League of Nations, Thirty-fifth Session of the Council (Cmd. 2528 of 1925)

英政府對於這個建議雖然大致滿意，但仍要求一條國界略在這線之北，俾『被土耳其人逐出來的亞西利亞人的老家包括在依拉克裏。』（註一）

土耳其雖非國際聯盟的會員，卻有一代表羅希德博士（Dr. Tewfik Rushdy）參加關於木蘇耳的討論。英國與土耳其都曾擔任（一九二四年九月）遵守國聯的決議。（註二）因為羅希德博士反對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國聯便延緩決議並另派了一個委員會去審查兩造對爭執的見解。土耳其政府不管牠先前已擔任恪守國聯行政院的決議，（註三）如今聲稱國聯不能作有拘束力的決議，僅能作一建議，聽憑兩造的同意與否而定。

（註一） Speech of Mr. Amer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at the Thirty-fifth Session of the Council of the League, September, 1925. (Cmd. 2528 of 1925, p. 6).

（註二） 閱 Udden 的報告 (Cmd 2565 of 1925, p. 3).

（註三） 閱 Publications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Series B, Collection of Advisory Opinions, No. 12, p. 17.

國聯行政院因此決定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九日按照洛桑條約第三條把行政院的權力問題交國際常設法庭答覆。(註一)所諮詢的問題是：

(一)根據洛桑條約第三條第二段，行政院應作的決議，其性質為何——公斷的判決，議，抑為一種簡單的調停？

(二)決議必須全體一致，抑由多數票決定？有關係方面的代表可參加投票否？
國際常設法庭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出牠的意見書。牠稱『行政院所作決議對兩造有拘束力，並且成為土耳其與伊拉克間國界的一種確實的決定。』牠又主張決議『必為全體一致，兩造的代表參加投票，但他們的投票於決定是否全體一致時不算在內。』(註二)英政府對於這種意見不表反對。土耳其宣稱牠不能同意照牠的見解說來，行政院僅能用全體一致的決

(註一) 該法庭於一九二一年按照國際聯盟盟約第十四條成立了。

(註二) Publications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Series B, Advisory Opinions

議，包括兩造的投票，纔可以採取法庭的意見。可是國聯行政院不管這一點，牠全體一致的接受了法庭的意見，兩造的投票不算在內。

賴唐南將軍 (General I. Laidoner)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從木蘇爾發出的報告，公布之後，引起了淒慘的印象。賴唐南將軍是一位著名的意沙尼亞軍人，他被國聯行政院派往考察布魯塞爾線兩方的情形。他報告謂布魯塞爾線南再沒有什麼土耳其的軍站，但土人正把基督教住民從臨時的土耳其地境裏驅逐出來到臨時的伊拉克地境。這種措置連帶發生了土耳其兵的『殘暴不仁的舉動，甚至於屠戮慘殺』還徵收罰金，佔取婦女。(註一)

國聯行政院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判決，定布魯塞爾線爲確實的疆界。(註二)該院邀請英政府與伊拉克訂一條約，保證委託統治制度繼續二十五年。整個事件於是由英國與土耳其直接磋商解決。

(註一) 報告全文見 Cmd. 2557 of 1925.

(註二)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Nov., 1924, p. 1671, 上有一張布魯塞爾線的地圖。

固有名詞中英文對照表

第一章

馬勒杜潘 (Mallet du Pan)
 兩國同盟 (Dual Alliance)
 三國同盟 (Triple Alliance)
 聖喬立諾侯爵 (Marquis di San Giuliano)
 桑特爾將軍 (General Liman von Sanders)
 吉馬爾 (Djemal)
 米居里 (Migueltine)
 格萊 (Sir Edward Grey)
 保羅肯邦 (Paul Cambon)
 馬漢海軍司令 (Admiral Mahan)
 五國條約 (Five Power Treaty)
 倫敦公約 (Pact of London)

朋根多夫 (Benckendorff)

白皮書 (White Paper)

第二章

馬歇爾比伯爾斯坦 (Marshall von Bieberstein)

巴格達 (Bagdad)

哈布斯堡皇室 (Habsburg Monarchy)

波斯尼亞 (Bosnia)

赫爾仔哥維那 (Herzegovina)

愛德華七世 (Edward VII)

雷斯特爾爵士 (Lord Redfale)

賽德哈哩親王 (Prince Said Halim)

耶維特 (David)

統一與進步委員會 (Committee of

統一與進步委員會 (Committee of

統一與進步委員會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安威爾 (Enver)

泰拉提 (Talaat)

坦克瓊斯古 (Take Jonescu)

馬西唐尼亞 (Macedonia)

滿拉斯地爾 (Monastir)

托利坡里 (Tripoli)

斯蒂特 (Steel)

麥默特歇夫克提拍夏 (Mahmud Shevket Pasha)

蘇丹渥斯孟 (Sultan Osman)

雷斯賈地 (Reschadieh)

閣本 (Tobeen)

勃來斯勞 (Breslau)

韃靼海峽 (Dardanelles)

博斯佛拉斯海峽 (Bosphorus)

王根哈姆 (Wangenheim)

保孟 (Baumont)

林普斯海軍司令 (Admiral Limpus)

馬勒提 (Sir Louis Mallet)

梭非亞 (Sofia)

馬因 (Marne)

吉雷納爵士 (Lord Kitchener)

費杜西亞 (Feodosia)

基爾斯 (M. de Giers)

塞普拉斯 (Cyprus)

默克他拍夏 (Mahmud Muktar Pasha)

第三章

未贖回的意大利地方 (Italia Irredenta)

托倫地洛 (Trentino)

亞得利亞海 (Adriatic)

肯波福米阿條約 (Treaty of Campo

Formio)

尼斯 (Nice)

突尼斯 (Tunis)

伯啓托特伯爵 (Count Berchtold)

愛倫塞爾伯爵 (Count Arential)

馬古第將軍 (General von Merguth)

威廉街 (Wilhelmstrasse)

康拉德德陸軍元帥 (Field-Marshal Conrad)

西德尼宋理諾 (Sidney Sonnino)

亞伐那公爵 (Duce d'Avarna)

布洛親王 (Prince Bismarck)

馬爾達別墅 (Villa Malta)

維希特爾 (Kiderlen-Waechter)

麥吉阿男爵 (Baron Maechio)

托里斯提 (Trieste)

布林男爵 (Baron Buriann)

多德康尼西 (Dodekanese)

偉特爾將軍 (General Count von

Wedel)

南帖羅耳 (Southern Tyrol)

格拉迪斯加 (Tiratisca)

意松查 (Isonzo)

郭里齊亞 (Gorizia)

羅特 (Rennell Rodd)

印泮略里 (Imperiali)

維特威廉 (William of Wied)

烏蘭 (Ulans)

烏定堡 (Wurtemberg)

杜雷查 (Darezzo)

沙生諾 (Saseno)

沙蘭德拉 (Antonio Salandra)

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意大利人民報 (Il Popolo d'Italia)

喬握立帝 (M. Giolitti)

錫沙爾品帖羅耳 (Isalpine Tyrol)

勃倫納 (Brenner)

意斯托利里 (Istria)

羅新 (Lussin)
派拉助利 (Palazzoli)
大爾馬地亞 (Dalmatia)
普蘭加角 (Cape Panka)
厄立得利亞 (Erythraea)
沙馬利蘭 (Somaliland)
里比耶 (Libya)
克羅地亞 (Croatia)
門的內閣羅 (Montenegro)
阜姆 (Fiume)
凡格利亞 (Veglia)
潘維吉亞 (Povodina)
格利各略 (Gregorio)
郭立阿 (Golio)
亞爾培 (Arbe)
德林河 (R. Drin)
斯派拉托 (Spalato)
拉古沙 (Ragusa)
喀泰拉 (Cattaro)

木索兒人 (Messulman)
神聖教堂 (Holy See)
佛郎西司蘇辟羅 (Francis Suptlo)
第四章
沙重諾夫 (N. Saazonoff)
樸資茅斯條約 (Treaty of Portsmouth)
斯托立品 (Stolypin)
伊斯伏爾斯基 (Isvolsky)
哥爾倫米金 (Gorenvkin)
自由黨人 (Cadets)
加里西亞 (Galicia)
派利洛格 (Paleologue)
大操場 (Champ de Mars)
古斯公爵 (Duc de Guise)
鮑將軍 (General Pan)
布加利斯提 (Bucharest)
萊茵河 (the Rhine)
科布林茲 (Coblenz)

西摩談話 (Hamilton-Seymour Conversations)
意諾斯米迪亞線 (Enos-Midia line)
沙卡利亞河 (R. Saxaria)
意斯米特灣 (Gulf of Ismid)
馬摩拉梅 (Sea of Manora)
應布洛斯 (Imbros)
加里波里 (Gallipoli)
麥根生元帥 (Field-Marshal von Mackensen)
騰拉傑克 (Dumayec)
第五章
格羅秀士 (Grotius)
巴黎宣言 (Declaration of Paris)
薩丁尼亞 (Sardinia)
貝其 (Page)
霍司大佐 (Colonel House)
藍辛 (Lansing)
西雪爾斯普林來司 (Cecil Spring-

Rice)

勃來登 (E. N. Breitung of Michigan)

大西亞 (Dacia)

托倫提 (Trent)

開爾克華爾 (Kirkwall)

第六章

湯麥司甲弗遜 (Thomas Jefferson)

里集 (Liège)

亞西利安人 (Assyrians)

阿里渥維斯達斯 (Ariovistus)

糾塞蘭 (Jusserand)

伯恩斯托夫 (Benstorff)

齊麥爾門 (Herr von Zimmermann)

普林斯頓 (Princeton)

伯斯門賀爾維 (Bathmann-Hollweg)

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肯那德輪船公司 (Cunard Steamship Company)

魯西坦尼亞 (Lusitania)

杜姆巴 (Dumba)

登堡博士 (Dr. Dernburg)

克利夫蘭 (Cleveland)

包爾福 (Balfour)

霍司議定書 (House Memorandum)

霍司大佐密件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凡爾登 (Verdun)

桑姆 (Somme)

愛斯揆士 (Asquith)

白里安 (M. Briand)

第七章

亞得利亞羅羅 (Adriatic)

弗地蘭 (Ferdinand)

蓋可夫 (Guechoff)

謝托克 (Theotokes)

威尼柴洛斯 (Venizelos)

慕尼克 (Munich)

愛琴羣島 (Aegean Islands)

巴式煦 (Pashitch)

柴米斯 (Zaimis)

斯古魯地司 (Skouloudis)

格魯克斯堡王朝 (Glucksbourg Dynasty)

柯夫 (Corfu)

彼得王 (King Peter)

羅泊耳斐塞 (Fort Ruppel)

麥爾伯煦哈夫伯爵 (Count Mirbach-Haritz)

甘立慈 (Görlitz)

克雷地 (Crete)

康多略地斯海軍司令 (Admiral Condouriotis)

沙拉米斯海峽 (Straits of Salamis)

關布羅斯 (Spiridon Lambros)

法利弄 (Phaleron)

柴品 (Zappéion)

瓊拉提 (Jonart)

亞力山大 (Alexander)	波爾共和國 (Boer Republic)	卻爾斯皇帝 (Emperor Charles)
披里亞斯 (Pierous)	查利王 (King Charles)	喀萊 (Calais)
洛金嶺 (Mount of Lovchen)	何亨佐倫 (Hohenzollern)	梅特涅 (Meternich)
第八章	托倫雪爾文尼亞 (Transylvania)	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 (Brest-Litovsk)
麥因 (Marne)	福爾根海將軍 (General von Falkenhayn)	何夫孟將軍 (General Hoffmann)
克虔克 (A. von Kluck)	卡派新 (Carradians)	杜克賀林將軍 (General Dukhomin)
伐地坎 (Vaticum) (教皇政府所在地)	瓦拉齊亞 (Wallachia)	克列倫可 (Krisjan Krylenko)
上薩伏夷 (Upper Savoy)	摩爾達維亞 (Moldavia)	李阿坡特親王 (Prince Leopold)
德恩 (Berne)	約塞 (Jassy)	越飛 (Veffe)
利佛特拉與亞爾孟 (Revertera-Armand)	西列斯 (Serech)	卡門納夫 (Kamenef)
斯茅次與門斯多爾夫 (Smuts-Mensdorf)	威特 (Witte)	比成可 (Madam Bizenko)
何恆洛親王 (Prince Gottfried von Hohenlohe-Schillingfürst)	拉斯普丁 (Raspudin)	可蘭 (Courland)
恩提威爾普 (Antwerp)	克倫斯基 (Alexander Kerensky)	立陶宛 (Lithuania)
伯爾格納德 (Belgrade)	維威 (Vevy)	斯托克霍姆 (Stoekholm)
辜爾孟男爵 (Baron von Kilmann)	尼古拉列寧 (Nicolai Lenin)	愛沙尼亞 (Esthonia)
第九章	普拉吞 (Fritz Platen)	立汪尼亞 (Livonia)
	格列姆 (Robert Grimm)	文斯克 (Dvinsk)
	克賓林伯爵 (Count Czernin)	明斯克 (Minsk)
		利佛耳 (Revel)

斯可夫 (Pakon)

黑特林伯爵 (Count Herling)

亞威列斯古將軍 (General Averescu)

勃夫梯 (Battea)

多布魯甲 (Dobruja)

多瑙河 (Danube)

培沙刺比亞 (Bessarabia)

第十章

伊立阿提 (Charles W. Eliot)

沙琴 (Sargent)

普列斯 (Pless)

蘇塞克斯 (Sussex)

霍沙湯尼克 (Honsatonic)

保非略迪亞慈總統 (President Por-

trio Diaz)

維那 (Villa)

哥倫布斯 (Columbus)

潘興將軍 (General Pershing)

喀朗閣 (Carranza)

意克哈特 (Eckhardt)

塔克薩斯 (Texas)

新墨西哥 (New Mexico)

阿利重那 (Arizona)

白賴安條約 (Bryan Treaty)

樸資丹 (Potsdam)

第十一章

卻爾斯大公爵 (Archduke Charles)

熊勃魯 (Schönbrunn)

波爾弗刺斯男爵 (Baron von Bolfras)

朗維白里埃 (Langewy-Briey)

濟大皇后 (Empress Zita)

包本帕馬 (Bourbon-Parma)

薩克士特 (Sixte)

柴維爾 (Navier)

希伐坐 (Schwarzen)

弗來新列 (M. de Freyinet)

哈勃斯堡 (Habsburg)

紐歐特爾 (Neuchâtel)

潘美爾路 (Rue Romnier)

愛爾杜地伯爵 (Count Erdödy)

普恩加登 (M. Poincaré)

糾爾肯那 (M. Jules Cambon)

威廉馬丁 (William Martin)

白里安 (Priand)

拉森堡 (Laxenburg)

李波特 (Ribot)

福克斯東 (Folkestone)

麻倫恩 (St. Jean de Maurienne)

普屬賽內西亞 (Prussian Slesia)

厄利斯利亞 (Erythraea)

台維斯 (Davis)

柏金漢宮 (Buckingham Palace)

外特島 (Isle of Wight)

司登福漢爵士 (Lord Stamfordham)

般那勞 (Bonar Law)

厥重爵士 (Lord Curzon)

愛特華卡爾孫 (Sir Edward Carson)

李定爵士 (Lord Reading)
 維克多伊曼紐 (Victor Emmanuel)
 班樂衛 (M. Painlevé)
 克里孟梭 (M. Clemenceau)
 利佛特拉伯爵 (Comte Rotherera)
 亞爾猛伯爵 (Comte Armand)
 福煦 (Foch)
 弗立堡 (Friburg)
 波希米亞 (Bohemia)
 第十三章
 斯洛文 (Slovenes)
 大爾馬地亞 (Dalmatia)
 塞爾維亞人 (Serbs)
 亞得利亞條約 (The Adriatic Treaty)
 普蘭可角 (Capo Planko)
 托蘭姆比煦 (Trenmitich)
 奧可維煦 (Hinkovitch)
 伏金洛維煦 (Vojnovitch)
 斯派拉托 (Spalato)

柴刺 (Zara)
 阜姆決議條 (Fiume Resolution)
 伊斯托里亞 (Istria)
 法郎洛蘇必羅 (Pramo Suplio)
 刺古沙 (Ragusa)
 佛里琴案 (Friedjung Case)
 尼可拉拍式煦 (Nikola Pashitch)
 伯爾格納特 (Belgrade)
 佛朗克林蒲爾隆 (Franklin Bouillon)
 回回教派 (Mussulman)
 阿蘭都 (Signor Orlando)
 朋斯 (Dr. Benes)
 米蘭 (Milan)
 第十三章
 盧森人 (Ruthenians)
 摩哈克斯 (Mohacs)
 梭立門大帝 (Solyman The Magnificent)
 馬沙克 (Thomas Garrigue Masaryk)

普刺圭 (Pragne)
 斯塔方尼克 (Colonel Stefanik)
 斯洛文國歌 (Hei Slovane)
 畢勳 (Pichon)
 西薩爾 (Robert Cecil)
 波希米亞民族同盟 (Bohemian National Alliance)
 第十四章
 米納爾爵士 (Lord Milner)
 貝當元帥 (Marshal Petain)
 海格陸軍元帥 (Jehd Marshal Haig)
 福煦 (Foch)
 蒲魯麥爾 (Pinner)
 賓格 (Byng)
 多倫 (Doullens)
 黑特林伯爵 (Count Hertling)
 海軍司令奧采 (Admiral von Hintze)
 李煦諾斯基 (Dielmowsky)
 亞爾次將軍 (General Freilherr von

Arz)

沙伏夫將軍 (General Savoff)

愛斯披來將軍 (General Franchet d'

Esperey)

般恩 (Barne)

巴登大公爵 (Grand Duke of Baden)

麥克司親王 (Prince Max)

可隆 (Vologne)

希爾海軍司令 (Admiral von Scheer)

海異大佐 (Colonel Heye)

布爾生 (A. S. Bursen)

馬克都 (W. G. Mc Adoo)

夏特孟 (Scheldemann)

莫德刺將軍 (General von Mudra)

莫德羅斯 (Mudros)

基爾 (Kiel)

埃爾慈伯吉爾 (Erzkorger)

奧本多夫伯爵 (Count Oberndorff)

溫特凡爾特 (Winterfeld)

康本 (Compiègne)

佛朗克樓堡 (Château Francport)

萊桑特 (Rathondes)

魏米斯海軍司令 (Admiral Wenys)

西姆斯海軍司令 (Admiral Sims)

海爾多夫 (Helforff)

梅顏斯 (Mayence)

可勃倫慈 (Coblentz)

自動礮 (Minnenwerfer)

里姆堡 (Limburg)

斯派他主義 (Spartacism)

第十五章

塔列蘭 (Talleyrand)

泰狄歐 (Tardieu)

杜他斯他 (Dufasta)

海地 (Hayti)

赫甲茲 (The Hedjaz)

比斯可芬飯店 (Hôtel Bischoffen)

大華飯店 (Hôtel Majestic)

奧斯托利亞飯店 (Hôtel Astoria)

康可街 (Place de la Concorde)

克利隆飯店 (Hôtel de Crillon)

李恩親王 (Prince de Ligne)

托蘭雪而文宜亞 (Transylvania)

斯瑪茨將軍 (General Smuts)

布爾喬亞 (Bourgeois)

阿特沙 (Odessa)

意卡左堡 (Eckartsau)

亞爾培 (Albert)

勃羅克林 (Brooklyn)

皮康非爾德爵士 (Lord Beaconsfield)

克洛茨 (Klotz)

莫利恩會議 (Conference of St. Jean

de Maurienne)

斯麥娜 (Smyrna)

克里斯必 (Crespi)

伯拉孔 (Bela Kun)

第十六章

雷實扶飯店 (Hôtel des Réservoirs)
 翠恩琅皇宮飯店 (Hôtel Trignon
 Palais)
 勃羅克多夫朗初伯爵
 (Comte Broeck
 dorf Kautzau)
 夏特孟 (Herr Scheidemann)
 古斯他夫包伊爾 (Gustav Bauer)
 漢孟繆勒 (Hermann Müller)
 漢尼爾 (Herr von Haniel)
 韋馬 (Weimar)
 勃拉地亞奴 (Bratinnu)
 約罕涅培爾 (Johannes Bell)

第十七章

北希來斯維格 (North Schleswig)
 中立的摩爾斯萊特 (Neutral Mores-
 net)
 里巴亞拉什丕爾 (Liege-Aix-la-cha-
 pelle)
 德意志關稅同盟 (Zollverein)
 薩爾路易斯 (Saarlouis)
 薩爾勃呂克 (Saarbrück)
 波都大會 (Assembly of Bordaunx)
 佛蘭克福條約 (Treaty of Frankfurt)
 托羅泊 (Tropau)
 何爾慶 (Hulschin)
 盧森人 (Luxembourgeois)
 卡派新 (Carpathian)
 潑里斯堡 (Preshburg)
 勃刺替斯拉伐 (Bratislava)
 阿倫斯坦 (Allenstein)
 馬林維爾特 (Marienwerder)
 馬林堡 (Marienburg)

但澤 (Danzig)
 維斯士拉 (Vistula)
 尼門 (Niemem)
 梅梅爾 (Memel)
 弗倫斯堡 (Flensburg)
 海里哥蘭 (Heligoland)
 登恩 (Düne)
 德意志式 (Deutschland)
 洛脫林更式 (Lotharingen)
 萊普齊克 (Leipzig)
 朋查耳 (Benzol)
 西客文件 (Papiers de Cergy)
 羅赫 (Rouher)
 阿斯孟大帝 (Caliph Ottoman)
 梅迪娜 (Medina)
 馬克華華蘇丹 (Mikawa Sultan)
 魯文大學 (University of Louvain)
 文愛克 (Van Eyck)
 間堤 (Ghent)

聖巴放禮拜堂 (Church of St. Bayon)
 地立克波慈 (Dierick Bouis)
 可勃倫茲 (Coblentz)
 開爾 (Kehl)
 斯托拉斯堡 (Strasbourg)
 第十八章
 洛加諾公約 (Pact of Locarno)
 聖日爾曼盎雷依 (St. Germain-en-Laye)
 卡勒羅灣 (Gulf of Quarnero)
 下奧地利省 (Lower Austrian Province)
 波可維拉 (Bukovina)
 威尼斯宮 (Palazzo Venezia)
 托里恩龍 (Grand Trianone)
 馬耶爾人 (Magyars)
 小協約 (Little Entente)
 路易條約 (Treaty of Neuilly)
 洛其 (H. C. Lodge)

馬摩拉海 (Sea of Marmora)
 加里波利半島 (Gallipoli Peninsula)
 斯滿拉 (Smyrna)
 厥爾迭斯登 (Kurdistan)
 熊島 (Bear Island)
 第十九章
 亨利第四 (Henri Quatre)
 愛牛林威廉 (Aneurin Williams)
 亨利懷特 (Henry White)
 魯特 (Roof)
 渥海渥州 (Ohio)
 哥倫布斯 (Columbus)
 可洛拉多 (Colorado)
 芝加哥每日論壇報 (Chicago Daily Tribune)
 沙姆叔 (Unele Sam)
 印地安拉帕立斯 (Indianapolis)
 聖路易斯 (St. Louis)
 特斯麥尼斯 (Des Moines)

明尼接他 (Minnesota)
 大可他斯 (Dakotas)
 蒙他娜 (Montana)
 布立特 (Bulitt)
 西雅圖 (Seattle)
 落磯山 (Rockies)
 斯模康 (Spokane)
 華盛頓報 (Washington Post)
 潘恩維 (Jacques Bainville)
 渥克拉河麻州 (Oklahoma)
 奧溫 (Owen)
 第二十章
 利加 (Lige)
 赫斯卻理親王 (Princee Frederick Charles of Hesse)
 亞蘭羣島 (Aland Islands)
 多彼特和平條約 (Peace Treaty of Dripat)
 貝映加 (Potschenga)

凡大 (Vilna)
 來佛耳 (Revel)
 伯耳滿大佐 (Colonel Yermontch)
 頓唐南將軍 (General Lashover)
 余登尼其將軍 (General Yulianich)
 鄧尼金 (General Denikin)
 海軍上將可爾加克 (Admiral Koltchak)
 克刺新 (Krasnin)
 越飛 (Yoffe)
 挪伐河 (Narva)
 北濱斯湖 (Lake Peipus)
 哥爾茲將軍 (General von der Goltz)
 耶特維加皇后 (Queen Jadwiga)
 維爾那 (Vilna)
 巴特利斯基 (Paderevski)
 華沙 (Warsaw)
 蘇華爾基 (Suwalki)
 徐立古斯基 (Zeligowski)

海門士 (Hyman)
 庫扶諾 (Kovno)
 白羅宋尼亞 (White Ruthenia)
 達奴普耳 (Tarnopol)
 第二十一章
 米列爾 (Millerand)
 尼蒂 (Nitti)
 特拉克魯 (Delacroix)
 桑來木 (San Remo)
 卡普改變 (Kapp Putsch)
 魯爾 (Ruhr)
 斯派他 (Spartacist)
 大姆斯達 (Darmstadt)
 特伐長別墅 (Villa De Vaclan)
 歐重爵士 (Lord Curzon)
 大使松非 (Marsni)
 亞美尼亞 (Armenia)
 托利比莊 (Trehizond)
 埃爾仔爾魯 (Erzeroum)

亞塞爾拜姜 (Azerbaijan)
 西克特將軍 (General von Seeckt)
 哈羅 (Hann)
 希西 (Hythe)
 林本 (Lyming)
 培爾加 (Belgrave)
 非列普沙遜 (Sir Philip Sasson)
 斯派會議 (Conference of Spa)
 陶斯計劃 (Dawes Scheme)
 米恩將軍 (General Milne)
 布龍尼 (Biarzgne)
 斯福閣伯爵 (Count Sforza)
 喬潔立蒂 (Signor Vitaliti)
 魏脫博士 (Dr. Wirth)
 范倫巴赫 (Felfrenbach)
 西蒙斯 (Simons)
 亞登消夏地 (Ardennes watering place)
 佛倫陸宮 (Hôtel de la Francisc)

特拉克魯 (Delacroix)

蓋斯勒 (Herr Gessler)

斯汀斯 (Hugo Stinnes)

威爾遜 (Sir Henry Wilson)

龍格爾將軍 (General Wrangel)

特肯納爾 (Trenchard)

李古 (Leynes)

白里安 (M. Briand)

聖詹姆斯宮 (St. James Palace)

士維特 (Tweed)

加洛格羅模洛斯 (Kalogeropoulos)

貝克爾沙米 (Bekir Sami)

蘭加斯特屋 (Lancaster House)

斯多加特 (Stuttgart)

杜斯堡 (Duisburg)

路洛特 (Ruhroft)

地實爾多夫 (Disseldorf)

萊茵地 (Rhineand)

小林男爵 (Baron Hayashi)

愛培爾特總統 (President Ebert)

哈維 (Harvey)

浪波列 (Rambouillet)

格來維茲 (Gleitwitz)

巴屯 (Benthen)

加士維茲 (Kattowitz)

康尼斯 (Cannes)

海員俱樂部 (Cercle Maritime)

拉生洛 (Dr. Rathenau)

庚洛亞 (Genoa)

山基阿基阿宮 (Palazzo di San Gi-

orio)

首相法克他 (Signor Facta)

巴士 (Barthou)

庇亞斯十一世 (Pius XI)

其克林 (Tehinderin)

拉可夫斯基 (Iakowski)

亞爾培別墅 (Villa d'Albertis)

亞長格爾戰役 (Archangel Expedition)

tion)

但尼金 (Denikin)

可爾札克 (Kotzebak)

拉派洛 (Rapallo)

巴勒杜克 (Bar-le-Duc)

第三十三章

休士 (Charles Evans Hughes)

哈定 (Harding)

亞林頓墓地 (Arlington Cemetery)

北大可他 (North Dakota)

特拉維爾 (Delaware)

何茲 (Hoods)

前無畏艦 (Pre-dreadnoughts)

喬治五世 (King George V)

阿刺斯加 (Alaska)

領袖艦 (Flotilla leaders)

沙勞 (Saraut)

喀斯塔克斯艦長 (Captain Castex)

海洋雜誌 (Revue Maritime)

麥塞 (Masses)
罐原 (Hanibara)

第二十三章

探尼斯 (Thennis)
托來他 (Marguis della Torreta)
地質爾多夫 (Disseldorf)
里培 (Lippe)
多特孟德 (Dortmund)
孔諾 (Cano)
巴登 (Baden)
亞本維爾 (Aphenweiler)
托利安 (Trillion)
法國外交部 (Quai d'Orsay)
暴漢 (Bully)
斯脫拉斯孟 (Stresemann)
張伯倫 (Ansten Chamberlain)

第二十四章

凡爾登 (Verdin)
法朗克 (Franks)

洛沙林基亞 (Lotharingia)
可隆 (Cologne)

亞丹陶爾登 (†. Adam Dorten)
維斯巴頓 (Wiesbaden)

萊因武裝黨 (Rheinwehr)
萊因共和國 (Rheinische Republic)

麥第斯 (Matthes)
派拉丁納特 (Palatinate)

赫新 (Hessian)
魯特維格夏芬 (Ludwigshafen)

二不呂根 (Zweilucken)
蓋斯南 (Herr Gosler)

亞拉什丕爾 (Aix-la-Chapelle)
梅因斯 (Mayence)

泰晤時報 (Times)
梅茲 (General de Metz)

克乃夫 (Cive)
麥克勒爾 (Ronald Menell)

巴塞爾孟 (Ernst Bassermann)

馬格利 (Margerie)
朗特馬克 (Rentenmark)

路得 (Luther)
第二十五章

紐海芬 (New Haven)
麥克唐納 (Ramsay MacDonald)

麥克斯 (Marx)
賀煦 (Hösch)

亞斯托利亞旅館 (Hôtel Astoria)
陶斯將軍 (General C. G. Dawes)

揚格 (O. D. Young)
金特士來 (R. M. Kindersley)

斯當普 (J. Stamp)
派孟地 (Parmentier)

阿利克斯 (Allix)
皮乃里 (A. Pirelli)

弗洛拉 (F. Flora)
霍達特 (Houtart)

弗朗葵 (E. Fraunig)

- 羅賓生 (H. M. Robinson)
 麥金那 (R. McKenna)
 勞隆阿塔林 (Laurent-Attalin)
 亞爾培 (M. Albert)
 姜生 (A. E. Jansson)
 包爾溫 (Baldwin)
 亞來賜 (Aix-les-Bains)
 斯派協定 (Spa Agreement)
 第二十六章
- 馬沙爾 (François-Marsal)
 杜美格 (Gaston Dannerue)
 赫禮歐 (Edouard Herriot)
 愛爾伯總統 (President Albert)
 乞坎司 (Chequers)
 開洛格 (Kellogg)
 聖詹姆斯 (St. James)
 洛更大佐 (Colonel Logan)
 柏林時報 (Berliner Zeitung)
 時報 (Temps)
-
- 里子 (Ritz)
 諾爾列特 (General Nollet)
 第二十七章
 李維諾夫 (Livinov)
 渥姆斯克 (Omsk)
 科爾札克 (Admiral Kolchak)
 卡爾司 (Kare)
 阿達汗 (Ardahan)
 巴士姆 (Batoum)
 總牧師波克維基 (Monseigneur Butkevitch)
 維斯坦因 (G. Weinstein)
 霍格生 (R. M. Hodgson)
 加拉罕 (M. Karaklan)
 潘森比 (Arthur Ponsonby)
 拉可夫斯基 (M. Christian Rakov-ski)
 亞更吉爾 (Arkangel)
 第二十八章
-
- 慈乃斯 (Thrace)
 歐非爾特 (Sheffield)
 畢勒 (M. Picton)
 米恩將軍 (General Milne)
 薩佛 (Sevres)
 安實盧 (Erzeroum)
 沙隆尼加 (Salonika)
 恩佛帕夏 (Enver Pasha)
 加里波立 (Gallipoli)
 斯滿拉州 (Smyrna)
 安哥拉 (Angora)
 沙卡利亞河 (R. Sakaria)
 飲哀魯 (Inn-Enniu)
 奧格斯他大帝 (Emperor Augustus)
 法朗克林蒲朗 (Franklin-Bouillon)
 羅多斯托 (Rodosto)
 卡拉希沙 (Ahum Karahis-sar)
 察拉克 (Charak)
 意斯米德 (Ismid)

哈林頓將軍 (General Harrington)	卡拉加照 (Karagach)	喀斯特洛利佐 (Castellorizo)
哈米德 (Hamid Bey)	馬利蘭 (Maritza)	多德康尼斯 (Dakaneese)
馬利蘭 (Maritza)	木蘇爾 (Musul)	渥托孟 (Ottoman)
亞得利洛堡 (Adrianople)	蓬派 (Bonpart)	塞普拉斯 (Cyprus)
瑪當尼亞 (Mufanie)	加隆尼 (Marquis Garroni)	察拉克 (Chamak)
夏貝 (Charpy)	利蘭高爾 (Riza Nur)	親王羣島 (Kizil Adalar)
莫培利 (Mombelli)	貝爾將軍 (General Pelle)	來門諾斯 (Lemnos)
意斯麥特 (General Ismet Pasia)	格魯 (Grew)	薩木惹乃斯 (Sam-thrace)
馬蘭拉基斯 (General Mazarakis)	伏鹿夫斯基 (Vorovsky)	密帖倫 (Mytelene)
蘇丹麥默特六世 (Sultan Mehmed VI)	德特加照 (Devdaganah)	覺斯 (Chios)
馬爾達 (Malta)	彭加濟斯總理 (Premier Pangalos)	薩木斯 (Samos)
麥吉特 (Abdul Mejit)	盧明宮 (Palais de Rumine)	尼加利亞 (Nikaria)
亞西士 (Abdul Aziz)	里伐牙 (Rezavaya)	惹乃斯協定 (Thracian Convention)
第二十九章	依拉克 (Iran)	披亞司脫爾 (Piastes)
滿地賓則卡新洛 (Casino de Monte-nou)	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第三十章
意斯麥特拍夏 (Ismet Pasia)	應不羅斯 (Imbros)	麥克斯 (Marx)
歐齊離宮飯店 (Château d'Orchiv)	鄂尼杜斯 (Tenedos)	路德 (Luther)
倫巴德 (Herace Rumbold)	拉必特羣島 (Rabbit Islands)	斯脫拉斯孟 (Stressmann)
	羅德斯 (Rhodes)	可隆 (Cologne)

康城會議 (Cannes Conference)

樸立替司 (Pollitis)

朋斯博士 (Dr. Jennes)

恢復失地主義 (Terratenism)

查爾孟 (Charlemagne)

盤根地 (Bygonesian)

麥吉利 (Magerie)

古斯博士 (Dr. Gaus)

西錫爾赫斯特 (Sir Cecil Hurst)

佛羅曼哲 (Fromagot)

羅林 (Rollin)

披洛地 (Pilotti)

班樂衛 (Painlevé)

斯克靜斯基 (Skrynski)

美汲湖 (Lake Maggiore)

樊迪文 (Vandeveld)

謝洛亞 (Scialoja)

修佩爾特 (Schubert)

基爾特廳 (Kird Hall)

托奈齊加 (Treitschke)

柯夫事變 (Coffin Incident)

瓊尼那 (Jannia)

桑地可隆他 (Santi Quaranta)

德里尼 (Tellini)

科地 (Corti)

邦拉新尼 (Bonaccini)

羅伯特西薩爾 (Robert Cecil)

沙朗特拉 (Salandra)

法利龍 (Phaleron)

埃阿寧羣島 (Ionian Islands)

德美加普 (Demirkapu)

馬其頓 (Macedonia)

托里斯脫 (Tristie)

伊斯屈利亞 (Istria)

加布里鄧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

拉派洛條約 (Treaty of Rapallo)

樸托博羅斯 (Porto Borros)

蘇沙克 (Sushak)

里新那 (Rechina)

亞馬地亞 (Amathia)

羅希德 (Dr. Tewfik Rushdy)

賴唐南將軍 (General L. Laidoner)

